REAGAN

里根传 上

[美] H · W · 布兰兹◎著　杨清波 向平◎译

The Life

H.W.Brands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里根传：上册

作者:[美]H·W·布兰兹

译者:杨清波 向平

ISBN:978750866913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幕

今晚**9:30~10:00**
WNBC电视台第四频道
邀您与罗纳德·里根一起
共同见证
“抉择时代**”**
发起者：**WNBC**电视台
主办方：戈德华特竞选委员会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巴里·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大势已去，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而他的对手——国内最为狡猾诡诈的政客林登·约翰逊——已经把自己包装成类似殉难的约翰·肯尼迪那样具有牺牲精神的人，发起了一场民权革命。他还把自己塑造成了头脑冷静的三军统帅，抵挡住了东南亚的暴乱。在这一过程中，约翰逊使戈德华特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种族主义者和一个好战的战争贩子。而戈德华特称自己是个激进分子，尽管是以保护自由的名义；他还建议应当在越南动用核武器，但这一切并没有帮助他的事业。他讲得越多，困境便越深，成功的机会也就越渺茫。绝望之中，在大选前一个星期，戈德华特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在政坛上寂寂无名的代理发言人罗纳德·里根求助。

里根当时面临着一种不同的绝望境地，不那么公开却更为持久。作为一名过气明星，里根一直在兜售美国一家公司的产品，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孩提时代，里根就发现了观众的强大诱惑力，发现了掌声可以缓解人内心的焦虑。他从教会短剧的舞台一路走来，历经校园剧和无线电广播，自己的观众增加到了几十万。然后，里根又走上荧屏，让数百万人熟悉了他的面孔和声音。但是，在好莱坞他遭遇到了自己天赋的上限。他从没有在影院门口的宣传栏赢得过一席之地，也从未跻身一线明星的行列。等到了35岁左右时，里根已无法得到好角色了。他开始兼职

参与到电影行业的政治中去，代表演员与电影制片厂谈判。但这份临时工作很快就到期了，他手头拮据，急需工作。里根接受了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份工作，这使他又回到了荧屏上。只不过这是一个小了许多的电视屏幕，在系列主持中角色也少了许多。里根的合同要求他为通用电气公司在全国巡游，与公司员工和当地业务助理对话，探讨大公司带来的好处及其在“美国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自己的梦想在逐渐消失。当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结束时，这些梦想几乎消失殆尽。为巴里·戈德华特代言的邀请来得正是时候，简直是天赐良机，但也充满了风险。这次机会让里根再次直面观众，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清楚，假如他搞砸了这次机会，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并没有太高的奢望。他们在1964年10月27日的《纽约时报》第79页买下了一个单列通知栏。类似的广告在全国报纸中的影响力同样深刻。在1964年，政治竞选团队依然还在揣测如何利用电视。他们对于利用现场推介犹豫不决，担心别人会认为他们在包装其候选人，就像包装麦片和香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创造了一场人造的政治活动。他们在洛杉矶租下了一个礼堂，招募了数百名支持者，这些人收到了戈德华特的海报和标语牌。竞选团队把里根安排在一个用幔幕装饰成的讲台上，电视观众会以为是红白蓝三色，尽管转播是黑白的。里根仿佛是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讲话，这种集会体现了100多年来美国政治的特色。

但是，此次舞台式的活动缺乏真正集会的那种自然，并且演讲开始得也很尴尬。观众一直在等待着提示，等着戈德华特的名字，但里根在讲了很久之后才提到这位候选人，观众也一声不吭地坐着。里根有些紧张，语速太快。他标准的通用电气公司巡回演讲比那晚的电视节目时限要长。然而，里根却没有将其简化，反而尽量把所有内容都囊括进去。听众的沉默使他的俏皮话也流于平淡，这让现场气氛更加尴尬。在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期间，他放弃了年轻时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观点，转而支持亲企业的保守主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里根积累了成套的统计数

据记事卡，上面记录了政府的浪费和无节制。当晚，他飞快地说出这些数据，让人不知所以。然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里根从国内政治突然转向外交政策，让观众想不出美国联邦债务与古巴卡斯特罗革命有什么关系。他的手势与他的讲话内容也不搭配。他的一个主要动作是摆动右手的食指，这看起来明显带有学究式的古板。

然而，在这场半个小时的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次迟迟才提及的戈德华特的名字让人群有了反应。人们的鼓励让里根镇定了下来。他开始讲笑话，人们也完全理解了这些笑话。"每当你我对空想社会改良家的构想提出质疑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指责为反对他们的人道主义目标。"里根说道，"他们说我们总是'反对'——从没有'支持'过什么。可是，我们自由主义的朋友们的问题是，他们并非无知，而是他们十分清楚事实不是这样的。"

观众更活跃了。美国保守派是个好斗的群体，不会称自由派是他们的"朋友"，此刻里根却这样做了。他的声音很严肃，但并不像戈德华特常常表现得那么愤怒。里根抨击了民主党领导人，却没有攻击民主党；他谴责了美国政府的发展方向，却表达了对于美国人民的信心。

从一开始，里根就说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没有给他准备讲稿，他所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话。他没有说他曾在数百名观众身上测试过这些话，但优美的语言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蒙恩于人民，除却至高无上之人民，再无权力之源。在所有漫长的人与人关系的历史上，这种思想依然是最为新颖、最为独特的思想。"里根说道，"这就是本次选举的问题所在：到底是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自治还是我们放弃美国革命，承认远在首都的少许知识分子精英能够为我们规划生活，并且能比我们自己规划得更好。"

里根用生动的例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看到一个胖子与一个瘦子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胖子之所以胖是因为他占了瘦子的便宜。"他借此抨击了政府的再分配方案。

政府的福利项目成了一种敲诈。“一位法官在洛杉矶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说一位打算离婚的年轻妇女要来找他。这位女士有6个孩子，正怀着第7个。在他的追问下，这位妇女透露说她丈夫是个工人，每月能赚250美元。她想通过离婚来增加80美元的收入。按照抚养子女援助计划，她有资格每月得到330美元。她从两位女邻居那里了解到这一点，她们俩已经这样做了。”职业培训计划是典型的恣意挥霍。“每年光是为我们所资助的每个年轻人在食宿上的花费就达到了4700美元，而送他们去哈佛的费用才2700美元！”里根面露笑容，继续说道：“当然，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去哈佛就可以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观众大笑鼓掌。有些观众还记得挥舞他们手中戈德华特的标语牌，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们面前的这个人身上。“从来就没有政府会主动缩减其规模。”里根说道，“因此，政府项目一旦启动，就永远不会消失。事实上，政府机构才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见到的最近乎永生的玩意儿。”观众再次笑了起来，掌声也更热烈了。

里根的节奏完全控制了观众的情感。政府调控是社会主义的。“这不需要没收或征用私人财产或企业来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一国人民。假如政府掌握着那些企业或财产的生杀大权，那你是否在名义上拥有自己的企业或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机制已经存在了。政府可以随意起诉它想要指控的企业。每个生意人都有一部遭受骚扰的血泪史。不知什么时候，霉运就降临了。我们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如今被当作政府的恩赐，而自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仿佛随时都可能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

自由面临的危险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从国外的共产主义到国内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威胁都来自同一种自由派。“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救济的人跟我们说，他们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法，可以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他们称其政策为‘和解’。他们说只要我们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敌人就会忘却其恶行，并学会爱我们。一切反对他们的

人都被指责成战争贩子。他们说我们为复杂问题提供了简便易行的答案——但并不是简单的答案——只是容易操作：假如你我有勇气告诉那些当选的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高尚的事物的基础之上的。”

里根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他令大家欢呼，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不能犯下弥天大罪，向目前被奴役在铁幕之后的10亿民众说什么‘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的性命，放弃你们对自由的梦想吧。我们愿意与你们的奴隶主做笔交易’。我们无法从炸弹的威胁那里买到安全和自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说过：‘一个为了避险而选择屈辱的民族已然虚位以待其主子，也必将会如愿以偿。’现在，让我们澄清事实吧。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你得到和平，你可以马上得到它，那就是：投降。”

里根引用了帕特里克·亨利的话：“莫非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美好，竟值得我们以镣铐和奴役为代价来获得？你我都清楚，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又进一步深挖历史：“假如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吗？或者说，摩西应当告诉以色列的孩子们，要他们生活在法老的奴役下？基督应当拒绝十字架？康科德大桥的爱国者们应当丢下武器，拒绝打响那震惊世界的一枪？历史上的烈士们不是傻瓜，我们那些献出生命阻止纳粹前进的英烈们死得其所。”

里根的演讲接近尾声了。“那么，通往和平的道路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你我都有勇气对我们的敌人说：我们不会付出如此代价，你们也不应超越这一底线。”他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人类的命运不是靠物质上的多寡来衡量的。当伟大的力量在世上运行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是具有灵魂的人，而不是动物。”他再次引用丘吉尔的话：“时空之中，斗转星移；时空之外，责任在肩，无论你我喜欢与否。”里根又转而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对一个共和党人来说令人

惊讶。“你我都与命运有约。”他说道。最后，里根在演讲中向林肯致意：“我们将为我们的孩子保留这世上人类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或者我们将宣判他们从此步入千年的黑暗之中。”

此次演讲来得太晚，无法拯救戈德华特的命运，他以绝对劣势输给了约翰逊。但这次演讲为里根挣得了未来。在他演讲结束的时候，礼堂中的听众翘首跺脚表示赞同，全国电视观众的反应也几乎同样积极。各种社论和信件赞扬了这位新人为捍卫美国人在国内外的自由而带来的活力和说服力。许多共和党人总结说他们提名了错误的人选。里根从没有竞选过公职，但他的名字很快就成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人选的热点话题。其他州的保守派组建了拥护里根参选美国总统的委员会。

里根声称，对于命运的突然逆转他感到很惊讶。或许他曾经感到很惊讶，但他并不是没有准备的。早在当播音员时，他就一直在锤炼自己的播音技能，而为通用电气公司主持的那些节目就好比登上大舞台初次公演之前在小剧场进行的长期锻炼。7年演员工会主席的历练让他接触了与真正的政治一样的生态。10年来，里根曾一度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大批的观众了，而这10年也让他对满足的渴望变得更为迫切，而这种满足只有掌声才能带来。

后来，那些读到里根演讲稿的人意识到这篇稿子写得无与伦比，让人们开始关注里根，而不是戈德华特。那些最具引用价值的语言与戈德华特无关，只不过是戈德华特与里根的保守观点一致而已。里根把自己定位成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只是碰巧在为戈德华特的竞选效力。戈德华特的失败非但没有伤害到里根，反而让他更受欢迎，成了一位保守派可以团结在其周围的对象。

里根不可能知道他的演讲开启了美国政坛中最为不平凡的一次职业生涯；不可能知道他将两次当选联邦中人口最多的州的州长，并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将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深刻程度仅次于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位总统。在1964年秋天，他所

能知道的一切就是当一生中事业的大门正在开始关闭，而他自己的大门显然已经关闭的时候，他突然踢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里根做好了迈步前进的准备。“我从没有渴望得到个一官半职，也从没有对仕途有过任何特殊的好感。”他冷静地对记者们说道。他说他依然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但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必须听从于他的同胞。“这么多人认为我应当从事公职，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受宠若惊。”他们的意见值得深思。“我会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想法，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这都将是基于我的考虑，认为能够为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一部分 草原牧歌 **1911~1934**

1

关于童年，里根记得三件事情：父亲是个酒鬼，妈妈是个圣人，而他具有让听众大笑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缓解了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和种种尴尬。

“我11岁那年，从基督教青年会回到家中，当时正值冬天，天色已晚，寒风凛冽。”里根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妈妈外出做女红去了，我料想家中没有人。”内莉·里根做些活计来补贴丈夫的收入。“我在上台阶的时候差一点儿被前门旁边的一团东西给绊倒了。那是杰克倒在雪地里，双臂伸开，平躺在地上。”里根和哥哥尼尔对父母都是直呼其名。“我弯下腰查看出了什么事，结果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他从一家地下酒吧回家，刚好昏倒在那儿。我低头看了他一两秒钟，想着继续往前走回家，上床睡觉，就当作他不在那儿一样。但我不能那样做。我试图叫醒他，可他一直鼾声如雷，声音很大，我想所有邻居都听到了。于是，我拽住他的衣角，生拉硬扯地把他拖进了房子。”

这个孩子观察了父亲数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杰克不是那种一遇到不幸就狂饮作乐或借酒消愁的酒鬼。”里根说，“不是这样。杰克不能忍受的是和美幸福的生活。每当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他就会犯病，尤其是在假期或家庭团聚的时候，这就给了他一个放纵的借口。圣诞节期间，我们家总是笼罩在危险之中，因为我们都清楚节日里的杰克最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因此，我总是备受煎熬，既盼望着圣诞节，又害怕它的到来。”

杰克·里根酗酒的劣习使他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养家糊口者，在他的小儿子10岁前，一家人辗转颠沛于伊利诺伊州各地。罗纳德·威尔逊·里

根于1911年2月6日出生于坦皮科市，在他两岁时一家人搬到了芝加哥，之后又到了盖尔斯堡、蒙茅斯，然后又回到了坦皮科。地点的变化如同车窗外的风景。里根记得芝加哥一辆轰鸣狂啸的消防车，这让他曾经梦想当一名消防队员。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里根一家在盖尔斯堡。部队专列疾驶而过，在一个6岁大的孩童眼里，列车上的战士体现了冒险精神和英雄主义。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当时里根一家人在蒙茅斯，当地的庆祝活动几乎让这个小家伙不知所措。“游行、火把、乐队、鼎沸的呐喊声、狂饮以及焚毁德皇威廉二世的肖像，这些东西让我感到不安，不同于我自己的世界。”里根回忆道。

里根9岁时一家人来到了迪克森，这座一万人的小镇成了他的故乡，直到他外出上大学。杰克·里根振作了一些，或许也可能是内莉决定停止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当儿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挑战。迪克森几乎没有天主教徒，也不喜欢他们中的多数人。孩子们没有追随他们父亲的信仰，但镇上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们在杰克·里根身上发现的天主教徒的劣迹被转嫁到了他们头上，他们被迫自卫，有时候会动用拳脚。他们还忍受着因为杰克的嗜酒劣习而带来的蔑视，对此的还击更为剧烈却不那么理直气壮。

内莉·里根用心良苦地解释丈夫的劣习，意在引起孩子们的同情和理解。“内莉努力想要表明他生病了，无法控制自己。她不断地提醒我们他在不喝酒时对我们是多么慈祥。”里根回忆说。内莉的祖上是苏格兰人，杰克是爱尔兰后裔。她体现了苏格兰人出了名的那种勤俭节约。当然，鉴于她丈夫不稳定的收入，她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内莉把尼尔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传给罗尼（罗纳德的昵称）。她还打发尼尔到屠夫那里，为家里那只“不存在的猫”去央求些动物内脏。她在炖锅里填满麦片，假装是一道美味佳肴。“我记得她第一次把一盘麦片肉端到餐桌上的情景。”里根回忆说，“又厚又圆的小馅饼藏在肉汁里，我之前从没有见到过。我咬了一口，润滑多肉，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了。”

内莉通过说教，尤其是通过以身作则的方法教育儿子们信仰宗教。每个礼拜日她都会去基督教堂，最初是带着儿子们参加主日学校，后来就参加常规的宗教活动。内莉从来不恶意揣测儿子们认识的任何人。“虽然我的父亲玩世不恭，常常会想到人的劣性，但我的母亲截然相反。”里根回忆说，“她总是想从人们身上发现最好的一面，也确实发现了，即使是那些我们当地监狱中的犯人。她经常给他们带去热汤热水的食物。”内莉倡导并践行着黄金律。“母亲总是教导我们‘试着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她总是先人后己，并总是最先考虑儿子们。“我父亲怀揣梦想要自己出人头地，而她却一直努力帮助我和哥哥取得成功。”

有一件事使杰克·里根看起来让儿子们十分敬佩。孩子们年少时目睹了三K党的死灰复燃，该组织把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移民添加到非裔美国人的行列，作为其恶意攻击的目标。杰克禁止儿子们观看D·W·格里菲斯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该影片将白袍卫士塑造成了英雄。尼尔和罗尼争辩说，其他所有的孩子都看了这部电影，并且影片中的三K党与现实中的存在时空差异。“三K党还是三K党，白袍还是白袍，任何白袍蒙面的人都是孬货。”里根记得杰克这样说过。

里根还讲述了杰克跟他说过的一件事。在一次出差途中，杰克登记入住了一家宾馆。当时店主向他保证说：“您会喜欢这里的，里根先生。我们这里不允许犹太人入住。”杰克一把抓起箱子，转身离开了。他大声说道：“我是个天主教徒，今天你不接受犹太人入住，那将来有一天你也不会允许我入住的。”那晚，杰克·里根在自己的车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尼尔·里根擅长交往，喜欢运动，每次搬家之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找到合适的圈子。比他小两岁半的罗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频繁的搬家让他感到不安。“在学校里，我一直是个新生。”里根回忆说，语气里还带着以往的焦虑。“有一段时间，四年中我上了4所不同的学校。”尼尔在运动方面的魅力也让他自惭形秽。“我很矮小，在沙地上进行的橄榄球比赛中，很多时候我都被压在人堆的最下面。打棒球时，我总是三振出局，或者因错失简单的腾空球而遭受羞辱。我的棒球技术很差，每当我们这伙人在轮流挑选队员时，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还记得上八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二垒位，当时一个球径直向我飞来，但我没有意识到。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希望我能抓住它。我就呆站在那里，球落到了我身后。所有人大喊：‘天啊，不会吧！’数十年之后，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这种事你不会忘记的。”

里根的麻烦之一是近视，戴眼镜可以矫正一些，虽然可能会被嘲笑成“四眼儿”。他喜欢“荷兰仔”这一绰号，最初是由于内莉给他理发的样式而得来的。然而，对他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已经形成。“我很难相信自己可以与其他孩子一起很好地玩耍。这种自信心上的残缺不是小事，尤其是在你成长期间，运动和游戏在你周围的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我总是首先想道：我无法加入这一伙，因为我没有杰克、吉姆或者比尔那样棒。”

但是，有一个方面他跟其他人一样出色。内莉·里根为丰富迪克森的文化生活做了一些贡献，在她所属的教堂组织业余演出。参加者诵读他们熟记的来自书籍、戏剧、诗歌或演讲中的章节段落。内莉也参加表演，并乐在其中。她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参与进来。尼尔痛快地答应了，而“荷兰仔”却需要说服。内莉坚持不懈，最终把他争取了过来。里根回忆道：“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走上舞台，清了清嗓子，开始了我的舞台处子秀。我记不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场观众的反应：人们开怀大笑，不断鼓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奇的经历，我喜欢这种经历，喜欢这种认可。对一个备受童年不安全感折磨的少年来说，这种掌声如同天籁之音。”

这种天籁之音培育了里根对于讲故事的痴迷。他从小就开始读书，记性很好。牧人兄弟、泰山和弗兰克·梅里威尔的故事让他从父亲酗酒的阴影中逃脱出来，抚平了生活的艰辛困苦，让这个缺乏经验的孩子可以努力适应生活。他想象着有朝一日，他的世界将会像那个受人爱戴的体育明星梅里威尔的世界一样。故事还为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父亲教给他如何讲故事。里根回忆说："他有着一种辛辣尖酸的幽默感，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棒的讲故事高手，尤其是讲到那些吸烟车厢的故事时。"内莉反对丈夫讲那些低俗的故事，但在这一点上，儿子站在父亲一边。"杰克总是向我们明确指出，此种奇闻逸事在一定情境下都会发生。他严格区分带有贪欲色彩的低俗幽默和淫猥。直到今天，我还赞同他的信条，并同意杰克和马克·吐温的观点——美国幽默的根本形式之一就是普通民众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智慧。如果其核心是以真正的幽默为基础的，那么即使语言存在问题，也是说得过去的。"

一位善于启发学生的老师鼓励年少的里根发挥其讲故事的天分。在其九年级的英语课堂上，B·J·弗雷泽告诉学生们说，优秀的作文应当是既具娱乐性又有教育性。"这促使我对于我的作文展开想象。"里根回忆道，"不久后，他就要求我向全班朗读我的一些作文。当我开始博得一些笑声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用我的作文来娱乐整个班级。我赢得了更多的笑声，也意识到自己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在教堂朗读一样。"

里根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主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是万圣节之夜，但一切都在变化。好人们在这一纪念仪式中睡着了"——可能是"值得纪念的"——"周六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四处跑动的声音，人们的耳朵里回响着含混不清的喊叫声，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只是到了午夜12点的时候，气喘吁吁的一阵咆哮声唤醒了小镇。"小镇上爱搞恶作剧的人们一直在火车站那边的夜色中活动。"来自北方的货物列车正在徒劳地挣扎，想要驶过100英尺[注]长的涂过润滑液的铁轨。"最终，火车

技师耐心地摆弄着机车驶过这一打滑的路段。“但第二天一早，更大的奇迹发生了。小镇变了模样，只是变得不那么美丽了。电线杆被人用门廊里的家具、指示牌和各种马车、小货车进行了装扮。街道看起来像是在进行清仓大甩卖，而学校和商铺的门口堆满了前几个晚上的战利品。”——句子到此结束了，少了一两个单词和一个单引号。故事用华丽的辞藻结束了：“但是天哪！除了电线杆上偶尔还在的一把椅子，现场很快就被这些物品各自的主人破坏掉了。”

上十一年级的时候，里根创作了一篇更长的故事。“马克带着一丝神秘和期待，坚持要跟我一起吃饭。”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叙事者和马克是耶鲁大学的学生——那是弗兰克·梅里威尔的母校，当天他们二人正在纽约市观光。“我们来到一处远离百老汇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这里没有名胜地的那种高雅，也没有鲍厄里大街那种肮脏污秽，这地方让人无法尝试进行归类。”他们无意中听到旁边两个人在商议一件违法勾当。“其中一人个子很高，皮肤黝黑，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着光芒，下巴尖瘦。他的同伙看起来一直在说着什么。这家伙黑黢黢的，一头黑发，长得矮胖，留着一副凡·戴克式的山羊胡，外加一副打了蜡的尖八字胡。突然，我们听到那个喋喋不休的男人发出一阵嘘声。‘笨蛋！炸弹会搞砸的，毒气更悄无声息。’我的心猛地一沉，喉结一紧。”密谋者离开了饭店，但留下了一张纸，马克一把抓了过来。纸上画的是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大楼。“毒气一词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就像是一块飞驰的陨石。图上用红墨水标出的是财政部大楼整个通风系统。”马克与叙事者面面相觑。“我们一言不发。两个耶鲁大学的大学生看起来不可能独自抵挡住疯狂的团伙和在那张破纸上谋划的可怕悲剧。”但他们必须试一下。他们冲到当地的警察局，向警官报告了他们的情报。这名警官把他们扔进他的警车开始追赶密谋者。他们抓住了那二人，结果发现他们脸上带着开心的微笑。他们根本不是罪犯，而是从一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这一点是马克不经意间从手边的一份报纸上发现的。“他拿着报纸，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上面有个令人捧腹的标题‘疯子逃跑，举报有奖’，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文字下面就是我们刚刚找

到的朋友的照片。所以，‘老伊莱’的荣誉得到了维护。”

在不教授英语的时候，B·J·弗雷泽负责组织迪克森高中的戏剧节目。他鼓励里根尝试一下。里根很高兴，希望获得更多的天籁之音。此刻，他已经长大了许多，克服了自己的一些羞怯，尤其是发现这不像运动或橄榄球那样需要敏锐的视力或者要与队友进行某种合作。然而，早期的那种敏感依然存在，舞台表演继续在缓解这种敏感。“对一个依然怀有过去那种不安全感的少年来说，同学们的反应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天籁之音。”里根说。随着每次的舞台谢幕，这种经历正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等上了高中的时候，我对学生戏剧演出非常痴迷，没人能够把我排斥在外。”

在后来的岁月里，里根反思了这一现象。“娱乐界有一种东西能够吸引那些年少时期感到羞怯或不安全的人们。”他观察到了这一点。“在我去好莱坞之后，我遇到的那些最成功的人当中有些人——许多演员和伟大的喜剧明星，比如杰克·本尼——在晚会上会安静地坐着，甚至很腼腆，而最搞笑的那些人却是作家们，他们占据着舞台中央，成了真正爱炫耀的人。这让我感到很疑惑：是否有些艺人没有被他们的使命所吸引，因为他们有些缺乏安全感，而这一工作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成为他们自身之外的某个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美国人与里根一样喜欢故事，原因也差不多。美国建国初期十分艰难。其他国家的居民从共同的历史和长期依附的特定国土中获取他们共同的身份，而美国人——主要以移民和他们的后人为主——除了对故土的厌弃之外，没什么共同点。所有缺乏经验的孩子都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故事，一个可以赋予他们迥然不同的经历以一种共同意义的文化纽带。

他们在所谓的美国例外论中发现了最为满意的故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称清教徒的定居点是“山丘上的城市”，为各地

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托马斯·杰斐逊和《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一起，将他们与英国的争端直截了当地置于“人类活动的发展历程”中，而不仅仅是北美或者是大英帝国的活动。19世纪40年代，命定扩张论的拥护者们提供证据证明美国受命于天，拓疆扩土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福音。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宣称，美国内战是一场决定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否会消亡的战斗，不仅仅是从美国消亡，而是从地球上消亡。19世纪90年代支持海外扩张的拥护者们升级了命定扩张论的观点，转而宣称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净化天堂，并引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美国人之所以优越是民族与文化激烈竞争的结果。

等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例外论的概念在民族心理中已经根深蒂固。伍德罗·威尔逊领导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说只有以美国为代表和领导的最无私的民族、最发达的民主才能够拯救西方文明于其自身引发的可怕的毁灭之中。西方文明的确幸存了下来，但十分勉强。美国例外论随之转向国内，因为事情变得很明显——世界还没有为美国的这种再生式的领导做好准备。年轻的里根接受了那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威尔逊判断严重失误，领导美国参与了战争。在回忆起他曾为之欢呼的那些参战士兵的命运时，里根反思道：“一想到军列上那些我曾向他们挥手致敬的年轻战士后来战死在欧洲大陆，我在很长时间里反对美国参战。”

反对威尔逊计划的活动包括拒绝接受威尔逊上台时提出的自由主义。20世纪20年代是人们记忆中最为保守的10年。禁酒令被写进了宪法；州议会规定讲授进化论是违法的；世界大战引发的外国革命使“恐慌”席卷全国；对外国人的仇视造成了移民的锐减，并导致了三K党的死灰复燃。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政府的权力不断增长，之后美国人的注意力从政府转向了私营企业。卡尔文·柯立芝说：“美国的主要工作就是商业。”他的大多数同胞都同意这种说法。

这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治下美国经济的繁荣。通用汽车公司

每年都推出不同的车型，车主们把汽车看作身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在这之后，汽车业成了工业部门的支柱。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改变了日常生活，创造了之前从没有过的需求。房地产和住房业迅速崛起，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阳光充足的地区。股票市场一路飙升，股价成4倍地增长，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百万富翁。

然而，财富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城市一派欣欣向荣，农业部门却萎靡不振。物价再没有回到战时水平，尽管农民们一直希望如此。当农民们满怀希望地耕种时，过量生产和低价格积习难改。

年少的里根没有分析国家经济，但他感觉到了农业萎缩的影响。虽然他父亲的工作是卖鞋，不是谷物或家畜，但当住在迪克森附近的农民——他们可能曾是杰克·里根的顾客——无法卖出他们的谷物或家畜时，他们也就不买杰克的鞋了。尼尔和荷兰仔从没挨饿，但他们知道家里只能勉强糊口。他们尽可能地打工赚钱。荷兰仔最常做的是在迪克森河边的洛厄尔公园当一名救生员。里根喜欢这份工作，主要是因为这让他名噪一时。他穿着一件胸前印有“救生员”字样纹饰的衣服，在他看管的水域内尽职尽责。后来，里根夸口说，在几个夏天的工作中他救了77名溺水者，尽管其中不少人否认需要救援。“‘你别管我，我没事’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里根后来回忆说，“‘你把我当傻瓜耍，就想让你自己出名。’”里根一丝不苟地把获救人数刻在河边的树干上，但无论救援人数是多少，他用自己日益宽大的肩膀承担起了一份重要的职责，并且用收入补贴了家用。

然而，当救生员不是一个职业，甚至不是一份全年的工作。随着中学毕业临近，里根不得不考虑其他选择。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只是少数人独占的领域。他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尼尔也没有开始尝试。但是，里根班里的一个姑娘的目标是上大学，而他则看上了这个姑娘。玛格丽特·克利弗是里根和内莉所去教堂的牧师的女儿。她活泼美丽，但并不像里根迷恋她那样喜欢里根。里根回忆说：“她（这听起来怪怪的）很

成熟，知道我俩都还不够成熟，除了友谊之外别无他念。而我呢？已坠入爱河。”玛格丽特的姐姐们上了尤里卡学院，这是一所处在皮奥里亚和布卢明顿之间的基督教会学校，位于迪克森以南100英里[注]。玛格丽特打算追随姐姐们的脚步。

即使没有玛格丽特这一积极的榜样，里根也有可能去上大学。他妈妈一直坚持要儿子们出人头地，要比他们的父亲做得更好。尼尔抵制这一要求，越来越公开认同杰克的做法。他具有杰克那种阴郁的魅力，发现自己也喜欢喝酒。他宣称放弃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改信父亲的天主教，内莉声泪俱下地解释说他在婴儿时曾接受天主教洗礼。他拒绝了内莉希望他上大学的愿望，在当地一家水泥厂当了一名工人。

相反，里根很像他的母亲，下面就是母亲做过的一些事情：她没有让他接受天主教洗礼，用她的观点来培养里根。荷兰仔很乖，回报了妈妈。他彬彬有礼，给人们带来笑声，信仰基督教，与牧师的女儿交往。里根是内莉的骄傲。他看到母亲身陷迪克森，婚姻凄苦，嫁给了一个没有能力和抱负的男人。为了母亲，也为了自己的未来，里根决定必须离开那里。大学就是他的遁身之道。

出于宗教原因的考虑，内莉赞同儿子去尤里卡学院，而更吸引里根的则是学院的橄榄球队。迪克森的一位橄榄球英雄在尤里卡获得了更大的荣耀，里根希望自己也能这样。“我从没有去过尤里卡学院，但它就是我的选择。”他后来回忆说。玛格丽特·克利弗选择尤里卡的决定最终敲定了一切。

钱是一个问题，但里根通过游说获得了部分奖学金，并得到一份工作，这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其他费用来自他当救生员时开设的一个储蓄账户。

里根梦想在尤里卡学院获得橄榄球荣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该学院很小，只有250名学生，其中许多还是女生。他无疑会在这样的小团体中鹤立鸡群，但他缺少天赋。“那个荷兰仔？我把他排在第5排的最后。”里根的教练拉尔夫·麦肯齐数十年之后回忆说。再没有比第5排更低的了，球队没有赶走任何人。“第一年，我从没有让他上场比赛，也想到他会因此而恨我，但我要为整个球队考虑。你知道，他是近视眼，什么都看不见有什么用。他看不到向他奔过来的选手或者是球，因而每次最后都会被压在人堆的最下面无法比赛。”麦肯齐也承认了里根的决心。“不得不说，他训练积极，经受了很多磨炼。”但他天生不是打橄榄球的料。“不知道为什么他如此痴迷橄榄球，我猜想他梦想着成为一名伟大的橄榄球明星。即使他没有上场的时候，他也喜欢走近球场。他常常从更衣室中拿出一把破扫帚，把它当作一个麦克风，随后一场一场地‘解说’比赛。”里根掌握了阵型变化和玩法，但一切都是徒劳。麦肯齐说：“他只会纸上谈兵。”

里根在舞台上的发展更好一些。他参加了几出校园剧的演出，在有些剧目中还担纲主演。戏剧老师让自己的团队报名参加了位于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的一次独幕剧比赛，尤里卡学院在12支参赛队中获得了第三名。里根得到了单独认可。他后来回忆说：“西北大学戏剧系主任派人来问我是否考虑把舞台当作职业。”

玛格丽特的父母带着里根和玛格丽特去看了一场戏剧巡回演出，名字叫《旅途终点》，背景是战时的法国。里根后来回忆了那位主演对他的影响。“那个饱受战争蹂躏、年轻但满脸沧桑的斯坦诺普上校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身处西线的地下掩体里——但很奇怪，我同时还在舞台上。我最想对那位替补军官说出他的台词，他曲解了意思，努力要隐藏悲伤，却表现得麻木不仁。深深的寂静，缓慢的步伐，而后是几乎耳语般的低语‘上帝啊，就这样了！你认为我不在乎！你这个小浑蛋，你认为我不在乎——唯一知道真相的人——真正了解一切的人’。”

然而，里根在尤里卡学院最难忘的表现不是来自舞台，当然也不是来自橄榄球场，而是来自学生政治运动。学院长期为金钱所困扰，在里根上大一的时候，学院院长决定平衡收支，取消不同的课程，裁减这部分教师。校董会支持院长的决定，但员工反对这一做法，而影响更大的是学生的反应。大三大四的学生发现他们毕业所需要的那些课程突然没有了，于是投诉说学院对他们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权衡他们的选择，里根作为大一学生代表也加入进来。

委员会成员决定举行罢课，进行课堂抵制活动。这一主意深得人心，但委员会的领导者判断说如果由大一学生提出来可能分量会更重一些，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的课程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小。有人认识里根并推荐了他，他接受了这一安排。

“有人跟我说我应当推广这一主意，这样结果就没有悬念了。”里根回忆说。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代表学生们准备了一份针对院长和校董会的精心制作的简短声明。“我回顾了一下我们耐心协商的过程，适当关注了一下校董会私下里试图侵占我们权益的不光明磊落的做法。”下面的反应鼓励了里根。“我发现当晚的观众感觉良好，我采用了戏剧式的语言，观众和我产生了共鸣。当我提到实际的动议时，已经没有必要经过议事程序了：他们高喊着站了起来——甚至连教职员工也高声赞同。那真是令人陶醉啊。”30年后，里根依然能够体会到那种胜利的喜悦。“再多说几句的话，我就可以让他们跑遍‘米德尔塞克斯的每一座村庄和农场’——还不用骑马。”他说道。此处他即兴模仿了朗费罗的《保罗·列维尔的夜奔》里面的桥段。

罢课活动促使校董会重新考虑，并导致院长辞职，这让里根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尽管他最终赢得了更多上场比赛的时间，但他从来就没有成为橄榄球英雄。他从当救生员时期就是一流的游泳健将，并代表学院参加了很多比赛。但游泳是一个小众项目，无法与橄榄球相提并论。他在学生组织中表现活跃，直至当选学生会主席。

里根加入了塔·卡帕·厄普西隆兄弟会，在那里受到了兄弟般的对待。体力劳动对尼尔失去了吸引力，他决定到大学尝试一下。他来到尤里卡学院，成为里根那个兄弟会的成员，比他弟弟晚了一年。大家希望弟弟可以将哥哥连同其他所有会员一起捉弄。后来，里根说当时他装模作样地猛击了几下，在一根木质球棒上钻了些窟窿，打在屁股上可以打出水疱。尼尔记得不是这样的。“我当时成了弟弟。”他说。他被当作弟弟来对待，只不过更严厉了。“每次我听到有人喊‘里根，调整姿势’并抓住我的踝关节时，我就知道他打我要比其他人打得更重了，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做，否则别人就会指责他偏向。”

除了学习之外，里根热爱尤里卡的一切。他极不喜欢学习，没有动力，也不聪明，没法不努力还能得高分。他学的是经济学，这是尤里卡学院开设的与商业最为接近的课程。他希望这个专业可以在毕业后有所用处。里根内心非常乐观，这一乏味课程的理论或者实践都无法吸引他，对一个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历史课太关注过去了；法语课对法国人可能不错，但一个美国人需要法语做什么？里根对待学习的态度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课程以外的要求他都马虎应对。他后来承认说：“我在尤里卡主要的学习目标就是保持C的平均水平，能及格就可以了。”

英语课是为数不多的能偶尔激发他灵感的课程，他可以锻炼讲故事的技能。他的一则小故事涉及了主人公所谓的“AEF自杀俱乐部”，这是为“一战”中劫数难逃的士兵准备的。大兵爱德华兹回忆了一个年轻战士贝林的经历。“爱德华兹自己的年龄并不大，但30岁的他丧失了贝林的那种乐观、理想和青春。当他听着这个少年谈论牺牲、荣耀和英雄主义的时候，他的喉咙仿佛被堵住了，他在心里诅咒这个命中注定的世界，每一代人必须沐浴着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的青春的鲜血。”半个世纪之后，里根会公开赞美像贝林一样的年轻人的牺牲，但在1931年的时候，里根在他们的牺牲中看到的只有愚蠢。在里根的故事里，贝林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承受着永久性的身心创伤，再也没能重拾希望。里根的故事以爱德华兹结尾——几年后，爱德华兹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短消

息："流浪汉戴维·贝林今天死于圣菲一列货运列车的车轮之下。此人是名退役军人，战争中遭受毒气攻击。事故发生时他正四处流浪，要跨过高速铁路到另一侧的荣军医院看病。他企图翻越刚刚启动的列车，结果失足掉了下来，被卷进了车轮之下。讣告已经发出，但没有亲戚朋友前去认领尸体。他将被埋葬在窑厂。"

---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2

里根回忆说：“搬到迪克森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电影。我记不清自己在我们那儿唯一一家电影院的黑暗中度过了多少时光，与威廉·S·哈特和汤姆·米克斯一同策马奔驰在大草原上，或是眼含热泪地看着影片中降临在玛丽·璧克馥和珀尔·怀特身上的危险。”里根的姨妈曾来家里做客，一家人一起到电影院观看了那一周的无声电影。“我记不得电影的名字了，它描述的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少年的冒险故事，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之后，我偶尔听到姨妈跟妈妈谈起了那个年轻的影星，说她认为我也具有成为童星的潜质。她说：‘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会带他去好莱坞，即便是一路走着去。’”

内莉·里根并不打算去好莱坞，她一直忙于让家人团聚在迪克森。但“一战”之后的几年里，大家都同意内莉姐姐的观点。好莱坞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牢牢地控制了美国人的想象力，其创新性也更为引人注目。在19世纪末期，摄影师和发明家努力想要让画面动起来，1894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完成了这一伟业，但一次只能让一人观看。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西洋景变成了电影。1903年拍摄的《火车大劫案》时长12分钟，背景是美国西部，但拍摄于新泽西。该影片承诺要为电影这种新媒体带来令人兴奋的未来。

这种未来在加利福尼亚州逐渐发展起来。早期的电影摄影机需要阳光来进行录制，而南加州绝佳的天气可以保证户外拍摄时间比这个国家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到了1910年，洛杉矶市区西部的一个社区好莱坞（起初，该社区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构思）开始吸引这一新兴行业中的佼佼者。D·W·格里菲斯在那儿拍摄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影片描述了美国内战及其重建，影片的倾向性让杰克·里根和其他拥护种

族平等的人们惊骇不已，吸引了大批观众花上昂贵的2美元来观看这部3个小时的电影。到了1920年，作为好莱坞对于亨利·福特流水线的回应，几家电影公司每年可以一起炮制出数百部影片。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开始了造星活动。最初，那些影片中的演员都是默默无闻的，但尽管如此，观众仍然逐渐有了自己喜欢的演员。一些电影公司拒绝进一步提升这些观众喜欢的演员，担心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待遇。然而，较为精明的管理者发现了确立名人品牌的潜力，他们与那些大众喜欢的演员们签署了长期合同，造星模式就这样诞生了。

正是这种造星模式吸引了内莉·里根的姐姐以及无数的美国人，他们梦想着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能够到好莱坞获取名利。20世纪20年代，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在电影之都得到了华丽的体现：玛丽·璧克馥是荷兰仔里根在银幕上钟爱的对象，她在自己作为联美电影公司创建合伙人——其他人包括格里菲斯、查理·卓别林和道格拉斯·范朋克——成为影业大鳄之前，每年能赚到50万美元；璧克馥和范朋克既是情侣也是商业伙伴，他们的浪漫史具有轰动效应，部分原因在于这段感情开始时两人都已各有归宿，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好莱坞天堂中看起来是绝配。他们奢华的婚礼为快速发展的影业报道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他们在贝弗利山庄的别墅Pickfair很快成为明星豪宅之旅中最受欢迎的一站。这种豪宅旅行成了南加州旅游业的主打项目。

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个月里，随着股票市场的崩盘，好莱坞的魔力在美国人的心中变得越发重要。股价泡沫变得十分脆弱，一旦破碎，就会伤及整个华尔街。金融业的灾难成了美国的创痛，整个国家恍然醒悟——银行家一直在拿着储户的钱玩弄市场。他们的损失引发了银行违约，让储户无法得到现金或追索。联邦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向金融市场倾注资金来拯救颓势，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本杰明·斯特朗也主张当股市泡沫发生的时候采取这种回应措施。但是，斯特

朗意外去世了，而他的继任者缺乏开闸放水的勇气，注资金额减少了1/3。结果股价暴跌，商人取消订单，制造商解雇工人，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持续了下去，直至1/4的工人失业。

在经济大萧条的前两年，里根运气很好，待在大学里，可到了1932年6月运气就差了些，他要毕业了，当时的形势每况愈下。他回想起了大四时的平安夜，当时他和尼尔在家里，杰克收到了一份特快专递。杰克看完信后喃喃自语道："这真是一件不错的圣诞礼物。"他失业了。在最后一学期，里根寄钱给内莉帮助补贴家用，同时他再次下定决心，不能像杰克那样潦倒一生。

在毕业后的那个夏天，里根重操救生员的行当，但这只能维持两个月。一到秋天，他必须跟许多其他没有工作的人一起去争取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做。对电影的热爱已经化为梦想，正如他渴望得到掌声一样。他沿着汤姆·米克斯和玛丽·璧克馥的职业路线走着，梦想着能在银幕上与他们站在一起。"在尤里卡学院读大四的时候，我私下里坚定了自己当演员的梦想。"里根回忆说。但他严守这一秘密，以防朋友和认识他的人觉得他任性自负。他解释说："跟别人说我想成为影星就好比说我想登上月球一样怪诞。假如我真的告诉人们我打算成为一名演员，他们就会把我孤立起来。"

为了隐藏自己的梦想，里根制定了一条他认为更加传统的路线图。无线电广播是一种比电影更为新颖的媒体，第一批正式广播是在战后开始的，但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不久，收音机——通常带有大控制台，安装在漂亮的木盒子里——就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体育节目广播是早期的主打节目。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广播时代开始于美国无线电公司于1921年播送的在杰克·登普西和乔治·卡尔庞捷之间的一场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不久，体育播音员的声音就如同好莱坞影星的面孔一样为大家所熟悉。

少年时代，里根经常收听来自芝加哥的电台广播，其信号覆盖了迪

克森以及伊利诺伊州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认为，体育广播可以成为自己进军电影的台阶，至少这是公共娱乐领域，而且做播音员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名声。因此，他决定在自己最后一季的救生员工作结束后，尽量去找一份播音工作。玛格丽特·克利弗独自一人要去往伊利诺伊州一处偏远的小镇任教，于是他告别了玛格丽特，前往芝加哥。

他满怀希望来到芝加哥。芝加哥电台众多，怎么也会有一个播音员的位置在等着他。然而，几次前往电台都无功而返。一家电台的一位好心的女士告诉了他原因。“芝加哥是个一流城市，没人愿意雇用没有资历的人。”他应当去更小的城市和小镇，到那儿的电台面试。“他们无法与我们争夺那些经验丰富的人才，因此他们通常愿意给新人一次机会。”

里根返回了迪克森，说服父亲把家里的那辆破旧的奥兹莫比尔汽车借给他前往小镇使用。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市就在密西西比河对岸，与伊利诺伊州隔河相望，位于迪克森以西75英里。在那儿，他又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这让他认为芝加哥那位妇女只不过是想打发掉他而已。最终，他来到了WOC电台，但节目主任告诉他，他来得太晚了。电台本来有一个空缺，但就在前一天被人占了。里根遭受的挫折使他一反往日的彬彬有礼，他大步流星地走出办公室，用一种大到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假如你连一份电台的工作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体育播音员呢？”

里根身上的某些特质吸引了节目主任，他跟着里根来到大厅。彼得·麦克阿瑟是苏格兰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患有膝关节炎。他的两根拐杖敲得地板咚咚作响。他带着浓重的口音说道：“等等，你个浑蛋！”里根停了下来。“你说的体育播音是什么东西？”麦克阿瑟问道。里根回答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体育播音员。“你懂橄榄球吗？”麦克阿瑟问。里根说他在中学和大学都打过橄榄球。麦克阿瑟给了他一次试音的机会，他把里根带到一间没人的录音棚，让他坐到一个

麦克风的前面。“我到另一间屋子听一下，你来描述一场想象中的橄榄球比赛，要让我‘看’到这场比赛。”

里根没有料到会这样，但他不想错过求职路上的第一次机会。他想起了一场尤里卡学院在最后一秒钟赢得的一场比赛，他熟悉比赛经过，也记得运动员的名字，于是他开始了播音：“现在比赛进入第四节，西部州立大学6：0领先尤里卡学院。”他添油加醋地说道：“大片阴云笼罩着球场，寒风呼啸而过。”尤里卡没有球场，只有露天看台，但里根猜想麦克阿瑟不知道这种差别。他继续着这决定性的最后一节的比赛。在现实比赛中，里根的第二次击球没有击中，但持球队员成功触地得分。里根在播报这次经过时删掉了后卫队员这一部分，制造了追平比分的关键得分，额外的一分确保了比赛的胜利。里根描述了欣喜若狂的球迷，简单明了地重复了一下比赛结果，最后说道：“现在回到我们的主演播室。”

麦克阿瑟拍着手从控制室走了进来。“干得不错，你这浑球儿。”他说道：“周六过来吧，由你来播报艾奥瓦州与明尼苏达州之间的校友返校赛，工资5美元，外加车费补贴。”

比赛那天，里根发现不只他一个人待在演播厅，还有一位资深播音员与他一起完成工作。里根播报了第一节，那个人负责第二节，里根又播报了第三节。当他想把麦克风递给对方来播报第四节时，麦克阿瑟给里根的搭档打来电话，告诉他让这个新来的家伙负责到底。里根断定他已经通过了现场测试。

麦克阿瑟为艾奥瓦剩下的3场主场比赛支付给里根每场10美元的报酬。里根非常激动地接受了，很高兴能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体育播音员。十大联盟是美国国内最棒的橄榄球赛事，对一个刚入行的新手来说，能解说这样的比赛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遗憾的是，随着赛季的结束他的工作也终止了。篮球以及其他冬季

运动项目都没有橄榄球那样的球迷基础，而电台也没有其他工作可以提供给他。麦克阿瑟说，在随后的赛季里他会记着里根，但无法做出任何承诺。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里根本来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经济大萧条使数千名没有工作、常常无家可归的战争老兵游行到华盛顿请愿，要求提前发放应允给他们的抚恤金，以防止在他们达到法定年龄之前失效。这些情况的出现让赫伯特·胡佛警觉了起来。这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在大选前的崩溃似乎印证了当时共和党人推行的以商业为中心的政策的表现。胡佛将这看成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会颠覆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于是命令部队驱散请愿者。这次行动由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此人跟胡佛一样，也有着同样的担心。此次行动成了一次悲剧性的惨败。士兵们驱散那些值得同情的老兵，烧毁他们的临时住所和许多人微薄的财物。在这一过程中，一位抗议者的女婴被杀死了。全国对于胡佛的过激行为反应强烈。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他的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说："费利克斯，这下我可以当选了。"

这件事，外加不断加剧的经济萧条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里根成了2300万美国人当中的一员，于1932年11月投票支持罗斯福。有超过1600万的人投票支持胡佛。里根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盼望着新总统能给经济止血。但罗斯福直到大选4个月之后才能就职，因为当时的就职典礼设在3月份，但国家能否挺到那个时候还不明朗。金融系统在股市亏损和不良贷款的重压之下几近崩溃，其财务困境导致储户开始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存款是上了保险的，储户们蜂拥着赶在银行倒闭之前开始提款。这些趋势加剧了储户们所担心的那种恶果，10多家，20多家，然后是成百上千家银行关门歇业了。整个美国金融结构处于深渊的边缘，危如累卵。

仿佛此刻令人担忧的事情还不够多一样，就在罗斯福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星期，他差一点儿就被暗杀了。疯狂的枪手没有射中罗斯福，却杀死了他的一个随行人员——芝加哥市市长。这一事件暗示胡佛宣称民主处于危险是正确的，只是关于危险来自何方的说法可能错了。

罗斯福的就职演讲即刻闻家喻户晓，他满怀信心地保证，美国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无所畏惧。对这篇演讲里根并没有记录留下自己的反应，也没有直接评价新官上任的罗斯福为消除银行恐慌而烧的三把火。但当国会应罗斯福的要求举行特别会议以便不加审查地通过一项白宫发给国会的紧急金融法案时，里根仔细聆听了罗斯福对此向美国人民所做的解释。作为媒体人，里根听取了他那一代著名政治大师对于后来被称为“炉边谈话”的阐释。他通过收听广播获益匪浅。“他声音坚定、温和，充满自信，回响在整个国家，极具说服力，给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带来安慰和力量。他让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里根回忆说，“对此，我将永世不忘。”

罗斯福果敢的行动和令人慰藉的谈话拯救了银行，之后总统又转而应对国家面临的其他挑战。在为期100多天的特别会议期间，他向国会提交了15项重要法案，立法机关全部通过。罗斯福的计划被称作“新政”，其目的是要缓解民众的苦难，恢复经济，通过改革来防止再次出现经济萧条，其重点是大力加强政府对于私营部门的权威，提升政府为美国人民谋求福利的责任。

保守的共和党人震惊不已。他们说构成国家基础的个体积极性以及个人责任都处于危险之中。自力更生的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是个欲壑难填的庞然大物，但在此狂乱时期，民主党人却释放出了这一怪兽，它将会变得贪得无厌。

一些民主党人也很清醒。由于对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糟糕往事的记忆，南方的民主党保守派对于杰斐逊和杰克逊（他们二人都对庞大的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的政党被其东北地区的自由派接替一事非常恼怒。他

们暂时接受了党派团结的要求，但对新政的功效依然存疑。

然而，里根却非常敬佩。这个来自贫苦家庭的穷孩子对于像罗斯福这样的显贵能够袒护普通百姓感到十分激动。里根回忆说："我很快就开始崇拜罗斯福了，他入主白宫时面临着一场国家危机，严酷程度同国家历史上所面临的一样，但他行动迅速，推行了一套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些危机。"

里根一家从新政中直接受益。迪克森的民主党人数不多，杰克·里根是其中最为显眼的。他依然没有工作，因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一份协助管理联邦救济的工作。里根在镇上的时候曾去过杰克的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同学的父亲在排队等待领取救济——那都是一些我认识了很久的人，我曾以为他们的工作像这个小镇一样长久稳定。"里根后来说。

里根自己失业的时间比起杰克的那些救济对象要短一些。1933年年初，WOC电台的彼得·麦克阿瑟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固定播音员辞职了，问里根是否想要这份工作。里根回答说想，第二天就动身前往达文波特了。

里根发现与橄榄球比赛节目相比，常规节目带来的挑战是不同的。在比赛中，他主要负责报道，只要略加润色详细解说就可以了，整个过程自然而然地就呈现在他面前。而在常规节目中，他必须编造故事。他播放录制好的音乐，播送广告，但必须自己精心编写播音稿，把不同部分串联起来，必须表现出个性，与听众建立起密切关系。

这并不容易。里根自己也承认，他有些呆板，无法做到气定神闲。他差一点儿就被解雇了，但他负责培训的那个接班人重新考虑了进入娱乐圈，认为自己目前教书的工作更为稳定。因此，里根得到了第二次机

会。他要求并且得到了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播音能力。渐渐地，他学会了在麦克风前表现得更加从容淡定。

但同时，WOC电台的母公司决定整合公司运营，把WOC并入位于得梅因的一家实力更强的WHO电台。里根和达文波特的其他员工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前往得梅因，可以保住工作。

包括里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前往。纵使罗斯福努力进行救济和恢复工作，经济萧条依然在全国蔓延，但无线电广播行业发展迅速。达文波特电台的播放功率是1000瓦，范围限于达文波特周边地区，而得梅因电台的播放功率是50000瓦，其信号覆盖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到了夜间，当信号经电离层反射后可覆盖全国。改用功率更为强大的发射机的结果之一是里根所经历的行业重组，另一个结果是无线电广播进一步深入美国家庭和美国人的生活。广播电台播出音乐节目，由乐队和管弦乐队在电台录音棚现场演奏；他们还播放戏剧节目，内容从知名剧作家的阳春白雪到通俗流行的侦探系列剧《影子》以及喜剧作品《阿莫斯和安迪》，应有尽有。

他们还播送更多的体育节目。电台越大，可触及的听众就越多，广告收费也就越高。这些费用可以负担起更大的工作团队，把之前忽略的赛事涵盖进来。里根的新东家派他前往现场解说橄榄球比赛、棒球比赛、赛车、田径比赛以及游泳冠军赛。

然而，预算并不是无限的，有时候里根需要远距离解说比赛。电台会准备好电报摘要，这是从在芝加哥小熊队或芝加哥白袜队的比赛现场连线到电台的。电台的电报报务员会把摘要传给里根，里根再将其改写成解说稿。数字“6–4–3”代表游击手对二垒手和一垒手的双杀。里根需要详细解说击球手琼斯如何为游击手史密斯击出一记锋利的滚地球或者很高的弹跳球，而史密斯如何干净利落地截住球，或是可能在扔给二垒的墨菲之前出现失误，墨菲会从一垒队员扬那儿侧身滑垒，同时迅速用力扔给第一个守垒员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奋力接住球，刚好及时阻止了

琼斯沿着一垒线狂奔。

这种方法给里根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当出现技术故障的时候。里根回忆说：“这个故事可能是我一生中讲过的最多的故事了。那是一个夏日，对我的想象力的考验达到了极限。小熊队与圣路易斯红雀队的比赛打得难解难分，到了第九局比分还是0：0。迪齐·迪安站在投球位，而小熊队的比利·尤尔格斯负责击球。我描述了迪安如何挥舞手臂，把球掷了出来。就在此时，我们的报务员克里摇了摇头，递给我一张纸条，我赶紧寻找关于比赛情况的描述，可是上面写着‘掉线了’。那好吧，既然我说球已经飞了出去，那我必须接着说。尽管我本可以跟听众解释说电报机无法取得联系，但这会让他们打爆电话，还会使他们选择收听我们竞争对手的电台。因此，我决定让尤尔格斯击出一记坏球，同时希望西联公司能够很快解决问题。为了拖延时间，我说包厢里的几个孩子为了争抢这个坏球打了起来。之后，克里示意说线路依然不好，我就让尤尔格斯又击出了一记坏球。我让迪安放慢了速度，他拿起松香袋，做了个手势，摇头表示不同意接手发出的投球信号，随后又做了一个手势，把球掷了出去。我说他掷了一记坏球，但这一次他就差几厘米就能完成全垒打了。”最后，线路又畅通了，但尤尔格斯在里根给他创造坏球纪录之前就被罚出场了。

很难说到底有多少里根的听众被他的解说糊弄了。他的电台不是唯一一家凑合应对电报连线播送的电台，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多年以后这在全国都非常普遍。里根也不是唯一使用虚假的坏球和杜撰的比赛来拖延时间的播音员。其他播音员会加入音效：用玩具球棒击打大理石来再现球棒击球的声音，用录制的欢呼声来再现观众的鼓噪，用录制的管风琴音乐来填补第七局的比赛间隙，甚至在因雨延误的比赛中用金属片来做出轰鸣的雷声。真正吸引和抓住听众的与其说是球场内的真实比赛，还不如说是播音员围绕比赛所创造出来的故事。里根的听众并不在乎他看不到比赛，只要他能够编出精彩的故事让他们能够“看到”比赛就可以了。里根做到了，他的听众也越来越多。

第二部分 金色西部 **1935~1962**

3

然而，里根想要的更多，他一直想得到更多。虽然电台的经历磨炼了他编故事的技能，但也刺激了里根的胃口，去寻求电影业中更多的观众。他在得梅因电台工作了4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计划走上银幕。1935年，里根说服老板派他到南加州去报道芝加哥小熊队的春训。为了弥补开销，他同意把此次行程算作他的年假。他希望在此期间到好莱坞看看，看一下在这个电影梦工厂自己可以有何作为，或许奇迹就会发生在他身上。

里根没有跟任何人谈起他的这一隐秘计划。第一次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获。小熊队的训练营地卡塔利娜岛距离好莱坞很远，超乎他的想象，并且需要坐船和电车，很不方便。第二次行程是在1936年的春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在1937年4月，当他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得到了老天爷的帮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南加州，棒球比赛取消了，记者们不用报道比赛了。里根利用这次机会来到洛杉矶，参观了比尔特摩酒店。他认识一位在他来之前就在WHO电台工作的女士，此人后来离开了电台到好莱坞发展。她还没有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可她在比尔特摩一家乐队找到了一份歌手的工作。里根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给她留言邀请她稍后一聚。

她名叫乔伊·霍奇斯，很高兴见到来自中西部的老乡。里根带来了来自他们共同的朋友们的问候，两人彼此回顾了艾奥瓦州的往事。最后，里根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想进军电影界的愿望。

当时为了矫正近视，里根戴了一副日常戴的眼镜。乔伊让他摘下眼镜，因为电影演员是不戴眼镜的，至少在银幕上不戴。她仔细打量着

他，认为他可以试一下。她告诉里根自己认识一位经纪人，正在寻找客户。里根说他愿意见一下那个人。

第二天上午，乔伊给里根打来电话说已安排好了会面。里根没戴眼镜赶赴10点之约。他凭着感觉摸索着经过前台来到比尔·米克尔约翰的房间。里根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舞台演出经历和在电台的播音经历，并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做了些夸张处理。米克尔约翰对其介绍将信将疑，但他十分看好这个新人的外表，于是打电话给华纳兄弟公司。他跟公司里的星探马克斯·阿诺说道："马克斯，现在我办公室里坐着又一个罗伯特·泰勒。"

每天，阿诺都能听到经纪人们这样说。"上帝只造了一个罗伯特·泰勒。"他的声音很大，大到里根都听到了。但公司一直在寻找新人和新面孔，因此他让米克尔约翰把里根带过去。

他们坐着米克尔约翰的车，很快就来到了阿诺面前。互相介绍之后，阿诺问道："这是你真实的嗓音吗？"里根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但还是回答说是的。阿诺没有详细解释，但后来里根了解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一位为华纳兄弟工作过的演员，不久前刚刚去世。

在米克尔约翰盛赞里根的优点时，阿诺上下打量着里根，同意给他一次试镜的机会。他递给里根电影《费城故事》剧本中的几页，告诉他记住台词等候电话。

里根不敢相信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他带着剧本回到卡塔利娜岛，结果发现自己无法专注于棒球报道了。几天后，他乘渡船回到大陆，到电影公司报到。试镜只持续了几分钟，里根与一位特意为此赶来的年轻女演员对了几句台词，接着就被打发走了。

第二天，阿诺给米克尔约翰打电话，告诉他试镜十分顺利，他打算让公司老板杰克·华纳看一下。但华纳很忙，可能几周内都无法看到，

因此里根必须静静地等下去。

里根充满信心，但也很现实。在持续恶化的经济萧条中，他不能够拿电台的工作冒险，寄希望于华纳公司可能会看中他。他说小熊队当时正拔营起寨前往芝加哥，而他必须与他们一起踏上东去的列车。

里根只是在后来回忆说，如果他明显无望从事演艺业，他也能够接受。“我并没有认为好莱坞这个地方是一个任何试图进去的人都能敲门而入的地方，他们不习惯别人跟他们讲，自己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无法原地等待。我肯定让他们吃了一惊。”当时，他想自己可能弄砸了一次成名的机会。“我对自己说：‘你真是个傻瓜。’”

因此，在返回得梅因两天后，当里根收到了一封来自米克尔约翰的电报时，他呆住了。电报上写着：“华纳公司提供一份为期7年的合同，一年的试用期，起薪每周200美元。我当如何去做？”

里根马上回复道：“在他们改变主意之前，签下合同。”

杰克·华纳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很随意的，因为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轻易得到的。他是波兰犹太人的儿子，其父母在沙皇时期躲过了大屠杀。华纳在成长过程中听过许多关于哥萨克人袭击犹太人小镇、烧杀奸淫的故事。他的童年是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度过的，那里的黑手党和劳工暴徒为了获取利益扩大影响会爆头割喉。他被歌舞杂耍表演所吸引，登台表演，以此来躲避钢铁城的黑帮生活，直到他哥哥萨姆说服他进入行业制作端，这也是该领域的赚钱所在。他和萨姆在世纪之交就进入电影业，在俄亥俄与宾夕法尼亚周围的临时影院中放映早期电影。此后，他们适时地转向电影制片，但这让他们与控制着东海岸大多数电影制作的托马斯·爱迪生的影业托拉斯对峙起来，于是他们决定在西部重新开始。当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刚开始的

时候，杰克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树起了家族的旗帜——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加入的还有哈里和阿尔伯特。在随后的岁月里，该公司乘着消费支出和技术进步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

公司的第一位明星是一条狗——一条德国牧羊犬，名字叫任丁丁（Rin Tin Tin）。这条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来到电影院观看其英雄行为。杰克·华纳授予任丁丁“撤销抵押的功臣”称号，因为它消除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承受的债务。与大多数人类演员相比，华纳更喜欢这位狗演员。他曾经这样说道：“它从不要求加薪，不要求更换媒体经纪人，也不要求装有空调的化妆间或更多的特写镜头。”事实上，任丁丁得到了加薪，每周1000美元，并且还得到了替身演员，来减少它那些繁重而危险的特技表演。

但当电影从默片时代转向有声电影后，任丁丁没有了用武之地，不再出现在华纳公司。萨姆·华纳说服他的兄弟们购买了一项技术，可以把录制的声音附加到电影中。最初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是声音可以让电影院不再需要管弦乐队，这些管弦乐队是为无声电影伴奏的。当萨姆提出这项技术还能够录制演员的声音时，哈里嗤之以鼻：“谁想听演员说话？音乐才是电影最大的优势。”公司在1927年推出了影片《爵士歌手》，这部影片包含了管弦乐、歌唱和少数几句对白。但正是这几句对白吸引了观众，不久就淘汰了无声电影。任丁丁收到了解雇通知。公司通过其主人和经纪人通知这位早期明星：“就像我们过去用任丁丁拍摄电影一样，拍摄任何与动物有关的影片都不再符合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策略已经改为拍摄有声电影，当然，这很明显是因为狗不会说话。”

任丁丁在另外一家公司火了起来，这家公司一直在支持一些无声电影明星，这些明星没有有声电影需要的嗓音，甚至不能叫唤。杰克·华纳和业内的其他人士意识到在新影片中声音的作用十分巨大，这对罗纳德·里根来说非常有利，他那经过电台培训的嗓音在试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华纳兄弟竭尽全力发展公司，直到他们的公司成为好莱坞

五大电影公司之一。

公司对待生活也极其坚定。好莱坞电影界的领军者是米高梅电影公司。这是一家由路易斯·B·梅耶领导的电影集团公司，此人与南加州政府交往甚多，并且支持以赫伯特·胡佛为代表的保守经济理念。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的岁月里，胡佛好像是加利福尼亚州送给美国的礼物。梅耶曾在胡佛的白宫吃过饭，并且从削减税收中获得利益，这种税收削减政策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推行的。

在很多方面，杰克·华纳都有意识地反对梅耶，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他的公司拍摄了一些影片，表现了美国人生活中丑恶的一面。黑帮电影成了华纳兄弟公司的主打产品，詹姆斯·卡格尼就是杰克·华纳亲自发现的，怀有美国良心的人斥责华纳兄弟专门拍摄藏污纳垢之地。哈里·华纳为他们的影片辩护说："电影展现的是正确与错误，就像《圣经》一样，我们通过展现正反两个方面来传播正义。"

里根对此也做出了贡献。1937年5月，他带着自己几乎所有的家当，开着一辆二手的纳什牌敞篷汽车前往好莱坞。此次行程集中体现了美国人自加州黄金潮之后的那种长途跋涉。西部长期以来就是充满机会之地，是光彩夺目的"美国梦"的目的地，而好莱坞就是其最新的化身。里根在比尔特摩做了短暂停留，向乔伊·霍奇斯表示感谢，感谢她帮忙打开了机会之门，随后他提前一周来到了华纳兄弟公司。

迎接他的是一个下马威。"你从哪里弄的那件外套？"马克斯·阿诺责问道。里根特意找人裁剪了那件白色的运动衣，自己非常喜欢。"你不能穿那件运动装。"阿诺轻蔑地说，"肩膀太宽了，这让你的头看起来太小了。"阿诺叫来一位助手，对他说："带他去衣帽间，看看服装师有什么办法。他看起来像个菲律宾人。"服装师重新裁剪了里根的外套，把肩部裁窄，让它更合身，又定制了领子可调的特殊衬衫，让里根那看

起来太短的脖子显得长一些。

里根又被从衣帽间送到了化妆间，在那里，他的自尊心再次受到了打击。化妆导演埋怨说：“阿诺那小子一定觉得我是魔术师胡迪尼，你看他签下的这些歪瓜裂枣！”事实上，无须太多化妆，或许能够化的地方很少。新发型消除了里根身上那种大学男生的痕迹，他肤色很好，无须改变。

里根的嗓音也很好，尽管可能需要指导以适应某些特殊的口音或方言。但他的名字必须改一下，在荷兰之外的地方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看一个名叫荷兰仔的演员演的电影。里根犹犹豫豫地提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名。阿诺与华纳兄弟公司宣传团队的人反复念叨着：“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听起来不错，适合宣传看板，他们决定试一下这个名字。

无论他们还是里根，都不知道这一瞬间的决定有多么重要。里根最大的希望是在电影界开创一番事业，从没有想过会带着自己好莱坞的名字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而那个领域是一定要使用真实姓名的。

里根没管这些，而是一门心思要得到第一个角色。公司会在B级片中测试新人，这种低预算的影片可以让观众买一张票看两部电影，这就会使观众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很值。B级片拍摄迅速，但被遗忘得也更快。里根看似天生就是为他来到之后的第一部影片准备的，影片名字叫《爱在电波中》，里面有一个电台播音员跟里根很像。

里根承认，当第一场拍摄快开始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怯场。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这样的机会，如果搞砸了，他就没有退路了。另外一名老演员注意到了他的紧张，于是说道：“孩子，别紧张，轻松一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化妆师做了最后的补妆，灯打开了，导演喊

道：“摄像……开拍！”

几十年之后，里根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我的紧张一下子不见了，那个老演员说的没错，我一听到导演的指令就忘记了所有的摄像、灯光和工作人员，一心一意地说起了台词。”

这是他几天之内的第二次好运，或者说是好命。与观众不同，面对摄像机表演的能力是一种天赋，并不是每一个演员都具备，就像不是每一个政客都天赋异禀一样。从一开始，里根就喜欢镜头，而镜头也青睐于他，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将持续终生。

早期的电影评论都是非常有利的。B级片除了可以赚得票房收入之外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相当于电影公司之间的棒球小联盟。收集电影情报的人和电影评论家不大关注电影本身，而更关注电影中引入的新人。评论家们喜欢里根。当里根发现自己7年的合同事实上只保证他有6个月的工作时间时，公司就延长了另外6个月，并且给他提高了薪水。

里根已经看到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他头脑里一直活跃着成为A级片明星的想法。他衣锦还乡，回到了迪克森，这个小镇宣称他是小镇的骄子。里根把父母接到了加利福尼亚，安排他们住进了家里的第一套房子。在华纳公司，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些角色，甚至向老板提出了拍某些电影的建议。

其中的一份建议最终成形，拍摄了一部关于克努特·罗克尼的影片。罗克尼是个挪威移民，后来成了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他受人尊重，但直到193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之后才得到尊敬，这使得他成了多种文学体裁中作家们无法抗拒的主题。里根在华纳公司大力宣扬拍摄一部关于罗克尼的影片，但之后华纳公司购买了罗克尼生平的拍摄权却没有向里根表示感谢或给予报酬，这让他很生气。里根认为自己受到了侵

犯，这也许是对的，但很显然好莱坞的任何人都可能会想到这个点子。

当得知华纳公司在让其他演员试镜来出演他为自己设定的乔治·吉普这一角色时，里根更加生气了。吉普跟罗克尼一样是名中卫，但英年早逝，他的故事同样能触动人的心弦。里根要求得到为这一角色试镜的机会，但制片人拒绝了他，说里根看起来不像打橄榄球的。里根从纪念册里翻出了一张自己穿着尤里卡学院队服的照片，回到了制片人的办公室。第二天，他得到了试镜的机会并赢得了这一角色。

里根喜欢扮演橄榄球英雄，这类英雄远比自己当年在比赛中的表现更出色。尽管吉普的戏份不多，但其中的一句台词把里根与数十年的生活联系了起来。吉普被诊断出得了不治之症，在临终之时他跟罗克尼说："将来如果有一天球队面临困境，队员们面临崩溃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全力以赴，哪怕是为了吉普也要赢下一场比赛。"

里根为吉普这一角色颇感自豪，却没有他父亲那么自豪。儿子们最终都会超越父亲的，但在里根身上，这种超越来得迅速而猛烈。家人搬到加利福尼亚这件事证明了里根做得有多么出色，同时也证明了杰克是多么失败。在他自己或者是母亲的建议下，里根不那么急于求成了，减轻了由于他的出手大方给老父亲带来的打击。华纳公司开始收到影迷写给里根的信，他问父亲是否愿意负责处理这一事务。里根记得曾跟父亲说："如果您不想做，就没必要去做，但您真的可以帮帮我的。这种处理影迷来信、回复亲笔签名照片等事情让我头疼死了。如果我在公司给您弄份秘书通行证，并有固定收入，这样您每天过来挑些信件读上一读，再订些照片，怎么样？"

他父亲很喜欢这一想法。里根说："杰克为此欢呼雀跃。这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给他带来了自尊，而他也做得十分出色。"里根并没有说他父亲是否明白是他儿子在给他开工资，但他的确说过，杰克这份

工作做得比他自己更出色。“有一天，他拿了一封年轻女士的来信给我看，信中写道她快死了，希望在临死之前得到一张我的照片。我当时想，这可能是有人编出来的故事，这个人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亲笔签名的照片。杰克敦促我无论如何要签上名字，我照做了。大约10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位护士的来信，她告诉我说那位名叫玛丽的女士临终前手里拿着我的照片，能得到这张照片让她非常开心。”里根又补充了一句：“杰克从没有说过‘我说什么来着’。”

杰克在加利福尼亚只生活了几年，1941年去世，享年57岁。里根很欣慰，把父亲的最后岁月说成是一种救赎，而他自己起到了关键作用。里根在数十年后写道：“父亲去世时很年轻，我最初认定这是由于他酗酒。而今我想，他的心脏最终衰弱可能是由于吸烟的缘故。我一直把杰克看成是个一天三盒烟、一根火柴抽到底的人：早上，他会用一根火柴点燃一天的第一支烟，从那之后，他就会用抽剩的那支点燃下一支。”里根为把杰克从酗酒中解救出来感到有些成就感，如果不是抽烟的话。“加利福尼亚有他热爱的家，公司里有他热爱的工作，这些可能最终帮助他战胜了困扰他多年的魔咒。当时，我在东部因电影的事出差，这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告诉我说父亲过世了。”他说道，“在电话中，她告诉我有天晚上她发现父亲站在屋子里，面向窗外，开始讲自己喝酒的劣习，说常常想如果自己不是一个酒鬼，那他们的生活会有何不同。接着，他跟母亲说他决定再不喝酒了。母亲说：‘杰克，我听你这样说有多少次了？’‘是啊，’杰克说道，‘但你从没见我这样做过。’他走了出去，回来时拎着一大壶之前藏起来不让母亲看到的酒，然后把酒倒进了水槽，砸碎了酒壶。”

母亲继续说，杰克开始去教堂了，他为儿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在拍摄克努特·罗克尼影片期间，杰克寸步不离。当影片准备在圣母大学——这是美国每一位爱尔兰人精神上的母校——首映时，他希望能够到场，但不想求自己的儿子。内莉悄悄传话过去，里根就做好了安排。“我邀请他跟我们一起踏上了去往南本德的华纳兄弟公司的火车，

参加庆典和首映式。”里根回顾道，“在父亲去世前，内莉告诉我，杰克跟她说了此次行程对他的意义。他说：‘当我儿子成为明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就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根成了一名丈夫。大学毕业宣告了里根与玛格丽特·克利弗爱情的终结，这种生活的转变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需要找工作，于是就天各一方，感情也就慢慢疏远了。玛格丽特去了法国，在那儿，她遇到了一位在美国使馆工作的年轻人，最终嫁给了他。里根去了艾奥瓦州，然后又去了好莱坞，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新的生活。

电影公司善解人意，很看重其旗下演员们的浪漫恋情，而电影媒体也销售相关的报纸：哪个男演员与哪个女演员约会了，他们在哪里吃饭了，以及他们经常去哪家俱乐部。里根也被报道了，其中许多得益于卢埃拉·帕森斯，一位造诣极高的娱乐专栏作家，碰巧也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迪克森。她很喜欢里根，还在他早期的一部电影《好莱坞旅馆》里演了一个小角色。

帕森斯一直在考虑为好莱坞的神仙眷侣牵线搭桥。当里根和一名叫简·怀曼的年轻女演员一起出现在1938年的喜剧电影《工贼兄弟》——关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3名军官学员的故事——中的时候，帕森斯公布了这一尚在萌芽中的恋情。怀曼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甚至比里根更具挑战性，1917年她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市，名字叫萨拉·简·梅菲尔德。在她5岁时，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深受打击心烦意乱，将她寄养在邻居家里。11岁那年，简的养母失去了丈夫，两人回到了洛杉矶，16岁时，简嫁给了一个名叫怀曼的推销员，她在婚姻中发现了某种独立。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多久，但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她以简·怀曼的名字一路走到好莱坞，在里根到来的前一年，与华纳兄弟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她又再婚了，但此次婚姻比第一次结束得更快。等到她和里根在

拍摄《工贼兄弟》期间相遇时，简再次坠入爱河。

也或许，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怀曼守护着自己心底的情感，但几年之后她对一位采访者说，在遇到里根之前，她从没有把自己的感情托付给任何人。她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里根高大强壮，比她年长6岁，能给她情感慰藉，温暖她的内心。“他非常阳光……坦诚率真。”她说道。他看起来稳若磐石，怀曼无法言表里根的爱对她的意义。“对我来说，嫁给罗尼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至于里根是如何看待怀曼的，毫无疑问源自怀曼迷人的外表，她年轻貌美，娇小玲珑，这让包括她的两个丈夫和里根在内的男人们都无法抗拒。她活泼多变的性格又增加了这种魅力，前一刻她还温声细语，转眼间就变得怒气冲冲。倘若怀曼没有表达出对里根的兴趣，里根可能不会太在意她。在与玛格丽特·克利弗分手之后，里根再没有与任何其他女性确立恋爱关系。他和简一样，对待爱情非常谨慎而多疑。在他们两个人的童年中，都不曾有幸福婚姻的楷模，虽说里根的父母跟怀曼的不一样，他们一直没有分开，但里根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丈夫。

里根既不纵欲，也没有被纵欲所控制。当时，好莱坞一位年长的女士把里根跟那些闺房娇客区分开来。她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当克拉克·盖博或者埃罗尔·弗林，或是泰隆·鲍华进入房间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热浪袭人。”采访者问道，那里根就不是这样吗？“不，罗尼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采访者问，他难道不是跟其他人一样英俊吗？“是的”，她回答道，“但女性的欲望跟男性是同步的。克拉克和埃罗尔对女士明显很狂热，但罗尼不是。我想他从来就没正眼看过安·谢里登”——里根曾与她一起出演过《金石盟》——“她非常性感迷人。”

不论如何，怀曼可能最先挑明了关系，而里根也没怎么反对。可能她比他更急于确定两人之间的关系：好莱坞娱乐新闻以及间接证据暗示她试图以自杀来引起关注，表明自己离了里根无法活下去。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怀曼之所以住院，可能是由于严重的胃肠炎引起的。然而，绯

闻却传播开来，说里根握着她的手，陪在床边，答应会娶她。

1940年1月，婚礼在洛杉矶北部格伦代尔市林茵纪念公园的小礼拜堂举行，当时新娘刚满23岁，而新郎快29岁了。

4

就在里根事业、生活双丰收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好运气似乎正在褪去。当最高法院撤销了政府经济计划的中心支柱——全国复兴总署的时候，新政在1935年的春天也就停滞不前了。罗斯福进行了回击，推出了社会保障法，把福利推广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联邦政府负担起了那些老年人、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以及他们赡养对象的生活保障责任。社会保障名副其实：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变化无常，个人可以就此获取保障。罗斯福最初的打算是要把医疗保险纳入这一揽子计划之中，但他最终决定不去冒险，把医疗保健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人。

民调显示，社会保障法广受欢迎，尤其是因为巨额的开支被推给了后人。1936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尽管当时每7名美国工人中就有一名失业，但他依然以当时创历史的差距击败了共和党人艾尔弗·兰登。罗斯福将这一结果视作对新政的认可和对最高法院的驳斥，于是在1937年年初，他预备了一套办法，要使法院遵从人民的意志。罗斯福的计划是要增加法院的正义，名义上是要减轻那些高龄法官的工作负荷，但很明显是要在其决策过程中增加自由的声音和得票数。

罗斯福的政治天赋几乎从来没有辜负过他，这一次却大相径庭。他的计划很快就被人们称作“法院整顿计划”，那些因1936年大选结果而萎靡不振的保守派们因为该计划又焕发了活力，并且为罗斯福批评者阵营增加了许多温和派人士，这些人十分重视宪法分权。本来，一位没有因为民调胜利而陶醉的总统是能够注意到这些警示的，但是罗斯福固执地要求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推行他的法院治理措施。他们尝试过，然而失败了，罗斯福遭受到一连串的政治打击。

不久，经济形势再陷泥潭，此时政治上的挫败显得更为糟糕。通过4年的恢复，失业率从25%下降到15%，然而此后，经济出乎意料地进入倒挡模式。失业率攀升，生产瘫痪，罗斯福在第一任期内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付诸东流了。在当时及后来，经济学家们讨论了此次经济衰退的多方面原因，将其归咎于政府和国会推行的不成熟的财政紧缩政策、美联储推行的拙劣的货币政策以及那些不惜一切代价刁难罗斯福的资本家们的蓄意破坏。

无论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其后果必将进一步削弱罗斯福的影响。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现在公开向他发起挑战，而在1938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大获全胜。昔日位高权重的总统发现自己四面楚歌，困难重重，很明显，这将是他任期内的最后两年了。

在里根主演的早期影片中，有几部是警匪片。好莱坞与犯罪展开斗争，尽管哈里·华纳推崇《圣经》的权威。电影被认为比当时的其他大众媒体——报纸和广播——更具情感表现力，电影业本身及其外围机构克服种种困难，以确保电影不会导致青少年或其他受到影响的人们犯罪。由威尔·海斯领导的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设立了一套电影制作守则，用于保护美国的道德水准——当然，保护电影业免受负面宣传的影响也绝非偶然。罗马天主教会创建了道德审查会，同样监督着电影的道德问题，但更多在乎的是教会的影响，而不太关注该行业的底线。

很少有主题本身就是禁忌之物。犯罪和暴力主题可以进行处理，性爱主题也一样，但这些东西必须要置于被广为接受的社会价值环境之中。犯罪行为可以蒙混过关，只要在最后一盘胶片中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就可以；包含野蛮的暴力行为的影片必须停拍，但在表现为了正义以及为了保护弱者而义愤填膺时，打架场面还是可以有的；婚姻是性爱的合法前提，如果有婚外情发生，那它必须以悲剧结尾。

里根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守则，性爱镜头由其他演员来演，在涉及犯罪的影片中，他为正义而战，常常是用他攥紧的拳头。据华纳兄弟公司宣传部门讲，里根在到达《独脚大盗》拍摄现场时问导演："我何时出手搏斗？"公司档案里还介绍说，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个演员共有"5处关节擦伤，膝盖瘀青，头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里根饰演的是秘密特工布拉斯·班克罗夫特，用头脑，但更多的是用武力挫败了假钞制造者和其他罪大恶极之人。业内报纸《每日电影》称《独脚大盗》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徒手搏斗惊悚动作片"，而华纳公司夸口说，另一部影片《空中谋杀案》刻画了"一场发生在咖啡馆内的打斗，堪称是乱战中的巅峰之作"。

布拉斯·班克罗夫特系列影片——里根主演了4部——遵循了恶无恶报的原则，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大量证据表明作恶必将遭到报应。禁酒令促使罪犯们组织起来，更好地满足了城市酒鬼们的饥渴。这些酒鬼们从没有支持过禁酒令，认为喝上一杯没什么过错。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第一年，禁酒令就终止了，但犯罪组织继续存在。罗斯福的司法部部长霍默·卡明斯向犯罪宣战，调动刚命名不久的、由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来打击犯罪。联邦调查局探员们的行为并不很受欢迎。在经济萧条的深渊中，民众的情感有时候会被那些高调张扬的罪犯所吸引，像衣冠楚楚的约翰·迪林杰、很上相的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然而，这些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的吸引力加强了政府向好莱坞施加的压力，也强化了不要美化黑帮分子的那种正统观点。政府的影响是针对电影公司反垄断行为的一种威胁，这些公司垄断了市场，扼杀了竞争。正统观点可以通过精心策划，对影剧院进行抵制。当华纳兄弟公司一块具有煽动性的广告牌激怒了费城天主教的主教时，他就禁止其全体教徒看电影。这位高级教士的行为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一位业内主管回顾了高层管理者的一次会议。"哈里·华纳参加了会议，他站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涕泗横流，恳求有人来帮他解套。他的确应当如此，因为即使

是在费城任何一家影院的中央过道里开炮，也不会伤到任何人。”

反对犯罪影片的运动持续发酵，演化成了反对现实社会中其他挑战的一场战斗。在资本主义看起来停滞不前的10年间，大量美国人都在寻找出路。共产主义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他们注意到共产主义的故乡苏联并没有遭受让资本主义世界瘫痪的经济萧条，国际共产主义是为数不多的勇敢抵抗法西斯的组织，这就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诱惑力。从比例上来说，好莱坞的演员和作家或许比所有美国人更多地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也可能不是，但他们更为显眼，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更严密的监督。当华纳兄弟公司最值钱的摇钱树埃罗尔·弗林到西班牙参观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人如何抵抗法西斯分子的时候，赫斯特报业集团指责他是作为共产党人去参观的。杰克·华纳变得很焦躁，认为弗林的事业完蛋了，他说：“如果再有美国报纸登出类似的东西，公众肯定就不会喜欢他了。”他向弗林通报了形势的险峻，之后弗林就不再介入其中了。

其他演员也吸取了这一教训。里根在伊利诺伊州的成长过程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不会让他接触太多的激进主义思想，而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了解也不会使他在极短的银幕表演中有太多表现的机会。然而，在好莱坞的早期经历让里根意识到，无论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有何承诺，对电影公司的签约演员来说，它只会带来麻烦，因此他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银幕下都恪守法律法规。

没有规定来约束好莱坞对于国外事物的处理方式，但尽管如此，电影公司对此还是坚持后果自负的原则。“一战”之后对国家产生影响的孤立主义依然强大，导致美国那些当选官员与欧亚的是非之地保持着距离。直至1920年大选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积极支持国际联盟以及其他形式的美国外交事务，并于当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伙伴。但在他与总统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惨败之后——这主要是因为国际联盟不得人心——罗斯福就将自己的这种国际主义观点秘而不宣了。

他在总统第一任期内避开外交事务，坚决拒绝对终结大萧条的任何多边做法承担责任。

但是，孤立政策具有严重的缺陷。日本恼羞成怒，退出了世界大战和战后和平会议，因为它没有得到获胜盟国中其他成员国所得到的那种相应的尊重。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政府为了获取这种令人信服的尊重而费尽心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1937年，日本公开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占领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欧洲方面的事务更令人担忧。意大利的民主屈从于贝尼托·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暴力团伙的淫威。193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种暴行蔓延到了非洲。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可怕的血腥杀戮，带来一种不祥之兆——假如法西斯主义在那里获胜（当时看起来有可能），那么它可能会征服欧洲的许多地区。

最大的威胁出现在德国。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的几个星期，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担任德国总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早已不是秘密，但世人只是逐渐才发现这种仇视是如何彻底地充斥着德国政坛的。德国国会里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称纳粹党）及其同盟者持续打压生活在希特勒所谓的第三帝国中的犹太人（前两个帝国分别是查理曼和威廉帝国）。希特勒废除了“一战”后的协议，重新打造德国军事力量，并要求调整疆土，恢复德国战前的边境线划分。

美国国内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国际主义者，他们认为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分子是一种存在性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派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宣称威胁被过分夸大了，有可能煽动涉世不深者的情绪，就像1917年把美国拖入世界大战那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站在国际主义者一边，却没有挑战孤立主义者的资本。1937年10月，他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要“隔离”外国侵略者，以此试探一下国际主义。但是，那些国际主

义者缩手缩脚，孤立主义者则横加指责，而他当时也正在克服其“填塞法院”计划和经济衰退引发的不利局面，因此所有这些都令他打消了进一步行动的念头。

好莱坞对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什么责任，但也出现了让罗斯福无能为力的那种同样的分歧。20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路易斯·梅耶以及业内其他大多数领军人物都是犹太人，他们自然对希特勒的上台比较担忧，但确切地讲，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常常感到被边缘化。如果对欧洲犹太人特别关注的话，会凸显出他们与其他美国人的差异，而许多人都在尽力缩小这种差异。

因此，他们态度暧昧。路易斯·梅耶请传媒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打探一下希特勒关于德国的目标和计划，结果他接受了由赫斯特传递过来的希特勒的保证：柏林没有侵略性设想。与梅耶一起在米高梅公司工作的艾尔文·萨尔伯格对此没那么有信心，但也不愿去诘问纳粹政权。1934年萨尔伯格一从德国返回，马上就说：“许多犹太人会丢掉性命的。”然而他估计，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会幸存下来。“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终将消逝，但犹太人必将永存。”

华纳兄弟的立场更坚定一些，这部分是缘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不久就攻击到了他们，这比对他们其他同僚的攻击早一些。在德国早期爆发的一场反对犹太人的暴力冲突中，纳粹暴徒杀害了华纳公司驻当地的代表。公司做出回应，关闭了德国发行办公室。作为个人，杰克·华纳和哈里·华纳欣然接受从事欧洲犹太人运动，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发表反对希特勒的讲话。

然而，即使是华纳兄弟，对于是否利用其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他们公司制作的影片——也犹豫不决。哈里·华纳在演讲中抨击了希特勒，但对支持利用电影来采取行动的主意很谨慎。“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拍出优秀影片？”他提出了这一具有潜在争议性的问题。他们联合了派拉蒙影业公司的老板阿道夫·朱

克，此人很谨慎，把政治与娱乐划分得很清楚。朱克说："我认为好莱坞就是做娱乐的，时事应由新闻媒体负责。制作带有政治色彩的影片是个错误。"观众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政治。"去电影院的时候，他们只想忘记政治。"

里根饰演的乔治·吉普一角可能会被人们记得最久，但他最引以为豪的角色是在《金石盟》中饰演的德雷克·麦克休。这部影片取材于当时一部同名畅销书，差一点儿没拍成。小说比较色情，除了大量缺乏想象力的婚外性行为描写和肢体暴力之外，内容还涉及乱伦和色情狂。业内和业外的审查者最初想阻止将其改编成电影，但之后同意删减不妥之处。然而，里根饰演的那一角色的核心戏份依然保留：他恋人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不同意他俩的恋情，于是，利用一次铁路事故的机会平白无故地给他截了肢。"开拍前的几天，我就开始准备这场戏。"里根回忆说。他想象着从麻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腿没了会是什么样子。即便如此，当他躺到道具师为他搭建的特殊的床上时，还是十分震惊。床上有两个洞，好让他的腿不被发现。里根低头看了看，想了一会儿这一角色所遭受的命运。"我就待在那儿，盯着身体消失的那一部分，这种恐惧无从缓解。"他跟导演说不要彩排了，"直接拍吧。"摄像机转动起来，里根睁开双眼，伸手去摸自己的腿，突然尖叫起来："我的腿呢？"

在他所有饰演的角色里，里根认为这一角色可能会为他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但华纳兄弟公司侧重于詹姆斯·卡格尼，卡格尼在同一年主演了《胜利之歌》，因而不予考虑里根了。尽管如此，华纳给里根提高了薪酬，也给了他一份新合同，表达了公司对他未来的发展信心百倍。

5

里根在之后的岁月里一定会从幸运的时机选择中——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获益匪浅，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的机遇几乎糟得不能再糟了。拍摄《金石盟》的时候，日本袭击了珍珠港，轰塌了美国孤立主义的传统基础。大洋不再能够提供保护，世界的问题——侵略者的野心、争创帝国和影响力的斗争——也就是美国的问题，无论美国人喜欢与否。直到那决定命运的一天——1941年12月7日之前，乔治·华盛顿留给国人的关于避免牵连国外事务的临终忠告还是美国政策的可行基础，但是珍珠港的战火使这位国父的古老忠告变得彻底陈腐过时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预料到这一时刻，尽管地点不对。数月以来，美日关系持续紧张，东京方面一意孤行，意在夺取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而罗斯福同样坚定，决心阻止其发生。他通过外交途径警告日本人，当警告失败后，他下令终止向日本运输美国的石油和钢铁。日本人将罗斯福的禁运理解成经济战的宣战书，事实也的确如此。双方都明白封港禁运威胁很大，可以使日本的战争机器（主要用于中国战场）陷入可怕的停顿。日军最高指挥部准备对南部和东部地区实施攻击，挺进资源丰富的东印度群岛。“一战”期间，罗斯福曾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服役7年，期间他曾研习过军事战略，因此他早就预料到了此种袭击。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美军指挥系统也没有人预料到的是——日本人会以美军在珍珠港的舰队为目标对远东实施打击，以此拉开了他们西南攻势的序幕。因此，此次袭击十分彻底，重创美军舰队，美方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这加剧了整个民族的痛苦，也使得罗斯福有可能面临渎职起诉。

但是，罗斯福把这一指责向下、向外进行了转移。他展开调查，调查那些负责夏威夷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官。他赶在国会之前，对日本违反和平行为准则的谋杀行为表达了整个民族的愤怒，他说，受到攻击的这一天将会“与耻辱共存”。他要求对日宣战，国会马上通过了。3天后，当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德国对美国宣战时，美国人民团结在他们的总统身边，就像以往每次战争开始时一样。唯一对罗斯福提出严厉指责的批评家是那些最为冥顽不灵的孤立主义分子，他们指责罗斯福不是说他对日本人的计划知道得太少，而是指责他知道得太多。在意识到罗斯福先发制人，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后，这些人以此推断说，罗斯福策划了珍珠港事件，目的是召集美国人参战。

罗斯福没有抗辩，不去以此来抬举这一指责。他意识到，在针对美国国际地位的辩论中，他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也知道几周前还不可能的事情，到如今不但变得可能，而且必须。20年来，罗斯福认为美国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大部分时间里他受制于美国对参与国外事务的嫌恶，只能对这一想法秘而不宣。终于，他可以畅所欲言了。他相信美国人民一定会唯他们的三军统帅马首是瞻，而那些剩下的少数孤立主义分子只能咬牙切齿，却无济于事。

事实证明，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里根漫长政治生涯的起点，这是一次复杂的征程，因为他需要沿着两个坐标轴前进。在20世纪30年代，里根是一个自由孤立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支持罗斯福，但在外交政策上反对罗斯福。在随后的20年里，他将经历两次转变，成为一名保守的国际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反对罗斯福，但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罗斯福。

这一征程开始于外交政策。里根的工作非常繁忙，这让他无暇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形成自己坚定的观点。他倾向于业内犹太人团体中华纳公司和其他公司那种反对德国的观点，但没有仔细思考以形成自己的观点。他的爱国主义是零星的、机会主义的。在艾奥瓦州电台工作期间，里根遇到了一位美军预备役人员，此人告诉他当地骑兵团正在招

募新兵。骑兵是部队中正在消失的一个兵种，尽管在“一战”中马匹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没人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它们还会有太大作用。然而，部队在许多事情上留恋过去，留恋他们的军马，此时正在招收骑手。小时候看电影时，里根就迷上了马，能有机会由军方出钱，自己策马奔腾，这使得此次招募非常诱人。骑术当然不会影响到他的电影事业，要想成为下一个汤姆·米克斯，里根必须学会骑马，于是他报名了。里根后来承认说：“我并不热衷于当军官，我当时还是认为我们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的战争，只是这笔买卖太划算了，难以拒绝。”

与日本持续紧张的关系改变了交易条款。当罗斯福对东京采取经济施压时，这支部队招募了像里根这样的预备役军官。里根收到一封信，告诉他拾掇停当，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马报到。当时，华纳公司拍摄的《金石盟》刚进展到一半，公司派出自己的律师来确保延期出发，以防止这一耗资100万美元外加大量工作人员的项目遭到破坏。这种请求延期的做法在当时很常见，也很流行，因为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希望并且认为能够避免战争。华纳公司的律师们成功了，1941年10月，里根接到通知，他在1942年1月1日之前将不会被征召，但部队跟他说在“那个期限之后的任何时间”都要做好报到的准备。

公司找到了另外一种延期的办法。它还有其他影片正在筹备中，里根在《金石盟》中的高超演技让华纳高层认为他的价值很高，他们力求要让他连续工作。

珍珠港事件让他们的计划泡汤了。战争袭击加速了部队调动的时间，也改变了民众对于参军的理解，对于名人的特殊礼遇不再适合电影行业赖以保证票房的那些演员。假如里根逃避服役，那么他在银幕上塑造的保家卫国形象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努力争取延期报到无果的情况下，华纳公司放弃了代表他进行游说。1942年4月，里根动身来到了部队。

但他并没有走得太远。华纳公司放弃里根的部分原因是电影行业的重新定位。与大部分行业相比，好莱坞在经济危机中更好地存活了下来，这台梦想机器使得美国人以较小的花费，便能在几个小时当中忘掉烦恼。至于好莱坞能否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最初是不明朗的，制造业以及所有与军工和战备有关的行业在政府计划中得以优先发展，这些都是来自华盛顿的命令。汽车制造停止了，底特律的流水装配线被改为制造飞机和坦克，消费品的销售被严格控制，以防无足轻重的非战斗人员使用削弱战时的努力。好莱坞电影公司那种招牌式的逃避现实的娱乐活动，跟其他事情一样，都是不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里，电影公司高管们面临着一种极大的可能，政府会命令他们停止拍片，直至战争结束。

但他们并没有收到此类命令。政府的克制反映了杰克·华纳以及其他电影管理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得益于美国军队中亨利·阿诺德和某些军官的远见卓识。华纳对战争的付出是无可置疑的，几年来他一直在就纳粹提出警告，一心想要尽快看到希特勒垮台，但他也同样致力于发展华纳兄弟公司，希望通过将电影行业打造成美国陆军部的左膀右臂，可以保证在抵抗轴心国的战斗中电影公司不会蒙受损失。华纳赶往华盛顿，建议军队公开宣传那些为了国家安全而浴血奋战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事迹。他与被称为“哈普”的亨利·阿诺德将军见了面，此人领导美国陆军航空队，认为他的飞行员们将是未来战争的主力。阿诺德将华纳招至麾下——确确实实的一名中校——以组建一支电影分队。

两人都达到了彼此的目的。华纳让阿诺德及其空军看起来不错，这就让阿诺德有了竞争资源的优势，这一点是战时政治中的核心方面；而阿诺德及其部队则保证了电影行业被列为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战斗中所必需的一支力量。

在早期的一次合作中，吉米·斯图尔特主演了影片《常胜之翼》，

把航空队战士刻画成了战斗英雄，极大地促进了征兵工作。事实上，申请报名应征飞行员的速度超过了阿诺德空军的处理速度。阿诺德跟华纳说："杰克，自从你们发行了电影《常胜之翼》，我们现在的飞行员多到可以驾驶世界上所有的飞机。"

"很好。"华纳回答道。

阿诺德反驳说："好什么好，我们还需要飞机上的机尾炮手，目前还没有。你能否赶紧拼凑一个什么玩意儿？再带点儿浪漫情调。"

华纳后来说："关于机尾炮手这份工作的责任和危险，我从中看不到任何特别浪漫的东西。但我们还是按照阿诺德将军的要求尽快拍出了一部影片。《机尾炮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几周之内，报名的应征者也超过了阿诺德的接收能力。"

里根报到的地点是梅森堡，此地自内战之后便扼守着进出旧金山海湾的通道。梅森堡依然守卫着海湾，但珍珠港遭到的袭击预示着日本人可能攻击美国本土，在最初的恐慌之后，梅森堡主要是作为美军部队开拔前往西太平洋的登船地点。

里根的工作就是协助登船。在军医发现他的眼睛近视之后，再没有人认为他会加入开拔部队了。一位医生告诉他："如果我们派你到海外，你会向一位将军开枪的。"医生的同事补充说："并且你会打偏的。"

里根一直待在梅森堡，直到部队发现他的天赋和经历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杰克·华纳的一组拍摄人马，即陆军航空队电影小组在距离好莱坞10英里的卡尔弗城设立了一个工作间。这支部队召集了一流的电影明星，包括像吉米·斯图尔特、克拉克·盖博以及威廉·霍尔登这样的大

腕。里根看起来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他在战前的影片中就演过飞行员，嗓音很好，非常适合许多影片都突出表现的旁白部分。

他奉命前往卡尔弗城，随即参与了数十部影片的拍摄。在《机尾炮手》中他出演了一位中尉，这个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刚毅使他成为影片中的英雄，也因此成了其他希望应征入伍的年轻人的楷模；里根为影片《职责之外》做了旁白，这是一部关于一名真实飞行员的电影，这名飞行员因在西太平洋执行一次任务而获得了铜十字英勇勋章；里根通过影片《向西是巴丹》和《目标东京》点燃了参战热情，两部影片分别庆祝的是美军早期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和战略轰炸日本本土岛屿的战斗；影片《横空出击》刻画的是美国空军在欧洲上空的赫赫战绩；影片《从军乐》是一部歌舞电影，在军队的协助下拍摄完成，但并不是那支电影小组。该影片把里根吸收了进来，饰演一位“一战”老兵的儿子。他是整个美国的象征，接过并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里根战时拍摄的影片让观众比以往更加熟悉他了，数百万观众看到他在银幕上一身戎装，逐渐认出他的嗓音就是影片中那些保护美国不受侵略的人的嗓音，他们慢慢学会把他与美国力量和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里根发现国家保卫者的角色很适合自己，于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一种才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的是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极大地重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态度。妇女政治权利的拥护者们曾取得了重大胜利，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获正式批准，但当时里根太年轻，注意不到。尽管此后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但大多数人在经济上还一直依赖她们生活中的男人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许多雇主厚颜无耻地首先解雇妇女，认为这些女员工不是她们家庭中主要负责赚钱养家的人。美国的参战极大地增加了妇女的工作机会，她们顶替了数百万参军的男性工人。当妇女担负起那些之前为男人们保

留的工作时，她们带回家的是之前男人才有权得到的薪水。对一些人来说，经济独立让人不安，而对很多人来说，这却是一种赋权。

非裔美国人也同样被吸收进了工业大军，黑人在“一战”期间就开始从南部农村地区向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地区迁移，但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这种移民现象慢了下来，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反向迁移。“二战”再一次打开了就业之门，黑人也再次向工业城市迁移。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直是个南部地区问题，而今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并且由于战争时期的努力变得错综复杂。A·菲利普·伦道夫是铁路卧车员工兄弟会的主席，这是一个主要由黑人组成的联盟。他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提醒公众关注联邦战争承包商的种族隔离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竭尽所能终止了伦道夫的游行示威，认为这将会影响战争时期的努力。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在战时工业中禁止游行示威，禁止种族歧视。这一交易使罗斯福成为他所渴望的战争焦点人物，也让非裔美国人认识到了团结就是力量。

然而，战争对国内生活最大的影响是它验证了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即“大政府”可以解决美国的大问题。这一理念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萧条的蔓延和新政的疲软而消退。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不看好罗斯福1940年的大选，双方都认为无论是谁取代他，都不大会愿意或者能够像他那样去扩充政府机构。

战争改变了一切，它带来的冲击波在美国人参战之前就再次托起了美国经济，证明联邦政府斥巨资用于军事战备是正确的。珍珠港事件之后，联邦政府在国防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各项活动中的花费增加得更快了，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就业数量以及收入水平。战争的到来同时也使罗斯福第三次竞选成功。珍珠港遇袭让美国人期盼总统的领导，也支持他所领导的政府。

战争的开始和发展重新恢复了新政的活力，也确保了新政的地位。假如没有战争，罗斯福可能会在经济持续萧条的阴云下下台；而战争带

来的经济复苏让他获得了声望。尽管新政与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与经济复苏也关系不大，但它也沾了点儿光，成为民主政治中的相关部分。并且，战争为新政中的一些计划——比如社会保障——提供了时间，使其成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直到1940年，社会保障计划才签发了第一份按月领取的退休支票，直到那时，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社会保障都是大部分参与者财政上的净支出。对罗斯福心存不满的继任者（如果经济萧条持续下去，其继任者一定会心存不满的）有可能会限制，甚至会废除这一计划。然而，罗斯福继续留任，社会保障计划也得以顺利发展。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争展现了“大政府”最好的一面。战争在美国人心中引发的爱国反应促使他们与政府合作，并在日常战时工作中互相合作。这种合作让政府较之以前或以后都更为高效：政府控制着经济，跟工人说他们无法拿到更高的工资，跟制造商说他们不能抬高价格，而工人和制造商都表示支持；政府提供医疗保健，而医生们对此毫无怨言；政府建楼盖房，而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没有反对；政府大幅提高税收，而纳税人照单全付。

这一切之所以都被接受，是因为政府在短期内赢得了这场战争，令人惊讶。假如战争拖延下去或者结局糟糕，那么人民对政府寄予的厚望可能会破灭。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斗争在美国加入后仅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美国史无前例的“大政府”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将美国置于世界强国之首。在这一过程中，“大政府”恢复了国家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心。到了1945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大政府”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需的，他们对此有着充分的理由。

6

里根跟许多人一样，在“大政府”的怀抱中得到了慰藉。他后来回忆道：“在‘二战’结束时，我成了一个彻底的新政拥护者，我认为政府能够解决我们战后的所有问题，就像它终结大萧条、赢得战争那样。我不信任大企业。我认为拥有公共设施的应当是政府，而不是私营公司。如果没有足够的房屋来为美国人民遮风挡雨，那么我认为政府就应当盖屋建房；如果我们需要更好的医疗保健，那么解决方法就是公费医疗制度。”尼尔·里根摆脱了家庭影响，成了一个共和党人。对这种脱党变节的行为，里根予以严厉斥责。“我们就国家未来的发展争论了几个小时，有时候言辞相当激烈。他抱怨政府的扩张，说华盛顿试图插手接管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铁路到街角小店，并且说我们不能再信任战时的盟友苏联了。我斥责说他满口都是共和党人的宣传。”

起初，里根并不想把这种争论带到家庭之外的场合。三年半的军旅生涯让他渴望再度过上平民生活，同时得到平民的那份工资。他的负担加重了：1941年1月，他和简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莫琳。他们还打算再收养一个孩子，1945年3月，刚出生不久的迈克尔成了里根家庭的一员。简从演戏中赚到的钱意味着这个家不必靠里根在服役期间部队每月发给他的300美元来生活。但里根能重新拿到华纳兄弟公司的薪水，两人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这比部队薪水可要高出许多倍呢。

华纳公司希望里根赚到那笔钱，于是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但这并不容易。品位变了，观众也变了。对里根来说，战后第一部影片的失败对他的事业和公司在他身上的投资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华纳公司迟迟没有动作，里根就等于是带薪休假了。他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手头宽裕，一周3500美元的合同继续有效。”战争结束的时候他34岁，身体健

康，依然年富力强。“我头脑里没有具体的想法，只希望在有想法之前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他去了位于洛杉矶以东圣贝纳迪诺山区的箭头湖游玩，开着摩托艇玩了几天。回到好莱坞之后，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作了两艘轮船模型。在以前的生活中，他从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以后也永远不会做了。他后来说：“在当时做这种事好像是恰如其分。”

华纳公司还是没给他安排工作，于是里根开始寻找别的方法来打发时间。他很有名，也很有钱，引起了那些想要发展事业的人和团体的注意。有人邀请他加入好莱坞独立公民委员会（HICCASP），该团体以支持新政而发起，后来一直是电影行业中思想自由的积极分子的聚集地。这一邀请让里根很受用，他成了一名热心成员。

这个团体针对大量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反对核武器，强调的不是原子弹在加速日本投降中发挥的作用，而是核武器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在HICCASP内部，就像其成员白天的工作那样，团体内部有着不同的分工：作家写稿，演员演讲。这对里根来说很合适，他对团体感兴趣的话题知之甚少，因而乐于朗读别人写好的稿子。诺曼·科温是一名作家，为电台、电影和印刷媒体写稿，一生致力于社会和政治事业。1945年秋，科温写了大量关于蘑菇云形状的厄运降临到人类头上的文章。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死亡之钟铀235”，并与团体内的其他成员说服里根来向具有同样想法的一大群人朗读。“地球之神秘被层层剥开，一层接着一层，直至地核裸露。”里根慷慨陈词，“最新的解药尚未公开，保存在守护之书中；但死神的恶臭却波及全人类，乘着来自长崎的风。”里根继续读下去：“若非你我齐心协力，在我们唯一的星球上……那些刚出生的婴儿，那些尚未婚配的青年，会死于你我熟视无睹的错误……和谐是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也是我们可以到达的最高境地。”

这首诗并没有引发太多争议。歌手兼演员保罗·罗贝森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一次富人聚会上朗读过同样的诗句，当时到场的还有战争

中美国“胜利的设计师”乔治·C·马歇尔将军。但是，里根在华纳公司的老板们觉得公开宣扬世界主义可能会伤及保守的观众，认定他的诵读是戏剧式演出，违反了他签订的排他性合同，公司命令他停止一切活动。里根选择遵从这一命令，走下了这一特殊的舞台。

但他又登上了别的舞台，怀揣着对目前他所在公司的些许不满，更多的是怀疑。1600万退伍军人组成了几十家委员会和社团联盟，其中一些直接为了自身利益向国会施压，提出诸如扩充退伍军人法案之类的要求，而其实该法案已经向退伍老兵提供了抵押贷款援助、大学助学金以及失业津贴。里根属于国内高收入人群，并没有申请政府补助，因此他选择加入其他团体。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有句口号吸引了他：“公民第一，老兵第二”，因此他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回忆说：“我对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有着很高的期望。”

里根投身到了委员会的工作中去，帮助安排募捐场地，向扶轮社和其他民间组织发表演讲。他的名望和熟悉的面孔保证了大批听众到场，其中大部分人反应积极，尤其在他歌颂美国反法西斯的胜利、提到要警惕任何形式的新法西斯主义时。然而，在一次面向好莱坞贝弗利基督教堂（里根常到这儿做礼拜）的男士俱乐部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听众来到了他的面前。此人是教会的牧师，他说自己喜欢里根的演讲，但认为里根应当说得更多一些。“我认为，假如您提到如果共产主义看起来是一种威胁，您将像反对法西斯主义一样反对它，那么您的演讲就更棒了。”

里根坦言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这一点，但很显然他说自己当然会考虑的。不久之后，他向另一个地方团体做演讲。这是一个市民组织，支持各种政治和社会事业。里根再次称赞了战后工作，表态说倘若法西斯主义再次出现，他会进行反抗。观众很喜欢他，直到演讲的最后一段。里根说：“我已经谈论了战后法西斯主义的持续威胁，但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主义’——共产主义。如果一旦让我发现有证据表明共产主义是种

威胁，危及我们所信仰和支持的事物，那么我会像对待法西斯主义那样严厉抨击共产主义。”

屋内突然鸦雀无声。

几天之后，里根收到了一封当时在现场的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内心斗争了好长时间，怀疑在那个组织内存在着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敢肯定你也注意到了，当你在最后一段提到共产主义时现场的反应，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该组织正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前线。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让我受不了，第二天我就退出了那个组织。”

回顾过去，里根认为这一时期是其政治观点的转折点。他说：“感谢我的牧师和那位女士，我开始清醒地面对真实世界了。”

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次教训。1946年夏天，里根被邀请加入HICCASP管理委员会。他很高兴自己得到认可，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可结果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就给他泼了冷水。此次会议在一位显赫的委员会成员家里举行，召集了大约60个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和里根一样，詹姆斯·罗斯福也认为平衡那些来自左翼和右翼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的做法是正确的。罗斯福跟这些人说，HICCASP正遭到局外人的指责，说它是共产党人的前线阵地，委员会有必要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里根后来评论说：“这在我听起来不错，有点儿像我加在自己那篇演讲中的最后一段。”但在与会的许多人听来，就不那么美妙了。“当时大家的反应令我很吃惊。一位知名的音乐人一下子蹦了起来，提出要背诵记忆中的苏联宪法，高声说苏联宪法要比美国宪法民主得多。一位知名的电影编剧也跳上前来，说如果美苏之间开战，他会主动支持苏联

人。”

里根站在罗斯福一边，因而也招致了左翼分子的愤怒。里根回忆说：“我发现自己深陷齐腰深的恶名口水中，例如‘法西斯分子’‘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无产阶级的敌人’‘异教徒’‘迫害狂’等，不容我争辩。”其中一人是编剧约翰·霍华德·劳森，他变得格外愤怒。“他不断地在我鼻子底下挥舞着一根长手指并斥责我。”

此次集会在一片狼藉中收场。里根离开的时候，米高梅公司的管理人员多尔·沙里走到他跟前悄悄地说：“跟我去奥利维娅·德哈维兰家。”

里根照做了。“我看到大约12个人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他回忆说。里根对他们高涨的情绪感到迷惑，这就表明（而这群人也解释了）发生在HICCASP集会上的激烈争吵不是偶然的。德哈维兰说，当她拿到演讲稿的时候就对HICCASP起了疑心。这篇稿子是作家兼编剧达尔顿·特朗勃写的，要她在西雅图的一次集会上演讲。她认为这篇稿子的共产主义色彩过浓，便向詹姆斯·罗斯福建议，他们应当将HICCASP委员会一军。罗斯福的提议也正有此意，结果里根亲眼见到了。

听到这个故事，里根开怀大笑。德哈维兰认为揭露共产主义者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哪有这么好笑，于是就问里根为何发笑。里根回答说：“没什么，就是我原以为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她紧跟着来了一句：“我原以为你才是！”

7

与此同时，里根依然没有得到像样的角色，抱怨自己机遇不好。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它在自己饰演影片《金石盟》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刻把自己拖离了银幕——他可能已经成了第二个吉米·斯图尔特或是亨利·方达，但这场战争让他走上了岔道。现如今，战争结束了，但华纳兄弟公司把最好的角色给了战后年轻观众更喜欢的演员。

里根的抱怨是有道理的。银幕上的巨大成功需要命运的成全，就像在任何工作中的巨大成功一样。要想星光闪耀，好莱坞明星们必须得到上天的眷顾。然而，里根事业不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他足够诚实，那他必须承认自己的戏路狭窄，缺乏性感的魅力。在他一生中，许多熟人都提到里根不愿意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他可以与某人相熟数年，却永远不会彼此亲近。他的含蓄部分原因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也无疑反映了一个酒鬼的儿子的需要，他需要掩藏自己的失望，这种失望来自看到本应当是自己感情支柱的那个人却醉卧在雪地里。

里根可以饰演一些轻松的角色，一些可以让他在人类生存的脆弱外表上轻松起舞的角色，但要演那些需要深层挖掘、表现激烈内心冲突的沉重角色则太冒险了。里根常常认为，他饰演的德雷克·麦克休展现了他的能力，在那个角色中，他确实表现出了面对人生重创时的恐惧，然而这在他的事业中只是昙花一现，无法复制。里根抱怨战争，但其他演员的演艺事业在战争中存续了下来。事实很简单，那就是里根在气质上不适合饰演沉重角色。他与熟人保持距离的自我防卫，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他与观众的距离。

至于缺乏性感的魅力，恐怕也有类似的原因。爱情是所有事物中风

险最大的，或者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里根身上没有像同时代影星埃罗尔·弗林那样散发出的性欲和吸引力，让女观众无法抗拒，也让她们的护花使者们大开眼界。

好莱坞的损失就是美国的收获，只是尚未到来，但目前，里根唯一知道或是感觉到的就是，他必须找到新的舞台。年轻时期的那种不安全感基本已荡然无存。为什么不呢？他名利双收，还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一个35岁的男人还想要什么？但他依然关注外在因素，来平息内心的声音，想要证明自己与父亲不一样。里根依然渴望观众的掌声，如果华纳无法给他，那他就要找到自己的。

1937年，里根在自己的好莱坞职业生涯开始时加入了美国演员工会。1941年，他曾代替一个临时生病的成员参加了工会董事会的一次会议。在战争期间，他通过简·怀曼与董事会保持着间接联系，她在1942年成了董事会的一员。里根在1946年年初顶替一名离职成员重返董事会，结果得到其他成员的广泛关注，并于当年秋天被选举为副主席。

里根发现自己喜欢电影行业中的政治生活，并逐渐喜欢上了美国演员工会中的那种礼尚往来的行事风格，也慢慢意识到自己也有能力写演讲稿。这些稿子反映了他对电影行业以及更为广阔的世界所形成的看法。

里根重返美国演员工会时，恰逢一场劳工纷争，导致好莱坞产生分裂，对电影行业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会持续数十年。在工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美国工人运动一直态度不统一：代表熟练工人的工会一般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现行制度下，为其成员寻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好的条件；而代表技术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则相反，它们常常站在更为激进的立场，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或其体系，提倡工人管理，或者彻底实行社会主义。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是前者的首要代

表，观念极为保守；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则是其激进的对手。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这两个组织一直交恶，有时候为了争夺某些行业工人组织的领导权以及整个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会爆发暴力争端。

劳工意识形态斗争也渗透到了好莱坞。美国演员工会代表的是演员——好莱坞劳动大军中的精英。一个新组织——影业公司工会（CSU）试图在电影行业中插上一脚，把幕后的工作人员组织了起来。它吸纳了一个现成的组织——国际戏剧舞台工作者联盟（IATSE）。CSU动员了一系列的罢工，意在为其赢得关注，也展示一下肌肉，表明自己可以代表其成员。这些罢工引起了关注，但并不都是正面的，因为IATSE与CSU互掐了起来。IATSE的成员挑衅CSU的纠察队，引发骚乱，数十人被石块、刀、棒球棒和拳头击伤。

最初，里根和美国演员工会试图避免在CSU和IATSE之间选边站，那些少数与工人关系密切的工会成员不愿意跨越任何警戒线，无论是谁设立的。一个更大一些的、在政治上更为统一自由的组织接受了CSU及其领导人赫伯特·索雷尔的主张，即新工会必须代表的是民主组织，替代腐败独裁的IATSE。但绝大部分演员几乎无法在暗地里竞争的工会间做出选择，因而也就乐于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导向，主要就是继续工作。与里根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战时服役，渴望回到以前的工作中去，拿到以前的薪水。

IATSE挑战CSU权威这件事使得跨越警戒线比以前更容易了。工人们在一起反对老板的时候，工会活动要求团结一致。但当工人们彼此争夺控制权的时候，就像目前这种情况，其他工会可以酌情处理。美国演员工会就是这样做的，决定突破CSU的警戒线。

然而，这种突破是要承担风险的。当华纳兄弟公司让IATSE的越界者自谋生路的时候，它需要更好地照顾这些演员，因为公司对他们的投资很大。公司每天上午都会给他们打电话，找一处公司之外的不出名的聚会地点，这些地点每天都变，为的是迷惑CSU的间谍们。汽车开到现

场，然后演员上车，之后配备保安的汽车会开到华纳公司，进入停车场。里根最终在一部名叫《夜夜惊魂》的影片中找到一个角色。他回忆说，当汽车穿过警戒线的时候，他被要求躺在地板上，以防被石块或其他致命的炮弹击中。里根解释说："我不能那样做，因此他们让我独自坐在一边。他们想，如果我被打中了，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受伤了。"有一次，当里根赶到集会地点时，刚好看到他乘坐的汽车烈焰腾空。

有时候，里根发现自己会出其不意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在HICCASP的反共立场并没有逃过CSU领导者的注意，他们认为他是盲目保卫现状，因此是他们工会的一个威胁。他打算跨越警戒线的决定看起来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里根拒绝承认该工会活动的合法性。后来，他断言说："CSU的罢工是一种假象，并不是要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只是要从别的工会攫取利益。"里根在1946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讲过类似的话。这次会议是由一些不满董事会条例的美国演员工会（SAG）的成员召集的，在女演员艾达·卢皮诺的家里举行。里根从他的同事、SAG成员威廉·霍尔登那里得知了此次会议。霍尔登提议他们也去参加。演员中的左翼分子斯特林·海登介绍了罢工情况，言语间倾向于CSU。这在里根看来是不正确的，他想反驳海登的观点，但霍尔登制止了他，直至海登讲完。霍尔登说："现在可以了。"

里根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回忆说："我当时遇到了一个从没想到过的最敌对的听众。"里根一直在研究应SAG要求举行的罢工，为全体成员准备了一场报告。他总结说，这场争端是关于管辖权的，在卢皮诺的会议上他也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报告是一次带妆彩排，两天之后我要向SAG全体大会做报告。这会给反对派进攻的手段，但也是一次破坏他们计划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里根回去拍摄《夜夜惊魂》，当天的拍摄地是在海滩上，期间有人叫他去接了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拒绝亮明身份。"有一伙人正在打算对付你，"里根记得那个人说，"他们要报复你，让你永远不

能再演电影。”

里根并没有太在意，直到华纳公司的其他演员和管理人员说服了他。公司报了警，警方允许里根随身带枪，并在他的住所配备了安保措施。他记住了打电话的那个人跟他说的：往他脸上泼硫酸。里根回忆说：“打那之后，每天早上我都会很仔细地带上那支有皮套的手枪，到了晚上才解下来。”

但生活不能这样过。罢工持续期间，里根以及其他反对CSU的人都身处险境，他们的生计亦是如此。华纳兄弟公司出现的暴力现象让整个电影行业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长期以来，造梦机器以及许多明星都依赖良好的氛围来创造奇迹，不断赚钱。

对电影公司来说，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电影行业的批评家们指责电影公司垄断市场，经营自家的影院，给那些影院放映自己公司电影的专属权，而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被拒之门外。国会和法院允许当前的制度持续下去，但它们不可能一直这样支持。无论把电影行业以一种负面方式带进公众视野的是什么——比方说，旷日持久的罢工——都产生了一种威胁，重新提起了垄断问题，可能会促使政府政策发生改变。电影公司和演员都更喜欢当前的安全感和盈利。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会议将在芝加哥举行。由于CSU、IATSE和SAG都与AFL有联系，SAG的领导者就有理由呼吁联合会来裁决好莱坞的争端。AFL已经涉足这一争论。由AFL三位副主席组成的小组（虽然遭到挖苦，但是公认的三位智者）为CSU和IATSE制定了分工原则。这些原则达成了停火，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之后由智者们发表的澄清说明更是把水搅浑了。然而此前AFL要利用其威望和影响来试图解决好莱坞罢工的行为给了SAG极大的鼓舞，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赶往芝加哥。

里根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讨厌坐飞机，并且与华纳兄弟公司的合同中有一条规定他只能坐火车或汽车旅行。然而，这一问题很严重，时间又很紧迫，他克服了对飞行的嫌恶，与其他人一起从洛杉矶登机。他们的任务是要亲自询问一下智者们，他们最初的决定以及后来的说明是什么意思。“我们想方设法与这三位尊贵、真诚，并且我敢肯定是十分诚实的人见了面。”里根回忆说。按照里根的描述，这三位说他们已不再有身为仲裁者的权威，但愿意以个人身份来解释一下他们的决定背后的原则。他们的解释很简单，即便不那么令人满意。鉴于IATSE的特殊历史，他们无法把来自AFL其他方面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运用到好莱坞这件事上。他们拒绝了解散互相争斗的工会、创建一个崭新综合体的建议，因为那样就会有悖于AFL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因此，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接受当前的制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此来解决好莱坞的管辖权争端。

里根和其他人试图让这三个人详细解释一下这一决定，因为这是当前争端的症结所在：摄影棚布景是应当由CSU代表的木匠来搭建还是由IATSE代表的舞台工作人员来搭建。起初这三位智者拒绝了，说关于这件事他们说得已经够多了。然而最终，他们答应舞台布景应当由舞台工作人员来做，但同时提出，这一决定还没有被威廉·哈奇森接受，他是木匠兄弟会的头儿，这个组织是CSU连接AFL的纽带。据里根对这次会面的回忆，这几个人又补充道，哈奇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来推翻或者延缓这一决定。

里根显得很惊讶，他记得当时说：“你的意思是说AFL的第一副主席哈奇森特意违抗仲裁原则，阻碍裁决？”

三人点了点头。

里根和其他人失望地摇了摇头。他回忆说：“我们开始明白了许多，但也感到更悲哀了。”但他们拒绝放弃，把情况反映到了AFL主席威廉·格林那儿，表达了对哈奇森阻挠的不满。“我们说，如果对AFL内

部这种一人当道的情况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美国演员工会就准备派明星们飞往美国的每一个重要城市，亲自展示电影公司之外的暴力影片，并告诉人们有那么一个人应当为此负责，此人就是AFL的第一副主席威廉·哈奇森。”

在里根的回忆中，格林沮丧地痛哭起来，他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独立工会联盟，我无权做任何事情。”

然而，负面宣传带来的威胁引起了哈奇森的注意，他同意见一下这支SAG代表团。会见一开始，哈奇森表现得很幽默，但对于舞台布景工作属于CSU木匠这件事则十分固执。当里根和其他人要求他遵守仲裁决定时，哈奇森发怒了：“那三个死脑筋的仲裁者对布景工作知道个屁！”里根讲述道。

里根回应说：“在这个国家里，如果你决定要参加球赛，并使用裁判，那么你必须遵守他的决定。”

哈奇森转向里根说道：“请注意，30年前在一场关于与机械师的争端中AFL否决了我的人，30年来我从没有遵守过。因为这件事IAM（机械师组织）离开了AFL，我始终把他们拒之门外。”

里根和他的那些SAG的同事试图让哈奇森改变主意，但他拒绝让步。里根回忆说：“很明显，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个劳方的拦路虎，其中有个自负的家伙，完全迷失在个人权力的蒙蔽下。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对他指手画脚。”最后，这些演员们放弃了。但在他们离开时，哈奇森宣布了一件事：“告诉沃尔什（理查德·沃尔什，IATSE的主席），如果他在8月的指令上让步，那我就会把索雷尔（CSU成员）赶出好莱坞，并在5分钟内解散CSU。”他又补充说：“对共产党员我也会这么干的。”里根认为最后这句话意义深远，因为直到那时，哈奇森都否认CSU里面有共产党员。

在离开哈奇森所住的宾馆时，这些演员们遇到了赫伯特·索雷尔，并把哈奇森所说的话告诉了他。索雷尔蔑视地说："哈奇森说什么都没用，无论他做什么，这都将持续下去！最后将只有一个人负责好莱坞的工人，而那个人必将是我！"

8

假如工人问题仅局限于好莱坞，那么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几乎是注意不到的。电影公司不断地推出影片，而观众络绎不绝地去影院观看。然而，在战后两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山呼海啸般的罢工。数十个行业的数百种工作停工波及了上百万工人，大小工会都在寻求涨工资，这样才能与工会成员提高的产量相匹配，这种提高自战争爆发之日就开始了，但由于战时工资管制而无法领取。铁路工人在1946年春举行罢工，导致全国运输网络瘫痪，促使哈里·杜鲁门威胁说要把罢工者强征入伍，这样就可以听从他这个三军统帅的命令了。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突然去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铁路工人原本认为杜鲁门会同情他们。铁路工会没有去检验杜鲁门的决心，而是停止了罢工，但这件事让这个国家变得紧张不安，也接受了那些说法——激进的工会分子正设法破坏美国经济。

同时，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走出矿坑和巷道举行罢工，迫使钢铁制造商和其他制造商压缩生产规模。如果这场罢工持续到冬天，那么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没有燃料来取暖。矿工领导人约翰·L·刘易斯在战争期间拒绝加入其他主要工会领导者的队伍，拒绝保证不举行罢工。他遭到严厉谴责，被称为一个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激进分子，而如今杜鲁门称其为美国健康与安全的威胁。《时代》杂志在其封面把他描画成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铁路、煤炭以及好莱坞的罢工发生在美国人生活中思维方式重塑的关键时期。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政治上一直比较保守。从19世纪中期工业化的开始到20世纪前30年间，社会主义在美国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欧洲所支持的共产主义——社会

主义的其他形式——也几乎没有赢得任何追随者。但在20世纪3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党左翼拥护与社会主义沾边儿的反萧条措施，甚至共产主义也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尊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主要对手资本主义变得四分五裂，几乎没人相信它可以东山再起。自资本主义在美国经济中打下工业基础后的60年间，它就一路坎坷，历经危机、财政恐慌和萧条。1873年的大恐慌导致了这个国家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在罢工工人和资方雇用的杀手之间发生了血腥的战斗；1893年财政恐慌引发的萧条波及范围更广，爆发了更多的罢工；1907年的财政恐慌让国会也慌了手脚，从J·P·摩根的手里接管并控制了国家货币供应和货币信托，将其交给了新成立的美联储；1929年的恐慌（股票市场的崩盘）引发了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和历时最长、也最痛苦的经济大萧条。在当时，人们很容易相信马克思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使这一制度走向自我毁灭。每一次危机之后，这一制度都会恢复过来，但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当大萧条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批评就显得更具说服力了。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制度看起来不错，部分原因在于直到最近，这种制度还没有被试验过，只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的理论才成为所有大国制定政策的基础。在西方社会看来，早期的效果非常好，苏联基本躲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于那些远赴东方去观察那儿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少数西方人来说，这看起来应当是在经济上取得的稳步发展，尽管最初一穷二白。大多数外来者是看不到斯大林集体主义下的暴力和物资奇缺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村地区的苦难生活大家是知道的，这通常被解释为俄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结果。沙皇并没有要求马克思教育他们去虐待农民。

共产主义也赢得了道德美名。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在逃避对抗法西斯主义，而苏联始终如一、竭尽全力地声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莫斯科方面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和人员来对抗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个国家内战爆发以后，这些法西斯分子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援

助。反法西斯的一方最终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因其英勇表现和高尚的目的而受到好评。

因为所有这一切的缘故，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美国受到空前绝后的欢迎。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显著增加，许多没有入党的人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党内成员谈论世界革命，支持反法西斯阵线。共产党员加入自由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都很受欢迎。当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德国发动“二战”入侵波兰扫清道路时（并允许苏联占领这个倒霉国家的东部地区）时，这些共产党员和他们的追随者大吃一惊。但斯大林的转变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政府无法单独阻止德国的无奈之举。不管怎样，1941年希特勒对斯大林的背叛又让事情走上了正轨。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政府与苏联联手后，美国的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夸口说，他们是最先这样行事的。

美国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的联盟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分裂的原因与美苏同盟在同一时间的分裂是一样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希特勒共同的憎恨是团结美苏同盟的黏合剂，希特勒一死，这种黏合也就不存在了。华盛顿和莫斯科意识到，它们不仅仅要反对法西斯分子，前者还反对共产主义，后者还反对资本主义。双方的信仰都具有普遍意义：美国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更加坚信资本主义，而苏联意在让世界更加信仰共产主义。

在当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是否会导致军事冲突是个问题，这个问题自“二战”硝烟刚刚消散起，便引发了世界的关注。考虑到在过去的30年间，世界所展现的对于武力的嗜好，前景不容乐观。

正是美苏之间极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恐怖前景动摇了美国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盟。前者信仰资本主义，也相信自己的国家，而后者坚持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会选择苏联一方。1945年之前，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还只是美国改革计划中的不同定位，但在1945年之后，它们成了争夺世界控制权斗争中的敌对双方。

哈里·杜鲁门陷入了这场斗争之中。1946年杜鲁门没有参加竞选，但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参加了。在做了16年的多数党之后，他们面对的是选民们积攒起来的不满，其结果就是共和党人横扫两院，这让意外当选的杜鲁门那具有偶然性的总统宝座更加不稳定了。

长期的在野令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积怨甚深。大部分共和党人从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新政，因为它有许多限制企业的新措施，还有史无前例的社会福利计划。许多人希望压缩联邦政府规模，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但作为公共福利项目的社会保障得到了选民的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退休并开始领取退休金支票，它的支持率更高了。许多企业倾向于它们熟悉的规定，不喜欢不确定的、会让努力付诸东流的制度。另外，尽管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但他们还没有控制白宫，因此杜鲁门有权否决任何反对新政的立法。

即便如此，战后的工人骚乱还是为共和党提供了一次进攻的机会。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实践主要还是对雇主有利而对雇员不利，对资方有利而对劳方不利。联邦法院颁布禁令禁止罢工，联邦军队被用来对付罢工者。新政的实施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部分中的（a）条款发生了彻底改变，转为对有组织的劳方有利。最高法院推翻了复兴法，因而也就废除了第7部分中的（a）条款。但民主党国会通过了一个替代法案——瓦格纳法案，该法案保证工会有权成立组织并详细地列举资方各种不公平的做法。在瓦格纳法案的保护下，工人在针对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大主顾的罢工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战争的爆发使工人的这一全新现状陷入停滞，却无法使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相信这将永远持续下去或应当持续下去。战后出现的蔓延全国的罢工在1946年分化了选民，给共和党人带来的巨大的胜利，此时，新的国会多数派已迫不及待地要发动反击。

攻击的前奏是1947年的一个法案，由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和新泽西州共和党人弗雷德·哈特利分别在参众两院发起，其目的是要改变劳资关系，恢复到对资方有利的状态，确定工人们的不正当行为，取缔那些只雇用工会成员的工厂，禁止涉及管辖权的罢工和相关的联合抵制活动，授权政府可以通过禁令来中止那些会威胁到国民福利的罢工。

工会领导人谴责了塔夫脱–哈特利提案，认为它恢复了瓦格纳法案从美国人身上铲除的桎梏。但共和党人在从没喜欢过工会的南部保守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得到了足够的选票通过了提案。杜鲁门否决了这一议案，称其为“令人咋舌的法规”，然而反对工会的联盟召集了压倒一切的2/3多数，使该法案强行通过，直插总统咽喉。

威廉·哈奇森和那三位智者对于同里根和SAG代表团的会面的记忆与里根不一样。AFL的领导们否认在他们努力解决罢工的过程中曾遭受或经历过难堪的压力，而里根曾在调查罢工的一个国会委员会的证词中为自己的陈述辩解过，他说自己是个演员，磨炼出了记住对话的技巧。此外，他与其他人曾专门被派往芝加哥去听取汇报并记了下来。“我们赶赴会场，提前就知道在芝加哥听到的每一个字，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向我们的成员汇报，这也是我们到那儿的原因。我们去的时候就明白，我们要一字不落地记住听到得一切。”

无论谁说了什么，很快，事情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罢工不会结束。里根与SAG的其他成员继续试图从中斡旋。他们说服了40多家地方工会来参加10月在洛杉矶尼克博克酒店举行的会议。里根再次拜访了罢工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重申了希望解决的愿望，但赫伯特·索雷尔和CSU不肯妥协。

于是，里根公开他的想法：不肯妥协的一方是CSU。他宣称：“我

不再保持中立了，事实证明，CSU是靠不住的，它的领导人不希望解决罢工问题，只想在好莱坞持续的混乱和动荡中攫取利益。”

里根对CSU的公开反对招致了SAG内部对他的反对。反对者要求召开全体会议，来决定董事会对CSU的偏见是否体现了整个工会的愿望。里根勉强同意了，他后来说：“我们当时怕得要死。”他指的是反对者有可能在会上冲动行事，但他无法拒绝反对者表达意见的权利。

此次会议吵吵闹闹，里根成了被谩骂的对象。左翼分子指责他反对工人民主，站在公司一边。里根再次表明他和董事会的立场，他的声音在激愤的氛围中越来越高。亚历山大·诺克斯是一名性格演员，曾与里根共事，但不喜欢里根的政治观点。他说：“里根语速很快，他总是这样，因此他可以滔滔不绝。”

事实证明，反对者只是少数。当时提出了一份动议：全体成员投票来决定对董事会领导的信任程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相当于反对CSU的罢工。到场的绝大多数人通过了这一动议，他们明显同意里根的观点——有工作并得到薪水要比CSU所谓的代表工人立场的观点更为重要。

公司高层对于里根的表现很满意。杰克·华纳跟儿子说：“罗尼·里根原来是中流砥柱，不但是为了演员，而且是为了整个电影业。”

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但缺少演员的支持，慢慢就减弱了。罢工者慢慢地回到工作岗位，随后就离开了工会，而工会也到期结束了。对于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里根很满意，SAG董事会看起来也同样满意，因为在1947年3月，里根成了美国演员工会的主席。

反对者更加蔑视他了。里根后来写道：“一天晚上，我和埃迪·阿诺德要赶去参加一次董事会会议，在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两个我们都认识的演员走了过来。我已经面露微笑，刚要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

俩其中的一个把脸凑到我面前，眼里闪烁着仇恨的光芒，嘴里发出嘘声，骂了我一句‘法西斯！’”

9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中有一个次要条款，要求工会官员要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一条相对来说不太具有争议，因为较大的工会同保守派和共和党人一样，都急于摆脱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嫌疑。但这一条款带来的后果以及它所体现的思维定式构成了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一个篇章，在这一章中里根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自18世纪以来，美国国会一直在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次调查的是1791年阿瑟·圣克莱尔将军领导的一支部队被俄亥俄州的印第安人击败一事；国会也曾调查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中的行为；它还调查了横贯大陆铁路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调查了在20世纪早期J·P·摩根的财政实力；国会还进行了回顾性调查，调查了那批“死亡贩子”，据说他们操纵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中中饱私囊。

国会调查主要有两重目的。公开的目的是要为有效立法收集必要的信息，隐含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当选的调查员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国会议员乐于把自己当作公众利益的监督者，这给了他们一个否认非现任竞争对手的平台。

对战争行为的调查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主题，每一次武装冲突都会导致至少一次的大规模调查；令人怀疑的颠覆破坏活动紧随其后，处于第二位，因为它涉及类似的焦虑情绪。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对于暴乱的恐惧在18世纪90年代引发了对于外国侨民的密切关注；南北战争期间对于南方同情者的恐惧也让国会行动起来。从某些方面来看，颠覆活动比公开的战争行为更容易成为国会调查人员的目标。挑战战争行为需要牵连总统，这在战时是有政治风险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种关于战争的

调查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展开的。相反，揭露颠覆破坏活动在政治上则是安全的。如果真有颠覆分子存在，那他们也是少数，几乎没有拥护者。国会可以对他们表现得愤怒至极，而不用担心政治上的反响。

当代对于颠覆活动的调查始于“一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委员会，用来调查德国在美国的影响。德国的战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一问题已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然而该委员会却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激进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委员会的发现导致了反激进主义镇压。当众议院在1930年成立一个特殊委员会来调查国内共产主义的影响时（当时发展得很快，数百万美国人认为它可以替代资本主义），针对颠覆活动的调查又继续开始了。一个重新配置的委员会得到广泛的授权，可以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起置于其权限之内，名字就叫“非美活动委员会”。

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用了一个不十分准确但被普遍认可的首字母缩写——HUAC。该委员会于1938年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试图把工人运动，特别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及新政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CIO转移了戴斯的攻击，但新政的联邦剧院项目却成了那些充满敌意的调查者的牺牲品，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因此也可以由联邦政府取消资助。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艺术界、文化界人士参与到了剧院项目之中，他们很容易成为政治目标。这些人舞文弄墨，可能暗中扭曲和改变那些没有戒心的观众的思想。

这一点并没有被在战后接管了HUAC的国会议员们忽略。许多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对于美国依靠苏联取得的反法西斯胜利一直暗地里恼火。因为当时有必要支持共产党，所以他们保持沉默，但内心并不满意。战争的结束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反对共产党，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多人看不起罗斯福，甚至在他死后也是如此，他们几乎像憎恨共产党那样憎恨他。他们发现可以通过攻击某些战时影片来攻击他们

的敌人，这些影片是应罗斯福在任时白宫的要求拍摄的，意在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有价值的盟友。华纳兄弟公司拍摄的《莫斯科使团》是这份双重起诉书中当庭出示的头号证据，其他证据包括米高梅公司的《俄罗斯之歌》和雷电华电影公司的《北极星》。这些影片实现了战时的目的，使美国对于苏联的援助在政治上顺应民心，战后却让相关的电影公司和剧作家沦为反共批评的目标。

这些批评来势汹汹。1945年，为HUAC制定的一份机密报告后来被泄露了。报告断言好莱坞中共产党员蔓延。报告里说："据估计，电影行业中有514名作家要么属于共产党，要么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党的路线。假如行业本身继续无所作为，那么行业中大部分从事创作工作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共产党员，或是成为追随党的路线的紧密同情者。这样一来，该行业就会依赖这一激进组织来从事影片制作。"对共产党颠覆破坏活动的起诉成了1946年国会选举中反对民主党的强有力的武器。在共和党人横扫两院取得胜利之后，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杜鲁门政府，反对好莱坞。

众议院委员会在1947年春天开展了一场新的调查活动，其成员赶到加利福尼亚去实地评估那里的形势。他们询问了电影公司管理人员，主要是关于罗斯福政府在战时影片的生产过程中对他们施加的影响。听证会不对公众开放，但HUAC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之后报告说："一些最明目张胆地宣传共产党的影片都是在白宫的压力下拍摄的。"

这次春季行动为秋季总攻拉开了序幕。委员会召集了数十位好莱坞制片人、导演、作家和演员到华盛顿来做证。这一次听证会对公众和媒体开放，通过电台进行广播，通过摄像机录制为新闻纪录片发行。HUAC的主席是新泽西共和党人J·帕内尔·托马斯。他对有人提出的关于听证会可能会破坏宪法、扼杀言论自由的批评置之不理。托马斯说听证会仅仅是为了通报信息。"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是聚焦共产党。至于个人

和团体如何利用这些信息，那是他们的事。电影行业和美国人民自会处理好剩下的事。”托马斯估计，美国正式共产党员的数量大约是10万人，那些遵循党的路线但还不是党员的支持者大致也有这么多。

随着听证会的进展，调查好莱坞带来的额外好处变得清晰起来。在一般的国会听证会中，证人通常是大部分美国人从没有听说过的人，但电影行业的听证会涉及国内最著名的一群人。报社和电台用对待好莱坞首映式的热情对待此次听证会。100多位记者涌入了众议院的会议室，听证会就在那里举行。他们被扬声器、电台麦克风和新闻摄像机团团包围住。白炽溢光灯对着证人和提问者频频闪烁，小一点儿的泛光灯吊挂在上方，特警尽力控制着成群的观众，他们争抢着预留给他们的300个座位。当大明星们出席做证的时候，警察就组成楔形队列在拥挤的人群中开道。

主席托马斯敲响法槌，维持听证会的秩序。他宣布说：“委员会十分清楚正在调查的这件事的重要性，电影行业代表的是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也代表了数千名工人的就业，这里面包括不熟练的工人和收入很高的演员以及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电影行业代表的是可能对美国民众来说最大的一个独立娱乐项目——每周有超过8500万人去看电影。”的确，正是电影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才使得对这一行业的监管显得很有必要。“当然，我们都认识到，电影对观众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好莱坞的摄影棚。我们也都认识到，公民在自家附近影院中的所见所闻会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电影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那很自然，也很符合逻辑的一点就是，颠覆和独裁势力会企图利用这一媒介来达到颠覆美国的目的。”托马斯煞费苦心地宣称自己信任在电影界中工作的大多数先生和女士们的忠诚，但少数人造成的威胁十分恐怖，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这一行业进行彻底调查。“毫无疑问，好莱坞里面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小看他们在好莱坞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已经被行业内部的骚乱所证明。”但是，共产党活动和影响的量级和实质性危害有待进一步确定。“因此，委员会所面临

的问题以及当前调查的范围将会决定共产主义在好莱坞电影行业渗透的程度。”

委员会首先叫来的是公司管理人员。杰克·华纳在他反对共产党员和其他颠覆分子的证词中没有向任何人让步，这不仅是一个电影业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意识形态的白蚁已经潜伏在美国人的许多行业、组织和社团中。无论它们在哪里，我要说的是，让我们把它们挖出来消灭掉。我和我的兄弟们将会非常乐意慷慨出手，资助肃清活动，也愿意成立这样的基金会来向苏联运送那些不喜欢我们美国政府体制，喜欢共产主义体制的那些人。”早在5月面对委员会做证时，华纳曾被要求指出那些他认为是共产党员或者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当时的做证是保密的，但这一次他被要求听一遍复述，因此他必须公开确认他的指认。在读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委员会、观众和广播电台的听众都听到了，他们是：阿尔瓦·贝西、戈登·卡恩、盖伊·恩德、霍华德·科克、小瑞因·拉德纳、埃米特·莱弗里、约翰·霍华德·劳森、艾伯特·马尔茨、罗伯特·罗森、欧文·肖、达尔顿·特朗勃、约翰·韦克斯利、朱利叶斯和菲利普·爱泼斯坦、谢里登·吉布尼和克利福德·奥德兹。当他的证词读完后，华纳被问到他是否坚持这一指认。“是的，我坚持。”他答道。

曾导演过里根主演的《金石盟》的制片人兼导演山姆·伍德又在华纳的名单上加了几个名字：约翰·克隆威尔、欧文·皮切尔、爱德华·迪麦特雷克和弗兰克·图特勒。伍德不希望电影有任何的审查。“我认为你应当用影片表现一切，如果故事中有亮点——比方说《愤怒的葡萄》——那些发生在美国的事情，那我们就应当表现它。”“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叛国，也应当以叛国罪对待。”伍德指出，许多人，包括电影行业中的一些名人，并不希望看到取缔共产党，只要它能转入地下活动。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唤醒大众，让大家明白共产党人就在身边，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任何人，尤其是好莱坞中的人，如果向他们发出挑战，都会被扣上反工人、反犹太人、反黑人的大帽子。但是，他们的行为暴露了他们真实的身份。“如果你扒下他们的外衣，就会发

现锤子和镰刀。”

路易斯·B·梅耶感谢了委员会出色的工作，并主动做起了自己的那份。“共产主义与民主政府的原则完全对立，我欢迎委员会提供的此次机会，可以发现关于非美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渗透情况。”梅耶说道。然而，他认为事实会发现电影行业自身做得很好，让破坏分子处境尴尬。“我为电影业感到自豪，为其战争与和平年代的表现而自豪。它同报纸和广播一起，拥有同一个庄严的信仰：保卫我们神圣的言论自由，对那些披着自由外衣从事颠覆暗杀的企图坚决予以回击。”梅耶宣称，他和业内的其他人对破坏活动“时刻保持着警惕”。“假如像指控的那样，共产党企图利用银幕达到颠覆破坏的目的，那我会因为战胜他们而自豪。”

管理人员艰难地前进着。他们不想让国会对他们的影片内容指手画脚，但也不希望被看作在阻挠一场全体美国人都很关注的调查，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些人继续到影院看电影。华纳、梅耶以及其他人是从追求利润的角度考虑的，他们对当时民众的心理非常敏感，超过了委员会中的托马斯和其他当选官员，后者是从政治立场来考虑问题的。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针对被认为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公司影片的抵制活动都将会是致命的。华纳和梅耶都有特殊理由来表明他们的反共诚意，因为他俩负责拍摄了两部战时影片——《莫斯科使团》和《俄罗斯之歌》，这两部影片现在被当作共产党的宣传影片而受到攻击。

管理者的考量中还有最后一点，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一直存在。他们对寡头垄断方面的指控一直难以招架，因为他们掌握着发行影片的影院。这一体制有点儿贸易管制的味道，而寡头垄断的受害者们还在请求国会打破这种体制。华纳、梅耶和其他管理者希望避开所有可能招惹立法者不满的举动。

主席托马斯对于听证会的开局显得很高兴，他对萨姆·伍德说：“你讲的确实很实在，如果行业内、工人以及教育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像你

这样表现出同样的勇气，那么在这个国家，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了。换句话说，你有种。”

在与制片人和管理者交流了3天后，委员会请出了明星们。罗伯特·泰勒告诉委员会，在与美国演员工会的合作中，他经常发现共产主义的影响。他说：“开会的时候，特别是在工会全体大会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男女演员的行为让我想到即使他们不是共产党员，那他们也在努力成为共产党员。”泰勒认为电影公司必须对共产党员采取果断措施。“倘若我有权开除他们，那我会非常乐意把他们全部解雇，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到好莱坞或电影公司工作。”国会也应当发挥作用。泰勒认为应当取缔共产党，驱逐其成员。“倘若我有能力，那他们都会被打发到苏联或者其他令人讨厌的地方。”

罗伯特·蒙哥马利声称，共产党员和其他破坏分子在好莱坞只是少数，但尽管如此，他们也很危险。他说：“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参加公开集会时组织得非常完美，目的非常明确。”蒙哥马利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战争）来击败共产党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主席先生，同其他1939~1940年在这个国家里的数百万人一样，我放弃了工作，与被称作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主义战斗。我甘愿再次放弃工作，再次与被称作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战斗。”

乔治·墨菲认为美国的共产党员是苏联间谍，他们已经渗透进了好莱坞，但并不仅限于好莱坞。他说：“我认为电影行业中存在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国家当前的各个行业中都有。”墨菲支持杰克·华纳的观点，坚决认为好莱坞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我认为电影业成功地阻止了任何行业之外的宣传企图。”

里根在墨菲之后出场。委员会的首席调查员罗伯特·斯特里普林询问了里根的从影背景。里根回答说他自1937年6月开始进入演艺界，然

后又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其中有3年半的中断。"

斯特里普林问那是什么时候。

里根回答说："那是在战争后期。"委员会成员和听众席中的许多人点头赞同。

里根先生是美国演员工会的成员吗？如果是，当了多久的演员工会成员？

"从1937年6月开始。"

他是工会主席，对吗？

"是的，先生。"

他还有其他职务吗？

"是的，先生。就在战争开始前，我是董事会成员；战争刚一结束，在我当选主席之前，我又成了董事会成员。"

斯特里普林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作为董事会成员，作为美国演员工会主席，作为一名积极分子，你是否曾看到或注意到过，在组织内部有共产党或法西斯团伙试图对工会施加影响或压力？"

里根一直在期盼着这一问题，前面每个证人都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立即回答说："在美国演员工会内部有一个小团体一直反对工会董事会和董事会官员的政策，体现在对各种问题的投票上。这个小团体被怀疑多少是在执行与共产党有关的策略。"

这个团体在工会内部是否造成了混乱？

"有时候，他们试图制造混乱。"

里根先生知道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吗？

“我没有调查权，或者其他什么的。我不清楚。”

里根先生是否听说过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我听到过不同的议论，其中有一些带有共产党色彩。”

他们是否企图控制工会？

里根说，是的，他们想这么做。但同公司管理者一样，他认为好莱坞可以自我监督。“我想，至于您所说的，我们这一方也想控制工会，因为我们也同样努力要表达我们的观点。”里根一方取胜了。“平均90%以上或更多的美国演员工会成员投票支持工会的现行政策。”

之前的证人证明共产主义的前线组织已经在好莱坞成立了。里根先生是否受到这些组织的引诱呢？

“先生，是这样的，我曾经收到一份来自一个被称作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宣传材料，我不清楚它是不是共产主义，只知道我不喜欢他们的观点，因此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瓜葛。”

里根先生是否被邀请加入联合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呢？

“从没有人邀请我这样做，但我发现自己在另外一个场合被误导去支持一项活动，而这项活动就是联合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支持的。”

能解释一下吗？

“几周前有人给我打电话。碰巧当时在好莱坞有一次募捐活动，急需在城市的某个区域建一家医院，名字叫全民医院。我想，建立这家医院的目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得到了好莱坞大部分人的支持——或者我应当说是洛杉矶的大部分人。当然，它也得到了大部分医生的支

持，因为这是迫切的需要。不久前，有人叫我接电话，一位女士自报家门，由于我不认识她，就没有记下任何细节，因此现在也说不出她的名字。她告诉我说要举行一场演奏会，其间保罗·罗贝森会进行歌唱表演，所有的门票收入都将用于医院建设。她问我是否可以把我的名字列入赞助人名单。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认为罗贝森先生和我的政治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转念一想，自己是否有点儿傻啊，因为在这种场合，罗贝森先生可能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到场的，而募捐的主题无疑是要高于任何政治考量的：这是一家所有人都支持的医院，我自己也捐钱了。我当时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之后，我离开了几个星期，当我回来时，有人递给我一份报纸，里面的一则报道说演唱会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举行，由联合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资助。”左翼政治势力控制了此次演唱会。“在报道中，我没有看到关于医院的一个字，于是打电话给报社说我不习惯给编辑写信，但想解释下我的立场，结果对方笑着说道：‘你不用担心，你可能是第50个带着同样想法打来电话的人，包括大部分合法医生，他们也被列为这件事的赞助者。’”

里根先生是否认为这是典型的共产党手段？

“我想这与他们的策略一致——是的，先生。”

斯特里普林说，里根先生是电影行业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于如何采取适当的做法来消除行业中共产党的影响，有何高见？

里根重申说，电影行业可以处理好自身的事物。“我们当中99%的人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想在我们民主权利的范围内，永远不要践踏民主赋予我们的权利，在限制那些人的活动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毕竟，目前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一个政治党派。在这一基础上，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就可以揭露他们的谎言，反对他们的宣传。在美国演员工会这件事上，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用试图以一小撮有组织的团体来控制一个组织的大多数人的惯用伎俩。因此从根本

上说，对抗这些人的最佳途径就是要让民主发挥作用。在美国演员工会内部，我们让民主发挥作用的方法就是确保每人一票、人人知情。我相信，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如果所有美国人都了解事情的全部，那他们就永远不会犯错误。无论该党取缔与否，我同意前面几位先生的观点——那是一件需要政府来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公民，我比较犹豫，或者说不愿意看到任何政党因其政治思想而被取缔。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170年，我们的立国之本就是民主是很强大的，足以经受考验，回击任何思想的侵袭。然而，如果有证据表明某个组织是某种势力、某个国家的间谍机构，或是某种违法的政治团体——我想政府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有证据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同时，好莱坞也要应对这一挑战。“机缘巧合，我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十分自豪，对我们处理斗争的方式引以为荣。我不相信共产党有机会能够利用银幕作为他们哲学或思想的宣传板。我相信，只要好莱坞的人们继续像现在这样警惕、清醒、勇敢，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

里根又被问到他是否清楚共产主义向美国电影编剧工会的渗透，这一工会与他自己的美国演员工会不同。

里根回答道：“我必须指出，这是道听途说，我曾听到过与此有关的议论。”但他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事件或名字。

托马斯主席向里根的到场表达了委员会的感谢，他选取了证人提到的托马斯·杰斐逊和民主自我修正的力量这两点，发表了如下的预言：“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自己希望做好的工作，也就是尽我们所能把美国建设成一片净土。”

里根突然插话道：“先生，在这一点上，我想要表达但没有表达清楚的也是这种担忧。我讨厌、憎恨他们的思想，但我更憎恨他们的策略，第五纵队的策略、欺诈的策略，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公民，我从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由于对这群人的恐惧或憎恨而受到影响，因恐惧或

憎恨而去牺牲我们的任何民主原则。我依然坚信民主可以解决一切。”

托马斯主席说：“我们同意这一点，非常感谢您。”

10

此次听证会与里根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对里根来说，这种面向全国观众的公开的政治舞台是全新的体验，他意识到自己喜欢这种感觉。里根也非常精通此道，他脚步轻盈，思维敏捷，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摄像机一直对他青睐有加，而他也知道如何很好地去配合。他在配合调查和为自己的行业辩护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

里根的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电影媒体突出报道了他的诚恳真挚和刚毅的外表。普通报纸喜欢他对杰斐逊的引用和对民主原则的呼吁。大部分人期盼着更多地看到这位能言善辩、很上镜的演员代言人。

其他证人的待遇则苛刻了许多。约翰·霍华德·劳森就是其中一位，他被杰克·华纳和其他一些人向委员会指认为破坏分子，收到传唤前去解释。在他开始朗读一份公开声明时，麻烦就来了。托马斯主席要求看一下副本。他看了一眼之后，就放了下来。托马斯说：“我不愿意听这份声明，不要再读了。”

劳森反驳道：“你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全国人面前诽谤诋毁我——”

托马斯说：“等一下——”

“并且你拒绝让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阐述我的权利。”

“我之所以拒绝你读声明是因为你声明中的第一句话，那份声明与此次调查不相干。记住，这是一个国会委员会——依法成立的国会委员会。我们有严格的程序，也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斯特里普林先生，请

核实证人。”

劳森坚持道：“在这间屋子里，美国公民的权利是很重要的，我打算维护这些权利，托马斯议员。”

“劳森先生，请说出你的全名好吗？”斯特里普林问道。

劳森继续说道：“我表示抗议，抗议委员会反对我读这份声明。你们曾允许华纳先生、梅耶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在这间屋子里读过声明。我的名字是约翰·霍华德·劳森。”

直到斯特里普林问劳森是否是美国电影编剧工会成员时，事情才平息下来。

劳森回答道：“这里提到的任何有关成员资格、政治信仰或者组织关系的问题都——”

“主席先生——”斯特里普林请求道。

劳森继续说：“是绝对超出这个委员会的权限的。”

“主席先生——”斯特里普林再次说道。

劳森试图继续下去：“但是——”

托马斯敲响了他的法槌。

劳森承认道：“我是美国电影编剧工会成员，这是公开备案的。”

几名观众开始鼓掌。

托马斯怒目圆睁：“我想请观众席注意：你们是委员会请来的客人，整个过程必须保持秩序。我不喜欢鼓掌或任何这样那样的表现。”

斯特里普林请求主席要求证人回答问题。

劳森坚持说：“主席先生，您曾允许——”

托马斯敲响法槌让劳森闭嘴。

劳森继续说道：“这间屋子里的其他证人用300、400或500字来回答问题。”

托马斯说：“劳森先生，请你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不要继续试图破坏听证会，好不好？”

“我不是在接受审判，主席先生。委员会是在当着美国人民的面搞审判，我们开门见山地来吧。”

斯特里普林继续提问：“劳森先生，你成为美国电影编剧工会成员有多久了？”

“从它成立之日起，也就是1933年。”

“你在工会里面有办公室吗？”

“我有没有办公室这一问题同样是一个超出委员会权限的问题。”

托马斯再次敲响了他的法槌。

劳森不理会他：“这是在国家人权法案之下侵犯组织权利的行为，也是——”

托马斯再次敲响了他的法槌，对劳森说道：“这是要求你回答问题，通过你的律师要求你回答问题，我们也希望你回答。假如你不想回答，那么我们就原谅你，记录中也不会有你的回答。”

“我希望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回答您的问题，主席先生，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你必须回答问题，否则将被请出证人席。”

之后，又出现了多次掐斗、中断和敲槌，最后斯特里普林问到了屋子里所有人都在一直等待的那个问题：“劳森先生，请问你现在或曾经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吗？”

劳森回答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之前提到的几点，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此次问询没有丝毫关系，这次问询企图控制电影业，并在所有领域侵犯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主席先生——”斯特里普林说道。

法槌再次敲响。

劳森无视干扰和敲响的法槌，继续说道：“这一问题不但与我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的问题有关，而且委员会企图建立一种特权—”

法槌再次敲响。

“这种特权在历史上是任何委员会都无法得到的，并企图侵犯美国公民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无论他们是新教徒、卫理公会派教、犹太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无论他们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托马斯再次敲响了法槌，并命令道：“劳森先生，请再次安静。劳森先生，我们问的最相关的问题是你是否曾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您为了在这儿制造恐怖又在故技重演了，希特勒在德国曾使用过

——”

法槌再次响起。

“为的是制造一种完全使人误解的氛围，这次听证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

法槌再次响起。

“目的是你们可以抹黑电影行业，可以开始控制媒体，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传播方式。”

托马斯说道：“你已经知道——”

“人权法案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委员会侵犯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现在，如果您想知道——”

斯特里普林说：“主席先生，证人没有回答问题。”

“如果您想知道——”

法槌声接连不断。

“这儿犯下的伪证罪以及计划要犯的伪证罪——”

托马斯说道：“劳森先生——”

“您就会允许我跟我的律师把上周做证的证人带到这里，允许我们互相质问这些证词，我们会揭露所有的谎言——”

托马斯猛敲法槌，宣布道：“如果我们必须在此待上一周的话，我们将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你是共产党员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真是遗憾，也很悲哀，我必须教会这个委员会关于美国人的基本

原则——”

法槌再次响起。“问题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是：你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我回答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任何美国公民在回答绝对侵犯他权利的问题时可以采用的方式。”

“那么，你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告诉过您，我会向美国公众展示我的信仰、组织关系以及所有的一切，他们会知道我的立场——”

托马斯已忍无可忍，他无比严肃地敲响了法槌，示意安保人员到场。“让证人退席。”

“当他们读我的作品时。”

法槌震天响。他命令劳森：“离开证人席。”

“我写关于美国主义的文章已经好多年了，我还会继续为人权法案而战斗，这也是你们试图要破坏的。”

“警官们，将此人带离证人席。”

劳森被带走的时候，听证会会场爆发出掌声和嘘声。

托马斯向观众挥舞着法槌喊道：“这里禁止表态，禁止表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另外9个证人——编剧和导演——重复了劳森的表演和经历，细节

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一致，所有人都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关键问题：他们是否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他们很快就被称作“好莱坞十君子”，他们认为该委员会在激烈的反共时代无权要求他们自证其罪。他们以第一和第五修正案为基础，认为该修正案胜过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授权章程。

委员会做出回应，共同起诉这10个人藐视国会，众议院以346：17的投票支持该起诉。

“好莱坞十君子”同时成为英雄和败类。左翼分子及许多自由派人士称赞他们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保护神，是将职业和信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艺术家；而保守派则谴责他们是外国间谍或是误入歧途的傀儡。

电影行业本身也分成了不同阵线。公司管理者和制片人最初的态度模棱两可，迟迟不想对编剧和导演进行忠诚测试，他们担心摊上官司、招致负面宣传及损失创作天才。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总结了所有政治禁令或者黑名单所带来的缺点：“缺乏合法权利表达观点以及挑战针对自己的起诉，这让无辜的公民感到非常无助。凭借证人未经证实的说法，无辜公民可能会在公众的心目中受到起诉和定罪，该证人也许非常忠实，但可能被偏见误导或迷惑。”

然而当时，公众的意见站在众议院一边，反对“好莱坞十君子”，因此管理层也改变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反对言论自由的观点，辩称问题的关键不是言论而是就业。第一修正案保证了“好莱坞十君子”的言论自由，但无法保证他们的工作。电影公司完全有权剥夺那些以疏远观众的方式破坏公司生意的人的工作。1947年11月，管理者们匆匆忙忙地聚集到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来商讨他们的对策，会议出台了一条声明，概括了他们的政策：“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成员对好莱坞这10个人做法感到非常遗憾，他们以蔑视法庭罪被传唤。我们无意预判他们的合法权利，但他们的行为已经对他们的公司造成了伤害，也削弱了他们对行业的有用价

值。我们将立即解雇他们或暂停对这些人的雇用，并且不予赔偿，也不会再次雇用这些人，直到他被无罪开释，或者承认蔑视法庭罪并发誓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一政策也不仅仅局限于“好莱坞十君子”。“我们不会明知故犯雇用共产党员或者任何党派或组织的成员，如果这些人倡导利用武力或者非法违宪的手段推翻美国政府。”制片人承认他们的政策会招致危险。“这可能会伤及无辜，也可能会制造恐怖气氛。”当恐怖左右社会时，创作型的工作会受到损害，但为了国家利益，值得冒险一试。

11

针对好莱坞举行的HUAC听证会改变了里根的生活，除了让他感受到政治的诱惑力并在新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外，听证会还将其置于意识形态深渊的边缘，而他轻而易举就跨越了过去。在关于共产党的问题上，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站在电影公司一边。倘若“好莱坞十君子”中有演员的话（里根这个工会主席手下的成员），那里根可能就要麻烦得多，但编剧和导演不归他管。他的责任就是让演员开工，在这一点上，里根与工会的利益同制片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华尔道夫声明发表不久（逐渐被称作制片人的政策声明），里根和电影工会的其他代表与电影行业的管理层碰了下头。路易斯·梅耶解释说声明背后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考量，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他说制片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保护电影行业，把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

里根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责任的，他就声明的条款提问了梅耶和其他制片人。他们如何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而谁不是？涉及的当事人的话能够采信吗？梅耶回答说尚未确立正式的筛查程序，制片人会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里根又问道，如果国会调查指控某人是共产党员，但当事人予以否认，这个时候怎么办？米高梅的母公司洛氏公司的尼古拉斯·申克回答说，在用人方面，行业不会把权力让给国会，但如果国会委员会要求公司员工做证，而该员工拒绝回答自己是否是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他就被解雇了。对此，里根没有反对。

尽管梅耶和其他制片人还有里根都把共产党问题视为一个经济问题，但在冷战那种令人忧虑的氛围中，这一问题带有不可否认的政治后果。即使“好莱坞十君子”没有在针对HUAC的政治调查中明确表明立

场，这种后果也会出现。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的核心就是政治问题。里根站在制片人一边反对“好莱坞十君子”，这样一来，他就向世人宣布了自己的反共政治立场。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已经发现，这一问题可以让他开创一番政治事业。

帕内尔·托马斯不是调查好莱坞共产党的唯一一位，他的委员会也不是找里根谈话的唯一一个。从战争爆发之前，J·埃德加·胡佛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开始调查颠覆分子的活动，他们最初关注的是德国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探员在1943年与里根进行了面谈。里根报告说曾遇到过一个他们在追查的人，此人在一次聚会上因为反犹言论差一点儿被里根揍了一顿。战后，胡佛的人把目标转向了共产党，他们再次与里根取得联系，在舞台工作人员罢工期间造访了里根与简在好莱坞的家。据里根回忆，刚开始他拒绝了他们，他说：“我不支持扣共产主义的帽子进行政治迫害。”他们说他们也不支持，只是在寻找间谍和破坏分子，还说他们认为里根会帮助他们，因为共产党十分仇视他。他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讲述了在一次集会上一些激进分子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对付那个该死的恶棍里根？”里根决定配合他们的工作。他回忆说：“我们花了几个小时交换信息，整个会谈让人大开眼界。”

1947年春天，里根接受了FBI探员的又一次拜访，他提到了美国演员工会中的政治活动，并说大部分成员都忠诚可靠，但一小部分人总是好像在“追随共产党的路线”。里根提供了几个违法者的名字，包括安妮·里维尔，她是工会中难得的人才，也是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

里根没有公开他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联系，该局在好莱坞培养了许多情报人员，至少有18个，里根的代号是“T–10”。联邦调查局希望对情报人员的身份保密，原因很明显。里根愿意帮忙，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没错。他支持根除颠覆分子的工作，认为如果颠覆分子不知道自己在打他们的报告，那他的工作就会更有成效。

然而，关于他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系，至少在一件事上他打破了沉默。1965年，里根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历经数月的艰难战斗中，美国演员工会除了广义上的所指之外，从没有用过‘共产党员’这一单词，也没有指认过任何个人。”然而，在1947年与联邦调查局的会面中，里根的确进行了指认。

里根不断增加的政治活动让他无暇顾及婚姻，这对婚姻没有好处，但他的婚姻早已出现了问题。他和简一直不是很亲密，部分原因在于性格和历史问题。两人的童年都没有那种幸福、成功的婚姻作为他们自己后来婚姻的榜样，必须自己动手打造。二人也都无法对彼此坦诚相待，在童年时期都学会了在情感上自我防护，让对方进入自己的世界是有风险的，可能会重复他们年轻时常常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和失望。

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很难让他们在情感上走得亲近。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事业，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很难让他们聚到一起。他们雇了帮手来照顾莫琳和迈克尔，两个孩子见保姆的时间比见父母还多。莫琳后来回忆说：“我想父母对我们的关照屈指可数，因为这种事不常发生，通常他们一周工作6天。像许多名人的孩子一样，我和迈克尔被留给了像班纳阿姨这样的人来照顾。”她是他们主要的保姆。孩子们常常在情感上依赖家庭，就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一样，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亲近。但在里根家里，不是这样的。

经济通常是婚姻的黏合剂，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当时绝大多数美国家庭主妇在物质上依靠丈夫。但在这件事上，里根的家庭也不是这样的。战争期间，简比里根赚得多得多，已经习惯了高收入带给她的独立感。战后，家庭收入重新得到了平衡，但她依然可以完全养活自己，如果真走到这一步的话。

简对里根的职业似乎失去了敬意。他们结婚的时候，两人的事业前

途一片光明，在前几年里他们比翼双飞。但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里根的演艺事业死气沉沉，走上下坡路，而她的事业则继续发展。简演得就是比他好，可以用他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来表达复杂的感情。她的角色和表演越来越好，在1948年的影片《心声泪影》中饰演了一位被强奸的聋哑人，在这部影片中她没有一句台词，却获得了奥斯卡奖。

随着里根演艺前景的持续低迷，他无疑不再是她曾经心目中的强者了。同时，简对行业中的政治活动越来越讨厌了，而他却为之着迷。她发现工人问题单调乏味，即便并不是那么令人反感。而国家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引起里根的兴趣，但在她看来却更加糟糕。多年以后有人问里根，简·怀曼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里根说他不知道。她从没有对政治表现出足够的兴趣，让自己的观点与他的一致。

1947年年初，简怀孕了。可能这次怀孕是提前计划好的，但更有可能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或许再生一个孩子可以让家庭破镜重圆，但也可能不行。无论如何，这个女婴早产了，第二天就夭折了。这次经历对简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但里根却几乎没有安慰她，因为当时他患了严重的肺炎，住在几英里之外的另一家医院。简一定感到非常孤独。

或许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在乎孤独，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变得越来越生疏。简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藏进了她即将饰演的《心声泪影》的角色中。她用蜡塞住了自己的耳朵来模仿失聪的状态，或许是因为不想听到他的声音。由于工会和众议院听证会的工作，以及“好莱坞十君子”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原因，里根变得更忙了。

电影媒体捕捉到了他们不和的蛛丝马迹。里根否认出了问题，而简则没有。他们的不同反应让两人的隔阂更深了。

里根是否发现了婚姻行将完结？很可能没有。里根父母之间的关系比这个严重多了，但内莉从没有离开杰克。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也不会离婚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其他教派的大部分迪克森人也不会离婚的。

即使在好莱坞，人们也忠于婚姻，将其视为一种习俗，至少与后人相比是这样的。

因此，当简在1947年秋天说她想要离婚的时候，里根惊呆了。没过多久，她就要求他搬出去。

里根不知所措。当然，他必须离开，他十分绅士，不可能强求来挽留一位不情愿的女士，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妻子。但到哪儿去呢？日子怎么过下去呢？他的家是他的港湾——一个不完美的港湾，的确，但至少也是一个港湾。里根曾想过，他的家能够给他提供童年时代所感受不到的安全感。可是现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又要漂泊了，像童年时期那样无助。当时，他永远不知道下一张收回房屋的通知什么时候会到来，全家又要被迫搬家，永远不知道他父亲到底是那个满肚子好故事的快乐的杰克，还是那个昏倒在雪地里的醉鬼杰克。

四处漂泊的童年教会了他如何适应生活，却没有教会他如何交朋友。一个微笑，一个故事就可以让他融入新环境，让人们看到阳光、乐观的里根，让人们想与他交往。但他从不让人亲近，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学会了保护自己。

他与简的婚姻有时候会让他想不必封闭自我，她能带给他从没有过的安全感，会是他永远的妻子。他可以让自己依赖于她，虽然之前他没有依赖过任何人。

但是，里根不知道如何去做。他父母一直生活在一起，因为母亲看不到别的选择。杰克不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好手，但他能有所收入。在他们的艰苦生活中，一丁点儿的东西都很重要。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相爱过，这种方式是里根所不能模仿的。他缺少如何与人亲密的教导，没有指示牌，也没有路标，只是一路盲行。

简自己的问题也让建立亲密关系这件事变得更难。她也在寻求亲密

关系，却不知道如何付出或接受。但与里根不同，她可以选择，不一定要保持婚姻。她曾离异过，并挺了过来。这次她也会熬过来的。

婚姻就这样结束了。1948年6月，简正式提出离婚起诉。加利福尼亚法院要求她说明原因，她提出的理由是受到精神折磨，难以令人信服，却达到了目的。里根没有争辩，离婚获得批准。

12

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前，哈里·杜鲁门从没有想过当总统。当了总统之后，他常常想为什么所有人都想当总统。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派在国内事务上处处刁难他，阻止新政的延展，并通过塔夫脱–哈特利劳动法和其他措施来压低新政带来的收益。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大合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盟军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一定会带来一次盟国主导的和平会议，就像“一战”之后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但是，美苏领导人无法就会议内容达成一致，互不信任的军事割据在欧洲中心地带僵持着。美苏士兵在柏林和德国其他边界地区剑拔弩张，这些地区是1945年他们的部队从纳粹手中夺取的。

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争斗呈现出其他形式。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迅速，有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获得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在希腊，共产党起义者击败了保守政府，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滩头阵地。在全欧洲，各国的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中苦苦挣扎，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在怀疑他们是否能活到下一个星期、下个月、下一个冬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没有引发战争，也没有带来经济萧条的组织的哄骗——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很明显自正其身。

美国领导人和他们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同行们回忆了希特勒当年是如何一步步地积蓄力量，创建自己的邪恶帝国的，他们发誓不会像前任那样重蹈覆辙，犯下绥靖错误。但是，英法两国缺乏推行反对绥靖姑息主义政策所需要的资金。1947年年初，伦敦方面的特使告诉杜鲁门政府，英国无力在巴尔干半岛发挥其传统作用了。美国官员非常警觉，马上做出反应，要求共同关注该地区的未来，担心希腊垮台引发的边界危

机或在其周边出现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国务院为希腊的保守政权准备了一个救援计划，在资金配比上与土耳其达成平衡，当时土耳其也有自己的左翼分子问题。杜鲁门前往国会推销这项一揽子计划。他叙说了巴尔干地区面临的威胁，将其置于全面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环境下。杜鲁门说："在世界历史中，在当前形势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免费的。第一种生活方式取决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点就是自由结社、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取决于少数人强加在多数人身上的意志。它依靠恐怖和压迫、没有自由的媒体和广播、内定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如果美国袖手旁观，让残忍的少数分子破坏了多数人的自由，那就是昧心而愚蠢。"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是支持那些自由的民族，他们正在抵制使用武力的少数人或外部压力对他们的镇压。我认为，我们必须协助那些自由的民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短期来看，杜鲁门得到了他想要的：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一揽子援助，这让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示好。从长远来看，他得到的可能比他想要的还多。他的声明很快就像19世纪的"门罗主义"一样，被称作"杜鲁门主义"，很显然让美国开始致力于一项政策：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反对一切看似共产主义的扩张。杜鲁门煞有介事地把人性划分为绵羊和山羊，让美国在全球当起了"牧羊人"。

杜鲁门主义仅仅是一个开端。战争结束两年后，欧洲依然无法让经济复苏。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利用资本主义的不景气获取政治利益，预示着他们可能会很快接管法国和意大利政府。美国领导人无法想象比这更惨烈的灾难了，于是他们行动起来，进行阻止。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欧洲重建计划，由美国财政承担。需要的资金总额是杜鲁门为希腊和土耳其所要资金的许多倍，然而美国国会却同意了，部分原因在于这笔钱将会为美国的生产者、承包商和托运人带来收益，即使重建的是欧洲。

杜鲁门逐渐形成的冷战战略成为美国40年外交政策的基础。杜鲁门之后的八位总统，包括罗纳德·里根，都赞同他的远见卓识并追随他的领导，但他从其同时代的人那里得到的宝贵支持少之又少。共和党保守派指责说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只是让他们更厌恶新政了："大政府"变得更加庞大，并在榨取美国人民的血汗。其他共和党人反对杜鲁门，只是因为他是民主党人，他们试图阻止这位因偶然事件而成为白宫主人的人以自己的名字签署新的租约。1948年的大选对杜鲁门来说前景不妙，因为在民主党当政16年之后，选民们看起来已不耐烦。当南方民主党中重要的一派在民权问题上倒戈时，形势变得越发不妙。杜鲁门下令军队废除种族隔离，但废除歧视的做法进展缓慢，这对美国南部的黑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然而，杜鲁门在大选中险胜。出于习惯，里根依然对民主党保持忠诚，支持总统并为其竞选活动募捐。恰好有足够的选民勉强对这位性格急躁的密苏里人表示赞同，让他击败了纽约的托马斯·杜威，把他推上了总统宝座。

杜鲁门以对保守派展开更进一步的公然冒犯作为庆祝。他拒绝了美国建国者们的建议，推翻了美国基本的外交原则，通过谈判达成了和平时期的盟约。《北大西洋公约》让美国有义务优先考虑保护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另外8个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抵抗外来攻击。《北大西洋公约》没有提及苏联，但所有人都明白，它是盟国唯一真正担忧的国家。

《北大西洋公约》完成了"遏制政策"的构建，这也是对杜鲁门反苏政策的概括。这激怒了保守派，他们认为乔治·华盛顿比哈里·杜鲁门明智，反对他们所认为的管理者对于权力的攫取。显然，公约从国会手里夺走了战争决定权，并将其赋予了总统，他可以决定面对攻击何时反击。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是在工人问题上杜鲁门在参议院中的死敌。他再次双拳紧握用手指点总统，警告说公约将导致美国长期占据欧

洲，让美国防卫力量妄自尊大。

然而，塔夫脱的路线少有人回应。公约迫使保守派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要么致力于“小政府”的建设，要么反对共产主义。许多人认为塔夫脱是正确的，他预言说，大西洋联盟和其他遏制政策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规模更加庞大。但是，出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考虑，大多数人认为，国外共产主义对美国自由的威胁要比国内自由派的威胁大，因此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支持杜鲁门的冷战工作。

13

女演员帕特里夏·妮尔在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碰到了里根，她觉得自己从没有见过如此忧郁的人。妮尔说："他妻子简·怀曼刚刚宣布分手，这很遗憾，因为他不想离婚。我记得他走到外面，一位年长的女士陪着他，他哭了。"

里根继续工作，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埃迪·布莱肯与他一起出演了《从琼斯海滩来的女孩》。这是一部很快就被遗忘的影片，讲的是寻找完美女伴的故事。"里根是个孤独的家伙。"布莱肯说。在他看来很奇怪，里根对周围的漂亮女士熟视无睹。布莱肯说："他从不沾惹性感撩人的女性，从不是一个追求床笫之欢的人。他追求的是人生的伴侣。"

出人意料的是，工作把里根带到了海外。马歇尔计划是要帮助匡扶英国倾斜的经济，但在1948年秋天，经济稳定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英国需要能筹划到手的每一笔钱，因此，英国政府禁止在英国的外国公司向外输出利润。华纳兄弟公司和好莱坞其他公司在英国都拥有并经营着影院，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英国影院的盈利只能在英国消费。华纳决定利用其"冻结的美元"（他就是这样称呼这笔钱的）在英国拍摄电影。1948年11月，里根、帕特里夏·妮尔和其他演职人员远渡重洋去往英国，拍摄影片《浮生梦痕》。

这次活动考验了所有参与人员的耐性和毅力。当时天气寒冷，燃料持续短缺，迫使英国在取暖上的开支都要比以往有所减少。影片背景是战争末期的缅甸，这更加剧了演员的不适，因为它要求演员穿着热带服装四处游荡。

里根向拍摄人员和公众表现出了良好的态度。他和妮尔住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使得电影媒体开始揣测浪漫情事，但这种关系纯粹是工作关系。妮尔后来说道：“我们相处得很好，不工作的时候我们愿意待在一起。我们会一起用餐，甚至到当地的舞厅跳舞。”然而不存在欲望，他没有，她显然也没有。

里根使用了许多方法来转移他的忧郁和寂寞。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给杰克·华纳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描述了演职人员在偏远孤岛上的艰难处境。信的开头这样写道：“至收信人：请保证这封信传到加利福尼亚伯班克J·L·华纳手中。”他又继续写道：“亲爱的J·L：我把这封信装在一个瓶子里扔进了大海，希望您可以收到。或许我对此荒蛮之地生活的描述，能对他日之探险有所帮助。您应该还记得当时我们出发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对于找到并融化那笔‘冻结的美元’是多么乐观。倘若我们当时知道即将面对的一切（我没有经历过，也不理解‘面对’这个词），那我们的心情一定会大不相同。我们第一眼看到这块禁地的时候非常震惊，仿佛看到了《午夜号角》一般。浓雾遮天，四处弥漫着牛粪和煤烟的味道——当时担心是煤气爆炸之类的情况，于是我大喊一声‘不要吸烟’。当时，我最好能大叫一声‘不要喘气’。当地人还算友好，表现得好似在‘冰点之下’，但很快就被礼物收买了——主要是现金。我们在这个看钱的国度表现得十分慷慨。他们说的话有些奇怪，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话相似，但不同的地方很容易引起误解——‘knocked up’丝毫不是指‘利安德游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那种快乐，而只是被类似电话铃声之类的东西从熟睡中惊醒。另外一个语言差异的例子是‘bloody’这个词。在你看到当地人严重伤害他人而把这种事情说成‘bloody’的时候，你会被人从伦敦的沙龙中扔出来的。我们可以讲‘fanny’很疼（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可我惊讶地发现即使这种标准的美式英语表达也有相反的意义。倘若我有他们所说的‘fanny’，那我可以成为英国女王……在当地首都中心附近，有一块被称作皮卡迪利马戏团[注]的空地，我去过那儿好几次，但从没有见过大象或者杂技演员。我必须承认那儿还有一些怪人（主要是女性）好像在兜售什么门票。她们不断地拉拽我的衣袖，嘴里

说着‘两先令，老爷’。当地名人一项最有意思的风俗是与运动有关的。他们都身着红袍追赶一些狗，而这些狗又在追赶一只狐狸。还有一点，这些人都骑着马。这项活动被错误地称为‘猎狐’。我之所以说是错误，是因为这些红衣服与狐狸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他们是在锻炼马的肌肉，而这些马是用来吃的。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非常幸运，因为我一直没有吃马肉，吃的只是马鞍和马具。据此我写了一个关于英国烹饪的单词。他们对食物的做法就是我们过去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做法……再见！（这是当地人分手时说的话，说的时候上嘴唇不动，低头看着鼻子）。”

里根尽其所能地让英国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家。他从纽约的21俱乐部订购了一车牛排，可惜最后到他餐桌上的寥寥无几。酒店工作人员说其余的都在路上坏掉了。里根怀疑它们被当地馋肉的百姓偷走了。

在英国拍电影与在美国不同，英国人整个周末都休息。有一个周末，里根和妮尔乘坐一位英国先生开的汽车在乡村转悠，此人当时正在追求妮尔的一个朋友。闲聊中，话题转向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做什么。里根苦笑了一下，回答道：“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或许他是认真的，但这也很有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为的是改善一下英国阴郁的冬天和自己忧郁的情绪。

里根在围绕《北大西洋公约》的辩论声中返回美国，回到了好莱坞。就在他回来前的几周，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年轻女士来到了这个电影之都，就像10年前的里根那样，来到西部试一下在电影界的运气。南希·戴维斯1921年出生在纽约，当时名叫安妮·弗朗西丝·罗宾斯。她的父母是伊迪丝·勒基特和肯尼思·罗宾斯，在南希记事前他们的婚姻就结束了。她跟着当演员的妈妈辗转于各家剧院，后来伊迪丝觉得剧团生活对小孩子不好，于是就把南希——她一直被这样称呼——托付给了一位

住在马里兰州的姨妈。历经6年的分别之后，母女二人团聚了，当时伊迪丝嫁给了芝加哥的一位医生洛亚尔·戴维斯，离开了舞台，参与到芝加哥广播剧的制作当中。

她与之前的同事保持着联系，每当像斯宾塞·屈塞、玛丽·马丁和丽莲·吉许途经芝加哥时，他们经常聚在她在湖滨大道的家里。南希后来回忆说："斯宾塞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具魅力的一位。他患有失眠症，每当我约会回来或与朋友外出回来很晚的时候，他就会起来迫不及待地与我彻夜长谈。"因为有许多业内的榜样，南希最终打算当一名演员。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屈塞，屈塞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记好台词，不要撞到家具上。"而另一位客人凯瑟琳·赫本则提出了警告。她说南希遇到的都是明星，是一些在业内取得成功的人，超过一般人的期望。她需要明白大多数满怀希望的人并没有那么成功，需要像服务员或秘书那样从事普通的工作，从表演中获得微薄的薪水。

尽管如此，南希还是开始行动了。她从芝加哥来到纽约，到舞台上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她曾在史密斯学院以及夏季轮演剧场演出过，但专业剧院的演出让人望而生畏。试镜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她在女主角玛丽·马丁的坚持下，在《鲁特琴歌》中找到一个小角色。这出戏演了4个月，成了南希百老汇生涯的全部。

然而，她又结识了新朋友。当时克拉克·盖博离婚尚未再娶，尽管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但他依然英俊潇洒、魅力四射。经过斯宾塞·屈塞的引见，他对南希颇感兴趣。两人在纽约一起度过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这让电影杂志开始猜测这位新人将会出现在这个男主角的生活中。但是，当他返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南希却留了下来。

然而，这段时间并不长。伊迪丝认为南希在电影中的运气或许比在舞台上要好，于是就给屈塞打电话，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屈塞安排了在米高梅公司的一次试镜，当时公司一流的导演、摄像和技师都在。试镜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米高梅公司给了南希一份合同。她收拾好行囊，在

1949年春前往好莱坞。

南希想的不仅仅是要开创一番电影事业，或许她只是在两边下注。她一直想着结婚，嫁给一个像她继父那样成功的男人。当她的心上人死于一场火车事故之后，南希唯一的一次认真的爱情也就悲惨地结束了。现在，她快28岁了，必须考虑自己所剩无几的韶华岁月。纽约没有出现可以托付终身之人，但好莱坞有可能有这样的人。

至少有一个传闻说，南希煞费苦心地去甄别电影行业中那些最符合条件的人选。米高梅公司的一位熟人回忆说，她看到了南希列出的一份名单，把尚未订婚的男性按职业进行了分类：制片人、导演、经纪人、律师和演员。在演员一栏里，罗纳德·里根名列榜首，在与简·怀曼离婚后，他可能是最符合条件的单身汉了。

多尔·沙里通过美国演员工会认识了里根，当时沙里刚刚成为米高梅公司制片部主任。他了解公司的这位新雇员，知道南希想认识里根。沙里和妻子举办了一次小型晚宴，把他们二人聚到了一起。沙里的女儿参加了晚宴，她回忆说："当时谈论了许多政治话题，还发生了一些争执。里根能言善辩，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清晰。南希就坐在他的对面，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面带微笑表示赞同。"

里根并没有神魂颠倒。他借口第二天要早早赶往纽约，在其他客人离开前就退席了。随后几周，美国演员工会的工作让他应接不暇。可以想象，他忘记了那次晚宴，因为之后他宣称自己第一次见到南希是在几个月之后的1949年秋天。南希间接地联系到了里根，表达了她的担忧：她可能被错误地当成了另外一个南希·戴维斯，那个人与某些左翼分子的活动有关联。里根调查了这件事，向中间人保证说一切没问题，公司将分别对待两个南希·戴维斯。但南希希望听到美国演员工会主席亲口告诉她，里根勉强同意了。

他们见面吃了顿饭，里根告诉她说自己第二天上午要早起拍片，无

法待到很晚。南希说她也是。（后来，南希承认说：“我不是，但女孩是有自尊的。”）里根拄着一双拐杖与她见面，因为他在一场明星垒球赛中腿部骨折了，需要用拐杖帮他走路。他们在日落大道的一家饭店吃的饭，起初谈论的是身份问题，正是这一表面上的问题把两人聚到了一起。当南希对他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显得缺乏信心时，里根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改名字。

“我不能那样做，”南希一板一眼地说道，“南希·戴维斯是我的名字！”

里根回应说，许多男演员和女演员都使用艺名。

她却不这样想。

谈话继续进行。里根逐渐对她显露出温情，说自己可能还有些时间去看音乐表演的第一场，就在街的那边，问南希是否有时间。

她说：“就看第一场。”

他们一直看完了两场。

南希回忆说：“我不清楚那是否就是一见钟情，但确实非常接近。”

两人相比，对南希来说这种感情更接近于一见钟情。他们开始约会，但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频繁。南希回忆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我们眼里只有彼此，迫不及待地要结婚。但是，罗尼并不急于做出承诺。第一次婚姻让他受了伤，痛彻心扉。尽管我们时常约会，但他还跟其他女人约会。”里根在谈及离婚一事的时候更多地谈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南希回忆说：“对此他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准备，当事情发生后他还没人可以倾诉。”她逐渐明白他不轻易交友，即便相交也不会很深。“如果你总是在搬家，那很难交到亲密朋友，或是扎下根来。我想这一点——外加每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个酒鬼——就解释了为什么罗尼

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南希对他了解得越多，也就越意识到对他来说，让人亲近是多么困难。“尽管他有爱人之心，但看起来却常常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让任何人靠得太近。他周围有一层壁垒，他让我比其他人靠得更近些，但有时甚至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阻隔。”

里根后来承认说，他不是一个模范的追求者。“事实上，我每件事做得都不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跟她约会，继续主动到纽约参加工会活动——总之，每一件事都有可能让我失去她，如果不是有人一直在设法照顾着我。尽管我打算自由自在下去，尽管我认为我的生活模式木已成舟，不会再有变化，但上天一直在努力告诉我，有些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是上天，或许是南希。里根决定自由自在地单身下去，但南希更坚决，决定不让他跑掉。她忍受着他的外出旅行，忍受着他见其他女人，尽管自己也并非不会吃醋。她无意中听到另外一个女演员说起里根曾送给自己一件礼物。南希后来回忆说：“那件事让我很伤心。”里根邀请她到自己在马利布圣莫尼卡山区购买的一处牧场，之前他曾在北岭市有一个小一点儿的牧场。南希很能吃苦，帮助油漆栅栏，在附近做些杂活儿。有一天里根说：“你看，你真的应当买所房子，这会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她一直在想着住到他的房子里，做他的太太，因此里根的这句话让她很震惊。南希说：“我当时心如死灰。”

但是，南希坚持了下来，而里根也觉得自己喜欢有她在身边。他回忆说：“慢慢地，我走出了冰冻的世界，发现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这里温情脉脉，让人心满意足。”当莫琳和迈克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邀请南希与他们一起度周末。她的目标最终露出了曙光。“我开始认为我们真的可以结婚了。”南希说道。

此时，“前里根夫人”成了麻烦。南希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景，里根会带上她到孩子母亲的家里去看望孩子：“简对我十分友好，但这些探望令人尴尬。不仅仅因为她曾嫁给过罗尼，而且因为她是那样的一个大

明星，那是她的房子、她的孩子。我感到不太自在，对她有些畏怯。”她还有一点儿恼火。“我能够看出来，简知道如何利用里根的好脾性。她让他相信自己不应当再婚，除非她再婚。”

然而，南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让一个明星就挡住去路。“我花了一些时间，但终于使他不再有那样的想法。”

里根的新恋情让他重新考虑一些之前自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一位来自迪克森的老朋友写信说她失去了丈夫，心甘情愿不再找寻另一段真爱。里根在回信中表达了非同寻常的反省。“你的来信让我相信，你开始的这段旅程只能给你带来痛苦，未来将会一无所获。”他写道：“这是错误的。你还年轻，非常有魅力，足以吸引配得上你的男人，而你跟儿子在生活中也都需要一个男人。你提到了你姨妈以及她教给你的‘理想’。你必须抓紧时间重新考虑这些教诲，考虑的角度不应当是现代生活，而应当是现代认知。我想，我所成长的家庭关于‘理想’的理解跟你的家庭是相似的，是母亲教给我的。现在，我对她老人家以及她的教诲非常尊敬，但我必须要超越那些东西，找到‘生活准则’，符合我的良知和对对错的认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她的原则，相反，这是要发扬光大，在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的基础上，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同时，我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明白，某种‘理想主义’事实上是在逃避现实。你说你认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活中只有一次真爱——这真的是不正确的。你难道真的相信因为战争夺去了他们的第一位爱人，上帝就要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孤独终老？弗洛伦丝，或许你会对此颇有微词，但我必须说明一点——你必须要直视你的内心，扪心自问，你是否真的相信你失去的那一次真爱，还是这只是一种可以让你隐藏自己的掩体，因为你过去的经历没有达到你少女时期的梦想，如今你害怕男人。”

里根分享了他自己在爱情、性和婚姻方面的经验。“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婚恋关系都抱有一种‘风花雪月’的憧

憬，但有时候这种梦想很难与肌肤之亲的现状相吻合。让你看一下我受到的教育是多么‘过于理想化’吧——我觉醒了，逐渐意识到（可惜太晚了）就连在婚姻中，我对于性行为都有一些罪恶感，好像整件事都带着罪恶的气息。一位非常正派的老先生让我走上了正轨，使我对从没有接触过我们文明社会的原始部落的行为，或者我必须说是他们的道德水平产生了兴趣——比如波利尼西亚人。这些人是真正的大自然的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把身体欲望看作自然、正常的需求，应当真诚、勇敢地去满足这种欲望，而不是笼罩在罪孽的氛围中、隐匿在黑暗中窃窃私语。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是异教徒，但他们是没有堕落、没有性犯罪、没有心理疾病、没有离婚的异教徒。我想我要说的是，我反对那些有组织的宗教教条，这些宗教把婚姻关系仅仅当作一种‘可接纳的’罪孽，其目的是传宗接代，并且他们认为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我个人认为，上帝不会创造邪恶，因此他在我们身上种下的都是美好，而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就是终生相伴的至高无上的形式。”

里根还提到了等自己的女儿长大成人以后，自己会对她说的话，但他也提到了对于自身的发现。“我希望她能明白，在她与她爱的那个男人之间没有什么是错误的或淫秽的，性欲本身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还有一件事我想她应当明白——如果她发现某个男人很有魅力，对方对自己也充满欲望，我跟所有的父母一样希望她能正确理解，品位高尚，不要不加区别地滥交，或者陷入滥情之中。但是（这一点同样重要）我不希望她感到恶心，认为对方的性欲表明道德败坏或下流无耻。男人当然会为魅力四射的女人神魂颠倒——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不这样，那么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女孩对男人的判断必须以他对她的意愿的尊敬为基础，但不要要求他不能有本能的冲动，就像饥渴那样的本能。”

里根说，第二次爱情完全有可能，也十分值得尊重。“世上到处是孤单的人们，人们应当得到幸福，也能够给别人带去幸福。爱情不是对宇宙尘埃的魔幻触控——两人命运天定，且只能彼此相伴。爱情可以从

温情陪伴中慢慢发展，我们都应当勇敢追求。”他总结道：“现在，我要马上把这封信封进信封并寄出去，因为如果再读一遍的话，我就没有勇气把它寄出去了。”

里根确实把信寄出去了，同样，他也鼓起勇气请求南希嫁给他。他的时机选择可能受到南希显然已经怀孕的影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计算一下日子吧”，指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帕蒂在婚礼后7个半月出生）。里根对二婚的小型婚礼仪式非常满意，但南希本来一定是想要坚持大一些的排场，如果不是顾及脸面想要尽可能早一点儿结婚的话。

于是，1952年3月4日，仪式在圣费尔南多谷的小布朗教堂匆忙举行，到场的只有新娘、新郎、牧师、威廉·霍尔登和他的妻子阿迪斯，他们担当伴郎和伴娘。南希没有注意到当时霍尔登夫妇的婚姻正出现问题，两人分坐在小教堂的两端。她回忆说：“我一整天都沉浸在幸福的眩晕中。”

---

1. 英国英语中指的是皮卡迪利广场。——译者注

14

在嫁给里根之后，南希的演艺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继续发展的事业上。华纳兄弟公司基本上认为里根不适合继续演电影，杰克·华纳一直很友好，但这让里根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里根的经纪人卢·沃瑟曼是美国音乐公司的头儿，该公司正与华纳兄弟公司发生摩擦。沃瑟曼告诉里根，他可以雇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来对付华纳公司，避免可能发生的利益上的冲突，但里根拒绝了。他向华纳解释说：“我不认为陌生人可以突然介入并代表我的最佳利益。”他说更希望亲自与华纳公司协商解决。里根对公司的做法有意见。“我知道您会想起我们之前关于《哈根女孩》的讨论。”在这部影片里，里根扮演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秀兰·邓波儿的追求者。“您说剧本和角色都不太好，但请求我私下帮忙来拍这部电影，我当时高兴地照做了。当时，您鼓励我引入合适的室外剧本，同意为我买一部特意为主演编写的剧本。我在《魔鬼山》一片中看到过这种东西，而公司也购买了。”里根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公司拍片计划的消息，直到最近才听说前景不妙。“有‘传闻’说您打算让别人来主演这部电影。我自然不信此等谣言——我太熟悉您了，从没有想过您会食言。但是，我急于想知道拍片计划——开机日期等，为的是更好地安排我自己的计划。坦率地说，我希望尽快开始，因为我对这个故事很有信心。”

事实上，很快就开始了，但主演不是里根。华纳兄弟公司让埃罗尔·弗林饰演了里根想演的角色，这让里根心生不满，抱怨杰克·华纳和公司制度的忘恩负义。

这次过错不能完全归咎于公司，因为电影行业当时正承受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尽管制片人竭尽全力去迎合公众和政治喜好，但最高法院还是在1948年出台规定，禁止主要的电影公司控制影院，电影公司被迫自己打开销路。这一结果削弱了B级片的存在理由。B级片原本是由垄断影院推给大众的，其收入又支撑着电影公司的寡头市场垄断。电影公司第一次被迫开始竞争，于是就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大幅削减成本。巨星们有幸生存下去，而像里根这样的边缘演员，工作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对于老牌好莱坞的第二个打击是电视的出现。实验性的动态影像直播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正规的电视节目才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了这一新兴行业中的天才和资源，但战后不久，电视的那种小屏幕就显现出了其价值，成了电影大银幕的有力竞争者。1945年，在美国国内几乎没有听说过电视机，而到了1950年，有将近400万家庭在炫耀这种新设备。到了1955年，有3000万家庭，或者说美国超过1/2的家庭都有了电视机。到了1960年，电视机的数量接近6000万台，比例达到9/10。

电视对电影的挑战很明显，也很巨大。数百万电视所有者和他们的家人现在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就可以体验到电影提供的那种情感逃避。他们的这种个人决定对好莱坞来说是一场灾难：1945~1960年，看电影的观众人数下降了3/4。

里根第一次正式与电视接触，是在担任美国演员工会主席的时候。这种新媒介给现有的劳工关系制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对里根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电视演员是否是电影演员，而当他们的电影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电影演员是否可以成为电视演员。里根和美国演员工会并没有迫切地想要加大控制，左右演员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的表演，因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舞台演员（他们有自己的工会——演员权益协会）或是广播演员（他们属于美国广播演员联合会）。但广播领域的一些演员试图既成为电视演员，又成为舞台演员，想要合并成一个单一、综合的工会。他们联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名字叫作电视管理局，简称TVA。

里根表示反对。电影演员是演艺大军中的富裕的精英，如果与他人联合，他们就会失去阵地。此外，电影演员主要生活和工作在好莱坞，而大部分舞台演员和电视演员住在纽约。但在里根看来，关键因素还是政治上的。他觉得，电台方面提倡的大工会就是为激进政治准备的一种掩护——他在SAG内部和国会面前一直在与这种政治进行斗争。他后来写道："让我把其中一点解释清楚。我并不是在暗示说TVA运动是一场共产主义阴谋，但它是一场有争议的活动，正像猫一样潜行着，与少数共产党人有联系。他们必须理解并从事那些造成麻烦的活动——尤其是针对美国演员工会的活动，因为'大工会'正中他们下怀。该党的路线一直支持极简主义和集权主义，与接管12个组织相比，它更容易推翻那种政治决策远离普通百姓的组织。"

里根用了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与单一工会分子进行斗争。这份工作需要无休止地开会，会上，联合分子们会不断地提出关于程序的异议、个人特权问题以及质询问题，结果都被美国演员工会的全体成员以压倒性投票否决了，因为他们知道，保持现状对他们来说最为有利。最终，里根和美国演员工会的其他领导人保住了电影演员的独立性，让电视演员加入了美国电视与广播演员联合会。

美国政客一直是新式通信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他们会敏捷地抓住一切可以让他们联系到选民的事物。西奥多·罗斯福利用大规模发行的报纸使自己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成了第一个全国闻名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来达到推行新政的目的，举办了多场亲密无间的研讨会，在其炉边谈话中与5000万听众一起探讨了民主哲学和民主党政策。

罗纳德·里根将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那样利用电视，但他和他那一代的其他人从这一新媒介中学到的第一课来自约瑟夫·麦卡锡。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乘着1946年反对新政的浪潮杀进参议院，但

3年之内毫无建树。1950年年初，他偶然发现了联邦政府中共产主义渗透这一主题。这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哈里·杜鲁门早在1947年就发起了关于忠诚问题的调查，在“好莱坞十君子”的听证会上调查罗纳德·里根和其他证人的情况。但麦卡斯的时机选择被证明是由官方授意的。苏联刚刚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让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人都震惊不已。据可靠专家的推测，莫斯科掌握这种武器的时间应当更晚才对。鉴于这一点，有人得出结论说，一定是间谍泄露了原子弹的秘密，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事实上，间谍确实已经在工作了，因为世人发现克劳斯·福克斯在英国一家法庭被宣判有罪，罪名是向苏联传递关于英美原子武器计划的情报。随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贝格也因类似罪名在美国法院被判有罪，并被处决。在麦卡锡突然顿悟前的三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没有人宣称中国共产党在向美国政府渗透，但单单是他们的胜利看起来就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加重了砝码。

麦卡锡发现共产主义这件事，外加民众对这件事的反应，给了共和党人有力的武器来反对杜鲁门和民主党。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大选中委婉地批评了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因为他们不希望看起来不够爱国，或者破坏他们自己主导这一政策的机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赞成这一政策的。杜鲁门出人意料地战胜了杜威，这让他们在震惊之余怒火中烧。他们抛弃了对杜鲁门政府的尊重，抛开了所有面子上的考虑，宣布在政治上向杜鲁门所做的一切开战。麦卡锡给某些共和党领导人的印象是粗野的，或许还肆无忌惮，但他看起来刚好适合扮演非正规军的角色，可以带头冲锋陷阵。

麦卡锡对美国国务院发起了攻击，声称国务院滋生着大批共产党人；他攻击杜鲁门总统庇护上述共产党人；在杜鲁门解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说他在朝鲜战争中不服从领导之后，又说总统应当受到弹劾；他又谴责马歇尔将军——乔治·马歇尔！——说他处于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臭名昭著，足以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风险”。

麦卡锡的攻击决定了杜鲁门政府的命运。杜鲁门有资格在1952年再次竞选，但毫无疑问无法当选，他甚至没有寻求民主党提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二战”中是欧洲战场盟军统帅，尽管是共和党人，但他积极支持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民主党的阿德莱·史蒂文森，自赫伯特·胡佛之后第一次把白宫交到了共和党人手中。

既然他的党占据了政策的制高点，麦卡锡简短地重新考虑了一下他的策略，只是简短地想了一下：很快，他就开始攻击艾森豪威尔，说他在面对共产主义时不够警觉。艾森豪威尔很蔑视麦卡锡，但这位参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同事依然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于是让他掌管政府行动委员会。

麦卡锡把这一委员会当作一个平台，来展现他对美国国会调查历史的重要贡献：在覆盖全国的委员会听证会中利用电视直播。美国军方对于麦卡锡发起的针对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军方人员的指控非常愤怒，开始寻找办法进行反击。当麦卡锡的一个幕僚为一个应征入伍的助手寻求优待的时候，军方发现了这一机会，揭发并控告了这位参议员。麦卡锡召开听证会，两大电视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杜蒙特电视公司从头到尾进行了直播，而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做了部分报道。听证会吸引了2000万电视观众，持续了36天，播出时长是188个小时。

电视转播对麦卡锡没有丝毫好处，他本身缺乏面对电视的形象特质，在回答军方律师的提问时表现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约瑟夫·韦尔奇质问道：“归根结底，您没有良知，是吗？您也没有留下良知？”麦卡锡没有第二次答辩的机会，更别提体面和良知了。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对公众思想的控制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麦卡锡的失败显示了电视在塑造政治理念方面的力量。倘若有人颇具镜头魅力，表现出来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惧，那么电视就会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观众。

15

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宣传人员提议让里根从电影转向电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政治上的考量。他们从里根身上看到了一些电影观众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与电影的大银幕相比，电视的小屏幕展现出来的演员形象是不同的，不适合大银幕的演员可能非常适合电视的小屏幕。

里根无疑已经不适合大银幕了，他的电影生涯几乎彻底失败。他不怪自己，却埋怨电影行业。里根对电影专栏作家赫达·霍珀说："巨星不会陨落，他是被糟糕的故事和更糟的角色给毁了。"里根指的是整整一代演员，但他自己的经历明显地体现在了他的话里。"当前的角色分配制度对电影无益，对演员来说则是致命的。比方说，一个演员演警察可能非常出彩。某个制片人在看了电影之后会说：'那个家伙显然知道如何演好警察。'于是，在这个演员的下一部片子里，就会让他饰演警察。之后，这家伙在15部影片里都扮演警察，结果就彻底完蛋了。"里根又进一步指责制片人，因为他们认为观众需要在银幕上不断地看到新面孔。"不要误解我，我完全支持新面孔的出现，他们是这一行业中的新鲜血液，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想你会发现，与我们职业中的其他工种相比，演员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他说，美国演员工会的8000名演员构成了最大的人才库。"但是，好莱坞当前的制度好像不是在利用这些人才，而是在剥削他们。"这是极其可怕的短视行为。里根问霍珀："你知道有6500万人并不是有规律地去看电影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年龄超过30岁，我们需要带回影院的就是这部分人。"

华纳兄弟公司听不进去这些话，于是，当公司明确表明不会再提升里根的工作的时候，里根经过谈判，得到了接受为其他公司工作的权利。然而，鲜有成形之作。在影片《胜利之队》中，里根塑造了一个酗

酒的棒球投手，在影片《君子红颜》中与一个黑猩猩演对手戏。这些就是他最好的角色了。残酷的事实是观众不想看他演戏，因此制片人也不想与他合作。

里根参加的美国演员工会的政治活动让他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但即使是这些工作，在1952年年末也期满结束了，当时他把SAG主席一职交给了沃尔特·皮金。在该工会的历史上，他的任期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主席，比其中许多人都更愿意在顶层寻求改变。此外，南希怀孕了，里根不希望像公司要求的那样过多地出差了。

里根后来说道："我坐下来反省了一下我的事业。好莱坞的第一丝寒意不是只有谁没给你打电话——而是谁给你打了电话。小本经营的制片人那里有个超棒的剧本，你应当读一下。不久之前，他们是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因为他们雇不起你。而今，接到他们的电话，感觉就像在沙漠中迷路的家伙抬头看到秃鹫开始在空中聚集一样。"

但是，里根需要工作。他在好莱坞有一栋房子，在马利布有座牧场，这些都需要钱。他有妻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更别提他跟简·怀曼还有两个孩子。战后，他的收入一直很可观，但他作为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超过了90%，他也没有设法避税。

电视在向他招手，但跟大多数演员一样，里根认为这是落魄者的选择。它给的工资没有电影高，还把演员分成过气明星和从未红过的明星，因此里根拒绝了邀请。他尝试去拉斯韦加斯当司仪。这座赌城从内华达沙漠的岩石和沙子中崛起，刚好避过了加利福尼亚州严苛的法律。在这一角色中他很不自在，而且这种不自在也表现了出来。他喜欢这笔高薪，却无法把自己看作夜总会歌舞表演的"道具"。

这时，他的经纪人找到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想法。通用电气公司想赞助一个电视节目——每周一集的系列短剧。这些短剧都是高质量的制作，有一流演员客串表演。该系列剧需要一个主持人来介绍，此人将

成为该节目的代言人。此外，还有另外一些内容：该主持人还要身兼通用电气公司的发言人，在全国旅行，代表公司管理层与分布广泛的工人以及通用电气公司开设工厂的城镇中的其他团体进行交流。公司的想法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公司发言人这两个角色可以互为补充。成千上万的员工可以构成电视观众的核心力量，而当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观众数量就可以增加到数百万人。

这一邀请对里根很有吸引力。它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并且可以让他在大众面前露脸。缺点就是需要旅行，但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不可能诸事顺心。里根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可以提升个人形象的旅行，他曾经这样做以推销自己的电影。他很享受众星捧月般的名人待遇。尽管他的名气不再像以前或者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大，但他依然可以成为通用电气公司员工眼中的明星。当然，他必须要宣传通用电气公司以及资本主义的优点，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他信仰资本主义，并认为自己会逐渐信任通用电气公司。

于是，《通用电气剧场》这一电视节目就启动了，罗纳德·里根担任主持人。赫达·霍珀报道说，他的合同是“目前最优厚的电视合同”。这基本等于没说，因为电视才刚刚起步。但里根将其视为向前的一步跨越。他跟霍珀说：“这笔交易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合同允许我可以拍电影——所有我想拍的电影。因此，我可以在周末主持电视节目，平时继续我的电影工作。”

关于电影工作，里根是在痴人说梦。他于1955年和1957年分别拍了两部电影。南希·里根参演了第二部影片《海军悍妇》，这是她嫁给里根之后出演的唯一一部电影。但除了这些，就只有几个配音角色和1964年在最后绝唱中饰演的一个小配角——当里根与通用电气签约的时候，他的电影事业已经结束了。

对于从电影事业中早早退休这件事，里根装得若无其事。卢埃拉·帕森斯在1955年春天的时候写道：“过去，我一直觉得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街头演说家，试图改变世界，努力解决复杂的电影行业中的问题。如今，他变得更有意思了，对整个世界也不那么严肃了。”里根曾找到来自迪克森的老朋友、专栏作家帕森斯来为通用电气公司的系列节目捧场助威，而她询问了他风格转变的原因。里根回答说：“我想是电视为我做了这一切，你知道我过去是美国演员工会的主席，经常拍片，但从没有拍过一部不受制片人影响的影片。我得到的角色总是饰演那种庄重、沉稳的人。如果让我拍西部片，那我演的一定是东部的律师！”对于电影角色，他还没有彻底关上大门：“如果任何一种媒介中有一个好的角色，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会抓住的。”他说道：“电视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挑选你自己的故事，因为你的财务状况允许你等待自己所期望的。”里根认为事情与以前不一样了，并且不单单对他自己是这样。“你意识到这一行业正在发生变化吗？当前很少有明星有合同在身，许多大明星也都成了自由身，开始上电视了。”

有几个这样的大明星出现在里根的节目中，他在1957年对记者沃尔特·埃姆斯说：“弗雷德·阿斯泰尔、吉米·斯图尔特、托尼·柯蒂斯、艾伦·拉德、查尔斯·劳顿、奥迪·墨菲、阿特·林克莱特、珍妮·卡森，以及许多其他演员已经来电视台拍片或答应至少在我们这一季的系列节目中拍半个小时的短片。”埃姆斯问里根是如何做到的：他和通用电气公司如何把这么多大明星吸引到了电视的小屏幕上来？里根回答说：“精彩的故事，一流的导演，高质量的作品。演员最基本的愿望以及我们这一行业的根本需要，就是发挥演员最佳的表演能力。《通用电气剧场》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里根又补充说，这一档节目常常会让演员的表演超越定式，这一点很吸引他们：弗雷德·阿斯泰尔饰演的是一个不跳舞的角色，奶油小生托尼·柯蒂斯将与公牛搏斗，吉米·斯图尔特将主演根据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改编的西部片，查尔斯·劳顿将成为少年棒球联合会中一支球队的教练。

在电视这种新媒介中，《通用电气剧场》不仅仅是一种革新，还是一次实验，发展了公共关系艺术。自19世纪美国工业化开始以来，公司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影响着他们公司的个人和团体展现自己的形象。顾客和客户构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员工们是另外一支，而政府官员和选民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顾客通常是通过广告和商业促销招徕的；员工可以在企业生活区得到细心的照料和保护，或者当他们罢工的时候，用削减工资和公司安保力量来进行威胁和恫吓；政府官员可以对其进行贿赂，就像在镀金时代发生的几起丑闻那样，或者在竞选活动中予以资助，直到20世纪初国会取缔了大部分公司的捐助。

在20世纪20年代，公关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时，围绕企业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业做法。布鲁斯·巴顿成为该领域中的头面人物。他的公司叫巴顿–德斯廷和奥斯本公司，为像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这样的新兴大企业提供指导。（巴顿同时还赢得了下面的荣誉：自我提升专家，《无人知晓之人》的作者，这本书把耶稣不仅刻画成了基督教的创始人，而且还是当代成功学文化的缔造者。）他们的推销比较温和，但与镀金时代相比，其坚定的决心毫不逊色。该公司利用现代媒介，尤其是广播。私营企业让政府学到了一点儿东西：富兰克林·罗斯福巧妙地利用了广播，这让巴顿很引以为豪（尽管不是很开心，因为巴顿是共和党人）。在“二战”期间，政府为了推动战时工作，引进了来自公关行业的人员和思想。

通用电气公司雇用里根这件事，显示了这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其生产工厂和实验室遍布数十个州，工人数量超过20万。公司公共关系主管是莱缪尔·博尔韦尔，此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企业沟通问题，并为此设计了一套理论，打算让里根付诸实践。该理论在几个层面运作：《通用电气剧场》体现的是公司是艺术的赞助商，不是像歌剧那样的精英艺术，而是当前公司数百万客户或

潜在客户可以欣赏的通俗艺术。里根英俊的面孔、温和的微笑和舒缓的嗓音，使他成为博尔韦尔希望让那数百万观众在每个周日的晚上观看和聆听的那个人。

但是，博尔韦尔的心中还有其他观众。跟大多数公司一样，通用电气公司不喜欢工会，试图消除工会的影响。博尔韦尔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办法之一就是要鼓励公司员工成为团体中的一员，分享管理层的价值观。里根签下的合同使他成为公司团体建设中的排头兵。他参观工厂，走进车间，与所有周围的人握手，讲述好莱坞的趣闻轶事。他宣传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价值观，博尔韦尔希望借此向工人灌输思想，抵制工会影响的扩大。

博尔韦尔的方法存在着风险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里根是工会成员，前不久还成为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个分支机构的主席，现在依然是。在情感上，他是否会情不自禁地站到工人一边来反对资方呢？如果这样，博尔韦尔是否能辞掉他，又不让公司处境尴尬呢？

然而，像每一位公关大师那样，博尔韦尔是人性方面的专家。他了解里根，知道他不是典型的工会分子。里根所在的演员工会与通用电气公司所要对付的主要工会组织——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不一样。里根的工会更像是一个公司工会，是一个公司赞助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要对付真正的工会。与那些对立者相比，里根更多的是与制片人站在一边。他在国会证词以及在向美国演员工会成员和其他行业听众发表的演讲中表达出的政治观点明显表明，他坚定地站在博尔韦尔希望他拥护的支持企业原则的背后。

里根后来炫耀说，他为通用电气公司所做的每一次演讲都是他自己的话。公司领导人“从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我应当讲些什么”。里根说道：“他们也没有暗示说我唱错了歌曲，应当更换曲调。”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里根的观点反映了公司的路线，与博尔韦尔希望的一样。里根从公司领取报酬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越亲密。里根在20

世纪60年代中期这样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演讲也经历了某些发展，不仅反映了我不断变化的思想，也反映了集体主义快速兴起的潮流，这一潮流威胁要吞噬我们自由经济的成果。"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任期间没有带来保守派所期望的废除新政的结果。相反，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共和党人支持并且发展了社会保障制度，把联邦政府的资金大肆用于修建公路，启动昂贵的太空计划，被保守派普遍看作民主党的克隆体。当1960年大选民主党人重新执掌白宫之后，保守派的期望变得更糟了。里根写道："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后知后觉，看明白了业已存在的一些东西。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加快节奏，打造一个被政府支配和控制的社会。"

然而，里根有时候把对政府的抨击做得太过分了。通用电气公司最大的客户是联邦政府，政府购买军用机和其他武器系统，购买政府实验室设备，尤其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发电厂的发电机和其他电气设备。里根对政府侵犯行为的长篇声讨檄文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当作一个例子——直到他听到风声说TVA的管理者也在收听节目，并对通用电气的老板拉尔夫·科迪纳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何不向一家更心存感激的公司采购呢？

科迪纳说他不会审查里根——这一做法让里根开始审查自己。里根回忆说："突然之间，我领悟到了什么。科迪纳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意思是要准备用5000万美元来支持我说的那些话。现在，这份责任落到了我的身上。就因为我得到了全权委托来发表我的观点，我就可以自由地使公司难堪或者对公司造成伤害吗？"

里根给科迪纳打了电话。"我知道您有麻烦了，这让我很担忧。"里根说。

科迪纳回答说："很抱歉，你知道了这件事，这是我的问题，我会处理的。"

里根说他很感激公司对他的支持和给予他的自由，但他不能滥用这份自由，发表一些可能导致数千名通用电气公司员工丢掉工作的言论。“科迪纳先生，您认为如果我在同样内容的演讲中不提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怎么样？”

里根回忆了对方的反应：“在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声音说道：‘那我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里根总结了这次事件：“从演讲中删除TVA没有问题，随便一抓就可以找到100个规模超大的政府的例子。整件事的唯一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挽救自由，已经为时过晚了。”

里根为通用电气的工作持续了8年，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有过短暂中断，当时他临时代替其他人参加演员工会的活动。里根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合作把他从一名好莱坞人士转变成了一个为保守派观点代言的全国发言人。他后来写道：“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对一个未来要进入公众生活的人来说，这次经历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机会——相信我，尽管在那些岁月里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8年来，我乘火车、坐汽车，为通用电气公司周游全国，到访了其139家工厂的每一家，有些还去了好几次。在这期间，我接触了通用电气公司的25万多名雇员——不仅仅是握手，而是与之交谈，倾听他们的想法。”在他到访的城镇中，他与企业领导人会面，发现自己关于政府干涉电影行业的陈述引发了同情。“无论我在哪里，都会发现观众中有人在等着演讲过后与我谈话。他们会说：‘如果您认为在您的行业中发生的事情很糟糕的话，那让我告诉您发生在我们行业中的事情吧。’于是我就听着，他们就举出政府干涉的例子，抱怨政府官僚如何通过过分监管来告诉他们如何经营他们的行业。那些通用电气公司的行程对我来说成了政治科学中的研究生课程。我看到了政府在如何通过实际操作来影响美国人民，与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

厄尔·邓克尔是里根的助手，同时负责安排行程计划。他回忆了里根如何在通用电气公司的行程中学到了“零售政治”。在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厂里，女员工们首先把里根围住了，都急于见一见这位明星。她们那些男性工友们则不大感兴趣。邓克尔回忆说：“男员工们都站在那儿，一起看着他，明显在说些什么贬损的话——‘我敢打赌他是一个同性恋’，或者类似的话。里根会与那些姑娘们聊上一会儿，他知道周围的情况，因此随后就会离开她们走到小伙子们中间与他们交谈。10分钟后，当里根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拍打着他的肩膀说：‘就这样，罗尼。’”偶尔，女员工或者她们中的一些人难以搞定。邓克尔记得有个高大强壮的女人质问里根：“嘿，小子，我想有朝一日会把你逼退到墙角里。”她说道。里根笑着回答道：“好吧，只是那个墙角要非常大才可以。”

行程安排让里根很忙碌，尽管如此，还是给了他反思和阅读的时间。他一如既往地避免坐飞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跨越全国的火车车厢和包厢里有许多天的空闲时间。“直到今天，我还想象不出有比从洛杉矶到芝加哥的超级首席列车更舒服的旅行方式。”他回忆道。在超级首席列车的车厢里，他阅读了莱缪尔·博尔韦尔提供的关于通用电气公司宗旨和目标，以及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资料。厄尔·邓克尔回忆说，里根像个聪明的小学生。“他对我们的员工关系哲学——‘博尔韦尔主义’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就是要去与那些受其影响的人谈话。”邓克尔说道。里根会看一下《通用电气新闻》，它涵盖了资方希望公开的公司事务，包括里根的行程安排；他还会看一下《通用电气招工信息管理者指南》；他阅读了大量的蓝皮书，拉尔夫·科迪纳在书中阐述了公司哲学；他还阅读了博尔韦尔为通用电气公司员工读书俱乐部推荐的各种书籍，包括刘易斯·黑尼的《到底如何谋生》和亨利·黑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其一贯如一的主题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商业和个人自由。

里根还读了一些自己找到的杂书和文章。他喜欢收集奇闻趣事，善于记忆，可以把这些内容糅合到自己的演讲里。一位好莱坞的熟人回忆

说：“罗尼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本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减，列宁祖父的职业，历史上所有棒球投手的自责分率，2000年甜菜产量的乐观估计，最近降雨量的减少导致堪萨斯州夏季的一切都完蛋了，等等。这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里根读的东西越多，进行的旅行演讲越多，他就越来越意识到之前自己的政治组织不再适合自己不断发展的信仰。他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我回到家对南希说：‘你看，我刚刚开始明白一些事情，那些我在演讲中一直提到的关于政府的所有事情（我不仅仅是在演讲——我是在布道），那些我一直在批评政府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所有事情。我刚刚明白，每四年当选举来临的时候，我会去支持那些我所批评的人。’”

这并不完全准确。里根曾同一些民主党人一起，要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民主党人在1952年竞选总统。当这位之前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将军选择共和党的时候，里根依然认为他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在他和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选中投了他一票，并在1956年二人的竞选中再次投了艾森豪威尔一票。

然而，里根一直是个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1960年，约翰·肯尼迪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是波士顿大亨，民主党的捐款人。除了从事其他行业外，他还拍电影，他给好莱坞施压，要求好莱坞支持自己的儿子。他以都是爱尔兰裔为由要求里根帮忙，但里根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民主党推行“大政府”政策，于是选择支持理查德·尼克松。里根没有为尼克松的竞选积极活动，因为那样可能会破坏通用电气公司展现在国人面前的无党派形象。同时，尼克松改换门庭，认为强大的“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的代表团与对共和党心存不满的脱党分子相比，更能够有效地打击肯尼迪。这让里根和其他反对肯尼迪的民主党人很沮丧。

如果尼克松的做法打击了肯尼迪，这种打击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中击败了尼克松。然而，

里根依然对尼克松很崇拜，在他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的时候支持他。在那场角逐中里根赞扬了尼克松及其共和党的观点，当时，观众中有位女士站了起来，问他是否已注册成为一名共和党人。

里根回答说：“目前还没有，但我打算这样做。”

这位女士向人群宣布说：“我是登记员。”她大步走上里根演讲的讲台，递过去一张登记表。

“我签上了名字，成了一名共和党人。”里根后来回忆道。

第三部分 抉择时刻 **1962~1980**

16

有些人从政是为了追逐权力，而里根想得到的是关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强人是林登·约翰逊，他对权力的渴望从20世纪30年代他踏进国会的那一刻起就非常明显。约翰逊拼命地要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为达到目的他不遗余力，也不讲原则。里根并非如此，他想要的是观众，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关注和掌声。他想要一个舞台，一直想要一个舞台。

如果通用电气公司能为拥有他而感到满意，那么里根可能也会对于待在该公司感到满意。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星期天晚上的《通用电气剧场》开始流失观众。节目安排看起来过时了，美国观众有了新的钟爱的电视节目，包括4位男影星出演的一流星期日电视剧《大淘金》。

当时，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题：1961年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电气设备行业的定价问题，通用电气公司首当其冲。公司管理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避免任何可能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而里根对于“大政府”的攻击就属于这种行为。自艾森豪威尔时代开始，里根的观点就没有改变过，然而国家发生了变化。约翰·肯尼迪的当选标志着政治潮流的改变——再次向着自由的方向发展。里根坚决反对这一潮流，这给通用电气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公司提出，如果里根停止谈论政治问题，那么还可以继续让他展销商业产品。里根权衡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还可以以什么谋生。但是，他认为这被缩小的舞台太小了，于是拒绝了这一提议。1962年，公司取消了《通用电气剧院》这一节目，终止了与里根的关系。

里根失业的时候正值冷战最恐怖的时期，《北大西洋公约》催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按照条约，美国军队驻防联邦德国抵御可能发生的苏联的进攻。北约的诞生促使莫斯科创建一个对应的联盟——华沙条约组织，同样处于备战状态。紧张关系漫长持久，偶尔严重激烈，就像1961年那样，当时民主德国共产党出乎意料地绕着西柏林建了一道墙，原来德国首都的这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属于联邦德国的。然而，这种紧张关系从没有突破极限，冷战时期欧洲剧院上演的大事件从没有发生过。

这使得两个超级大国针对世界其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朝鲜战争结束了，没有达成和平协议，只是在1953年出台了停战协定。关注焦点向南方地区转移，当时中南半岛地区的共产党迫使法国放弃了在当地的统治权，在越南北部成立了共产党政权，对整个越南发号施令。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政权，并向越南南部的反共政权提供援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该政权称为越南共和国，美国接受了这一说法，美国军队和士兵重视并且支持这一政府，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也遭到了南部反对派的破坏。

冷战扩展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诸国手忙脚乱地从它们的非洲殖民地撤出，继任政权处于来自诸多国家的各种隐形的诱惑包围中，努力地要站稳脚跟巩固地位。非洲政权努力通过谈判乱中取胜，并取得了各种胜利。新成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偏向极“左”路线，不合华盛顿口味，艾森豪威尔政府授权暗杀他。最后卢蒙巴死了，尽管死于他的刚果敌人而不是美国特工手里。刚果开始偏向美方的轨道，但中苏美在非洲争夺政治和思想影响力的斗争一直在持续。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以后，冷战就蔓延到了拉丁美洲。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对卡斯特罗的左翼政权实施经济封锁，并策划了多种谋杀卡斯特罗的手段。在艾森豪威尔下台以前，没有一件阴谋

得以成功，颠覆卡斯特罗的军事行动却开始启动。这一行动的预想是这样的：在美国的帮助下，把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武装起来，让他们登陆古巴，成为国内反对卡斯特罗团体的核心。约翰·肯尼迪同意这一入侵计划，但很快这一计划就彻底失败了。卡斯特罗渗透到了流亡分子中间，掌握了所有有关登陆计划信息，入侵被粉碎了。肯尼迪颜面扫地，而卡斯特罗则备受鼓舞。

但这位古巴领导人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寻求保护，防备第二次攻击。最被看好的就是莫斯科。莫斯科侦测到了一次机会，纠正了与美国人之间的战略不平衡。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关键在于核弹头导弹，美国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苏联。美国的一些导弹部署在土耳其军事基地，飞到克里姆林宫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苏联与古巴达成的协议可以让莫斯科把导弹部署在美国的后院，让美国领导人也品尝一下苏联领导人一直独自品尝的严酷味道。

协议达成了，苏联人得以把导弹基地部署在距离美国海岸100英里远的地方。对于美国人的再次攻击，卡斯特罗可以得到保护。从美方传递出来的核心机密是：如果华盛顿方面在苏联导弹部队正式成立以前发现了这一计划，那它们会更愿意冒险入侵古巴。

导弹基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但进展不久，美方的情报人员、军事卫星以及U–2侦察机就发现了基地所在。肯尼迪考虑了几种应对措施：入侵、空中打击、封锁或外交手段。他阻止了入侵或轰炸，指出美国不是在与古巴开战，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然而，肯尼迪在向赫鲁晓夫发布公开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基地建设并从古巴移走所有导弹的时候，还是保留了入侵或轰炸的可能性。同时，他开始封锁苏联向古巴的海上航运。

全世界都在屏气凝神等待着赫鲁晓夫的反应。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接受肯尼迪的要求是一件耻辱的事，但拒绝这一要求对苏联人来说可能带来自杀性的结果，而对于那些被吞噬在超级大国之间核战争烈火中的

数百万民众来说，则可能是毁灭性的。在经历了无比漫长的6天等待之后，赫鲁晓夫最终同意把导弹撤出。

肯尼迪的拥护者声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秘密交易并没有公之于众。肯尼迪的民众支持率迅速飙升，他的顾问们踌躇满志，期望着1964年的到来，届时他将竞选连任。

然而，肯尼迪没有活到1964年。1963年11月，他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身亡。除了奥斯瓦尔德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面对电视镜头，在警方的监禁下，他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枪杀，把刺杀肯尼迪的原因带进了坟墓，而杰克·鲁比的动机同样无人知晓。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悲剧事件引发了众多阴谋论，这种阴谋论在所有当事人都死去之后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共和党人给了里根公开自己转而加入共和党这件事的机会。自“二战”以来，共和党人经历了自身内部两败俱伤的激烈争吵，来分裂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党内部的纯粹主义者声称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期，该党就已经迷失了方向，接受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新政的其他内容，并且支持遏制政策，带着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政府的足迹。共和党中的实用主义者回击说，社会保障制度在数百万美国人那里深得人心，无法根除，而遏制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实用主义者以艾森豪威尔为例，指出坚持中庸之道才能赢得选举。纯粹主义者反驳说，中庸可能会赢得选举，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党的灵魂和国家的未来。

巴里·戈德华特不是纯粹主义者中最纯粹的，但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却是相对纯粹者中在政治上最为可信的一位。戈德华特的祖父逃离了俄国人统治下的波兰，认为没有财富的犹太人在沙皇治下是没有未来的。他最后来到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在那儿，他儿子创建了该地区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巴里出生于1909年，在他母亲所在的那家圣公

会教堂接受了洗礼。他一生都把自己看作基督教徒，但从没否认自己的犹太出身。他一直在自家商店工作到“二战”爆发，战争使他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他的政治生涯从城市一级开始，随后在1952年大胆挑战当时在任的一位民主党人，争夺一个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席位。接下来，他乘着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共和党人的东风取得了胜利。他并没有向艾森豪威尔的实用主义表示感激，却称艾森豪威尔的国内政策是“杂货店新政”，打那之后，总统便很少与他说话。

但戈德华特的直率让他与自己选区的选民关系亲密，大家在1958年再次选了他。他也与那些曾购买并阅读了他的政治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的数百万美国人关系不错。戈德华特的良心是接受冷战，因为尽管他痛恨政府规模扩大，但认为扩大防御是个例外，是应对共产主义威胁所必需的。事实上，他认为美国应当对苏联人及其代理人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必要时可以采取核武器。戈德华特认为，美国真正的未来在于粗犷的西部。他说：“有时候，我认为，假如我们摆脱东海岸，让其漂向大海，那么我们的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好。”他支持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获得平等，但反对联邦政府的民权法律，因为它在关于各个州的特权上违反了宪法规定。

出于对党的忠诚而不是信仰，戈德华特在1960年支持尼克松。当尼克松被击败后，戈德华特预言说，保守派将很快收复对党的领导。的确如此，只不过是通过激烈的斗争。纳尔逊·洛克菲勒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温和的衣钵以及家族的巨额财产，这使得这位纽约州州长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对手。戈德华特和洛克菲勒在1964年初选时就为争斗做好了准备，每人都赢得了多个州的支持。然而，当戈德华特在代表数量很多的加利福尼亚州险胜之后，提名看起来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尽管如此，温和派还是努力想要阻止他。在共和党所有人的记忆中，在旧金山牛宫体育馆举行的共和党大会是一场最丑陋的大会。来自西海岸的代表看起来支持戈德华特，他们鼓动西部保守派在洛克菲勒讲

话时，对他横加指责，不断刁难。当保守派大声指责洛克菲勒的离婚和再婚一事时，这种丑陋变成了人身攻击。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选一个离过婚的人当总统，而保守派也不打算开这个头儿。当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无法在代表中找到阻碍力量的时候，最后关头狙击戈德华特的行动失败了。斯克兰顿公开指责戈德华特说："你曾多次草率地提出要用核战争来解决世界问题。"这一指责只是更加激怒了保守派。

在提名演讲中，戈德华特自己也在煽风点火。这位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攻击民主党，说他们没有能够阻止共产主义浪潮。而共和党人的政府，戈德华特的政府将会中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我想把这一点表达得足够清晰些：我不想让和平和自由由于缺乏力量或意志而在我们的手里遭到破坏。"戈德华特曾被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这是那些自诩为温和派的人干的，对此戈德华特表示欢迎。"我想提醒大家，在保卫自由的战斗中，极端主义并不是一种恶行。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在追求正义的战斗中，温和并不是一种美德。"

保守派高声呼喊表达他们的支持，他们冲出会议大厅接受民主党和世界的挑战。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温和派一直在表达的意思：保守派可以提名候选人，却无法使他当选。几周内的民调显示，戈德华特远远落后于林登·约翰逊，而随着选举临近，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的前景依然没有改善。在国防问题上，约翰逊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正如他对越南的政策开始显现的那样。而戈德华特对于极端分子这一标签的欢迎态度让选民担惊受怕，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过后依然胆战心惊。约翰逊方面发布了一条电视宣传片，片中，一个小女孩正在数菊花花瓣儿，一个不祥的男声接替她开始数，一直倒数到零。此刻，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占据了整个屏幕。一个更平静的声音出现了，要求选民投票支持约翰逊。"高危时刻，岂能留在家中！"

17

作为不久前还是民主党人的里根，他非常适合去拉拢民主党人士来支持共和党的事业。他在加利福尼亚代表戈德华特演讲，借助那种让作为西部同胞的戈德华特赢得提名的反对政府的情绪。然而，没有足够的西部保守党人士从根本上缩小与约翰逊的差距。民主党难以控制的最大选区在南方，那儿的保守派对约翰逊拥护民权的立场心存不满。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希望能联系上这些有所保留的民主党人，于是决定向全国转播里根那篇“抉择时刻”的演讲。

对里根来说，演讲非常成功。倘若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准备得更充分，此次演讲对戈德华特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他的竞选团队在里根的演讲活动中增加了一次募捐活动，观众捐了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戈德华特阵营中的人没有想到会这样，不知道如何来花这笔钱。当戈德华特在一周之后被彻底击败的时候——他得到的大众选票不到39%，仅仅拿下了6个州——这笔钱的大部分还留在竞选账户中。

在美国政治历史中，还没有哪一篇演讲能像里根的演讲这样，开创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事业。林肯于1860年在库伯联盟学院的演讲为他在东部地区赢得了伊利诺伊州人民的信任；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那篇名为“跨越黄金时代”的演讲为他赢得了1896年的民主党提名。但林肯和布赖恩都身处政坛，都是国会议员，而里根则是一个政坛新人。他从没有担任过政治职务，也从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他只是自己新加入的政党中的一员，几乎还不到两年。然而，就凭着这一篇演讲，里根成了美国最受瞩目的共和党人。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里根这种被大家认同的思想会把他带上这个国

家的最高行政岗位，并在25年的艰难运转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里根的支持者们逐渐把他1964年10月份的这次表现称为“那篇演讲”，其在国内推行更小政府，在国外推行更强大防卫的双重主题，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为成功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份模板。

当时的观众确实意识到，与那位真正的候选人相比，这位曾经的演员是一个更强大的政治候选人。如果说戈德华特在民调中的表现让保守派很沮丧的话，那么里根的演讲则让他们再次振作起来。他们把他淹没在一种新型的影迷来信中。里根对一位记者说：“我在演艺圈那么多年里，从没有过这样的邮件反馈。”在这些来信中有个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共和党应当提名里根参选。假如里根参加选举，那么共和党及其保守立场或许会发展得更好。来信的人说他应当尽早参选。

密歇根的保守派成立了一个里根竞选总统委员会，其他州的共和党人也开始谈论相似话题。但更为现实的第一步是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现任州长、民主党人帕特·布朗的第二任期将在1966年结束，这给了共和党人一次机会，他们认为有可能取而代之。竞争已经开始了，里根那篇动人的演说把他推到了那些看到希望的小团体面前。政治分析家理查德·伯格霍尔兹在戈德华特惨败之后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距离报名时间还有14个月，但已经有两个知名的共和党人开始认真考虑竞选州长的问题了。一个是罗纳德·里根，53岁，演员，是一个坚定拥护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政治保守主义的人。”另一个是乔治·克里斯托弗，旧金山市前市长，一位共和党的温和派。伯格霍尔兹说：“里根是最热门也是最陌生的人选：能言善辩，英俊，认可度高，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坦皮科这个小地方的人踏上了大舞台，朝着最终竞选总统的方向前进……这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伯格霍尔兹也认识到了里根面临的挑战。演员乔治·墨菲步入政坛，刚刚被选进参议院。有些选民认为他的胜利为里根铺平了道路，但伯格霍尔兹认为恰恰相反，这将会让人觉得有一个演员从政就足够了。

另外一个障碍是里根的背景，他曾是罗斯福治下的民主党党员。“一些诽谤他的人说，他身为民主党党员的经历‘相当自由’，恰恰表明这很可能让人尴尬。”还有一点就是里根缺少经验。选民会选一个从来没有过一官半职的人吗？或许对加利福尼亚州来说，他太保守了，这个州曾猛烈反对戈德华特。“一些政治上的‘支持者’现在开始揣测，里根能否很好地调整自己的观点，来达到加利福尼亚州广大共和党选民的要求，因为这些选民已经表明，他们不需要政治极端分子。”最后一点，里根出门不坐飞机。“在这样一个州，在这样一场瞬息万变的地方长官竞选活动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伯格霍尔兹说，里根也有一些优势。他的演说威力很大，可以立刻为他赢得追随者。他可能的共和党对手乔治·克里斯托弗的问题是，他来自北加利福尼亚。伯格霍尔兹说：“里根是南方人，这里也是选票集中区。”这里同时还是电视的故乡，而对于利用电视，里根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他有望展现出最大魅力，利用电视形象产生最大的影响。在利用电视宣传其政治活动方面，南加州在所有地区中独领风骚。”

里根看到了那些关于他的专栏文章，但他很谨慎，对此不置可否。他谈论原则，但不谈论政治。戈德华特的失败进一步让他相信，保守派必须寸步不让。他在一次洛杉矶年轻共和党人的集会上说：“保守主义思想绝不能放弃。”这些人是共和党右翼中的狂热分子，里根讲的就是他们希望听到的。他没有把戈德华特的失利归咎于保守派，而是归咎于党内温和派。里根称这些温和派是党的“叛徒”，说：“有些人向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宣誓，而同时又来寻求我们的支持。我们不能再要这样的候选人了。假如在加州总统初选之后，我们当时的对手在全国大会上加入到巴里·戈德华特的队伍中，并保证提供支持的话，那么，今晚我们就是在庆祝一场彻底的胜利了。”里根还提到了他收到的来自全国的信件和电话。他说，这些人告诉他，和其他的保守派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

对于是否竞选州长的问题，里根闪烁其词。一位记者告诉他，一场运动正处于筹备之中，要把他的名字写到1966年的选票上。如果这一运动发展壮大起来，共和党提名他来参选，那他将如何应对？里根回答说：“我希望我能拒绝掉。”

但里根认为这听起来太消极，于是，当大家的热情持续高涨的时候，里根对自己的回答进行了重新措辞。他依然拒绝承认有进军官场的欲望，但又说自己不能忽视人们的意志或使命的召唤。“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和愿望，但关于各人的责任所在，我有了一些别的想法。”

对保守派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最为糟糕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保守派重视传统和稳定，在20世纪60年代，各种势力挑战着美国的传统和稳定，这在之前是没有的。内战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非裔美国人要求国家遵守第13、14和15条修正案的承诺。最高法院在1954年突破了种族主义制度的几个方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取缔了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国会通过1957年的民权法案，又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黑人，尤其是南方的黑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遭受着隔离，被剥夺了公民权。

美国黑人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发生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那场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使得一位名叫马丁·路德·金的年轻牧师一跃成为全国的焦点。金长相英俊、善于表达，并且具有超凡的魅力，成为民权运动的象征。数千名黑人——其中许多是学生——团结起来抗议各州法律、市政法规以及社团活动中的种族隔离规定。他们坐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餐馆中拒绝离去，直至被捕。他们到州府和县法院游行，要求登记选举。他们忍受着讥讽、威胁和身体暴力等种种折磨，包括拳打掌掴、消防水枪的冲击以及子弹和炸弹的攻击。

如果没有现代媒介，尤其是电视，他们的运动是不会成功的。北方

的美国人很早就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读到过种族隔离的内容，但纸上的文字，甚至图片，其情感冲击力是有限的。电视极大地缩减了南方与国家其他地区在情感上的距离，将黑人抗议者遭受到的暴力行为带到了全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

在支持民权方面，电视从没有像1963年的夏天那样，发挥如此有效的作用。几十年以来，黑人领导者曾试图组织游行示威，前往华盛顿曝光发生在工厂、公共场所、教育以及美国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种族歧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延缓了这一游行示威，但在1863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100周年的时候，几个民权组织计划实现这一游行示威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大约20万人来到美国国家广场，其亮点是马丁·路德·金的那篇引人入胜的演讲。金说道：“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人群刚开始很安静，随后便跟上了金的节奏。数百万的电视观众被迷住了，在他重复“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呼吁让自由之声响彻全国的时候，观众们被感动得哭了。金在最后总结说：“当这一切发生时，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自由啦！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金的演讲点燃了肯尼迪政府统治下的烈火。这届政府犹豫不决，没有把民权当作首要事务，为的是防止总统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这些白人自内战以后便成为民主党联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中肯尼迪

的同盟者在1963年秋提出了一份民权法案，但当肯尼迪在11月遇刺身亡的时候，法案还没有任何进展。林登·约翰逊继承了这一法案，他带给民权运动的既有热情又有信誉，这都是肯尼迪所欠缺的。约翰逊的热情来自他的教书经历。他曾在得克萨斯州的小镇科图拉教过墨西哥裔的美国孩子，在那儿，他发现了种族偏见是如何阻碍学生的发展机会，伤害他们的自信心的。他的信誉来自自己的南方历史渊源，这让他可以在对南方人讲话时使用他们的词语和他们的语言。

约翰逊是一位立法专家，这很有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完善了说服和强制的艺术，这些是成功立法的根本。作为美国总统，约翰逊利用这些艺术连同总统的权力，一起为民权法案的通过努力。几个月内，法案成功通过，约翰逊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新法律禁止几乎所有形式的公开种族歧视，向所有种族的顾客开放饭店、宾馆、剧院以及商店，强化现有法律，规定在学校、军队和选举中推行平等待遇。在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支持下，新法律把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一脚踢开，保证了这一制度的加速废除。

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做法也同时为共和党的复苏打下了基础，该党最终让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签署民权法案数小时之后，约翰逊看起来没有其助手比尔·莫耶斯认为的那样兴高采烈。莫耶斯问他原因，约翰逊说道："比尔，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拱手送给了共和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如此。"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把加利福尼亚送给了共和党人。对许多生活在美国大城市中的黑人来说，约翰逊政府的民权改革进展得太慢，他们对持续的不平等感到沮丧和愤怒，最终爆发为暴力活动。1964年夏天，就在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几天之后，第一波冲击袭击了哈莱姆黑人聚居区。一位白人警察射杀了一个黑人少年，引发了持续5天的骚乱，造成数百人受伤，1人死亡。在随后的几周，费城、罗切斯特和泽西城都爆发了

类似的事件。

第二年，暴力活动迅速蔓延到了西海岸，到了里根的后院。1965年8月，洛杉矶沃茨警方因为酒后驾车逮捕了一位黑人司机，随后附近的黑人爆发了骚乱。市里和州里的官员都希望阻止发生类似东部的暴力活动，于是先发制人，在这一地区布置了大量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但是武装力量的出现反而加剧了紧张局势。数千名黑人涌上街头，纵火犯点燃了白人的房子，整个街区烈焰冲天。当地媒体对向冲突地区派遣白人记者犹豫不决，但《洛杉矶时报》从其广告部抽调了一名黑人员工来报道这一事件。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需要像这些暴乱分子一样行动起来。他这样写道："我也学会了大喊大叫，'烧，宝贝儿，烧'"——这是暴乱者的口号——"几颗子弹射向我，幸运的是没有一颗击中我的车，更幸运的是，没有一颗射中我！"破坏活动匪夷所思，令人震惊。"暴乱分子正在点燃他们的城市，疯狂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理智。洛杉矶的一大片地方都在燃烧，任何没能回答出那句疯狂口令的人都身处危险之中。"他可以从自己的车里搜集观感印象，但向报社发送稿子则需要他给报社打电话。"我所有的电话只能从加油站旁边街角处的公用电话亭来打。"他解释说，"你都不知道在一间无遮蔽的、被照亮的电话亭里，自己感觉是多么赤裸裸。但当时我熟悉内情，每当一群黑人靠过来盯着我看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去做。你只要打开门，探出脑袋喊一声'烧，宝贝儿，烧'，你就安全了。"这次暴力活动最终导致34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还有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许多当地人没有参加这场暴力活动，他们坦言自己理解暴乱分子的感受，并且同情他们。一位加油站的黑人老板告诉一位白人记者说："这是仇恨带来的仇恨，这不会伤害到我们黑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那些楼房并不属于我们。你们白人在生活中从没有对我们黑人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情。"另外一名黑人说道："这是草根百姓的事情，黑人领导者对此无能为力，美国军队也阻止不了，必须顺其自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保守派对于政府的主要意见就是政府规模

发展过大，但发生在哈莱姆、沃茨和其他城市的骚乱让他们想到，有时候政府的规模太小了。他们要求更加严格地执法，增加警察的数量和力量，如果有必要，可以增派州和联邦部队。同时，保守派还把骚乱理解成开明的自由主义的又一表现，这种自由主义没有把恶行归咎于施恶者，而是归咎于社会环境，对骚乱这件事来说，就是贫穷和不平等。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宣称，自由主义腐蚀了美国人的性格，他们把这些骚乱当作确凿的证据。

当时，社会现状面临的其他一些挑战也引发了保守派相似的反应。大学和学院对他们一连几代的学生充当的都是替代父母的角色。但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当“二战”后出生的这批孩子开始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学生要求得到比他们的前辈更多的自主权。他们抗议对于言论的限制，声称美国第一修正案适用于独立的成人，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最初抗议的温床，“自由言论”运动的领导人和成员要求得到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便有时候，他们的言论会惹恼或激怒那些声称管理着州和国家的个人和团体。这些学生抗议者跟年轻人一样，经常表现得十分自负，常常令人讨厌，偶尔还很暴力。他们控诉“现存体制”在种族主义上的沆瀣一气。他们谴责“军工联合体”——这一术语是他们兴高采烈地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偷来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了越南战争。

反战抗议尤其激怒了保守派，他们心目中的典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反抗法西斯主义。许多保守派把抵制征兵行为标记为煽动叛乱罪，把妨碍军事基地和兵站行动的行为认定为叛国罪。保守派无法断定谁更应当受到惩罚——是抗议者还是允许抗议的政府官员。许多人弄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政府没有在国会坚持宣战，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动员全国反对法西斯主义那样——除非约翰逊像自由派一贯的那样愚蠢或贪赃枉法。

虽然抗议活动让大多数保守派很恼火，但有些人总结说，从长远来看，这些活动对保守主义和整个国家是有好处的。这些政治战略大师分析说，自由派已经失败了，但选民会对骚乱和学生动乱做出反应，要求回归到曾让美国自豪的昔日辉煌中去。这一政治潮流将会朝着保守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有合适的候选人，保守主义一定会再次当权。

18

竞选州长——或者不竞选州长——都不是一件有收入的工作，而里根需要一份工作。找份新工作需要时间，但最终他找到了另外一份主持工作。《死亡谷岁月》本来是电台中一个少见的系列节目，后来成功跨越媒介进入到电视领域。斯坦利·安德鲁斯在里面饰演的是“老游侠”，他从节目在电视上首秀以来一直主持该节目，但13年后，制片人想要一个新面孔。1965年，里根得到了这一角色。

这份工作让他出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他还可以为政治竞选试一下水。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内旅行演讲，偶尔，但也非常重要的是，他会走出加州，向那些他曾以通用电气的名义讲过话的理事会、委员会、商会和董事会发表演说，只不过这次是为自己的品牌服务。他告诉英格尔伍德商会说，新政背后的思想以及针对社会工程的每一次尝试在道德上都是失败的。他说：“每个个体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接受那种‘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的说法是经受不住考验的。我们国家建国之根本是相信个体。”在迪士尼乐园宾馆与奥兰治县的共和党同事见面时，里根说，建议从加利福尼亚的工资中预扣州所得税的目的是要哄骗选民满意。“我不相信没有痛苦的税收。每个人都必须准确地知道何时缴税和缴税数额。”林登·约翰逊向贫穷宣战的活动没有希望了。“它只是新瓶装旧酒，没有效果的。”民权法案受到误导，被认为是非法的。里根并不反对要平等对待不同种族的人，他说：“我完全支持这一点，而且终生支持。”但联邦法律“写得很糟”，践踏了个人和各个州的权利。里根谴责了医保法案——这一法案经国会批准，由约翰逊在1965年夏天签署——称为“公费医疗”。这是迈向集体主义的又一步。“如果你可以把医生集体化，那么你也可以把病人集体化。”

民调显示，里根遥遥领先于乔治·克里斯托弗以及其他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全国的媒体也开始关注。“在共和党当今低迷的人选之内，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的横空出世，他是作为戈德华特竞选活动的救星出现的。”里根在辛辛那提的演讲之后，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这样说道：“的确，许多好斗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愿意捐款100美元到辛辛那提公园来大汗淋漓地聆听里根严厉谴责福利国家，几乎忘记了巴里·戈德华特。他们很严肃地与我们谈起罗纳德·里根竞选1968年总统的事（尽管有些人更倾向于理查德·M·尼克松作为1968年对抗约翰逊总统的替罪羊，把里根留下来为1972年做准备）。听起来很荒谬？并非完全如此。”埃文斯和诺瓦克解释说，尽管里根还没有宣布竞选加州州长，但他被广泛寄予厚望来获得共和党提名。现任州长布朗与选民之间的八年之痒进一步加剧，原因是大众对大学生示威游行，尤其是对沃茨骚乱活动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在埃文斯和诺瓦克看来，里根在1966年11月击败布朗是手到擒来之事，并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的州长，身后又有狂热的戈德华特运动的鼎力支持，里根一定会成为共和党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似乎证明了，事情还远不及去年11月3日自由派共和党人想的那样，已尘埃落定。保守派非但没有承认戈德华特式的保守主义为民意调查招致了灾难，而且他们现在宣称，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候选人，一位能用一种更能被大家接受的方式来包装这一思想的候选人。这名候选人就是里根。”

埃文斯和诺瓦克向他们的读者简要描述了这位曾经的演员：“里根（尽管在单独与媒体打交道时有些不安）绝对是一位宴会讲演大师。他衣冠楚楚，一表人才，从远处看，这位54岁的影星会被看作仅为34岁。但他最大的优势是他那经过精心润色的演讲，它相当于把戈德华特的思想和约翰·F·肯尼迪的技巧结合了起来。里根不是采用历史悠久的方式来赢得掌声，而是学着肯尼迪的方法，采用一连串的大量数据，引经据典，充满智慧（包括曾引用希莱尔·贝洛克）。听众常常因为太过入迷而忘了鼓掌。”他的名人效应非常明显。“里根同戈德华特一样，得到了

女性共和党人的青睐。一位苗条的辛辛那提年轻主妇坦言，去年，她非常着迷地观看了三次里根的电视演讲。一位州政府官员透露说：‘我妻子说她要投票支持里根竞选总统，无论他有没有被提名。’”然而，通往巅峰之路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在里根飞速上升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毁掉戈德华特的那些不可改变的因素。在辛辛那提的一次漫谈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里根陷入了曾给戈德华特造成伤害的同样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中。他对约翰·伯奇协会含糊其辞，对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自愿方式拒绝说‘是’或者‘不是’，并且表明了他对1964年民权法案中大部分重要条款的反对态度……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让自己那些好斗的右翼人士高兴，同时不让其他任何人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戈德华特从没有达到过的）。因此，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斗争对共和党来说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小威廉·F·巴克利也是这样想的。在20世纪50年代，巴克利曾为美国的当代保守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他创办的好斗的杂志《国家评论》严厉地斥责了自由派，为自由意志论者、麦卡锡分子、改良的左派和其他认为美国正在走向集体主义毁灭之路的人提供了一个阵地。因此，巴克利倾向于支持里根，因为里根在1965年的表现证实了这一倾向。“他正在形成一种政治技巧，这一技巧让专业人士感到震惊，这些人认为演员有别于男装经销商，如果他们能成为优秀的政客，那是有伤大雅的。”巴克利说道，他指的是哈里·杜鲁门从政前的职业。巴克利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长、民主党人杰西·昂鲁对里根表现出了足够的尊敬，有意要让他失去价值。巴克利说：“昂鲁的策略是要煽动里根，为的是让他露出‘卑劣的一面’。其想法是假如像罗纳德·里根这样优秀的专业人士也会被弄得咆哮发怒的话，那么历经20年时间在银幕上塑造的良好形象就会毁于一旦，公众的理想就会破灭，会感到痛苦，这样就达到了目的。”巴克利持怀疑态度：“昂鲁策略的困难在于，假如罗纳德·里根的性格中有卑劣的一面的话，那也是深藏不露的。我并没有深入研究里根，但我认为在他身上是有些怒气的，正如我觉得在圣方济各身上也有一样。但我认为，即使面对最严峻的政治挑衅，这种愤怒也不

可能显露出来。”巴克利发现，昂鲁和里根的共和党对手——主要是乔治·克里斯托弗——正在把里根描绘成一个极端分子。或许在戈德华特失败之后，里根严厉批评了党内的温和派，但他如今成了谨慎的化身。“他周游全州，说的全是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的好话，甚至连调侃自己那些共和党对手策略的做法都没有，这些对手宣称共和党内部有必要团结一致，认为自己完美无瑕，却猛烈攻击比他们立场更右一些的所有人。里根温文尔雅，面带微笑，继续努力表达自己对布朗州长那些庞大支出政策的不同意见，批评今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和沃茨两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

到了1966年年初，里根对自己获胜的机会十分自信，于是正式宣布竞选。他是在一段30分钟的录像中宣布这一决定的，这段视频被同时传给了加利福尼亚州15家电视台。他把自己定位为“平民政治家”，以区别于那些他在初选和大选中要面对的职业政客。里根重申了自己关于个人权利的观点，对“专制的官吏和家长式作风的政府”的发展发出了警告。他以发生在伯克利的骚动为例，指出布朗和民主党没有尽到义务，没有保护好个人权利，也没有维护好公共秩序。“我们是否会允许一所知名大学屈膝于一小撮喧闹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是否要以犹豫和软弱来对付他们的疯狂和粗野？我们是否要告诉校方，我们希望他们执行符合礼仪、常识和奉献精神的校规校纪，来实现大学崇高而伟大的目标呢？”他反对联邦政府向各个州的教育提供援助。“联邦政府的援助带来的就是联邦政府的控制，就像萨克拉门托政府把州的主权交给了华盛顿方面，同时又从那些被选举出来管理我们城镇的人们那里夺走了更多的权力。”里根为复杂的美国主义政治感到痛心，指责民主党迎合“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特殊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可以被用来骗取“政治私利，这样一来，无所顾忌者就可以做出无所顾忌的承诺来拉取选票。”他承诺要进行一次干净的竞选，遵守共和党州主席盖洛德·帕金森提出的“第十一诫”，禁止共和党人攻击共和党同仁。

林恩·诺夫齐格是一名记者，作为新闻秘书加入了里根的竞选团队。他回忆说，帕金森的“第十一诫”对里根非常有利。“当然，主席应当保持中立，但他们出台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候选人攻击里根，说他缺乏常识，缺乏任何政治资历等类似的问题。”诺夫齐格说道：“这一招十分奏效，因为我们可以说‘你不能挑剔里根，因为他是共和党同仁。’”里根非常高兴地予以合作，他说：“我不会批评任何共和党人。”

里根并没有完全遵守自己的诺言。乔治·克里斯托弗和其他共和党温和派企图激怒里根，迫使他否认与约翰·伯奇协会的支持有关系。这是一个新的麦卡锡团体，推崇第十条修正案，反对自18世纪以来联邦权利的每一次发展。这明显包括那些旨在保护少数裔民权的联邦法律。因此，协会成员常常被他们的对手冠以种族主义者的恶名。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种族分子，使得这种指责合情合理，也就要求政治候选人与他们保持距离。

里根意识到，如果伯奇协会成员不是乱投候选人的话，他们会投票支持自己，因此不想疏远他们。几个月以来，他巧妙地避开关于这个协会的问题，这自然鼓励了克里斯托弗和温和派人士，称他是一个同路人，暗示他是个关着门说话的种族主义者。尽管如此，里根拒绝否认，说自己反对以当事人之伙伴来“指控”当事人。随着压力的增加，里根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自己“非常不同意”伯奇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的某些言行。“我不是其中一员，也无意成为其中一员，不会乞求他们的支持。”

这不太妙，而且来自左翼的刺激还在继续。1966年3月，里根参加了在圣塔莫尼卡美丽华酒店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黑人党员论坛。乔治·克里斯托弗和几个次要的候选人也参加了，其中有些人的发言乏善可陈，观众和记者们都不感兴趣，但里根对其中的内容十分不悦。他愤怒地做出回应，声音大得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我讨厌有人暗示说我的性格

中有偏执盲从的成分，是否还会有人说我不够正直。我不会保持沉默，让任何人在这样的场合或其他任何场合说三道四。”他昂首阔步地走出大厅，把一只拳头狠狠地砸进了另外一只手的手掌里。不止一个记者听到他说：“我要搞定那个浑蛋。”但没人能够说清楚，他口中的那个浑蛋指的是谁。

里根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返回会议大厅，平静地开完了会议。他发表了一篇声明，明确阐述了他关于民权法案和民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提到民权法案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其表述得不够好，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地积极促成实现这一法案的目标。对于现有的巨大困难我深表遗憾。我曾多次说过，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来强制执行这些权利，在必要时可以采取武力。”他说自己不会支持有种族歧视的企业，但他不认为宪法允许联邦政府强迫商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里停止歧视，州政府也不应当侵犯财产所有者的权利。里根反对民主党提出的、最近被采纳的加利福尼亚公平租赁（或出售）房屋政策，他说：“在一个容忍歧视或偏见的国家里，自由没有立足之地。”但自由同样也无法幸存于规模持续扩大的政府之中。他说，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基本权利“无法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果是的话，那么政府的控制力量将不受限制，“最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里根的解释明显让共和党初选选民感到满意，他们让他以2：1胜过克里斯托弗。获胜的比例以及里根支持者们的热情让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共和党人——这些人曾被该党在1964年的糟糕表现所打击——认为共和党又有了希望。迈克尔·迪弗回忆了他对这位前演员的第一印象：“我不是十分支持里根的竞选，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中，我算不上什么，曾在圣克拉拉市担任党内执行董事。在政治上，我属于北加利福尼亚，尽管我曾积极支持过戈德华特。但我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当我在戈德华特

大选之后的那个早晨醒来，意识到我们只拿下了五六个州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希望赢得选举。”迪弗认为，戈德华特身上的那种保守主义显示出了人们身上卑劣的一面。“我们有4个或5个戈德华特的组织，它们在加利福尼亚彼此间互不理会，这太可怕了，你会说整个戈德华特组织都是右倾的。现在回顾起来，这些人太可怕了。这里面有约翰·伯奇协会的人，有让我们脱离联合国的人。不能让这些人搅浑我们的组织。这些人一直参与其中，因此我只是不想再与这些事情有牵连了。”

迪弗原以为里根也是这样的人，直到他亲自遇见他以后。迪弗说：“我在一次晚宴上遇到里根，当时他决定周游全州，据说是要试一下水。他来到每一个城镇，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当时我为圣巴巴拉市共和党州委员会工作，我们大约30个人一起在圣巴巴拉一家很受欢迎的饭店吃饭。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可以感受到他的思维方式。他无疑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家伙。他身材魁梧，在房间内显得鹤立鸡群。但当他讲话的时候，更让人难以忘怀，因为他非常友善。他的确非常和蔼，而且非常聪明，因此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里根击败克里斯托弗之后，这种印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迪弗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胜利者，于是加入了里根的竞选团队。他完全被这位候选人迷住了。历经数次竞选，几十年之后迪弗说道：“你希望能帮助里根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希望可以帮他克服困难，希望可以保证一切都打理得井然有序。我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每一个曾经为他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他从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但很明显，每一个人都在那样做。我想，周围极少有这样的人——我的生活里从没有这样的人——值得你这样尊敬。你希望他成功，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分担普通人不得不做的一切琐事。”

与大部分人相比，迪弗更加对里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许多观察家

把里根初选中的大胜看作共和党的一次复兴，不仅仅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政治专栏作家戴维·劳伦斯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结果可能是带有预言色彩的。假如在该州出现一个团结的共和党，1964年竞选的苦涩通过派系间的合作得以消除，那么加利福尼亚州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由共和党人主宰的州。"而且加利福尼亚州也可以成为全国的先驱，关键就在于候选人。"关键在于这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他所承担的公共事务的职务，常常有助于赢得选举。"劳伦斯说道："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在具体问题上比自己的对手说得少、专注于一般原则的候选人常常更容易获胜，主要赢在性格上。"

里根就具有这种获胜性格，而帕特·布朗则不具备。这位现任州长从来不会让人激动振奋，与里根比起来，他看起来平庸迟钝，有时候会被自己说的话所羁绊。林恩·诺夫齐格在回忆起布朗时说道："帕特为人不错，可记者们会看不起他，把他当作滑稽小丑之类的人。"几十年之后，诺夫齐格对布朗在视察完海啸对新奥尔良市的破坏之后所说的话，依然暗自发笑："这是我当选州长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布朗同样也没有赢得棒球迷们的信任。当时，他信心百倍地提及洛杉矶道奇队和旧金山巨人队："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这两支球队能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相遇。"两支球队都是在国家棒球联盟比赛，因此是不可能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相遇的。

1966年6月的民调显示，里根领先现任州长11个百分点，在5个月的选战中，布朗从没有缩小这一差距。里根在萨克拉门托避开了民主党人艾伦·克兰斯顿的伏击。这位州审计长与他当面接触，要求他回应关于约翰·伯奇协会是个反犹太人组织的报道，还有该组织的另外一些罪行。里根拒绝接招，没有理会克兰斯顿当面发起的攻击，而是继续向前走去。在奥克兰，里根还遇到了工会中的"刁民"，他们用叫喊声淹没他的讲话。里根喃喃自语地抱怨说，声音大到刚好可以让记者们听到："伙计，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不是候选人，可以回答这些家伙的问题。"之后，有人问他对于刁难的感受，他回答说："这没有难倒我，这

是劳方统治者的把戏，我没有理会他们，坦率地说，也不想理会他们。”里根得到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克兰顿的支持，此人说，如果里根在加州大胜的话，那么他可以寻求共和党提名，在1968年竞选总统。斯克兰顿说：“他的竞选活动非常出色，性格非常迷人。共和党可以利用魅力四射的人物，很高兴我们有了这样的人选。”

这位魅力四射的人物在11月份取得成功——里根击败了布朗，累计超出100万张选票，带领共和党几乎席卷了全州的政府机关。共和党继续在全国发展，从反对把持白宫的政党第六年的反应中获益，从对于校园和城市动乱的不安中获益，从对于越南战争的担忧中获益。共和党收获了8个州长席位，在美国参议院收获了3个席位，在众议院收获了47个席位。

19

里根的大获全胜使他成为全国议论的焦点。《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小沃伦·韦弗对196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了预测，把里根排在4位共和党可能参选人员的首位。另外三位分别是理查德·尼克松，他曾周游全国，在许多州兜售并宣传共和党候选人的美德；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他的再次当选跟里根的当选几乎一样完美；伊利诺伊州的实业家查尔斯·珀西，他刚刚击败民主党的一位老将，在最伟大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的那个州得到了一个参议院席位。

里根没有理会关于总统职位的议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对策》栏目采访时，里根说："我感到非常荣幸，受宠若惊，有人会把我的名字与总统职位联系起来，但我与加州人民有一个四年之约。"

然而，他没有回避那些更适合总统而不是州长的话题。他强烈要求越南战争升级。"一旦战事开始，我们派遣美国年轻人前去送死，那么国家就有道德义务竭尽其所能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他说道。他希望更多地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尤其是武器库。"把他们轰炸出来，你可以成群结队地俘虏他们，而不是在苦力的背上沿着丛林小路艰难前行。"里根认为，军队应当回到志愿参军模式。他说："我对整个征兵的事心存疑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形成一套自愿服役模式呢？我不希望军队成为奴役的象征。"他要求彻底改造联邦福利和贫困方案，因为这里面到处是"贪污和资金滥用"。里根预测，全国民权运动正在进入一个相对平静、和平的时期。黑人权利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将会被"他自己的人民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因为这些人认为，与摩擦和暴力相比，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获得平等"。

同样，里根迫切地想要开始州长的工作。事实上，他非常迫切，以至于操之过急了。他的任期本来是从1967年第一个工作日——1月2日星期一开始，但他提前几天就签署并宣读了就职宣誓。随后，加州政府秘书长宣布，文书工作搞乱了，并说这都是自己的过错。然而，秘书长助理曾负责过宣誓仪式，并见证了签字过程，他记得自己曾告诉里根说："这份文件将正式让您成为州长。"这位助理秘书后来又捏造了对里根有利的谎话，补充说："说句对里根州长很公平的话，回首往事，我可以理解当时没有完全表达清楚。"

这场混乱很快在共和党人接管加利福尼亚州行政机构的紧张与繁忙中被忘记了。里根在1月1日午夜过后不久再次宣誓就职，他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需要缩减政府规模的话，之后在场的人都回家睡觉去了。里根养精蓄锐，为3天后举行的公开就职典礼做准备。他宣称："政府是人民的事务，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上缴了第一美分的税款之后就成了政府的股东。"这些税收过高，必须降低。政府的企图必须得以缩减。"我们要制定的路线并不简单，需要当选者进行管理，也需要选举者进行管理。对此，让我们说得明白无误些：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了抉择时刻——我们所遵循的路线憎恨任何认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拥有无限权力的想法。"

里根也承认，政府的某些功能还是必需的。政府必须与破坏和平的人做斗争。"心怀不满的那些人可以在法庭或立法机关寻求平反昭雪，但不能走上街头。政府不能容忍无法无天的暴力团伙以及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形势需要，我们都将坚定迅速地平息骚乱或暴动。"

政府必须帮助那些无法自助的人们，但它一定不能放纵游手好闲之徒和寄生懒惰之流。"我们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慷慨大方的民族，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的义务，去帮助那些老弱病残，以及那些不是因为个人过错而命运多舛之人，他们必须依靠他们的同胞。但是，我们不

会用失业救济金来替代工资支票，长期让贫穷继续下去。如果自立、尊严和自尊这些道德的根本因素遭到了破坏，那么就不会有人道或仁慈的存在。”

大学必须健康发展，否则其学生只能离开。“上万名年轻男士和女士会在我们的州立大学里接受教育。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们相信，在合理的规定和期望框架下，提供这种教育不是在否认学术自由；要求遵守这些规章制度，或者要求那些不愿遵守的人必须到别处求学的做法也不是在违反个人权益。对支持大学教育制度的纳税公民来说，这并不是在政治上对知识自由进行干涉。除了教学之外，大学还在公认的、已被接受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上塑造学生品格。”

在这一点上，里根在演讲中说得很正式，甚至很严厉。在他谈到预算的时候，又表现出轻松的一面。“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差劲儿，就好比在北大西洋上空飞往巴黎的一架喷气式客机一样。机长说他有消息要宣布——好消息和坏消息——他首先要宣布坏消息。他们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指南针和高度表失灵，无法确定飞行高度、方向或目的地。然后，他宣布好消息：目前他们赶上了每小时100英里的顺风，飞行计划比原来提前了。”

在谈到前任政府和立法机构掘下的财政窟窿和加利福尼亚想要爬出来需要付出的努力时，里根又恢复了严厉的语气。必须而且一定要实施严格的开支紧缩。“多年以来，你我像孩子一样被要求安静下来，并且被告知对于那些你们不能理解的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但事实是，有简单的办法，只是这些办法并不容易实施。”必须改变税收与消费文化。“是时候把支出与收入匹配起来了，而不应当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将紧缩、削减和压缩，直至减少政府开支。这并非易事，也不会令人满意，将会涉及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我们要整顿财政部门。在这期间，我们将建设一些设施，让我们州更适合生活，而我们也更愿

意这样做，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得起，而这些设施也物有所值。”

结束演讲时，里根谈到了另外一件事，比那架任性的飞机故事更动人。他指着飘扬在集会现场的州旗说，这面旗帜比通常飘扬在那儿的旗帜要小一些。“这是有原因的。那面旗帜被加利福尼亚州的年轻人带到了越南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回不了家了。”有个叫萨金特·罗伯特·豪厄尔的年轻人的确回家了，但受伤严重。“他把这面旗帜带了回来。我想我们非常自豪，能够看到它今天飘扬在州府上空。它可以提醒我们，应当赋予我们的子女可信赖的事业和可追寻的旗帜。如果这是一个梦想，那它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拥有，值得我们把它传递到下一代。就让今天成为这一切的开始吧。”

州政府的管理琐事很难让里根产生兴趣。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负责提供重大政策原则，并把细节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威廉·克拉克从竞选团队成员一跃成为州长办公室主任，他在谈到自己的老板以及老板面临的各种问题时，说得非常体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基本的想法和洞察力，但他必须依靠专业人士的帮助。”里根的想法和洞察力证明了他的优势，而他对于别人的倚重则证明了他的弱势。这两点在他作为州长解决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平衡州预算时，变得非常明显。

跟大部分的州一样，加利福尼亚州在宪法上也禁止自身出现赤字亏空，但该州的当选官员在花费人民的金钱时禁不住诱惑，使他们这一上层阶级备受折磨。帕特·布朗离任时留给里根的礼物是一个凭借大量虚构才得以平衡的预算：通过改变之前的核算方法，让该州在征税的时候计算收益，而不是在领取的时候。通过这种方法，布朗最后的预算可以对外宣称，有15个月的税收来支付12个月的支出花费。里根在竞选期间曾批评过这种骗人的花招，这一批评也是导致布朗失败的部分原因。但现在，里根必须处理这一结果，启动一个不可能失去平衡的预算。

里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提议全面削减10%的州政府花费。这一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反映了里根长期以来的观点——整个政府过于臃肿。他让其他人为此展开辩护，而他的目的是大幅削减。

里根这一办法的问题是，它引起了每一个想从政府计划中寻求帮助、支持或者选票的人的反对。他的预算没有带来赢家，只有输家。同各地的立法者一样，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也是要利用政府开支来打造人脉支持网络，而里根的计划威胁到了每一个这样的网络。

这位新州长没有通过调整自己的习惯来适应加州首府的政治文化以助推自己的事业。里根不是一个天生的善于交际的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他的儿子罗恩·里根后来说道。但州长应当是善于社交的。迈克尔·迪弗同威廉·克拉克一起加入了州长办公室，他解释说：“那些来到萨克拉门托的伙计们都喜欢上了萨克拉门托，到了萨克拉门托，也就摆脱了他们的妻子——据说这是一个业余立法机构——大家每天晚上到弗兰克肥仔和波西酒吧坐着聊天、喝酒、联络感情。但里根每天晚上6点就回家，与南希、孩子们或者在家里的任何人吃顿冷冻快餐，从没有跟我们一起玩过。大家对此一直在发牢骚。为什么他不能像州长们应当做的那样去做呢？他应当在晚上6点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几瓶酒来，而我们则把脚搭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这些牢骚促使里根开始尝试着去顺应。“我们最终试图每周把几个立法者叫到家里去。”迪弗继续说道，“我们会挑出五六个人，都没有带老婆，只有国会议员。大家一起吃饭，南希也会在场。之后，大家走到地下室，那儿有张台球桌。气氛不是很愉快，没有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说，他很有意思，也很开心，但这不是大家想要的氛围——他们不想到谁的家里去，而且还有老婆在场。”

当里根的预算提交到立法机构的时候，这种和谐一致的差距就变得很明显了。州议会议长杰西·昂鲁领导的多数民主党人宣称，这根本不能接受。昂鲁认为，起草预算是州政府立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行政机

关的责任。无论如何，他很高兴可以与里根过招，因为他打算在1970年向他挑战，竞选州长。昂鲁坚持认为，州长的预算削减了造成浪费的项目，但也盲目地削减了必要的项目。比方说，心理卫生部门将不得不解雇数千名负责照顾智力受损病人的员工。难道州长愿意承担由于他削减开支而导致社会上大部分弱势群体遭受痛苦的责任吗？或者承担这些得不到治疗的病人对社会其他人造成伤害的责任吗？

里根的预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即使削减了10%的开支，也远远没有达到平衡。昂鲁和民主党人认为，增加税收是不可避免的。在期望得到立法机关的任何合作之前，州长需要承认这一点。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保守派以自己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为荣。他们不喜欢税收，但更不喜欢赤字。里根也是这种观点，因此在提议修改预算、把新税收纳入其中的时候，他没有遭受良心危机的痛苦。尽管如此，当里根看到自己的提议所引发的头版新闻标题时，他还是退缩了。州长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让收入与支出相匹配”，而不是反过来。仅仅两个月后，《洛杉矶时报》就用一整版刊登了大幅醒目标题“创纪录的税收飙升”。税收增加总额接近9.5亿美元，而该州支出将超过50亿美元，这将是另一个纪录，也是那个誓言要“紧缩、削减和压缩”的州长的又一次倒退。

修改预算的提议成了与立法机构进行交易的基础。里根与昂鲁在利润方面展开争论，昂鲁希望州所得税从工资中预扣，而里根却反对这样做。昂鲁坚持认为，预扣的做法对那些诚实的纳税人更公平，可以让欺骗变得更难，而里根则认为，预扣的做法虽然可以缓解纳税的痛苦，但同时也减弱了削减税收的需求。里根这一轮获胜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答应未来减轻不动产税，而这也是昂鲁所希望的。但里根也希望如此，这就意味着在扣税这件事上，里根事实上是不战而胜。

等到立法机关通过了预算，得到了里根签名的时候，税收增加超过了10亿美元。一些保守派指责州长背叛了自己的原则。里根回应说，在

民主政治中，妥协是固有的一种做法。他告诉记者卢·坎农：“我愿意得到我所能取得的一切。”

在另外一个议案中，妥协变得更难了，但不管怎样还是妥协了。对保守派来说，反对堕胎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这主要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堕胎一直是违法的。但随着对妇女态度的改变，随着20世纪女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和政治上的自由，人们对待堕胎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许多妇女开始要求更多的自主权来掌握自己的生育。20世纪50年代，口服避孕药的发展引发了关于性行为以及谁应当为女士代言的讨论。就在大约同一时间，一些母亲服用沙利度胺这种经常用以治疗早孕反应的药物，结果导致畸形儿的出现。这种情况让大家开始考虑采用合法手段来终止高危妊娠。

加利福尼亚并不是第一个放开堕胎法的州，但里根执政第一年推出的一个法案是最势不可当的一个。民主党人、提案发起人安东尼·贝伦森之前曾与人共同在州议会提出了一个法案，允许堕胎以挽救母亲的生命。他与法案的支持者们听取了证词，这些证词讲述了那些被迫进行非法堕胎的母亲，由于不具备法定资格的业余医生的原因而惨遭丧命的案例。然而，天主教会断然反对这一提案，努力失败了。

贝伦森在从州议会转入州参议院之后，于1967年再次进行了努力。社会对于妇女和性行为的态度继续逐步演变，贝伦森的新提案也得以取得进展。该议案规定，在发生强奸或乱伦的情况下，怀孕母亲的身心健康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孩子有可能出现畸形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堕胎。随着辩论的进行，最后一条吸引了极大的负面关注。天主教会依然谴责所有情况下的堕胎，但越来越多的加州人愿意让妇女选择终止那些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妊娠或者危及她们生命或健康的妊娠。然而，即便在这些人当中，仅仅因为婴儿可能是畸形就堕胎的想法，也常常被看作遥不可及的。

里根就是这伙人中的一员。他对堕胎没有坚定的信念，也从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件事。假如孩提时代，他曾跟父亲去过天主教堂，那他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教会的观点。但他没有那样做，因此有足够的空间来自己做决定。在先前贝伦森的提案取得进展的时候，里根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在州府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跟记者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和深奥的问题，其中尚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提到了"法律漏洞"，谈及了可依法惩处的强奸罪。然而让他最为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是关于畸形儿堕胎的条款。"对我来说，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在残疾婴儿出生前，就试图断定我们是否有权在出生前决定何种残疾是不允许活下去的，关于这件事，我们的真正立场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已经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严格来讲，这些人都是残疾人。"里根说，法案这一部分背后的逻辑可能会导致杀婴罪。"这儿是否会有人提议说，在他们出生后，我们应当进行选择并排队，决定哪些残疾婴儿应当被杀死，哪些应当被留下？"

记者们问他，假如这一法案通过了立法机关的审查，他是否会否决这一法案。

里根还没有决定好，他说："我还在等待，不会进行评论，直到我看到法案的内容。"

一名记者评述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求堕胎前必须在那个州有住所才可以，并问州长是否赞成这一限制。

里根说他还没有考虑这一点，但听起来这个主意不错。"我不想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州里引起关注。"

记者们又问关于这一法案，州长最看重哪一部分。

"当然是对母亲的保护——母亲的健康和生命——非常坦诚地说，我认为有一点体现了正义的存在——不强迫暴力强奸或乱伦的受害者忍

气吞声。”

他再次被问及他的最终裁决。

他重申道：“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明确的问题，我还无法给你一个答复。”

可能里根更希望这一法案在立法机关就被宣布无效。他并不是妇女权利改革者，但也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未出生婴儿的保护神。无论如何，随着法案向前发展，他逐渐接受了法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我自己内心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从道义上和法理上支持合法堕胎，保护母亲的健康。”他在另外一次记者会上说道。然而，他对畸形儿这一条款还是心存疑虑。“仅仅凭借婴儿生来可能不够完美这一点就剥夺未出生婴儿的性命，我还是无法认为这样做无罪。”他说下一步很危险，那就是在出生后再决定有些婴儿必须死掉。这一点“跟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重复着自己的想法：“你如何来划定这一界线？世上许多重大的成就都是由那些有缺陷的人或畸形儿取得的。”

有人问他是否会否决带有畸形儿条款的提案。

他依然拒绝做出承诺。“关于这一点，不要非让我说得那么具体。我已经跟大家坦诚相见了。”

里根一直希望不要非得做出决定。该法案勉强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然后移送到了州议会。在众议院投票前的几个小时，里根依然拒绝回答他是否会签署该法案。但当众议院以令人惊讶的48：30支持这一法案的时候，里根意识到，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认为选择做出得越早越好。他签署了该法案，说道：“我相信，加利福尼亚人民看到了这种需要，并且支持这一法案的人性化目标。”然而，他的疑虑再次出现在他的告诫中：“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保证这一立法不会让加利福尼亚成为某些人的避难所——他们来这个州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利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

条新法律。”

20

就像沃茨的骚乱帮助共和党人在加利福尼亚州选出了一位州长那样，在其他城市发生的动乱让他们认为可以在两年之后选出一位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夏天成了美国的骚乱季节。随着气温升高，人们的脾气变得暴躁，城市警察也为暴力事件做好了准备。1967年夏天，纽瓦克市在7月初爆发了一次冲突，两周之后底特律爆发了“城市战”。与其他地方的暴力冲突一样，底特律警方在处理一次小问题时遇到了抵抗，随后斗争升级，底特律暴力战争就开始了。在底特律事件中，纵火、抢劫和枪战持续了5天，促使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派遣州国民警卫队、约翰逊总统派遣美国军队。冲突中共有4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数千人被捕，财产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底特律的幸存者惊慌失措，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看着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担心底特律的悲剧可能会在他们附近的城市发生。

形势每况愈下。长期以来，马丁·路德·金一直在宣传用和平手段反对不公平。这位民权运动的主要发言人恳求非裔美国人远离暴力，运用他们来之不易的政治权利。金发现自己在与一些更为好斗的声音竞争，包括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H·拉普·布朗。在加利福尼亚，好斗分子与黑豹党勾结在一起，这是一个由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创建的组织。黑豹党成员抵制金关于不再以肤色分等级的美国未来的设想，宣扬黑人民族主义和自我防卫。他们筹划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全副武装冲入了加利福尼亚州府，抗议他们所谓的警察暴力执法和有选择性的执行武器禁令。

然而，金坚持非暴力的信仰，得到了数百万非裔美国人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相信，在民主发展的框架内，改变是可能发生的。然而，1968

年4月，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当时，暗杀者的动机没有马上搞清楚，因为他成功在逃两个月。但黑人社会的反应非常愤怒和绝望。如果非暴力的倡导者金都能被枪杀，那在现行体制下，还有什么希望来进行变革？

金被枪杀这件事引发了迄今为止范围最大的暴力活动，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了骚乱。芝加哥陷入无政府状态，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在大火中和与警方的冲突中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骚乱的最后阶段恰巧赶上了总统竞选的初选。理查德·尼克松沿袭着他在1960年输给约翰·肯尼迪的老路，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败给了帕特·布朗。一些人认为，他从此会退出政坛，主要是因为他在败给布朗之后曾说过，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但他不动声色地向共和党候选人提供建议，帮助他们募捐，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温和派，可以领导该党走出1964年戈德华特陷入的保守派泥沼。

当约翰逊出人意料地从民主党一方撤出的时候，这一定位获得了极大的价值。约翰逊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这位倔强的得克萨斯人会为保卫阿拉莫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但是，约翰逊常常为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所困扰，在1955年的时候，他差点儿死于心脏病。他深谙政治历史，清楚总统的第二任期少有善终者。在说服国会通过其民权法案、医保法案和其他重大社会改革措施方面，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政治资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但他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另外，在越南的战争进展得非常糟糕，尽管他通过多次决定，向那儿派送了50多万军队和与之相称的资源。1968年年初，东南亚的冲突发生了特别明显的转折，当时开始自新年假期的一次共产党攻势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强势。自此，约翰逊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宣布他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同时，他扔出了政治上的“白毛巾”，称自己不会寻求第二个总统任期。

共和党人一下子看到了通往白宫的一条坦途，不会受到现任者的阻挠。当南方民主党人准备脱离本党，以抗议该党在全国接受民权主张时，形势变得更明朗了。

突然之间，里根开始把自己想象成领导自己的政党到达希望乐土的那个人。他转移了关于竞选总统的询问，说自己在加利福尼亚有太多工作需要做。他同意把自己的名字置于共和党大会的提名之中，但只是作为一名最受宠爱的加利福尼亚州人民之子。这种走形式的姿态可以使加利福尼亚代表团在他候选资格的背后团结起来，因而也就修补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裂痕，这一裂痕自1964年以来一直困扰着加利福尼亚共和党。

但里根开始思考，加利福尼亚人民之最爱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最爱。尼克松缺乏领袖气质，这一点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承认；他的两次失利给他打上了失败者的烙印；他的执政理念受到怀疑，事实上让人难以理解，没有人可以说清楚在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轴心线上他到底站在哪里。里根是一位忠诚的共和党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保守分子。待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唯一可信的保守分子只有他自己了。一个拥有由86名成员组成的加州代表团（大会中最大的代表团）支持的候选人面对任何其他对手都会拔得头筹。认为他可能吸引足够多的额外选票将其推上总统之位的想法，并非痴心妄想。

在公开场合，里根一如既往表现得很腼腆，说自己是“非实际候选人”。但是他让自己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竞选做好基础性工作。当一位民意测验专家发现，在全国有大量里根竞选支持者的时候，里根开始解释自己的弃权声明，使其听起来合情合理。“很自然，听到那种说法我很感兴趣。”他说的是民意测验报告。“我不会躲避，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很明显，我会对其进行评估。”当再次被问到他是否会寻求总统职位的时候，他回答说：“这一职位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对于

那些询问他是否支持那些为他取得候选资格而工作的人们时，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在初选中他吸引了大量选民自填的候选人的投票，那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将一直等着此类事情的发生，然后再做决定。"

里根展开了在数个州的巡讲，看起来跟候选人尼克松做得很像。当他在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演讲时，观众热烈鼓掌欢呼，明显在否定尼克松。此时里根预测，角逐共和党提名的竞赛不会在初选中就定下来，而是会等到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政党代表大会上。汤姆·威克是一名为《纽约时报》撰稿的专栏作家，他在爱达荷州追随着里根，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名政坛竞争者。威克写道："近距离接触里根，会发现他的外表与谈吐都令人敬畏。他反应敏捷，面带微笑，用一连串的俏皮话就可以让观众兴奋，就像喜剧演员鲍勃·霍普一样……他不经意间就可以开始指责大政府、社会福利、街头犯罪、美国外交政策以及政客们。在他结束对所有这些暴露的政坛敏感事件的演讲之前，他的观众会为他那句无关痛痒的话欢呼（'时代急需政治领袖'，这是他昨天晚上说的，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威克并没有打算说爱达荷州是全国的排头兵，但他引用了一位可靠的大会代表的话："你越往西去，就越接近1964年的情形。"威克用自己的话描绘了一个场景，这一场景可能会让代表大会把注意力转向里根。"此刻有一种可能是，一位支持尼克松但还没有正式答应支持他的代表可能会由爱达荷州选举出来……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14位代表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是在1964年支持过戈德华特的共和党人，他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到里根的阵营，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或许在迈阿密海滩的第二轮或第三轮投票中。"

里根继续像候选人那样进行竞选活动。美国报业协会的年会刚好在洛杉矶召开，里根在会上说："国家已经完全失控了。"当前的政府和主要的民主党候选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都在鼓励人民期盼着不劳而获，却提不出任何建议去阻止发生在美国城市中的暴力活动，阻止美国海外可信度的削弱。里根继续说道："在这样一个期望值

升高的时代，文明完全无法应对蛊惑民心的政客；它也无法应对那些预言家，他们叫嚣着通往乐土的道路存在于盗抢燃烧后的城市瓦砾之上；文明也无法应对那些政客，他们坚决要求社会保障必须增至3倍，对于如何让这种不可能变成现实却拿不出任何计划；他们要求必须抛弃在越南的国家责任，为的是可以把从越南转移过来的钱用来在城市贫民窟中提供大量为就业而安排的工作；他们要求年轻人不一定非要应征入伍；黑人不一定需要遵守法律……这是为世界末日准备的宏伟计划。”

世界末日在6月来得更近了，尽管对里根没有益处。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正在庆祝在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初选中的一场关键胜利，此时在洛杉矶国宾饭店的一个陌生人来到他跟前向他开枪。肯尼迪一天后死亡。这次刺杀似乎印证了里根关于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的怨言，但出于政治需要和慎重考虑，里根或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试图将这一事件转化成个人收益的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从中收益，那也是最接近政治核心的候选人，这些人最不可能唤起强烈的热情。

尼克松依然无法让选民兴奋，但他也没有让选民害怕，并且现在他为其他共和党人所做的工作开始显露成效了。他在一些不大的州里接连取得初选胜利，几乎累积了足够的代表数量，可以让他在代表大会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排在第二位，里根第三。洛克菲勒本来以为，如果有人会从尼克松的失败中获益，那这个人一定是他，而不是里根。无论如何，洛克菲勒的代表们更喜欢尼克松而不是里根，就像里根的代表们更喜欢尼克松而不是洛克菲勒一样。

尼克松在里根之前就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平衡。随着代表大会的临近，里根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位候选人了。“我不认为提名是为哪位候选人特意锁定的，我坚信这是一次开放的、没有限制的代表大会。”里根在电报中对他手下非正式的竞选委员会主席这样说道：“我的名字将出现在提名中，很显然，到那时候任何一位代表都会把我看成一名候选

人。”为了防止人们继续怀疑他的参选可能，里根补充说：“我从没有同意谢尔曼声明”——在声明中，内战英雄威廉·T·谢尔曼曾说过，如果被提名，他将不参选，如果当选，他将不就职。“我确实认为任何公民的回答必定都是截然相反的。”里根的支持者们到处宣扬说，尼克松在南方得到的支持不够坚定。一位支持者说：“这些代表依然在观望。”另外有个人说，如果尼克松不能在大会开始时获胜，那他根本就不可能获胜。“领先者不能泄气，否则就死定了。”

尽管如此，里根保持了表面上的非实际候选人的做派。他说：“我不曾申请，也不会申请。”然而，他去南方地区寻求代表支持。在伯明翰，他会见了大约100名代表和候补代表，努力要让他们放心——即使背叛尼克松，也不会把提名拱手让给洛克菲勒。一位代表问里根，假如最后的角逐是在尼克松和洛克菲勒之间，他是否会支持尼克松。里根的回答转弯抹角：“这在我看来简直匪夷所思——那些支持迪克[注]或者支持我的人会去支持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得克萨斯州，他被问到假如他获得提名，他是否会比现在更坚定、更公开地展开竞选活动。里根回答说：“我不会做个被动的候选人，我会拼命竞选。”在南卡罗来纳州他遇到了斯特罗姆·瑟蒙德，此人之前是民主党人，现在是共和党参议员。他把里根拉到一边，给了他不太受欢迎的鼓励：“年轻人，有朝一日，你将成为总统，但不是在今年。”

洛克菲勒的顾问们因为里根越来越公开的竞选活动而精神大振。他们认为，尼克松在南方地区的支持不够坚定，希望里根会在代表大会开始前窃取一些支持尼克松的代表。这样一来，尼克松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无法取胜，而他的弱点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到时候，代表大会就会变得完全开放而没有限制。”洛克菲勒的一个手下预测说。

里根和洛克菲勒都前往迈阿密去削弱尼克松的力量。洛克菲勒一伙儿继续虚报忠于尼克松的代表数量，而里根的人一边回顾着他于1964年

演讲的奇迹，一边试图瞒天过海，让里根出现在全体代表大会上。

但是，尼克松展现出了长期从政的经验优势。他让南方人知道，自己不会选择一位自由派作为竞选伙伴，并说服少数受拥戴的当地候选人，不要把他们的代表推给洛克菲勒或里根。更关键的是，他让里根退出了竞争舞台。

尼克松的代表们坚定不移，里根和洛克菲勒阵营所希望的倒戈事件并没有发生，尼克松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赢得了多数。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尼克松才让里根出现在镜头前。他允许里根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建议说，必须全体通过决定。

里根的做法符合人们对他的期望。他说既然共和党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支持被提名者。“如果现行的这种领导我们的政策再继续4年的话，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代表们高声喊叫着表示他们的支持，尽管很难讲清楚有多少人是在支持这句话的内容，又有多少人是在支持讲话者。

---

1. 理查德的昵称。——译者注

21

对于一个对大学生活充满感情的人来说，里根从抨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或许，就像在政坛某些其他领域一样，他是在弥补因成熟而抛弃的年轻时代的自由主义。同样，他记忆中对于尤里卡学院的那种感情是其他任何大学所无法比拟的，或许他讨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那种知识精英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精英主义十分挑剔，这让像他自己这样的学习成绩居中的学生很难被录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是反对尤里卡学院的管理，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里根特别高兴可以攻击加利福尼亚的王牌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作为候选人竞选州长时，里根说道："在那所大学中，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很认真，希望学到知识。但校方优柔寡断的管理使得少数'披头族'、满嘴污言秽语的人和不满现状的人得以破坏这一希望。这部分人中的少数人让学校蒙羞。"如果想要清理整顿伯克利分校的乱象，恢复高等教育的声誉，那么该州就需要一位新州长。

清理整顿开始的时间比里根预期的要早。克拉克·克尔曾是伯克利分校的名誉校长，当时担任加州大学校长。他很自然地认为，里根的批评是指向他的。在里根就职州长的时候，他要求校董会进行信任投票。里根凭其职位，理所当然地成了校董会的一员。包括里根在内的几名校董会成员都对克尔处理伯克利动乱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大家不想在当场弄得太尴尬。让克尔和里根感到惊讶的是，在后者的第一次校董会会议上，克尔就被解雇了。

在校董会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里根对此事的免责声明，因为这件

事在时机选择和最后的结果上都恰到好处。加利福尼亚和全国的自由派人士对此愁眉苦脸，担心美国公共高等教育王冠上的那颗明珠正受到里根和无知者的威胁。当里根的第一份预算计划大幅削减对大学的投入时，他们痛心疾首。尤其是加州的自由派人士，他们抨击里根开始收取大学学费的提议。不收取学费的政策与其说具有实质意义，不如说是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数百美元的入学费用有助于解决其他州的学费问题，但其象征意义对许多加州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一直引以为荣，说即使家庭条件最一般的学生也可以接受这个国家最好的高等教育。里根回击说，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诚实是政府的最佳政策。如果入学费用等同于学费的话，那它应当被称作学费。在目前州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下，必须提高学费。

里根的建议引发了新的抗议，这一次直接针对的是他本人。上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突然来到萨克拉门托，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反对洗劫学校来平衡你的预算”“弹劾罗尼·里根”，“卑鄙！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当天，按计划里根本来要到俄勒冈州的，但他推迟了行程，与抗议者会面。“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错过这件事的。”他告诉威廉·克拉克。他让示威者在办公室外排队等候，然后克拉克陪着他出去与抗议者见面。克拉克后来回忆说：“我们穿过两道门来到台阶上，那个学生领导模样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没有看到我们来到跟前——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背对着我们——但大群的观众看到了州长，他们惊讶的表情告诉那个讲话的家伙他身后有事情发生。他转过身来看到了州长，震惊之余，出于礼貌把麦克风递给了州长。”

“在我去往俄勒冈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里根对学生们说道，但他们根本不觉得有趣。他们看过他的行程计划，正希望他不到场呢。“喂喂，你们说什么？罗纳德·里根逃跑了！”在他现身之前，他们一直在反复地喊着。在里根解释自己改变计划的时候，他们嘘声一片，试图把他哄下台去。“我想，任何带着诉求来到州府找州长的公民团体都不希望州长不在。”里根说道。当嘘声倒彩继续不断的时候，他

说道："我想我所能说的一切都无法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放开成见，明白事理。"他强调自己希望把政治排除在教育之外，但补充道："加州人民心甘情愿为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表达思想和原则的某些权利，这些思想和原则符合他们资助的教育。作为州长，我永远不会把政治因素注入校董会，但作为州长，我一定会代表这个州的人民。"

里根和杰西·昂鲁达成的妥协预算，避免了对大学实施最严厉的投入削减，也推迟了关于学费的决定，但高等教育依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旧金山州立大学的非裔美国学生成立了一个黑人学生会，该学生会在1968年领导了一次罢课，反对大学管理，反对里根和州政府，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大众的剥削。此次罢课和围绕罢课引发的暴力活动造成了财产损失，导致作恶者和路人被捕，学校校长辞职。继任者是语义学教师S·I·早川，他戴着一顶宽顶无檐圆帽来上班，承诺要把好斗分子组织起来协调一致。在提到自己的时候，他这样说道："对有些人来说，你是一个英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你是一个浑蛋。"

发生在旧金山的罢工事情挑起了伯克利整个海湾地区的激进分子与之呼应。1969年2月，一个自称是第三世界解放阵线的组织试图关闭伯克利分校，上课的学生受到威胁，有些还遭到攻击。

里根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宣布伯克利分校进入"极端紧张"状态，派遣州里的部队协助当地警方。"我们正在扭转旧金山的局势。"他说得有些草率，"他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在被问及军队要在学校和附近驻扎多久时，里根回答说："视需要而定。"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必须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生命安全，保护学校财产安全。校园不能有暴力、危险和恐吓。"

几周后，学校财产成了导火线。为了未来的发展，伯克利校方曾在

校园南面得到一处地产，但在1969年春仍处于闲置状态。一个嬉皮士联盟——一群反文化的、宣扬爱情、和平和毒品的辍学者——和政治激进分子们决定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嬉皮士们想要种花和蔬菜，而激进分子们希望种下对抗的种子。他们一起将其命名为"人民公园"，宣布这将是在新型产权关系上的一次勇敢的实验。

里根不太在意这些嬉皮士，但迫切想要接受激进分子的挑战，就像他们迫切地提出这些挑战一样。他在竞选总统活动中不同一般的表现让他付出了代价，被人认为是没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他同激进分子一样，也在寻找一次机会来证明自己。校方不希望发生他们本可以避免的对抗。里根越过这些校领导，下令清除该地方的所有非法人员，并竖起栅栏，禁止再有入侵者进入。

里根和激进分子都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而且还不止于此。5月15日黎明前，大约250名加州警察到达现场，命令所有那些正在公园内睡觉或闲逛的人员离开。所有人都照做了，除了几个因为吸毒过量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人，他们被拖走了。警察在公园周围封闭了几幢楼，防止其他人接近。之后不久，来了一辆推土机，开始在这一地区周围平整路面，准备竖起栅栏。等到了中午时分，栅栏完工，这一地区安全了。

但安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与此同时，一大群人正在学校中心地带斯普劳尔广场集结抗议。学生领袖声讨查封人民公园的行为，将其看作导致了在越南的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美国的公民权利的法西斯政策。一位演讲者最后号召大家重新夺取公园。人群开始反复高喊："夺回公园！夺回公园！"他们沿着电报大街向公园进发。

在距离目的地几个街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警方封锁线，一些示威者开始扔石块，另外一些人开始扔水泥块和金属块。一个有明显示威经验的人用一把超大的扳钳打开了一个消防栓，顿时满街一片汪洋。警方用催泪瓦斯回击，之后开始开枪。至于大部分枪里装的是猎鸟用的子弹——很轻的那种小子弹，可以造成伤痛，但只要不击中目标的眼睛和面

部就不会造成严重伤害——还是更厉害、能致命的大号铅弹则成了事后争论的焦点。事实上，人群中有一个人被打瞎，另有一个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当混战的消息传到萨克拉门托的时候，里根命令州国民警卫队赶到事发地点。等他们到达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但部队留在原地，在附近实施宵禁。

里根为自己和当地政府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在回顾一系列导致骚乱的事件时说道："在清除了那处地产上的人员之后，发生了暴徒的暴力活动，额外的警力被调集到事发现场。当天警方遭到了来自一群精心准备的武装分子无缘无故的猛烈攻击。这伙人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和投射物，包括钢条、砖块、大石头、水泥块和铁管等。持不同政见者手持铁棍、石块和水泥块站在消防通道和房顶上，劈头盖脸地向警官砸了下来。一位警官被扔过来的匕首刺中胸部。"里根说，警方用催泪瓦斯和打鸟用的子弹进行了适当反击。"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对使用致命武器穷凶极恶地攻击的回击。"他对游行者的受伤，尤其是对其中一位名叫詹姆斯·雷克托的25岁年轻人的死亡表示遗憾。然而，责任并不在政府，而在那些"街头帮派"和"校园激进分子"，是他们组织了"整个革命企图"。加州人民需要明白，像这样的示威游行不是无知的恶作剧。"我们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大学男学生突袭女学生宿舍，抢夺女生内衣为战利品的胡闹行为呢？"

里根的话并无助于平息形势。伯克利爆发了更多的抗议示威，促使警方在里根的同意下，动用一架直升机在示威者上空喷洒催泪瓦斯。一支愤怒的伯克利教工代表队前往萨克拉门托要求见州长。当里根邀请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们痛斥里根对他们的城市采取的军事占领，要求解除封锁。

里根立场坚定，他向教授们和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现场1000名观众听了他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的演讲，更多人

通过电视收看了演讲。“在过去的11个月里，伯克利爆发了4次严重的骚乱。”他解释说，“所有这些骚乱都有来自南部校区——电报大街和人民公园——激进分子的参与。在这11个月里，发生了8起严重爆炸或爆炸未遂事件，逮捕了将近1100名吸毒者，仅在南部校区就有750名。”他说，警方和国民警卫队没收了大量炸药和数百支枪械，它们还没来得及使用。“已经发生了数十起纵火事件，造成了80多万美元的损失……一名警察遭到伏击被射中，另外还有12名警察遭到枪击。”5月15日的大骚乱只是其中之一。“这不是一次自发的爆发。房顶堆满了石块和其他投射物。”只是在现场警察失去对骚乱的控制之后，阿拉梅达县的警长才派副警长带着霰弹猎枪赶到现场。“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不得不跨过受伤警官的身体，这些警官无法得到帮助或者无法被转移，因为剩下的几个站着的警官正遭受猛烈的攻击，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拼命地保住性命。”

里根对抗议示威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动机进行了区分，他说：“占领那处地产的领导者明确表明，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政治性的，他们在挑战这个国家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追随者大部分是动机单纯的学生，他们因为文化和大学的一些做法而心生不满。他们希望能从时代伟人那里得到收获，结果却发现自己深陷教学助理们所实施的海量课程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流水线上的无名小卒——一边是新生制服，另一边是毕业典礼礼服和自动化的文凭。他们希望有人知道他们在那儿——即使他们不在那儿的时候，也不会被错过或记录成缺席。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是学者，他们大都忙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里根同情学生，反对激进分子和教职员工。“这一代的学生信息更为灵通，更有觉悟，理应得到的更多。”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全州都会遭殃。“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与这些受到挫折的学生建立起联系，在他们由于疏忽而转向暴徒之前，一起找到解决办法。此时此刻，在加利福尼亚，真正的危险正在发生。”

里根通常愿意与抗议者进行交往：与诘问者们相互进行语言攻击，彼此不相上下，但有件事使他不安。他跟记者们谈起了到大学参加校董

会的一次经历。“我记得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站在学生中间，当我走向汽车的时候，她一直在喊‘去你的，去你的’。事实上，她在向我吐口水。我走到她跟前，问她想过没有，等她再长大几岁之后，是否会为她的行为感到惭愧。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骂了一句‘去你的’。”

22

随着夏天的到来和大部分学生的离校，伯克利的问题慢慢缓解下来，但重新开始的抗议活动构成了里根1970年竞选连任的背景。这次的热点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与抗议活动相比，这所大学以党派活动著称。激进分子拒绝让冲浪者形象和作战的警察凌驾于大学政策之上。他们随之把自己的战斗延伸到附近的埃拉维斯塔社区，他们在那儿包围了美国银行的一家分行——军企综合体的最恰当的象征。

里根再次做出快速反应，飞到圣巴巴拉与抗议者见面。里根称其为“懦弱的懒汉”，宣布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并召集美国国民警卫队。

里根的行动遏制了暴力活动的扩张，但没有缓解其根本原因。里根认为，他清楚原因所在：一小撮革命分子希望让大学社区的其他人成为激进者，刺激警方和州政府采取武力行动。大学中的一些人同意这一点，并说他使用武力的话，就正中激进分子的下怀。但里根拒绝改变主意，宣称说：“绥靖退让不是办法。”激进分子不希望解决问题，只想搅乱局势。倘若他们不谨慎小心，那么激进分子就可能如愿以偿，并且得到的更多。“如果这是一场血雨腥风，那就来吧。”

很快，里根就后悔自己说了“血雨腥风”这样的话。当天晚些时候，他缓和了自己的说法。“现在，我们必须咬紧牙关，打个比方说，或者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知道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他说道，“我当然不希望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出现血雨腥风。”

“咬紧牙关”这种说法也没有太大改进，一些评论卷土重来，困扰着里根。暴力活动再次在埃拉维斯塔社区爆发，冲突中一位名叫凯文·莫

兰的学生被杀死。杀他的显然是一名警察，本来瞄准的是别的地方。

这次枪杀事件对里根的震动很大，他强忍泪水对记者们说道："子弹来自何方并不是关键，几年前，当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团体决定要将法律置于自己手中的时候，这颗子弹就已经射出去了。任何支持并煽动他们的人都同样有罪。"里根呼吁大家记住凯文·莫兰，并再次号召结束暴力冲突。"假如他的死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希望这可以让那些所谓的大多数沉默的学生、教师和校方清醒地反思一下，得到一些常识，认识到自己的立场并且说'结束这一切吧，不要再参加集会，不要再用同情的话语来支持那些诉诸此种暴力的人'。"

圣巴巴拉的麻烦没有立刻结束，但它被那个春天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更大的抗议示威活动所掩盖了。当理查德·尼克松下令入侵柬埔寨的时候，美国高校师生都情绪激动了。总统的战略目标是要拒绝承认越南周边中立国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避难所。其政治成就就是，与以往相比，鼓动起更广泛的国内抗议示威活动。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向示威者开枪，射杀了4名学生，打伤了数人。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大学，警方射杀了2名学生，打伤了12人。

假如民主党有一位更有力的候选人的话，那么发生在加州的校园暴力活动很可能会让里根的竞选连任活动变得复杂起来。杰西·昂鲁试图从众议院一跃登上州长位置，但他无法摆脱自己在立法机构中"太上皇"的恶名。他的竞选活动磕磕绊绊，没有募集到足够的钱来有效地挑战现任者。

里根凭自己的政绩来竞选：平衡预算，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对抗激进分子的挑战。后一个角色在伯克利和埃拉维斯塔社区枪击案发生以后，受到影响，失去了些光彩。一些选民询问政府是否走得太远，但其他人则支持里根的观点，认为死亡的责任在于激进分子，而不在于政

府。

他还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用主义者参加竞选。加利福尼亚大学校董会在设法弥补一些里根建议削减的税收之后，接受了里根的要求，学生开始缴纳学费。当新预算在立法机关陷入僵局之后，里根是妥协的一方，他不再反对预扣州里的个人所得税。在承认自己之前曾说过，在预扣所得税这一问题上，自己的立场像水泥般坚固的时候，里根开玩笑地说：“你所听到的声音是我周围的水泥开始破裂的声音。”

选民们喜欢里根的原则，也喜欢他的实用主义，只是他们不再像4年以前表现得那么有热情了。他的得票率从当时的58%下降到53%，他比昂鲁多出的选票数只有当年战胜帕特·布朗时的一半。然而，胜利终归是胜利，里根对此欣然接受。

23

里根在民调中的下滑趋势让他在全国的吸引力也有所减弱。鉴于尼克松稳获1972年的再次提名，共和党直到1976年才会寻找总统候选人。等到该党真的开始寻找时，不一定还会寻找保守派分子。尼克松让选民和权威人士感到迷惑，因为他说起话来像是保守派，但行动起来像是自由派。他于1968年的竞选主题“法律与秩序”吸引了保守派和其他被大城市的骚乱和反主流文化的放任自流搞得焦虑不安的一些人。而他在美国国内政策中的表现，即他所谓的新联邦主义，看起来是在改变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中的中央集权趋势。但这一表象，就像尼克松在许多事情上一样，蒙蔽了世人，因为新联邦主义的本质是，华盛顿方面把钱赋予各州自行支配使用。华盛顿可以收回它所给予的。

在某些方面，尼克松甚至连假装是保守派都不愿意。他推行环境改革，其力度比自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的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大。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限制汽车和工厂废气排放的权力。同年，美国环保署成立，推行空气法案和相应的立法，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同时还公布保证书，对环保署自身的权力进行了全面的规定。1971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成立，把联邦政府的触角伸进了这个国家几乎每一名雇员的事务之中。尼克松政府是第一个在种族问题上推行平权法案、将其作为联邦政策的政府。他的劳工部采用了一个计划，意在纠正从费城到全国其他城市中的种族歧视问题，规定了为联邦政府工作的承包商雇用黑人工人的最低数量。尼克松增加对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资金投入，还向那些努力遵守法庭秩序的校区拨发联邦资金来废除种族隔离。

尼克松最大胆的创举，同时也是他最为自由派一面的体现，或许也

体现了尼克松最为保守的一面。这当然是他最让人不解，既得到自由派也得到保守派支持，又遭到双方共同谴责的行为。“家庭援助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对贫穷家庭提供的联邦资助更加高效，费用更低。这一方面吸引了保守派，包括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此人帮助制订了该计划。但另一方面这一计划的实施需要借助“负所得税”手段——联邦政府向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提供资助——不需要社会福利支付方面长期以来要求的那些需要负法律责任、常常让人难堪的调查。这一点吸引了自由派，同样吸引他们的还有一点，即这一新计划的功效将扩大其覆盖范围，达到数百万人之众，尤其是此前并未覆盖到的儿童。

倘若里根听从尼克松的领导，支持“家庭援助计划”，那么他就会免去自己的许多麻烦。里根把社会福利改革当作自己第二任州长任期的重点，主要是因为加州接受救济金的福利救济人员数量不断上升，有可能破坏他在平衡州政府预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里根抨击了那些社会福利骗子，他们游手好闲，靠那些诚实纳税人的慷慨援助为生。他煞费苦心地指出，这些人剥夺了他所认为的那些真正应当得到帮助的人的需要。他在第二任期开始时承诺要改革福利制度，他说：“在得到条例和联邦法规的许可后，社会福利快速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无法满足的庞然大物。为了满足其胃口，我们节省开支，甚至去除了基本的公共服务。”自由派希望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填补资金缺口。里根说这种办法是一个无底洞。“除非我们可以勇敢面对，并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明年、后年以及大后年——直到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增加税收。”

在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之后，国家经济进入了轻度衰退时期。里根承认，经济衰退对加利福尼亚的州政府预算造成了危害，但他拒绝承认由于经济下滑和之前几年令人不安的事件而让许多美国人感受到的那种悲观。他对加州人民说：“那些抱怨病态社会的人们并不是

在谈论我们。我们这个年轻的民族正在追寻一项事业，人们可以将其理想、青春和力量投入其中……正如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的：‘贪图享受的懒汉是不会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他们待在家里。’”乐观主义正在成为里根政治上的标签。他总结说：“是时候忽略那些沉溺于错误中的人了。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到正确的事物上来——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力量和潜能有多么强大，而那些让我们恐惧的事物是多么渺小。正如去年秋天，我向一群来到州府的同胞们说的那样，如果把加利福尼亚面临的问题和加州人民一起放在竞技场角逐的话，那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里根向立法机构提交了一份详细的福利制度改革方案，该计划的双重目标是，剔除福利名单中不应得到福利待遇的那些人，增加那些确实无法供养自己的人的救济金数额。批评者指责里根铁石心肠，对经济衰退反应过激。立法机构中的民主党领导人倾向于把社会福利问题递交给联邦政府，依照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来解决。

尼克松的条件很诱人，但里根拒绝了。他说，有保证的收入集中体现了自由派执政方针中的所有错误。“我认为政府应当提高公共福利。”他讥讽道：“而不应当提供福利。”

里根的反对没有得到尼克松的青睐，却引起了美国总统的注意。迈克尔·迪弗回忆说：“尼克松派出几个人与里根商议，让他停止福利改革。”但是他们失败了，于是尼克松亲自来解决这一问题。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有处住所，他偶尔去度假。有一次，他到西部访问，邀请里根到家里做客。尼克松很直接地跟里根提出一笔交易：州长缓和其对“家庭援助计划”的批评，而总统将会大幅放宽联邦福利规定，允许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实验，看一下对于符合条件的福利支票领取人的工作要求。

里根显然接受了这一交易，因为他的批评减少了，实验继续推进。同时，针对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改革，他全力对付以州议会民主党发言人

鲍勃·莫雷蒂为代表的立法机关。有一天，莫雷蒂要求见州长。“我记得他坐在办公桌前，我坐的位置的右手边有把椅子。”莫雷蒂后来提到此次会面时说，“州长说道：‘嗯，你想跟我谈什么呢？’我说：‘你看，州长，我不太喜欢您，我也知道您不喜欢我。但作为同事，我们不一定非要彼此喜欢。假如您真的想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坐下来开始做吧。’”

他们真就这样做了。两人对各自的工作都很认真，也都明白需要彼此的帮助。莫雷蒂可以拉来那些控制立法机构的民主党人的选票，而里根则可以左右共和党人，拥有否决权。两人都恪守原则，但都不是纸上谈兵。第一周，他们每天见一次，第二周，里根的助手与莫雷蒂在立法机构中的国会议员及其助手们碰面。

最终达成的法规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民主政治，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改革没有让任何一方欣喜若狂，却极大地改变了现状。法规强化了获取福利待遇的条件要求，减少了数万名救济金领取人，而保留在名单上的那些人的救济额度增加了，更准确地反映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费用，纳税人也省下了数十亿美元。

里根第二任期内的第二项法规几乎让里根同样感到自豪。几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上升，抬高了地产税，这对退休人员和其他那些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的房主来说，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里根希望提供救济。同时，他和州里其他的当选官员发现，他们自己根据法庭命令，需要使州里的教育支出更为公平合理，而其中大部分支出来自地产税。乍看起来，进行地产税补助的愿望和教育支出均衡的需要是相互矛盾的，但在经历了最初的失利之后，里根与莫雷蒂成功地达成了另一项妥协。这一法规降低了地产税，同时增加了州里对于学校的支持力度，尤其是那些位于比较贫困地区的学校。

尼克松的社会福利计划进展得远不如里根的好。尼克松为此在国会

努力了两年，然后在1972年大选之前将其搁置到了一边。不管怎么说，尼克松还有其他重要的事务要处理，首当其冲的是，要大胆调整自冷战开始之后的国际事务。

事实上，理查德·尼克松就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政客，他心中想的就是，要把国际上的麻烦转变成对美国有利的因素。他清楚，敌人的敌人如果不一定能成为朋友的话，那至少可以成为有利用价值的伙伴。他希望可以说服中国和苏联，减少它们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结束那里的战争。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尼克松希望增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但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美国人一向认为，自己国家的政策植根于原则之中。25年以来，他们一直被告知，也一直在告知自己——美国在冷战中的敌人是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都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也没有接受上帝。但不管怎样，尼克松希望与它们合作。

尼克松的行动神秘异常。他派遣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前往巴基斯坦，表面上是执行一次普通的外交使命。在卡拉奇期间，基辛格诉苦说，自己跟许多旅游者一样，坏了肚子，要求随行记者放几天假等他康复，并保证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新闻。随后，他悄悄搭乘一架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出现在北京。在北京，他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人分别是“红色中国”的领袖和中国最出色的外交家。基辛格表达了美国人民的友好，希望开创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他们的反应也是如此。

尼克松称，向中国敞开大门是“20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为尼克松安排了亲自访华的行程，他在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汇报时说道：“我们为您和毛泽东开启历史新篇章做好了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开启的程序，在全世界掀起了滔天巨浪。”

正如尼克松希望的那样，这一滔天巨浪对莫斯科的震动最为强烈。

尼克松估计克里姆林宫方面也会合作，以防美国与中国走得过近。事情也就是这样发展的。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来到北京，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善，要求朝着两国的共同目标快速发展。他引用了毛泽东诗词中的一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又用自己的话说道："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高峰的时候了。"

克里姆林宫方面一直在倾听，这一点在3个月后，当尼克松达到莫斯科的时候，变得很清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同意签署了冷战时期第一个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ALT）。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在反弹道导弹防御方面放弃军备竞赛。反弹道导弹条约严格限制导弹防御。勃列日涅夫还在相当于冷战停火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停火协议被称作缓和紧张局势之举，其中的12项基本原则一开始就宣称，在核武器时代，除了和平共处，没有其他选择。尽管双方信仰不同，美苏将在"主权、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关系正常化。随后的原则逐字强化了这一和平共存方针。

每一次革命都必须要与反对力量进行斗争，尼克松倡导的在全球事务中缓和紧张局势的革命也不例外。但在反对力量组织起来之前，尼克松在1972年的大选中轻松获胜。民主党很难吸引强有力的候选人进入到初选中去，而尼克松则看起来令人敬畏，因为他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表现得游刃有余，对于美国外交工作的处理也相当智慧。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民主党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名该党在现代历史上最为弱势的候选人。没有人认为乔治·麦戈文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但南达科他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总统人才。麦戈文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这部分人一直决定着总统角逐。共和党人讥讽他是个"三A候选人"，是"迷幻药（acid）、特赦（amnesty）和堕胎（abortion）"的代言人，指的是据说他很招嬉皮士的喜欢，主张原谅一些拒绝在越南战争中服兵役的人，以及他承诺支持堕胎权利。麦戈文看

来铁定成为民主党1972年的人选，就像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那样——一场原则性的灾难。在这之前，麦戈文几乎从没有被提名过。

然而，尼克松想要的不仅仅是胜利，他想要的是压倒性的胜利。他开始变得狂妄自大，支持竞选团队对民主党采取肮脏的手段。尼克松后来说，在国防部文件（涉及越南战争的机密历史文件）遭到泄露和公开之后，他曾担心国家安全。但尼克松白宫方面启动的政治谍报活动做得太过火，不仅仅是要堵住泄密渠道。当5名政府特工于1972年6月在华盛顿水门大厦办公室被捕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尼克松否认提前知道这件事，他的否认持续时间很长，长到足以让他获得对于麦戈文的巨大胜利。他在49个州胜出，得到了61%的普选选票。

这种压倒性的胜利看起来是对政治中温和派的不可否认的支持。1964年，美国选民拒绝接受戈德华特死板的保守主义；1972年，他们又拒绝接受麦戈文悲天悯人的自由主义。尼克松仿佛已经发现了神奇的中间立场。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保证他们不再遭受早年的贫穷和生病得不到治疗的窘境，希望政府能够清洁空气和水源，保证工作场所安全。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应当保护少数裔不再遭受公开的歧视。然而，他们并不希望政府为他们大包大揽，什么都做，更希望自己能做的自己动手来做。政府不是他们的敌人，但也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最主要的是，美国人拒绝接受来自左翼或右翼的煽动，拒绝接受对现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从他们接受其貌不扬的尼克松这一点来看，他们并不接受具有超凡魅力的人。

然而，几乎就在尼克松要第二次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的总统职位开始动摇了。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联邦法官拒绝接受这伙儿水门盗贼的有罪答辩，于是他们开始谈判。证据线索指向白宫，紧接着，经过国会的调查，线索直指总统办公室。其貌不扬、低调中庸一直是尼克松的特

征，而今却成了他垮台的原因，因为没有热心的崇拜者团结起来维护他。共和党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抛弃了这位总统，直至最后，他几乎是独自一人站在那儿面对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听取了他关于保留白宫谈话重要录音的请求。当法院否决了尼克松的请求时，众议院着手准备弹劾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一职，把白宫拱手让给了杰拉尔德·福特。

24

就在那一天，里根看到了州长之后的生活的希望。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从没有被误认为是尼克松那样的温和派。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没有禁止竞选第三任期的规定，但里根不希望被看作一个职业政客，更别说被看作一个州长办公室的元老了。如果说离开萨克拉门托之后，有一个适合里根的公共角色的话，那这个角色要么是在华盛顿，要么哪儿也不是。在尼克松垮台之前，没有任何地方看起来是更有可能的选择了。

在离开州长官邸一个月之后，里根就64岁了。这个年龄足以让他从全职工作中退休，然后，利用从演讲和公司董事会的工作中赚到的钱，他和南希可以过上自己希望的舒适生活，但里根还想要一个舞台。此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唯一对他还有吸引力的就是总统一职了。

尼克松的辞职马上让他意识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从萨克拉门托通往华盛顿的大门突然之间敞开了。尼克松将不再能够选定一位温和派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可能成为共和党提名的热门人选，但福特在上任几周之后，就因为抢先赦免尼克松而给自己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民主党和许多共和党人私下里悄悄谈论着这笔幕后交易：用总统宝座来换取赦免。那些了解福特的人不相信这一指责，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它造成的伤害。

1975年1月，里根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交给了帕特·布朗的儿子。这一传承意味着里根在这个州的影响可能会很快消失，因为与里根

相比，杰里·布朗更多地继承了自由派的衣钵。或许布朗的当选完全是在提醒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些人，里根的执政风格一直比他的演讲风格更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

里根不得不再次想办法来填补自己的空闲时间。当然，他可以在1976年竞选总统，但不能显得太急切，而需要看起来忙碌，有收获。牧场生活在召唤，于是他就响应这一召唤。大约在当选州长的时候，他就卖掉了马利布的牧场，因此，在准备离任的时候，他和南希又购买了另外一个牧场，位于圣巴巴拉北部的圣伊内斯山区。他们称其为德尔谢洛牧场——意为空中牧场或天堂牧场——里根花了大量时间来翻修房屋、改良将近280多公顷的土地。

当州长耗费了里根大量的收入，但当了8年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的州长使得他在巡回演讲的舞台上更具魅力。卸任州长一职也让他再次从事其广播事业。他收到邀请，请他做电视评论员，但他选择了无线广播。迈克尔·迪弗非常惊讶，他回忆说："沃尔特·克朗凯特给我打电话，我很吃惊，他说他打算让里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中，每周做两次5分钟的评论工作。我想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晚间新闻这档节目，每天的收视人群有3000万或4000万。之后，一个来自好莱坞的名叫哈里·奥康纳的老家伙出现了。他是广播节目制片人，当时手里没有任何活跃的客户。他来见里根，告诉他可以让他上电台的一个每天5分钟的节目。这样一来，就需要做决定了。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像扣篮一样轻松的决定。里根说：'我决定上电台的节目。'我问：'为什么？你不去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不，我不做晚间新闻栏目。'我说：'我不相信，难以置信。'他说道：'迈克尔，人们看到我上电视会烦的……我上电台他们不会感到厌烦。'"

迪弗后来承认，里根是正确的。"在1980年年底，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时候，我们每天通过电台向大约5000万人发表讲话。在一些关键城市，比如纽约、洛杉矶，我们每天对他们说两遍，都是在早晚上下

班的时间。”迪弗回忆说，有一次，当时的前副总统（后来获得1984年民主党提名）沃尔特·蒙代尔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真的认为广播节目对里根获得提名有帮助吗？”迪弗回答道：“我认为密切相关。”蒙代尔说：“好吧，我在考虑我自己也这样做，上电台做节目。”迪弗说道：“那很好，不过副总统先生，我只想告诉您一件事：每一期的广播节目都是罗纳德·里根自己写的稿子。”蒙代尔说：“你在骗我吧。”迪弗答道：“没有，他不让任何人来写这些稿子。他会让皮特（汉纳福德，一名工作人员）为他写报纸专栏文章，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会把演讲稿写得更好。”

当里根预测说人们会讨厌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陷入那种年老色衰的演员担心自己外貌的虚荣之中。他的头发依然乌黑——天生就是这样，他跟每一个问他的人都这样说，他的理发师也从没有反驳过他，但他的面部和脖子出现了难以避免的皱纹。他明白，自己的年龄是竞选总统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想把一张衰老的脸呈现在公众面前。

对于自己的外表，里根可能的确没有办法遮掩。作为公众眼中的人物，他无法避开镜头，但他尽量少拍静态照片。迈克尔·迪弗注意到，一有剧照师靠近，他就紧张。迪弗回忆说：“最后，有一天我问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带来一个静态照相师，我总能看到您脖子后面变得僵硬？’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些的人。迈克尔，静态照片会让我彻底完蛋的。’”电视画面转瞬即逝，不佳的形象一闪而过，可是静态照片就不是这样了。里根说：“静态照会让我彻底毁掉形象的。”

然而，虚荣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里根清楚，与电视相比，电台是一种更亲切的媒介，更适合他最为擅长的那些个人的趣闻轶事，可以打动听众。在电视上，如果他讲述一个从越南回来的士兵的积极向上的故事，或是一个关于芝加哥南部一位福利女王的劝诫故事，那么这一媒介一定会要求他展示图片的。而在广播里，语言就是一切，他用迷人的嗓

音娓娓道来，这一嗓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富有磁性。里根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炉边谈话的效果，也记得罗斯福用语言的魔力塑造出来的精神形象以及他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在电视诞生之前的时代，罗斯福除了电台没有别的选择。里根可以选择，却拒绝使用。他认为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的政治偶像，去触动和打动他的美国同胞。

除了基本的保守派原则之外，里根没有施政纲领，他希望依靠大的事件来提供行动方向，而它们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帮助。在他离开萨克拉门托3个月之后，美国参加的越南战争以失败而告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无视1973年的协定，在美国撤出自己的部队之后，击溃了越南共和国，占领了西贡市。美国花费了20年时间阻止这场征服的努力失败了。

里根指责华盛顿方面在领导上出现失误。他对电台听众说："当我们从越南长期的残杀中撤军时，我们所想到的是，假如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谈好的停火协议时，我们可以提供武器弹药，使越南共和国和柬埔寨能够抵挡得住。"华盛顿方面，或者说掌管立法机构的民主党却放任自流。"我们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国会剥夺了三军统帅确保协议实施而采取行动的一切权力。现如今，还是这个国会，史无前例地不负责任，拒绝批准可以让这个伟大国家践行诺言所需要的资金。"

里根为他的听众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的多米诺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都将危及整个地区的命运。他提醒听众注意，"二战"之前绥靖政策的失败是如何导致多米诺效应的。他说："如果我们退却让步，任由我们的一个盟国开始宣扬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想惹祸上身——那么多米诺理论这一术语所表达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盟友身上的真实写照。共产主义会认为寻求下一个猎物是没有危险的——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没有提出威胁。但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盟友不再能够相信我们，于是开始进行交易。"

里根说，这种交易活动在亚洲已经开始了。泰国正在背离美国，菲律宾正在寻求和解，日本开始与河内方面对话。这种破坏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大洲，“多米诺效应是世界范围的。”土耳其正在脱离北约，希腊断然拒绝美国第六舰队的访问，葡萄牙正危险地向左翼倾斜。“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中东地区空手而归。几个月前，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和可靠性，美国让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比5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和平解决。现在有传言说，到了夏天会爆发战争。媒体描述说，基辛格的眼里满含着沮丧的泪水。由于我们在遥远的中南半岛地区没能够支持盟友，所以一度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可靠性不再让人相信了。”

里根认为，在中南半岛的失败体现了对世界的一种更大的误解。他一直是个忠诚的共和党人，不会直接攻击共和党政府的政策，但开始质疑缓和紧张局势对话的哲学基础。尼克松对莫斯科敞开大门，允许粮食销售，向苏联运送了数百万吨美国的小麦和玉米，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批评者称其是“粮食大劫案”，但他们的队伍中不包括中西部的农民，因为他们非常高兴，原因在于粮食销售带动了他们其他农作物的价格。1975年，苏联再次出现粮食歉收，杰拉尔德·福特扩大了这一交易。

交易的增加促使里根表达了对于缓和紧张局势对话的疑问。“苏联人希望购买美国的小麦，美国的农民希望卖掉他们的小麦。”他告诉电台的听众。这笔交易表面上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我们相信自由市场，那我们难道不应当允许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卖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以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价格吗？”但这其中有其他考量，首先是进行购买活动的国家的性质。“如果我们认为，苏联对自由世界充满敌意——我们必须这样认为，否则我们就不会维持核防御计划，不会继续留在北约——那么，我们是否是在增加我们自己的危险，帮助陷入困境的苏联经济呢？”

里根说道。美国只需要其劳动力中的2%，就可以养活美国人和世

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整整1/3的苏联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但没有美国的小麦，他们就要挨饿。”

无论是因为里根真的非常矛盾，还是因为他不想强烈反对共和党执政的政府，他认为粮食问题有很大风险。“从经济上来说，小麦交易对我们有利。当前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混乱，贸易失衡。或许它让我们得到了足够的好处，超过了战略因素的考量。换句话说，与削弱苏联得到的好处相比，它增强了我们的实力。”但是，粮食销售引发的道德问题依然困扰着里根。

里根所处的两难境地让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方法，这一方法能出自一位保守派之手听起来也比较奇怪，因为它需要政府强力干涉私有化市场。里根总结说：“或许有一个办法，我们只需要做那些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停止与他们进行贸易来往，让他们的制度崩溃。但同时，需要我们自己购买农民的小麦，把它拿在手里，等苏联人民最终自由以后，再给他们吃。”

里根对于缓和紧张局势政策的观点是一个局外人的观点，他对发生在福特政府内部的外交政策的秘密谈判并不知情。然而，在政策另外一个领域，却露出了冰山一角。“水门事件”促使媒体去深挖政府事务，他们所发现的事情包括中央情报局越权行事的证据。报道指出，本来应当只对外国采取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却参与到了国内活动中来，包括窃听电话、私拆信件以及向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渗透等。杰拉尔德·福特感到必须对报道做出回应，于是责成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些报道，以及其他牵涉到中央情报局的事情。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委员会的头儿，其他成员包括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个人。刚从加州州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里根也在洛克菲勒委员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但里根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调查，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洛克菲勒，目前手头的工作让他无法参加所有的会议，并且他发现，这些会议中极少有什么值得让他中断工作的东西。（最终他只参加了26次会议中一小

部分。）该委员会的组成反映了福特政府在冷战期间没有兴趣调查分析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其中的大部分人跟里根一样，对于美国特工人员在侦察、打击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时面临的艰辛困苦表示同情。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开展的活动。尽管中央情报局的章程明令禁止这一点，但里根和其他人常常认为，这些活动都是合理的预防措施。

福特从洛克菲勒委员会那里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带有里根签字的委员会报告指责中央情报局做了“一些应当受到批评的活动，不应当允许再次发生”。报告同时提议，密切监督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但整份报告远没有达到中央情报局批评者所提出的那种彻查要求。

这些批评者对于另外一个委员会的表现更满意，它是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组织的，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领导。丘奇委员会穷根究底，披露了许多里根和其他保守派认为应当保密的内容，记录了1953年中央情报局在颠覆伊朗政府、1954年在推翻危地马拉政府中的作用、1961年在猪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20世纪60年代早期，它在企图刺杀多位外国领导人的行动中的角色。

里根对于丘奇委员会的不满超过了他对于中央情报局的不满。他跟自己的电台听众说道：“在任何一个拥有大约16000人的机构中，一定会有人犯错误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整体上，该情报机构还是尽职尽责、有效地保卫了美国抵御致命威胁，必须允许它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正在遭到刺探，其范围超乎美国人所能想象的极限。这种刺探不是来自国内的，不是我们自己人做的，而是来自潜在的敌人。”

25

现代美国的保守派在竞选公职时，面临着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他们经常把政府当作敌人，因而必须要向自己和他人解释，他们为何想要加入这一敌人的队伍当中。一些人表现得极度苦恼，另外一些人只是显得略微内疚，但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得出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论：假如他们不参选、不当选的话，那么自由派就会得逞，从而进一步危害国家利益。

杰拉尔德·福特不是自由派，但里根认为，他也不够保守，不能留在白宫里。不管怎样，这就是他对自己说的。假如他再年轻一点儿，那么这可能就是全部真相，但按照美国政治实践来看，里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里根如果参加1976年11月的大选，那只有威廉·亨利·哈里森在竞选时比他年长，而哈里森在就职后一个月就去世了。里根认为，他不能等到福特下台。如果他想得到总统宝座，那就是1976年，否则就永远不可能了。

因此，里根参加了竞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但并不高明的行动，胜算不大，意外重重。即使像福特这样非选举产生的总统也都是大权在握的，他们无须努力也无须花钱就可以号令全国媒体为其服务，可以做出让盟友和选民满意的任命，可以调拨经费，确保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效忠，这些人负责制定初选和党代会的规程。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多数美国人的爱国反应，如果做得巧妙的话，可以把这种爱国反应转化成政治支持。

对里根来说，如果要想击败福特，那就需要克服这些现任者的优势。对里根来说，单单是挑战福特就是在冒着分裂党的危险。几乎没有

哪个在任总统受到过来自自己党内的挑战，如果有，那几乎每次该党都会失去总统一职。假如里根挑战福特，假如共和党失利，那么里根将难辞其咎。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行动了。1975年夏天，在里根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调研委员会，由保罗·拉克索尔特领导。拉克索尔特是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赞同里根标志性的西部保守派立场，欣赏里根那种从容的个人风格。约翰·西尔斯曾在1968年协助过尼克松竞选，现在他想帮里根做同样的事情，为其出谋划策，鼓舞士气。里根自己则置身事外。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前，里根一直做着自己的电台节目、报纸专栏和有偿的演讲活动。一旦他成为正式候选人，这些收入渠道就会终止。

调研委员会发现，大家对于里根参选有着浓厚的兴趣。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不信任尼克松，很多人对他的垮台感到高兴。水门事件取得了保守派10多年来一直尝试未果的某种效果：使党内的温和派信誉扫地。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一直是少数派，直到尼克松自毁长城之前，他们看来一直在失势而不是得势。水门事件就像是天赐良机，他们自己无法预料，却渴望从中渔利。

里根是他们的人。他的言谈一如既往的保守，现在他离职了，可以把那些有损其讲话内容的实用主义搁置一边。1975年初秋时节，里根在加州和美国全国做巡回演讲，重复着那些在1964年开启其政治生涯的演讲。这些演讲一如既往地令人满意，却又不太具体，让他可以把美国的诟病归咎于联邦政府，却无须详细阐述他要裁减或取消哪些政府部门。

然而，他依然拒绝正式答应参加角逐。迈克尔·迪弗一直怀疑他到底在寻找什么迹象，直到这一迹象出现。“我们当时在飞机上。”迪弗说的是1975年11月一架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定期往返航班。里根的雄心壮志早已让他克服了自己的恐飞症。迪弗继续说道：“机上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机舱，他们为我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我们上飞机时，安保

人员把我们安排在前两个位子上。里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之后，126名乘客开始登机，每个人都跟他打招呼，或者停下来跟他说上几句。曾经成千上万的人都说过大致相同的话，但有位女士停了下来对他说：‘你应当参选。’”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妇女的话击中了要害。其余乘客都登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在进行起飞前的检查，飞机开始沿着跑道滑行。里根转头对迪弗说：“我觉得她说的对。”

迪弗当时不确定里根指的是哪位乘客，于是问道：“您说什么？”

“那位女士说我应当参选。是的，我应当参选。”

迪弗表示赞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里根会突然之间这样决定，他问道：“您确定？”

“是的，我认为杰拉尔德无法胜任。”里根说道：“如果我不参选，那我就成了那个一直坐在板凳上，永远没有参与比赛的选手了。”

在11月20日这天，里根参加到了这场比赛当中。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里根宣布他将挑战福特，竞选197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我们国家的首都已经成了伙伴制的温床，这种制度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对于用自己的税款支持这一制度的美国劳动者的需要越来越麻木不仁。”他说道，“当下，难以找到独立于这些给我们带来问题的势力之外的领导人：国会、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大企业以及大工会。”里根把大企业也算在他的“罪犯名单”里，这引起一些人的愤慨，因为他们记得里根曾长期担任美国最大的一家企业——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开代言人。里根很快就把这一点从批评中删除了，在政府众多目标中找到了发泄愤怒的渠道。他号召迅速采取严格措施，削减联邦政府支出。他说：“我们别无选择，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恢复到平衡预算中去。”在回答关于他不加节制地接受保守主义，是否会有重蹈1964年戈德华特带给

共和党那场灾难性覆辙的危险时，里根声称，戈德华特只是走在了他所处时代的前面。“1964年的唯一错误就是，这个国家的选民当时依然沉浸在有些类似新政综合征的情况之下，依然认为联邦政府的帮助是免费的，联邦政府的计划是会解决问题的。现如今，时事变迁，人们已经深信不疑，认为联邦政府过于庞大，过于浪费钱，却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里根否认他的竞选是直接针对杰拉尔德·福特的，并以共和党“第十一诫”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他的新闻秘书林恩·诺夫齐格说，这位前州长与总统通过电话，双方都表达了避免党派分裂的愿望。里根的助手们把这位候选人与福特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之间的谈话说成“非常诚恳”。

约翰·西尔斯、诺夫齐格以及里根的其他手下把他竞选声明的活动安排在华盛顿，而不是加利福尼亚，为的是可以与主要电视新闻网的新闻记者们更好地磨合，并且让里根有时间在当天下午飞往佛罗里达州再次露面。在迈阿密，他向一群看起来对他的竞选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们发表演讲，然而，一个年轻人却显得格格不入。当他向着里根的方向举起手枪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更明显了。安保人员当即将此人按倒在地，随后发现，他所用的武器是一把玩具枪。里根没有理睬这一事件，新闻媒体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

但是，南希·里根当时就站在丈夫身边，非常不安。她回忆说：“我全身发抖，罗尼不得不过来安慰我。”

26

迈克尔·里根希望能成为父亲竞选团队当中的一员。里根的长子花了很长时间，想要在父亲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环境和所涉及的人物都不利于这一想法。他的母亲和继母一直相处不来。迈克尔后来写道："35年来，我感到自己仿佛一直处于妈妈和南希的争斗之间。"简·怀曼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与南希走得太近，主要是因为南希明显比自己更能让里根幸福。而对于南希来说，她不希望让人们想起，自己的丈夫在遇到自己之前曾爱过别的女人。她知道，简与里根的分手不是里根的意思。如果让他来决定的话，他和简可能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

南希与简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影响到了莫琳·里根，但在父母离婚时，她比迈克尔的年龄大，有继母的时候也比他大。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莫琳没有遇到被收养的孩子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生身父母抛弃了他们，他们是否真正是收养家庭中的一分子。迈克尔自己证实说，他经常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大家是爱他的，但事实上，他常常得不到关爱。简过度忙于自己的电影事业，而里根则忙于电影工会事务和之后的政治活动。迈克尔从一家寄宿学校转到另外一家，他常常想，为什么自己的父母好像都不想要他。他渴望父爱，父亲却无法表达。迈克尔写道："他可以把自己的感情献给国家，却很难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拥抱。"

很久以后，迈克尔透露说，自从7岁时遭到一个野营辅导老师的猥亵之后，自己一直备受罪恶感的折磨。在父亲步入政坛以后，迈克尔担心记者或者里根的对手会发现他自认为耻辱的秘密。这种担心随着父亲每一次的胜利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单单是作为一个名人的儿子，一个著名女人的儿子就已经让人难承其重了。他认定人们假装喜欢他，为的是

接近他父亲或母亲。

让里根分心的事情很多，这几乎无益于父子关系的改善。迈克尔高中的最后两年是在亚利桑那州一家寄宿学校上的。随着毕业的临近，他清楚，由于之前的调皮，自己不会被允许参加毕业典礼。但一位教工暗示说，如果他能够说服他父亲在毕业典礼上讲话，那么他的劣迹将会被忽略不计。里根可能明白，也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但他非常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助迈克尔得到他的文凭。

里根在毕业这天来到学校向毕业生致意。迈克尔回忆说："当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听到爸爸介绍自己，然后询问毕业生的名字。当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我叫罗纳德·里根。'爸爸说，'你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感到受到伤害，但也并不十分惊讶。"我摘下我的学位帽。'不记得我了？'我说道，'我是您儿子啊。'"

"'天啊！'爸爸说道，'我都没有认出你。'"

迈克尔继续寻求父亲的认可，却再次受到了伤害，但他也没有感到太惊讶。当时，他的州长父亲没有参加他1971年在夏威夷举行的婚礼。迈克尔写道："爸爸和南希都没有来，令人侧目。令我懊恼的是，他们出席了特里西娅·尼克松于同一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婚礼，这让我很受伤害。正如演艺事业把我的母亲抢走了一样，政治把我的父亲抢走了。"

里根没有参加迈克尔的婚礼，而是给他写了封信。迈克尔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里根一直在远处观察着迈克尔这个浪荡公子的行为，如今他送去了自己无法当面去说的一位父亲的建议。里根在信里写道："你已经进入了人生之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关系里面，在

这种关系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些男人觉得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只能通过一件事得以证明——在其生活中一直表演着更衣室里的故事，沾沾自喜，认为妻子不知道的事就不会伤害她。然而，事实上，彼此心灵是有感应的，不需要她在衣领上发现口红唇印或追问男人凌晨3点身在何处，听他编那些蹩脚的谎言。女人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她有了感应，那么婚姻关系中的一些魔力就消失了。还有一些男人，牢牢地控制着婚姻，自己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种男人不在少数，比那些应当受到指责的女人还要多。有一条古老的物理定律是这样的——你投入多少才能得到多少。一个对婚姻投入半心半意的男人也只能得到半心半意的回报。当然，有些时候，在见到某个女人或者回想起之前关系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挑战，想看一下自己是否依然魅力不减当年。但让我来告诉你吧，用你的一生跟同一个女人来证明你的男子汉气概和魅力，这种挑战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所有男人都会偶尔说谎，表现得令人讨厌，这并不需要多少男子汉气概。真正能表现得很男人的，是保持魅力，为某个女人所喜爱，这个女人听过他鼾声如雷，见过他胡子拉碴，在他生病时衣不解带地照顾他，给他洗脏的内裤。做到了这一点，让她依然感受到脉脉温情，那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琴瑟和鸣。如果你真正爱一个姑娘，你就永远不应当让她感受到猜忌并蒙羞。当她看见你跟秘书或一个你们俩都认识的女孩打招呼的时候，不会去猜想对方是否就是那个让你回家很晚的人。你也不应当希望有任何其他女人可以在遇到你妻子的时候，在盯着你所爱的妻子的同时，却在暗地里偷笑，心里想着，这位就是为了自己你所抛弃的女人，哪怕只是暂时的。”

里根知道自己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过这种挑战。“迈克尔，你比许多人都更清楚，不幸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也清楚它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就是他尽其所能，来确保迈克尔的新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的全部原因。“现在，你有机会来使家庭幸福。对男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在傍晚回家时，知道家里有人在等着他回家的脚步声更幸福的事情了。”

里根在信的最后写上了“爱你的爸爸”，下面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你每天至少说一次‘我爱你’，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麻烦。”

迈克尔体会到了信里的温情，即使他希望能亲耳听到这些话。他写道：“这封信就像爸爸一样，发自他的内心，饱含着正直、诚恳和传统的温情，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里根的忠告并没有阻止迈克尔的婚姻以离婚收场——就像里根的第一次婚姻那样——但是，迈克尔没有停止寻求父亲的认可。当里根决定竞选总统的时候，迈克尔说，他希望竞选活动可以让家人亲密团结起来。迈克尔回忆道：“他疑惑地看着我，说道：‘可是，我们的家庭很亲密啊。’”迈克尔向南希表达了同样的希望，可南希说：“我对此不抱希望。”

迈克尔和莫琳都希望可以为竞选活动出一份力。莫琳继承了父亲对政治的热爱，而迈克尔只是希望能成为父亲生活中的一分子，但他们都碰壁了。莫琳已经见识过了，因为之前她已经被迫感受到了被抛弃的感觉。在里根第一次竞选州长的初期，他的一名顾问比尔·罗伯茨找到了她，解释说他和斯图尔特·斯宾塞认为，离婚问题葬送了纳尔逊·洛克菲勒1964年的选举。莫琳回忆说：“这些顾问们对于父亲之前的婚姻非常担心，我所得到的信息非常明确：我和迈克尔都不要以任何方式掺和到选举活动中来。事实上，斯图尔特·斯宾塞后来向我丈夫建议说，我应当挖个洞用尘土盖住自己，直到选举结束。”

多年之后，莫琳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刻的痛苦，她说：“比尔·罗伯茨的来访击垮了我，他怎么敢把我看作父亲竞选的累赘？当然，我理解他的视角和理由，即使我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无法忘却那种被踢中腹部的痛苦感受。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这已经够受的了，但现在，这个所谓的专家突然告诉我说，为了竞选着想，我必须要

假装从没有存在过。”

她给父亲打去电话希望得到同情，却没有真的期望得到同情。“他的反应可以预想得到。他说：‘如果你花钱雇人来负责竞选活动，那么你就必须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就这些。莫琳说道：“我跟迈克尔被这个斯宾塞–罗伯茨计划给‘干掉了’。”

1975年，他们俩再次遭到冷遇，这一次他们的年龄成了竞选团队挖苦的对象。莫琳34岁，迈克尔30岁。莫琳说：“他们觉得，我们让父亲看起来太老了。”里根的负责人更倾向于让这位候选人与他再婚后的孩子一起亮相。帕蒂生于1952年，罗恩生于1958年。当里根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一个23岁，一个还是少年——他看起来正当壮年。

南希也更倾向于竞选团队让帕蒂和罗恩一起亮相的做法。对于迈克尔和莫琳来说，这种做法除了令人受到伤害之外，还让人觉得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帕蒂和罗恩根本无意参与父亲的政治或竞选活动。这种伤害还体现在老一套的有关继母的故事里。迈克尔回忆说：“我们无一例外地被称作罗纳德·里根和简·怀曼的‘养子和女儿’，这样一来，就是一再提醒南希记住28年前结束的那桩婚姻。”

只是到了后来，迈克尔才能够同情南希，至少是有些同情。“不断提及过去的那桩婚姻，肯定每一次在南希听到或读到的时候都伤到了她，但是，当时我无法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觉得南希仿佛一直在把我们从这个家庭圈子里推出去，并努力把罗恩和帕蒂拽进来。”

27

里根正式宣布参选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鼓舞。11月初，盖洛普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共和党中他以40%：32%领先福特。在对普选胜负起到关键作用的独立派中，他以27%：25%领先福特。

但是，民调终归是民调。第一次真正的较量出现在1976年2月的新罕布什尔州。里根冒着新英格兰的寒风一天接一天地在晚宴上和工厂门口寻求选民的支持。他赢得了摇摆不定的威廉·洛布的支持，此人是该州最大的报纸《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出版商。竞选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里根的助手们在初选前两天就把里根送出了该州，以便当地一直负责其后勤工作的团队可以集中精力让选民们参与民调。

这一决定被证明是战术上的一次极大失误。尽管里根在中西部拉到了选民的支持，但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进展。初选那天，温和的天气对温和派来说是个好兆头，福特最终以略微多于1%的选票击败了里根。

约翰·西尔斯想要把这一结果通过舆论造假说成是一场胜利，他对竞选团队说："我们必须以真正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儿。"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能把一位在位的总统逼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一个壮举了。1968年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侥幸成功，最终让林登·约翰逊下台，下一个倒台的该是福特了。

尽管如此，失望之情还是难以隐藏。迈克尔·迪弗回忆道："媒体可以在我们脸上看到这种失望，我们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里根功亏一篑。他一直在领跑，福特却后来居上，赢得了胜利。福特一方占得了

胜利的势头，并得到了新的支持者。

“这是一个大灾难性时期的开始。”林恩·诺如齐格回忆道。里根在随后的5场初选中失利，每一次的失利都削弱了里根的可信度。心思各异的共和党人开始询问里根何时退出角逐，何时会退到总统身后，做一名忠诚的党员。里根回答说，他不会轻易决定参与角逐，也不会轻易退出，他将一路战斗到在堪萨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

当他在3月佛罗里达州初选中失利后，里根的远征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了。福特的团队更是敲响了党内团结的战鼓。他们说，如果里根真的信仰党的“第十一诫”，那么，他就应该退出角逐，因为他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对党造成的伤害要比任何反对总统的演讲都要大。

甚至连南希也认为他应当退出，尽管她考虑的是里根本人而不是政党。诺夫齐格回忆说：“南希非常郁闷。”她把诺夫齐格拽到宾馆的一间屋内说道：“林恩，你清楚必须要让罗尼退出这场角逐了，我们不能再让他难堪了。”

正在此时，里根走进了房间。“他认为我要和她站在一边儿。”诺夫齐格回忆说，“于是他说道：‘林伍德’——这不是我的名字，但他一直这样叫我——‘我不会退出这场角逐的，我要一直坚持到得克萨斯州，我要坚持到底。’”

诺夫齐格接下来讲完了这件事，他认为这件事反映了里根的特点以及他与南希的关系。“她接受了里根的意见。人们认为南希管着里根——不是这样的。她只是在里根不在乎的一些事情上管着里根，而一旦他很在乎，南希就管不了了。我想说的是，有几件事我都在场，当时她想要这样，里根却偏要那样。”

于是，里根继续参与角逐，重申他将战斗到党代会的那一刻。然

而，勇敢的语言替代不了强势的美元，随着他取胜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他的竞选资金也开始捉襟见肘。初选竞争横贯整个南部地区，里根不惜一切代价筹集资金，继续竞选活动。当时，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者想到了1964年里根为戈德华特所做的那次电视演讲的效果，于是建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电视台播出类似的内容。诺夫齐格找到一份里根在佛罗里达州用过的一份半小时的讲稿，略微修改了一下，就讲给北卡罗来纳州的观众听了。

虽然其效果不如1964年的那次全国演讲，却向南方地区的选民展现了里根的风采。演讲的内容在12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却是南方保守派愿意听到的。

他们喜欢里根讲的一些其他内容。到目前为止，里根在竞选活动中鲜有涉足外交政策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在关于国家安全事务上攻击三军统帅，可能有招致政治上强烈抵制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一问题上，他可以声称缺乏专业知识或者没有经验。但是，在参议院中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保守派杰西·赫尔姆斯一直在指责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尼克松–基辛格–福特的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并且反响不错。里根决定附和一下。

里根批评武器控制只是在控制美国的武器，而苏联却一直在继续增强它们的实力。里根指责福特和基辛格忽略苏联在中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活动。同时，他借用赫尔姆斯的话，指责福特政府试图放弃巴拿马运河。

这份指控书上的最后一条罪状令人疑惑不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巴拿马运河未来的谈判一直在进行，这些谈判从没有在美国人心中激起多少兴趣，并且与另外几个州的民众相比，北卡罗来纳州人在运河中的利害关系要少一些。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还是做出了反应。里根在电视上的循环演

讲、他对于放弃运河的严重警告、外加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共和党人的保守立场导致了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里根以52：46击败福特。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规定了具体的代表分配比例，里根赢得28位代表，福特26位。但是，北卡罗来纳州让里根得以继续战斗下去。要求放弃角逐的压力并没有结束。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次严重的挫折促使福特方面去强化其工作，努力把里根塑造成一个破坏者。然而，里根现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努力，将其视为一种证据，表明自己的既定方针正在稳步向前。资金也不断注入，虽不是井喷式的，但也源源不断。

5月份，里根在南方其他地方取得了多场胜利，拿下了印第安纳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并在6月初如愿以偿地在加利福尼亚州打垮了福特。

福特用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工业州那儿取得的胜利予以还击。总统的竞选团队把詹姆斯·贝克招至麾下。贝克是名来自休斯敦的律师，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可以运作政治制度来为自己的候选人谋求利益。他利用其在南方成长接受教养的魅力、多年浸淫在法律界的诡计以及白宫的影响力，对各个州参加党代会或领导层秘密会议的代表们穷追不舍，直至得偿所愿。

等到初选、党代会和领导层秘密会议结束的时候，福特在代表人数上略微领先里根。鉴于决定代表们一定会支持谁的规则各不相同，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双方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公开解读了这种不准确的数字，都提到了在代表大会中决定性的时刻，那些可能浮出水面的秘密的支持者。但是，公正的估计给了福特大约1090名代表，给了里根大约1030名代表。福特还需要大约40名代表才可以获得大会的多数，而里根需要大约100名。在争夺这最后一批代表的血拼中，总统机构的影响力无疑会对总统有利。

里根依靠的是出奇制胜。在约翰·西尔斯的鼓动下，里根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前，宣布了自己的竞选搭档。理查德·施韦克是来自宾夕

法尼亚州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林恩·诺夫齐格回忆说："西尔斯的想法是，如果他选择施韦克，那我们就可以把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单独拿下，这将有助于我们得到其他一些代表团的支持。"

这一宣布激起了媒体的兴趣，却在代表当中弄巧成拙。迈克尔·迪弗回忆说："由于施韦克的原因，里根所主张的那些有关南方的事务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我们前往密西西比州，开始与所有的代表会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选择施韦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打入东北部地区，看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或许我们可以从新泽西和纽约获得些许选票，可能会破坏福特的基础。当然，施韦克可能连宾夕法尼亚也拿不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保卫我们的基础选区，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在密西西比的杰克逊，我们把这些代表请到万豪酒店、华美达酒店，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想亚拉巴马代表团当时是4个人。屋子里除了这4位代表坐在那儿之外，还有施韦克、克莱尔·施韦克夫人和罗纳德·里根坐在贵宾桌前。他们讨论了整件事情，这时，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男士站了起来。他打着领结，穿得非常讲究。他说道：'州长，我不喝酒，但当我听说您选择迪克·施韦克做您的竞选搭档的时候，我回到家喝了一大罐的威士忌酸酒。我宁愿让我的医生从家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妻子得了性病。'"

精心策划的利用施韦克进行赌博式竞选这一招使里根的失败成了定局。代表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常规的大会议程直至点名登记。在8月19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福特以1187对里根1070的得票获得提名。

一些保守派甚至在失败之后也拒绝让步。杰西·赫尔姆斯咆哮着表达了自己对于缓和紧张局势政策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的坚决反对。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里根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在投票过后，强行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希望福特在11月的大选中落败。他说道："共和党一定会失败，这是让福特作为候选人所不可避免的。"

但是很快，两位候选人就团结起来。福特示意请里根作为自己的竞

选伙伴，但里根的反应比较特别，或许有些忸怩。后来与里根在工作中有着密切合作的詹姆斯·贝克认为，福特与里根联袂登场可能会吸引选民，假如双方都抱着合作的态度，那么联袂竞选是有可能的。后来，他跟里根说道："您很清楚，总统先生，假如当年福特总统邀请您与他一起竞选，他很可能会获胜。"贝克又补充说，考虑到未来4年发生的事情，"您可能永远当不了总统了。"

里根回答说："你说的对，假如他发出邀请，我肯定会责无旁贷。"

贝克继续说道："福特总统没有邀请您，是因为我们当时从您的竞选团队中得到消息说，您只有在他不让您担任副总统的条件下才可能加入到联合会议中来。除此之外，您还公开关停了您的支持者在堪萨斯城进行的旨在让您获得副总统提名的活动。"

里根回答说："我真的不想当副总统，当时我就这样说过。但我丝毫不记得曾让任何人给福特总统带话说，不要给我那一职位。假如他发出邀请，我一定会责无旁贷地答应的。"

贝克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他回忆说："我当时很惊讶。历史本来可以大不相同的。鉴于他们在初选中的激烈斗争，福特的确不想让里根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假如福特和里根在1976年联袂竞选的话，那么我想，今天白宫的墙壁上可能会少了两幅总统照片——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

福特没有邀请里根加入共同参选名单，但的确邀请他参加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会场举行的欢庆活动。他们握手言欢，表明至少在表面上共和党人内部还是很团结的。里根的支持者们要求他们的领袖发表讲话。里根的讲话让他们重新振作了起来，有些人在考虑要求重新计算选票，但里根明白，这一时刻自己不是主角，于是在引发人群蜂拥而至之前就退到了一边，但在退出之前，还是得到了比福特更响亮、更发自肺腑的大声喝彩。

第二天，里根向自己的支持者表示了感谢，并跟大家道别。至少有一位记者发现，他在擦拭泪水。考虑到这位候选人的年龄，许多人认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了。里根的讲话并没有过多透露自己的计划，他说："的确，所发生的一切让人失望，但事业，我们的事业还在继续……这只是漫长战争中的一场战斗而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大家只需待在工作岗位上，怀揣着同样的信仰和信念，继续今天的工作。舞台上的人物可能会变更，但我们的事业永在，我们的事业将万古长青，因为它是一条正道坦途。"

詹姆斯·贝克与胜利者一同离开了党代表大会，对这位失败者却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在提到里根对于福特的挑战时说道："他差一点儿就击败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接近。"

28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的提名没有太大价值，对里根来说，这缓和了此次失利带来的打击。共和党人还在忙于应对水门事件，而民主党则在榨取着每一张选票。几位知名的共和党人在竞选党内提名，但最知名的也深受从政污点之害，尤其是在华盛顿，这儿成了腐败的巢穴，选民们从水门事件以此类推，推及所有政客。吉米·卡特曾担任过佐治亚州州长，但他低调地处理了简历中的这一部分，为的是突出他来自佐治亚州普兰斯镇的背景，身份是个心直口快的种植花生的农民。他为人意志坚定，极其坦诚。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他承认自己对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充满着色欲。这一点让许多民主党人在初选时印象深刻，在7月党代会的前一个月就确立了候选人提名。其结果就是，当福特和里根还在通往堪萨斯城的路上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卡特已经开始休养生息，创建自己的竞选储备金库。民调显示，他远远领先于两位共和党人。

几乎没有人积极投身到普选活动中去。在从特赦尼克松以及同里根的角逐中死里逃生之后，福特已是千疮百孔。尽管像总统竞选活动通常表现的那样，劳动节之后这场角逐紧张了起来，但福特在与卡特的辩论中表现很糟，让人想起林登·约翰逊尖酸刻薄的评价——福特在许多场次的橄榄球比赛中都不带头盔（在密歇根大学上学时，福特打的是前锋，这一直是里根在尤里卡学院梦想的位置）。

里根对于共和党的事业没有提供多少帮助。他为福特做了许多演讲，以此来扭转关于对自己阵营内部怒而不语的指责，但是，他对这位温和派总统没有明显的热情。里根从没有完全掌握党派思维模式：一种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心理状态。他能做到，也的确说过，福

特比卡特更适合当总统，但他几乎不相信这一点，并深受保守派观点的影响——对国家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福特落败、共和党温和派彻底声名扫地。这样一来，保守派就可以执掌该党，引领美国走向复兴。

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第一部分。福特的竞选活动继续向前发展，但最终在普选中以48：50的百分比落后于卡特。福特阵营中的许多人指责里根在漫长的提名争夺战中削弱了总统的优势。“假如没有这场挑战，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输给卡特。”詹姆斯·贝克说道。这一结果与其说是对共和党温和派的彻底否定，不如说是那些最积极的保守派们所期望的，但至少这意味着下一次共和党的提名将是完全开放的。几乎所有的保守派人士都认为，卡特在总统任期内会干得一塌糊涂，选民们将会很乐意再给共和党一次机会。

“从前，有一只红色的小母鸡在谷仓前的空地上刨食，后来发现了一些麦粒儿。”竞选两周之后，里根对电台观众讲述道。他很高兴又回到电波之中，很高兴可以有机会讲他的故事，很高兴能再次按照要求把复杂的政策问题凝练到几分钟的空中广播里面去。在这次节目中，他从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借题发挥，赋予了其现实意义。他的这只红色小母鸡叫来邻居，问大家谁能帮它种小麦，这样它就可能都有面包吃了。母牛、鸭子、猪和鹅都借故拒绝了，于是，这只母鸡就自己种小麦。小麦长得很高，麦粒饱满成熟。它又问谁愿意帮忙收割小麦。

“我不能。”鸭子说道。

“这不是我的活儿。”猪说道。

“这有失我的身份。”母牛说道。

“我会失去失业补偿金的。”鹅说道。

于是，这只母鸡就自己收割小麦了。最后，它问谁愿意帮忙烤面包。

“那对我来说是要加班的。”母牛说道。

“我会失去福利救济金的。”鸭子说道。

“我没上完学，从没学过如何烤面包。”猪说道。

“如果就我一个帮忙的，那就是歧视了。”鹅说道。

于是，这只母鸡就自己把面包烤好，拿给邻居们看。它们都要求分上一份，但母鸡一点儿也不给它们，自己全留了下来。

“超额利润！”母牛喊道。

“资本主义吸血鬼！”鸭子叫到。

“我要求平等的权利！”鹅嚷嚷道。

猪则发出低沉的咕噜声。4个家伙一起向政府投诉，政府代表告诉母鸡必须要分享面包。

“可那是我辛苦赚得的面包啊。”母鸡说道。

“的确如此。”代表说道，“这是一个完美的自由企业制度，谷仓前空地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赚得它们想得到的。但是，按照我们现代政府的规定，生产工人必须与游手好闲者分享它们的产品。”

里根语气中的嘲讽显得漫不经心，但表露无遗。他总结说：“从此以后，它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包括那只红色小母鸡，它面带微笑咕咕叫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它的邻居们一直在想，它为什么再也不烤面包了呢？”

这种节目是典型的里根式表演：吸引住听众，传递出保守派的信息，却没有愤怒，也没有灌输太多华丽的辞藻。巴里·戈德华特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这一套。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会，尽管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事实上没有里根的节目这般口语化。因为不是总统，里根就没有负担，无须非要注意官员的尊严。但对看不见的观众来说，依然有着同样的关联，有着电波中同样的想象力的碰撞。里根的嗓音比罗斯福的要更好一些：令人宽慰，充满温情，严肃但暗含幽默。

人们很难弄清楚，里根通过电台广播到底赢得了多少选民。像许多专家一样，里根常常向改变信仰的人说教布道，但跟这些人在一起，他巩固了自己作为国内最具魅力的保守派的声誉。他大概把一些骑墙派吸引了过来，或许还有一些漫无目的的人，他们随意调台，听到他的声音后，就停下来听他讲故事。他几乎不会疏远任何人，批评家可能会指责说，他传递的信息过于简单，但他们中那些诚实的人会把这一点归因于作品风格以及里根的风格。人们可以不同意里根的观点，但极少有人觉得里根不和蔼可亲。

无论这些节目多么受听众的喜爱，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有助于里根在政治上和理性上的发展。广播节目需要他了解一些他之前几乎没有考虑过的话题，他每天必须找一些话题。他读书比以前更广泛了，从报纸和杂志中搜寻信息、故事和妙语锦言。

他提到了医疗保健，警告公费医疗制度的发展。他说："竞选活动不断地使美国的医疗保健脱离自由市场制度，进入政府的保护性监管之中。那些为我们带来邮政服务和铁路服务（另外两个常见的目标）的人们急于提供具有同样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国会中的一些人正在促成一条法规，要求雇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里根引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的例子，作为一个警示性的故事来告诉大家，这种对市场的胡乱干预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英国有一位女士，"妩媚迷人，就是面部有一点儿瘢痕"。她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炫耀说，自己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免费

的，但也承认就是有点儿慢。“我预约到一位皮肤科医生后，必须等上8年才能看我的脸。”而且她必须再等上一年才能开始治疗。“但这都是免费的。”然而里根指出，它不是免费的。“他们的税赋比我们高多了。”里根指的是英国，“他们的医疗服务占据了那些税赋的一大部分。”

里根还谈到了教育。圣路易斯一家电视台曾播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看起来像是总结了公共教育的缺点。“他们采访了圣路易斯公共教育制度下的一个学生。”里根说道，“这个年轻人20岁了，他从幼儿园一直上到12年级，最后得到了高中文凭。他是个职业上的文盲，不能阅读和写作，目前报名参加了一个成人阅读矫正项目。”里根向听众保证说，这个年轻人没有任何问题。“他思维并不迟钝，本人也不蠢笨，就是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里根将此归咎于教育研究学院的自由理论家，他们强调推理过程而不是记忆能力。在这些理论家背后，还有全国教育协会的影响。该协会与所有大的团体一样，都将其成员的利益，特别是其领导人的利益置于它表面上要服务的人们的利益之上。在这个故事中，这些人就是像圣路易斯文盲一样的年轻人。

他还指责环境保护运动。在嘲笑挽救濒危物种的工作时，里根问他的听众：“你们有多么想念恐龙？假如那些巨大的会飞的史前蜥蜴偶尔降落到你家门前的草坪上，你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吗？”他提倡再次使用杀虫剂，并声称在美国中断使用杀虫剂是基于恐惧，而不是证据。“环保局在1972年说，杀虫剂对人类无害，正确使用杀虫剂不会对动物、鸟类或海洋生物构成威胁。然而，现在却被环保局禁用了，理由是，在某些情况下，未来它可能对某些人或某些事物造成伤害。”他说，最近因毛皮猎人棒杀北方格陵兰小海豹而引发的绝望情绪已经失控。“格陵兰海豹并没有灭绝的危险，它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个海豹种群，其数量还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禁止猎取海豹皮可能会给原本已经所剩无几的大西洋渔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海豹每年吃掉50万吨小鱼，而这些小鱼对于鳕鱼、海鸟和鲸鱼来说，是食物链上非常重要的

一环。”他说，针对格陵兰海豹的活动是为环保主义者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的工作。“有一家国际性组织，它每年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保护海豹反对猎杀而募捐。年薪40000美元的高管乘坐该组织自己的直升机周游列国。”

他还批评公共交通问题。华盛顿特区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地铁网，最初规划的成本是25亿美元。里根说：“这一成本已经翻倍了。”而工程还远未完工。“这已经落后计划几年了，投入使用的只有4.5英里的里程，每天损失5.5万美元。”人们更喜欢驾车的自由。“大部分城市，包括那些中小城市都曾有快捷的交通，大家都很熟悉有轨电车的叮当声，直到后来人们放弃了公共交通，改乘他们自己的汽车。汽车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出行路线，可以从一家门口直接开到另外一家门口。人们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打算放弃这种自由，因而政府就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自由。”

里根的广播内容绝对是否定对手的。当然，自新政实施以来，否定一直是美国保守派的姿态。持反对意见是大家对于少数党的期望。20世纪70年代末，共和党保守派在两个层面都是少数派：他们的政党在全国政坛中属于少数派；共和党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众议院就没有得到过多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参议院也没有得到过多数。卡特入主白宫以后，共和党人也成了行政机构的流放者。同时，在共和党内部，自1964年戈德华特时代起，保守派一直就是少数派。如果里根听起来像是在攻击对方，就像严阵以待的圈外人，那他也是有原因的。

即便如此，里根的听众可能还是想知道他的立场。可能是规模小一些的政府，但是尽管他不停地攻击政府挥霍浪费，效率低下，可他非常谨慎，避免提及需要取消那些具体项目；他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感到痛心，可他并没有主张要废除它；他反对“公费医疗制度”，可他却让老年人享受他们的医疗保险。

他听起来无疑是在否定对手，但他听起来也像是一位候选人。

29

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总统候选人都会把自己的当选看成天赋神权来推行竞选期间所提出的政策方针，无论选民们是否真的赞成这些政策。吉米·卡特之所以能够当选，主要原因是他置身事外，远离水门事件的犯罪现场。但他把自己的当选理解成重新制定美国外交政策路线图的事业。1977年春天，卡特在圣母大学对一群观众解释了自己的新方针。环境很适合他的主题，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经常就人权问题发表讲话，而当天卡特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指出，在冷战期间，美国游离在其传统价值观之外。“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愿意接受我们对手的那些漏洞百出、谬误不断的原则和策略，有时候会为了他们而放弃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他说道，“我们总是以火攻火，却从没有想起水可以更好地浇灭烈火。这种方法失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战争，体现了美国在智慧和道德上的贫乏。”卡特站在强调人权的高度，把自己的当选看作美国人已经从他们国家的失败中得到教训的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重返我们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的道路。”

卡特继续说道，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遏制政策的基石——两极模式已经不再能够体现现实情况。亚非新成立的国家，以及拉美新近强大起来的国家都要求在国际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拒绝接受超级大国的优先权。“我们无法再指望另外150个国家唯大国马首是瞻。”卡特说道。这再好不过了，因为它符合美国根本的道德力量。卡特指出：“伟大的民主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强大、繁荣。我们强大、有影响力，并且繁荣昌盛，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在国际事务中，必须以自由来引导美国。“我们的政策必须反映我们的信仰——世界可以期望的绝不仅仅是生存，尊严和自由才是根本的精神需求。”卡

特重申，过渡时期已经开始。“现在，我们不再遭受共产主义带来的过度恐惧，它曾使得我们接受因为那种恐惧而加入我们的任何一位独裁者。我很高兴，因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卡特承认，一些美国人认为新的国家秩序令人担忧，这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一个新世界，但美国不应当为此担忧。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应当帮助它来形成。这是一个需要美国新外交政策的新世界——这一政策应当建立在长期体面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建立在充满乐观精神的历史眼光的基础之上。”这种乐观精神应当带领美国和世界进入一个新纪元。他说：“我们的政策植根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一点从没有改变过。我们的政策是为人类服务的，我希望这种政策可以使大家以身为一个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卡特采取行动来使自己的观点制度化。他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监控人权活动，委任民权活动家帕特里夏·德里安担任领导。他推举另一位民权运动老将安德鲁·扬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德里安和扬使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块试金石，他们斥责独裁者，强烈要求撤回美国对于独裁者的经济援助。卡特自己则公开与苏联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通信。他签署了联合国关于民权、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盟约，削减了对于阿根廷、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援助，对推行白人至上的罗得西亚和南非政府以及乌干达伊迪·阿明的暴政采取制裁措施。

卡特的新政策确实让一些美国人感到骄傲，却让大多数保守派感到恼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是名学者，她加入到新保守主义阵营，投入到论战当中。新保守派是一伙儿知识分子，他们从政治领域的左派转移到右派，这无疑激怒了他们的批评者。新保守派关注国内事务，但更关注外交政策。他们鄙视缓和紧张局势政策，到处攻击它。他们接受理想主义，但更以他们挑剔的现实主义为荣。

柯克帕特里克就是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身份来攻击卡特的。1979年，她在新保守主义的内部刊物《评论》中刊发了一篇题为“独裁统治与双重标准”的文章，抨击了总统固执的天真和因此产生的渎职行为。她声称，卡特把人权问题当作一根大棒来打击美国的权力主义朋友，但忽略了这个星球上的真正独裁者所犯下的更大的罪行。她发现了在右翼独裁和左翼独裁之间的重大差异：前者允许个人自主而后者不允许，并且右翼分子是可以挽救的。柯克帕特里克写道：“尽管还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被民主化的例子发生，但右翼独裁政府有时候却真的可以走向民主进化——假以时日，合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英明的领袖以及对代议制政府的强烈内在要求。”卡特无视这种可能性，因此也就不大可能进行改革。同时，他把美国外交政策当作一出道德剧，逐渐损毁了美国的实力和可靠性。“使得卡特政府前后矛盾，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样几方面：第一，政府的道德说教，这使得它极易被指责成虚伪；第二，政府偏爱那些侵犯美国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政策。政府对于国家利益的观念近似于双重标准：它认为友好的国家成了现实社会的有罪的代表，而把敌对集团的胜利看作有利于美国的‘真正利益’。”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些事件仿佛印证了柯克帕特里克的观点。尼加拉瓜被索摩查家族及其亲朋好友残酷统治了数十年，越来越遭到尼加拉瓜社会各阶层的反感。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组成左翼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包括温和派改良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卡特必须做出决定：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相比，索摩查政权是否更为可取。如果是，那么它是否是可以挽救的。两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当前的政界领导人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是否已经众叛亲离、完全丧失了信誉？假如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获胜，那么，掌权的会是他们中的温和派还是激进分子？是否需要出动美国军队来保证索摩查不被推翻？美国人民刚刚结束越南战争，是否会支持这种做法？

卡特试图采取折中办法。他对索摩查施加压力，要求他改进自己的行为，允许温和派参与到尼加拉瓜政治中去。他还削减了军事援助，但没有完全终止。

索摩查的反应并不像卡特所希望的那样。被认定与政府有关的枪手谋杀了知名度最高的温和派人士佩德罗·查莫罗编辑。暗杀增强了参与起义的激进分子的力量，他们进攻首都，很快就占领了国家王宫，同时俘获了上千名人质。索摩查对政权的控制出现了松动。

然而，直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几乎胜局已定的时候，卡特才呼吁罢黜索摩查。那时，卡特已经失去了对尼加拉瓜事务所拥有的一切影响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相信他对革命的帮助，这场革命大获全胜。美国的保守派指责卡特没有保护索摩查，击败左翼分子。

卡特在处理伊朗问题时表现得几乎一样。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能登上王位要感谢美国。美国在1953年与英国一同出兵，帮助推翻了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支持国王。然而这位国王没有表现出多少感恩戴德。他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中主导着价格鹰派。20世纪70年代期间，当该组织抬高油价的时候，巴列维无视美国关于他正在疏远伊朗人民的警告。卡特遇到了另外一个难题：他应当坚持让国王改革并接受势必会带来的变革，还是应当站在国王一边，因为担心变革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就像在尼加拉瓜一样，不可能知道起义者中哪一部分的分量最重。反对国王运动中的温和派承诺要超越国王，改善与伊朗人民和美国的关系。但是激进分子每时每刻都在谴责美国和西方国家。

卡特再次开始胡说了。他就人权问题训斥国王，却拒绝取消军事援助。他请国王到华盛顿访问，结果引发了美国反对国王的伊朗人的游行示威，也引发了支持国王的伊朗人的反示威，双方之间发生混战。华盛顿警方发射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结果瓦斯飘到了白宫上空，飘进了卡特、国王以及他们随从的眼睛里。卡特在回忆中称，这一刻是一种征

兆："催泪瓦斯制造了悲伤的气氛。差不多两年之后，以及那之后的14个月里，由于伊朗的原因，我们国家将会出现真正的悲伤。"

卡特自己在政治上也感受到了这种悲伤。国王失去了对于权力的掌控，其健康状况也发生恶化，罹患癌症，静等死亡，对于每天发生的事件越来越不关心了。1978年年初，警察在圣城库姆向神学院学生开枪射击，杀死了24名学生。这一事件导致动荡局面升级，最终迫使国王流亡，把权力交给了由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的一个小的伊斯兰教主义者组织。霍梅尼是大阿亚图拉，或称为什叶派宗教领袖。就像在尼加拉瓜事件中一样，卡特遭到双方的谴责。霍梅尼和伊朗的新领导人猛烈抨击美国，称其为"大撒旦"，而美国的保守派指责总统又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抵抗仇视美国利益的力量。

当德黑兰的一伙人冲进美国大使馆，抓获数十名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之后，卡特的信誉更是一落千丈。一些人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还有52人被扣留着。卡特发誓，要待在华盛顿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这52名人质获得自由。然而，他的这个誓言对他造成了不利影响。伊朗政府意识到，这批人质是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于是就扣留着他们。卡特自己也成了一名人质，被困于总统办公室，成了事与愿违的代表。

30

里根无法抵御这样一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的诱惑，也找不到不去尝试的理由。唯一可能会阻碍他再次竞选总统的，就是日渐衰弱的身体，但他没有沾染上让他父亲早亡的酗酒劣习，继承了母亲良好的基因。他母亲差不多活了80年，于1962年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享年79岁。在他的牧场里，里根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和新鲜的空气。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跟以前一样强壮，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很快失去健康。

因此，当里根于1979年11月正式宣布竞选的时候，没有人感到惊讶。他在纽约的一间挤满共和党上流人士的大厅里亲自发表演讲，之后，他又向全国发表了同一篇演讲的录播。他再次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华丽词库进行发掘，赋予罗斯福的名言以保守派的色彩："苦难中的人类在期盼着我们，恳求我们赋予我们的集会以天命：我们将支持自立、自律、道德的原则，并且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跟以前一样，里根呼吁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承诺减少税赋，这将迫使华盛顿方面缩小规模。他公开谴责政府监管不力，提议增加国防开支，重申了他之前对于卡特的批评——外交软弱，内政失策。在提到广为人知的"问题演讲"时——在这篇演讲中，卡特要求美国人审视自我，去发现这个国家不幸福的根源——里根声明说："我们政府的领导人告诉我们，人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们必须重振精神，重拾毅力，来实现我们国家的目标。诚然，我们缺乏信心，对事情焦虑不安，但是，我们所丧失的信心是我们对政府政策的信心。"

里根的时机选择好得不能再好了，民调显示，只有3/10的美国人认可卡特的表现。然而里根却步履蹒跚地迈出了第一步。他希望可以在关于自己年龄的问题上占得先机，于是在一次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

自己比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都年轻。汤姆·布罗考反驳说：“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比您年轻。”

“谁？”里根问道。

“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布罗考再次说道。

很显然，里根不知道吉斯卡尔是何许人也。后来，他的工作人员说，里根没有听清这个问题，但他们放弃了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意识到，与选民发现里根有点儿失聪相比，里根不知道谁是法国总统这件事的危害更小一些。

倘若在里根竞选活动开始的第二个月里，没有从克里姆林宫方面收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的话，那么他的出师不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美国不是唯一一个被伊朗革命搅得不得安宁的国家。苏联领导人担心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可能会进入中亚以穆斯林为主的苏联共和国。莫斯科方面一直在构建反对伊斯兰教教徒的防线，向穆罕默德·达乌德汗领导的阿富汗政府提供支持，但达乌德汗信誉不佳，而且在亲民问题上与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和伊朗国王有得一比，其结局也很类似，在1978年被推翻。（他和家人都被杀戮了。）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塔拉基和哈菲祖拉·阿明先是与日益强大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战斗，继而互相斗争，直至阿明在1979年9月策划谋杀了塔拉基。莫斯科给了阿明一次机会来镇压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起义，结果却是它变得更强大了，部分原因在于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鼓舞。克里姆林宫方面急于要同伊斯兰教教徒保持距离，于是在1979年12月，空运部队越过崇山峻岭进入阿富汗。苏联领导人声称，阿明邀请他们进行干预，因而此次行动就不能算是入侵。阿明的突然暴毙给这一解释蒙上了一层疑云，但无论怎样，阿富汗人或者外部世界的人很少有相信这一解释的。苏联政府扶植了一个新政权，开始了针对伊斯兰教教徒的血腥运动。

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下子让吉米·卡特清醒过来。至少他是这样解释

为什么立即下令改变政策的："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对于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要比这之前两年半的时间还要多。"他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对一名记者说道："苏联的行动让我深刻地改变了我对于苏联政府终极目标的认识，它的这次行动比我上任以来他们之前做的都要过分。"

卡特继续按照自己的突然醒悟来采取行动。他在1980年1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把苏联入侵阿富汗称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和平构成的最严重的威胁"。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警告苏联人，不要接近波斯湾水域和油田："任何外部力量试图取得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都将被视作是对美利坚合众国重要利益的攻击，此类攻击都将受到一切必要手段的打击，包括军事力量。"

卡特观点的转变几乎不能再具有戏剧化了，结果被里根以及其他反对缓和紧张局势政策的批评者占了便宜。在解释自己对于苏联人的错误认识时，总统承认里根和其他人是正确的。假如苏联武装力量进一步向南部地区进军，那就可能带来战争威胁。面对这种威胁，卡特目前所做的也就是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或者表明他们要采取的行动。

卡特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国会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国会同意了。他取消了粮食销售以及与缓和紧张局势政策有关的商业活动，撤回了允许苏联船只在美国海域捕捞作业的许可，及时下令美国奥运代表团待在家里，不去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不再公开提及"缓和紧张局势"这一说法。

卡特在缓和紧张局势政策中的投降做法，外加伊朗美国人质事件的持续折磨，可能会让任何一个可靠的共和党人轻易在他竞选连任中将其击败，或者也不大可能。美国人很少会首先从国际问题考虑，来进行总统选举投票，而是将以经济形势为首的国内问题看得更为重要。我有工作吗？我不会失业吧？我能买得起想买的东西吗？这些问题几乎需要每一个选民每天做出回答，而外交政策问题则不经常出现，也几乎不总是

那么迫切。

里根采取的最有效的攻击卡特的手段就是经济问题。在1945年之后的20年里，美国经济的表现相当令人满意，提高了生活水平，担负起了美国人所希望的和所支持的政府活动的需要。但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出现起伏。复兴的德国和日本向美国输送的货物越来越多，造成了贸易失衡，对美元造成了压力。同时，联邦政府在“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越南战争中花费巨大，导致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当国外美元持有者被迫出手他们贬值资产的时候，又增加了美元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从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撤资。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以及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汇率不复存在，美元跟其他许多货币一样，只是一种漂浮在货币交易者希望与恐惧的不断变化的大海上的货币而已。

当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利用20世纪70年代初需求增加这一趋势来把油价抬高4倍的时候，这个大海变得波涛汹涌起来。1973年，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爆发战争，为石油问题增加了政治因素。当时，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宣布，对美国采取石油禁运措施，因为它支持以色列。禁运只持续了数月，但油价持续上涨，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其结果是，美国遭遇到了从没有经历过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导致失业，这一趋势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不解。按照传统经济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被认为是逆相关的。升高的失业率迫使工人们接受低工资，压缩消费需求，因而也抑制了制造商提价的能力。但是，这一传统理论仿佛不再适用。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上升，导致一个新词汇的出现——“滞涨”，以此来指代这种新的不景气的形势。共和党人推广了一种新的度量标准“经济失调指数”，用以衡量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总和。

里根看起来处于最佳的位置，可以从经济困境中获取政治利益，因为共和党很自然地将其归咎于卡特。在共和党可能的候选人当中，里根是唯一一个享有全国性声誉和追随者的人。然而，乔治·布什曾在众议院工作过，之后又接受了一系列的任命。他决定挑战里根，争取提名。

布什是新英格兰人，移居到了得克萨斯州，在那儿组建了家庭，但没有成为得克萨斯人（相反，他的长子——也叫布什，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得克萨斯人）。布什在初选之前的备选时期远远落后于里根，但他希望可以让选民对于里根的年龄以及对于总统这一职位的整体健康要求产生怀疑。田纳西州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和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约翰·安德森也报名了，他们寄希望于里根和布什都不会一帆风顺。杰拉尔德·福特自娱自乐，暗示他可能会再次参选，但更可笑的是他跑到棕榈泉市打高尔夫去了，最终放弃了这一象征性动作。

刚开始时，里根低估了布什。这位得克萨斯的移居者，在艾奥瓦州诡异的政党会议开始前，就在该州安营扎寨，在全州与人握手致意、亲吻婴儿。里根的人忽视了艾奥瓦州，认为角逐直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才会开始。在以前的选举季，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艾奥瓦州比以往更引人关注，因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正在挑战卡特，争取民主党的提名。在艾奥瓦州报道民主党激战的记者们也无法不报道共和党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布什以微弱的优势击败里根，但这足以击落那位看似一定会获胜的候选人头上的王冠。詹姆斯·贝克后来承认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贝克曾在1976年代表杰拉尔德·福特对抗里根，现在作为来自休斯敦的私人朋友代表布什对抗里根。他负责布什的竞选活动，他说："这次胜利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

这种动力带来的打击和变化让里根和其他许多人都始料未及，促使他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投入到竞选当中。他在新英格兰的冬天表现出来的竞选活力大大缓解了人们对于他的年龄的担忧。初选前的一周，他与其他几名候选人一起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一次辩论，尽管他表现得不是太突出，可布什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布什失去了"大动力"，这是他对自己竞选势头的说法。

第二次辩论让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印象深刻。布什阵营希望能与里根来一次一对一的对决，以便更好地收集温和派那些反对里根的选票。里

根方面出现了分歧，他的一些顾问们认为，面对面的交锋可以让里根一下子击败布什，而另外一些顾问则倾向于让里根一人应对所有其他候选人，这样就可以把他跟其他人放到一起抨击，从而削弱其重要性。双方竞选团队最终同意进行一对一对决。但他们随后开始为谁来支付辩论费用展开争执。布什的团队目光短浅，推三阻四，而里根的人则同意为之埋单。此刻他们意识到，这给了他们主宰辩论活动关键细节和条件的机会。

里根本人对这种讨价还价并不知情，但他觉得应当把其他候选人也纳入其中，这些人正在为把他们排除在外而大发牢骚。有人传过话来，要他们到纳舒厄市的体育馆，辩论将在那里举行。他们在指定时间赶到，与里根一起开始讨论，而布什的经理人则在向《纳舒厄电讯报》的温和派人士乔恩·布林抱怨说，他们的人被骗了。布林表示同意，拒绝让另外4个人——霍华德·贝克、约翰·安德森、堪萨斯州的鲍勃·多尔和伊利诺伊州的菲尔·克兰参加。布什走上舞台，坐了下来。里根也是如此，但里根后面跟着另外那4个人。没有椅子，他们就在布林身后站在舞台上。

布什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就盯着前方一言不发。里根争辩说，那4位也应当有发言权，但布林遵守他所认为的基本规则，拒绝里根的要求。里根受到爆满的2000名观众的鼓励，继续要求放宽辩论人数限制。这时，布林示意音响师关掉里根的麦克风。

里根一直比别人更擅长煽情，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义愤填膺。现在，他就展示了这一招，大声喊道：“我花钱买下了这支麦克风！”另外几名候选人应当得到机会。

布林拒绝了，现场一片混乱。很多人高喊着支持里根，但极少有人支持布什。被排除在外的4位面向人群，苦笑不已，指着里根表示支持，而对布什则不屑一顾。他们最终离开了舞台，这场一对一的辩论继续进行，却虎头蛇尾，在第二天的新闻中极少有报道的，报道的几乎全

是里根如何勇于担当，表现出高于布什的人性优势。正如布什的新闻助理皮特·蒂利事后跟自己的候选人说的那样：“坏消息是媒体正在大肆宣扬这场冲突，好消息是他们完全无视这场辩论，在辩论中你也失败了。”

31

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证实了媒体对于里根优势的判断。他以超过2：1的比例横扫布什，把其他候选人甩得更远。布什尽管继续奋斗，但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里根在随后的初选中一路高奏凯歌，直至他的提名变得势不可当。边缘候选人都退出了，只剩下布什一人，他还在继续严词拒绝党内元老的忠告，不愿妥协让步，不愿追随里根。“布什十分顽强。”詹姆斯·贝克后来说道，还解释了一下，“他不想退出。”布什自己则相信他已故的父亲——前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每次当我权衡再三的时候，都会听到父亲跟我说‘你必须坚持到底’”。布什回忆说：“他教育自己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做轻言放弃的人。或许这一建议并不一定适用于竞选活动，但我还是不禁认为它是适用的，因此我不能放弃。”

然而，现实最终来临，布什也承认了失败。然而，他的顽强让他赢得了共和党选民的尊敬，他们认为尽管里根是党内的首选，但布什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二号人选。

里根经过了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才得出相同的结论。当时他不喜欢布什，认为布什拖延初选进程，削弱了共和党的力量。在棕榈泉市访问之后，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互相调侃了一番。此次访问本意是要展示党内团结，结果却成了一次爱的联欢。两人都认为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击败卡特。里根似乎提出了两人搭档竞选的想法。福特没有理会里根的这一表态，但也没有忘记。

在底特律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了一场加冕仪式，唯一能带来些戏剧性的东西就是确定里根的竞选搭档。记者们听到风声，知道

了里根对福特所说的话，福特还记得自己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福特政府中昔日的成员也变得活跃起来。詹姆斯·贝克回忆说："所有福特以前的手下都希望这能成为现实，他们希望重新得到昔日的工作。"福特被邀请来为党代会举行开幕典礼，他在开幕典礼中的演讲让观察者们感到震惊。演讲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承诺表明，福特已经准备好要再次登场。

里根再次邀请福特担任副总统一职，福特再次婉言谢绝，但没有之前那样坚定。里根对于记者们所谓的"竞选梦之队"感到很乐观。然而，他的几个顾问却认为这是一个馊主意。一位前总统如何能够适应做好副总统应当扮演的那种无足轻重的角色？如果他拒绝服从，将如何是好？

福特暗示说他可能会拒绝服从。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他将不仅仅当一名"有名无实"的副总统。"我去那儿带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将在各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这4年之中必须做出一些根本的、关键的和重大的决定。"福特说道。

里根同迈克尔·迪弗一起观看了福特的采访。迪弗回忆说："就像这么多年（现在应当是14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时我多次做过的那样，我仔细盯着我身旁这个人的表情。"福特的讲话突然让里根从竞选梦之队的幻想中走了出来。"他被震住了，眼里闪着光芒，说道：'这有些过头了。'"里根清楚，他不可能放弃总统的某些责任而不与宪法发生冲突。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走到目前这一步之后，他不会与别人分享总统权力的，美国政治的大舞台只能是他一个人的。

他意识到福特的采访可能会被解读成福特已经准备好出任二号人物了。里根不想让福特难堪，但在一次匆忙安排的私下会面里，他明确表明自己无法同意福特的条件。福特表示理解，一个几乎达成的协议泡汤了。

里根马上转向布什。他必须抓紧时间，以防媒体过多揣测那笔流产

的交易。他打电话给布什，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笼统，一个具体。“你会支持我的政策立场吗？”布什说他会的。“你支持我关于堕胎的立场吗？”里根逐渐对自己在开放加利福尼亚州堕胎法中的作用感到后悔，现如今他采取了保守而有约束力的路线，希望确定布什也是这样的。布什再次回答是的。随后，里根邀请布什接受副总统提名，布什接受了。

里根前往党代会大厅。几乎所有的代表们都期盼着里根宣布他选择了福特，因此当他解释说情况并非如此的时候，大家困惑不解。“我和福特已经得出了结论，而福特也深信不疑自己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身为前总统上，正如他承诺的那样兢兢业业，而不是体现在成为竞选搭档上。”里根说道。在代表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里根继续说道，他没有选择福特，而是选择了“一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此人也是一个候选人，政府工作经历丰富。他告诉我他可以全方位地积极支持党的纲领”。介绍到此，他几乎无须再说出名字了：乔治·布什。

副总统候选人布什走上舞台，他说道：“如果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胜利者，可以来问我，我是这一问题的专家。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领袖，因为他曾游历全国，了解国民。他的既定方针条理清晰，朴素易懂。”

第二天晚上，里根重申了那些方针。他抨击卡特和民主党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上让美国人民失望。“此次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民主党领导人对于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灾难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在政治上、人格上以及道德上的直接责任——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国会。”里根说道，“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如日中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他们希望你们告诉自己的孩子，美国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决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未来将是一个需要牺牲、少有机会的未来。同胞们，我完全反对这种观点。美国人民是世上最慷慨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最高的生活水平，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观

点——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倒退才能为别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些相信这一谎言的人决不能在管理国家中占得一席之地。“我绝不能袖手旁观，看着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庸庸碌碌之辈的领导下自我毁灭，这种领导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削弱了我们的国家意志和目的。”

里根描绘了另外一幅远景。“我恳请大家要相信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不认同种族、宗教、社会、政治、地区或经济界限，这种精神在数百万移民的心中熊熊燃烧，他们怀揣着寻求自由的梦想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到这里。未来的某一天，这种精神可能不复存在，但我曾见过它，也曾感受过它，在全国各个地方，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乡镇，还是在美国乡村地区。美国精神依然存在，随时准备再次燃起熊熊烈火，如果你我愿意为正义事业而奋斗。”里根把清教徒当作美国精神的典范，引用了开国元勋们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之后，他又开始引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讲话。“我相信，这一代美国人是应运而生的一代。”他说道，“我的同胞们，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再次抓住我们的命运，把它抓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结束时，他采用了一段经过深思熟虑的即兴演讲。“我曾想到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是我演讲的一部分，我在想是否应当讲出来。”他边说边盯着观众，然后继续讲了下去，把上帝引入到演讲中来。“我们能否怀疑这只是因为神明眷顾，上帝才创造了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度，把此地当作世上所有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的避难所：在铁幕之后忍受迫害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东南亚、古巴和海地乘船外逃的难民，在非洲遭受干旱和饥荒的受害者，阿富汗的自由斗士以及遭到野蛮囚禁的我们自己的同胞。”他停顿了一下，再次环视党代会大厅。“我必须承认，下面我要讲的让我有些担心——如果不讲，我会更担心——让我们默默祈祷，开始我们共同的改革运动。”大厅适时地安静了下来。随后，里根用一句话结束了演讲，这句话将成为里根的标志：“上帝保佑美利坚。”

里根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赢得总统大选主要是因为他跟赫伯特·胡佛不同。他认为自己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从中受益——与吉米·卡特不同。到了1980年年中，卡特的政治宝座已经岌岌可危。5月和6月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经济失调指数超过了21%，在竞选期间一直保持在20%以上，这几乎跟1932年一样高（当时失业率比1980年高，但通货膨胀却不合理——事实上是相反的）。考虑到这一点，单单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就足以让卡特完蛋了。国际形势也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苏联军队和战机残酷蹂躏阿富汗，这更强化了共和党的预言：卡特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过于幼稚。美国人质依然在德黑兰遭受折磨，春季的时候卡特授权进行营救，但行动彻底失败，导致数名美国军人丧生，这使卡特显得比以往更不称职。

然而，里根并不擅长保持领先地位，他思虑过多，失去了自发性。也正是由于他领先，所以与那些不被看好者相比，他的失误受到了更多的监督审查。在对参加过国外战争的老兵讲话时，他把美国在越南的工作称作一项"神圣的事业"。老兵们鼓掌欢迎，但里根的经理人们却哭笑不得。他们不是不同意这种说法，而是因为这种说法导致了针对越南战争的讨论，让媒体从里根的中心信息中分神了：经济形势摇摇欲坠，要想修复经济需要白宫易主。还有一次里根说了一些欠考虑的话，好像把卡特与三K党联系了起来。卡特方面自然提出抗议，而里根被迫道歉。在一次基督教福音派的会议上，里根被问及他对于与进化论相对的神创论的看法。里根清楚听众想听些什么，于是他说学校应当开设神创论的课程。他的经理人们再次被惊呆了，尽管其中一位把这一事件置于上下语境来解释。"此时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犯了这么多的重大错误，以至于记者们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报道。"这位工作人员后来说道，"神创论这件事让里根看起来像个白痴，但他侥幸逃脱了。"

劳动节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了角逐的紧张激烈，在一些统计中，卡特甚至追上了里根。但这些民调结果是靠不住的，因为里根在一些州里一直保持优势，可以为他提供所需要的选票。

双方为争取辩论席位而耍弄手段。约翰·安德森退出了共和党，进行独立竞选。那些对卡特不满而又没被里根吸引的潜在选民给了安德森足够的支持，使得他的竞选活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卡特的智囊团队不希望出现三方辩论，因为他们认为安德森从卡特那儿分出去的选票要多于从里根那儿得到的。里根很狡猾，意识到自己在纳舒厄市轰动一时的表现不可能重演，于是同意在没有卡特的情况下与安德森展开辩论。安德森比里根更能言善辩，但里根也并没有让自己难堪。此次经历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来接受卡特一对一的挑战。

里根与卡特的辩论在大选前的那个星期进行。卡特跟大家期望的一样，自己表现得像一位细节大师但缺乏个人魅力，里根则恰恰相反；卡特在为过去辩护，而里根则在承诺未来；卡特为准备此次辩论，自己潜身研究各种问题，里根考虑的则是他可以用来谴责对手的俏皮话或者名言警句。里根得到了意外帮助，很神秘地获得了一本卡特的重点提要手册。詹姆斯·贝克随同布什一起加入了里根的竞选团队。里根身边的加利福尼亚人意识到他们需要贝克掌握的经验。贝克后来说道："我是唯一一个运作过总统选举但没有进监狱的共和党人。"贝克指的是尼克松团队的那场"水门事件"。贝克的主要任务是为里根准备辩论。贝克后来说他是从威廉·凯西那儿得到的这本重点提要手册。凯西接替约翰·西尔斯担任里根的竞选主管。当时西尔斯与团队其他人日益疏远，被解雇了。凯西说自己不记得这本手册。"凯西没有说实话。"贝克之后断言道。尽管如此，贝克拒绝进行媒体所建议的测谎测试来解决这一问题。凯西曾是中情局局长，以弄虚作假著称。贝克承认说："我当时很害怕，因为他可以操纵测谎仪而我不会。"没有人被绑到测谎仪上，也没有哪一方能证明是对方的错误，这主要是因为这本重点提要手册并不十分重要，多是一些新闻剪辑，没有透露卡特的关键战略。"这不值得报

纸进行宣传。”贝克说道。

在辩论中，里根拥有一个更大的优势。林恩·诺夫齐格后来解释说：“在这些问题中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做你自己，因为没有人会因为观点而赢得或输掉辩论，赢家靠的是悟性。由于媒体一直认为里根比对手愚讷，而里根就这样表现，最终他赢了。”

里根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赢在悟性上。当卡特指责里根反对全国医疗保险，一直反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意义重大的项目的时候，当晚的高潮时刻到来了。一架摄像机对准了卡特，另外一架对准了准备回答问题的里根。当轮到里根发言的时候，他冲总统宽容地一笑，说道：“您又来了。”这句话并没有有力地反驳卡特，但克利夫兰音乐厅里的观众大笑起来，数百万的电视观众认定里根与那个缺乏幽默感的卡特相比，是一个更具魅力的人物。

里根乘势追击，发表了最后的讲话：“您比4年前更富有了吗？”他问道：“与4年前相比，您更能轻易到商店购物吗？与4年前相比，这个国家的失业率更高了还是更低了呢？美国还一如既往地在全世界受到尊重吗？您认为我们像4年前一样安全和强大吗？”这些问题只需提问无须回答，因为答案一目了然，而选民的反应也同样一目了然。

32

随着大选的临近，只有一件事让里根的团队担忧。威廉·凯西和其他人担心卡特会发动一场“十月惊奇”，安排伊朗人质获释。凯西成立了后来竞选活动“参谋长”埃德温·米斯所谓的“十月惊奇监督办”来关注政府与德黑兰方面谈判取得突破的迹象。领导这一监督办的理查德·艾伦解释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产生的成功解决人质危机的结果做出反应。”

这一监督团队不遗余力地设想可能的释放情境，并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10月19日，该团队拿出了一份机密备忘录让埃德温·米斯来宣布：“伊朗人知道这场角逐非常激烈，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卡特极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事实上是直到大选之前。预测到卡特可能会屈服于这种压力，监督团队建议里根做好准备。“建议指出，从现在开始到人质获释之前，里根州长应当在立场上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注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质获释随时可能发生。谨慎应对这一消息，但要很友好。罗纳德·里根应当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和祈祷，希望人质可以很快回家，即使是在大选前一天。第二，要坚持除非我们所有的人都回到家里，所有的条件都公开，否则美国政府不会从事任何交易或买卖。此外，我们必须留意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所带来的长期后果。”这样一种姿态对里根方面有两种积极作用。“一是如果人质真的获释，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通过产生出这种可能发生的期望，我们就可以减弱因为人质回家而带来激情流露。二是如果大选前人质没有获释，那么卡特会面临更高的信任危机，因为民众更希望他们可以获释。”

但是，谈判停滞不前，随着大选日渐临近，里根的团队越来越放松了。威廉·凯西要求候选人对人质事件保持沉默。在大选的前两天，凯西在写给里根和米斯的信中提到了卡特。“我相信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穷

尽了最后一丝努力想要巧妙处理人质事件，以获取政治资本，却再次搞砸了。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应当尽量少说话，顺其自然。”对于其他竞选工作人员，凯西则下达了禁言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不会因为我们竞选组织的任何言论而危及人质获释的可能性。”他写道，“这就意味着，除了那些得到特别授权的人之外，任何人从现在开始到大选之日都不能向媒体发表意见。”

有说法称竞选团队试图推迟人质获释，对这一说法凯西非常敏感，这可能是有特殊原因的。不久，他就赢得了这样一种名声——为实现他认为有价值的目的，坚决清除所有障碍，对秘密行动采取激进的、毫无保留的做法。同里根方面的其他人一样，凯西认为卡特当总统是一个灾难。对他来说，试图把人质释放推迟到大选之后来进行并不出乎意料，因此卡特就应当退休回到佐治亚州。

这也正是某些卡特的支持者后来所起诉的。伊朗门事件表明里根政府的做事手段包含了一些经不起公开审查的方法。在这之后，这些支持者的批评变得尤为尖锐，最强烈的控诉来自加里·西克，他是卡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人质谈判的重要参与者。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西克声称凯西曾同与伊朗政府有联系的人见过面，提出如果人质能扣留到大选之后，就向伊朗提供武器援助。

这一声明是爆炸性的，表明违反了洛根法——这是18世纪的一条法律，禁止个人参与外交事务——同时也延长了美国人质的痛苦和危险。几名人质要求国会展开调查。尽管大多数共和党人驳斥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是受到政治驱使的，但参众两院还是进行了调查。

参议院首先行动起来，但它的调查遇到了障碍。受命调查的检察官无法询问凯西，因为那时凯西已经去世了。他也无法调查里根，当时里根已经退休，拒绝做证。调查还受到检察官有限的传唤权力的阻挠，同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和以乔治·布什为总统的政府也不愿配合调查。

即便如此，调查还是发现了一些证据，尽管是间接的。这些证据为那些指控提供了依据。检察官从凯西的遗孀和女儿那儿得到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好像与这一事件有关。这两位女士出示了一些文件，但一些关键文件好像都丢失了，包括一份标记为“人质”的文件、一份1980年的日程表以及那一时期一份活页日历中的几张纸，据说当时凯西在马德里与伊朗方面的中间人进行了所谓的会面。应当能够记录凯西行程的护照也丢失了。最后，那份日程表连同一些日历活页出现了，其他东西却依然下落不明。

调查权限和资金都用光了，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然而，调查人员认定现有证据无法支持那种认为里根竞选团队与伊朗政府达成交易、推迟释放人质的说法。事实上，现有证据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这些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不存在这种交易。”这份报告称，关于交易的主要证人的证言是“完全靠不住的”。“他们关于所谓秘密会面的说法像谜一样，前后不一致，与无可辩驳的档案记录矛盾，也与大量更可信的证人的证言矛盾。”

但这份报告并没有让凯西摆脱干系。“这些证据整体上确实表明凯西在‘浑水摸鱼’”——报告在这里引用了一位证人的话——“还表明他代表里根的竞选团队从事了一些非官方的、偷偷摸摸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工作，收集有关卡特政府与伊朗之间反复无常、难以预料的人质谈判过程中的情报。”该报告还抨击了凯西的后人，说他们拒绝配合调查，表明“他们有意阻挠检察官及时获取相关材料”。

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小组审查的是关于后来被称为“十月惊奇”的问题——尽管没有发生这种惊奇。他们得出了与参议院特别小组大致相同的结论。小组主席、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李·汉密尔顿重申了针对凯西和里根竞选团队的指控的严肃性。“如果指控成立，那这些异常严重的指控会对里根成为总统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他又补充说，“如果指控不成立，那让这一疑云长时间地损毁被指控者的名声就是不公平的。”汉密

尔顿报告说，他领导的这个特别小组认为这些指控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没有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也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里根1980年的竞选团队与伊朗政府之间有过联系，也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该竞选团队试图推迟人质获释。”汉密尔顿承认，一些重要的证据还没有找到。“工作组没有找到凯西先生1980年的护照，小组的确获取了凯西在1980年3份日历中的一份，但这份活页日历中重要的几页没有了。”然而，缺失的材料对调查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材料的缺失并没有妨碍我们确定凯西先生以及其他人在被控与人会面那段时间的行踪。”汉密尔顿最后宣布这一案件结束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应当彻底停止争执。”

争议的确停止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消亡，新的证据偶尔还会点燃大家的兴趣。1996年，作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书。他在一次外交历史学家的会议上提到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那年年初时对卡特说的一句话。卡特当时到加沙与阿拉法特会面，布林克利随行。据布林克利透露，当时阿拉法特说：“总统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应当知道在1980年共和党人与我接触，如果我能安排把人质一直扣留在伊朗直到大选结束，就可以得到一笔武器交易。”阿拉法特注意观看着卡特的反应，但卡特只是在倾听。阿拉法特接着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当时拒绝了他们。”布林克利在对这群历史学家讲的时候自己又补充了一句：“阿拉法特保留着详细的记录，很快就会公之于众。”

布林克利提到的记录永远没有被公布，卡特也没有表现出想看这些记录的兴趣。在后来被问及阿拉法特的话时，布林克利说卡特仿佛一句也不想多听下去。布林克利把卡特这种没有兴趣的表现归因于他关注的是1996年的中东和平问题，而不是1980年发生的故事。

然而，其他的一些记录却被公开了。2011年，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应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公开了一些档案，这些档案与参议院和众

议院早些时候对“十月惊奇”的调查有关。档案材料反映了布什政府内部对于应当如何配合调查进行的一次辩论。布什团队的人担心一味地提出“十月惊奇”的问题会有损布什1992年连任的机会，因为一些指控认为布什与伊朗人有过联系，尤其是1980年10月巴黎的一次会面。政府更倾向于把调查控制在短期、小范围内，然而却无法完全回避。布什义愤填膺地否认了涉及自己的指控，他在写给一位之前的人质的信中写道：“我可以明确地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像那些造谣者指责的那样去过巴黎。我还可以无条件地向您保证，在人质问题上，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与伊朗人有过任何联系。”他跟记者们也说了同样的话。政府提交给调查人员的资料印证了布什的否认。

但是，政府拒绝公布表明威廉·凯西曾在马德里出现，并在当时和伊朗人有过所谓的会面的证据。白宫助理法律顾问保罗·比奇为此事所做的一份备忘录记录了比奇与国务院的埃德温·威廉森之间的一次谈话。威廉森解释说国务院正在收集相关材料，并在合计着把哪些材料提交给调查人员。比奇写道：“就这一点而言，埃德温只提到了一封来自驻马德里使馆的电报，里面提到威廉·凯西在城里，目的不明。”

当比奇的这份备忘录公开的时候，李·汉密尔顿大吃一惊，当时他已经退休了。汉密尔顿谴责布什的白宫政府隐瞒证据。“如果白宫方面知道凯西在那里，那他们当然应当告诉我们这一点。”汉密尔顿就差明说新证据证明了有关“十月惊奇”的指控是成立的了，但他重申凯西的行踪对于特别小组驳回指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凯西去过马德里。”他对记者罗伯特·帕里说道，“我们证明不了这一点。”他们无法证明的原因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隐瞒证据。“白宫方面没有告知我们他真的去过马德里。他们应当告诉我们吗？是的，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对此感兴趣。”

其他的一些证据不断地浮出水面。2013年，得克萨斯州前副州长本·巴恩斯告诉本书作者，他曾在1980年夏天陪同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

康纳利前往中东地区。当年，康纳利曾竞选共和党提名，但缓慢启动后不久就退出了角逐，支持里根对抗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州的对手乔治·布什。康纳利曾在理查德·尼克松手下担任过财政部部长，非常希望能在里根的政府中得到一个重要的职位。当时，他与位于休斯敦的文森–埃尔金斯律师事务所有联系，因而此次行程的目的被说成是“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的私人业务”，记录在公司档案中。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这是一次公务出行。尼克松对他的推荐先于康纳利的中东之行，他在写给一位外交官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会发现与他谈话非常有趣，因为他有着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并且他极有可能（我希望如此！）在里根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此次行程之初，康纳利好像曾与里根通过电话。一位助手做的一份交给康纳利的备忘录上写的标题是“里根州长”，内容是“南希·里根打来电话——他们在牧场。里根想与您谈一下关于参加战略会议的事。”康纳利一定会回电话的，但究竟谈了些什么，就无从得知了。

巴恩斯主动对本书作者说此次行程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有关，他说康纳利传话给他会见的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官员，说在11月大选之前释放人质对里根的竞选活动“不利”。当被问道这一信息是否来自威廉·凯西的时候，巴恩斯说没有人跟他说过，他也没有问过。

这事过去30多年以后，“十月惊奇”的故事依然迷雾重重。证据确凿无疑地表明，凯西和竞选团队非常担心卡特在大选前促成人质获释；证据同样清晰地表明，竞选团队准备通过暗示说卡特想抓住机会与劫持人质者达成协议，以此来让人质获释在政治上难以成行；证据表明凯西当时在散布暗示，或许甚至是做出许诺——里根政府将对那些帮助里根赢得大选的政府和个人另眼相看；证据还暗示（就丢失的护照和遗失的日历页码来说）并表明（就布什的白宫政府那份备忘录来说）利益各方有意地掩盖了相关信息。

可能除了里根与康纳利的通话之外，再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或者暗示

里根自己与为了他的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工作有任何直接关系了。他断然否认曾参与其中，称这些指控“纯属虚构”。在这一故事刚刚出现的时候，里根冷漠的管理风格变得很出名——臭名昭著，因为它与伊朗门丑闻有关。凯西对秘密的迷恋也同样出名。在里根的冷漠和凯西的秘密之间，里根的否认是完全值得相信的。

尽管如此，里根同样应对自己竞选团队为让自己当选的所作所为负责。假如他的团队所采取的措施违背了道德甚至法律，那么最终是要由他来承担责任的。

但是，里根的竞选活动并不是第一个偏离了正轨的竞选活动，如果真的偏离了的话。实际上，阻碍“十月惊奇”发生的努力几乎完全是多此一举。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伊朗人更不喜欢1980年10月的吉米·卡特。伊拉克刚刚入侵了伊朗，而伊朗人认为卡特就是幕后主使。他们没有理由让卡特得到满足，让人质获得自由，尤其是这可能意味着他会因此赢得美国大选。对伊朗领导人来说，卡特是个人尽皆知的讨厌的家伙，而里根则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不可能比卡特更坏了。无论里根的竞选团队是否承诺过用武器交换人质，伊朗人都铁了心地要等着卡特出局。

在没有“十月惊奇”的情况下，11月就是预料之中的了。美国人在11月4日投票，里根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击败了卡特，多出了800多万张选票，普选中得票率为51%，卡特为41%（安德森7%）。里根在44个州胜出，获得选举人团选票489张，卡特在6个州胜出，获得了49张选举人团选票。

里根在他和南希在帕利塞德购买的房子里观察着选举结果。卡特给他打去电话承认失败。里根驱车前往世纪大饭店对其支持者发表演讲，他说道：“大家都清楚，亚伯拉罕·林肯在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把负责报道

其竞选活动的记者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的麻烦现在结束了，但我的才刚刚开始。’”里根说他认为自己了解林肯的感受。“林肯所关注的是他当选总统的那个麻烦的时代，但我认为他并不恐惧，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那个依然年轻的国家的问题和麻烦，决心要抓住历史机遇，改变世界。”里根说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希望。“我对未来并不感到恐惧，我认为美国人民也不会对未来感到恐惧。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四部分 英雄梦 **1980~1983**

33

詹姆斯·贝克绝对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人，他领导了两次竞选活动，抵制里根获得共和党提名，然后在第二次失败后跳槽到获胜的一方，帮助里根当选总统。在里根击败卡特的两天之后，贝克被任命来负责里根的白宫。

贝克被任命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件事惹恼了那些长期战斗在里根一方的一些人。埃德温·米斯认为自己应当得到这份工作。米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与里根在一起，担任过各种工作：州长法律顾问、行政秘书以及办公厅主任。他为人精明，工作努力，在政治上足智多谋，是个忠心耿耿的保守派。但米斯不善于组织管理工作。林恩·诺夫齐格在几十年后暗示说："他有个手提箱，里面从没有清空过。我猜假如你翻到箱底的话，你可能会发现1967~1968年的东西还在里面。"米斯也没有办公厅主任应有的那种严厉。"埃德温没有生成个女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不会拒绝。"诺夫齐格继续说道："我所指的是最优雅的方式。埃德温愿意为你做世上的任何事情，他是这个糟糕世界中最可爱、最优雅的人之一。但是，当你无法拒绝别人时，你就会承担超出你能力范围的更多的任务。"而且，他愿意事必躬亲。"他不善于很好地分派工作和任务。"斯图尔特·斯宾塞同意这种说法。斯宾塞是政治顾问中的先驱，是第一批专业竞选经理人之一。除了里根之外，再没有人更能对里根的胜利负责了。斯宾塞非常了解米斯。"埃德温·米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除了他没有能力组织好一场两辆车的葬礼之外。"他说道："你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会发现这儿、那儿、地上到处都是文件。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之一就是接收好传到白宫的文件，把它们放置到合理的角落、合适的盒子里。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我们知道埃德温无法胜任。"

他本来还是有可能得到这份工作的，因为里根不愿意让人们失望，尤其是那些为他披肝沥胆工作过的人。并且他与米斯在一起比与任何其他人在心理上都感到更舒服。斯宾塞后来跟一位采访者说道："如果你坐在这间屋子里问埃德温一个问题，他所给你的答复与罗纳德·里根给你的答复会非常接近。他在思想上完全理解里根，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非常相似。"

但是在私人关系上，迈克尔·迪弗与里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近。他和斯宾塞都认为米斯在另外的岗位上能更好地为总统服务。至于办公厅主任一职，他们希望由更严厉、更善于管理的人担任，他们还希望这个人更精通华盛顿方面的事务。里根手下长期的效忠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加利福尼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此看作他们的优势：他们没有受到首都自由文化的影响。但是，里根自己抵制联邦政府的乌烟瘴气，迪弗和斯宾塞借此要求这位当选总统选择贝克担任办公厅主任。迪弗与里根讨论了这一话题，里根对提出由谁来担任办公厅主任这一问题表示惊讶，他说："我一直认为埃德温·米斯会胜任这一职位。"迪弗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说道："埃德温在另外的岗位上作用可能会更大。至于办公厅主任一职，您需要考虑了解华盛顿的人，了解政府运行方式的人。州长先生，我们即将入主白宫，但我们对此知之不多。"里根问他是否心里已有人选。迪弗回答道："是的，此人便是詹姆斯·贝克。"里根念叨了几遍这个名字，说道："詹姆斯·贝克，这个想法有点儿意思。"

斯宾塞对此事的记忆有些不同。据他说，他和迪弗认为他应当把任命办公厅主任这件事提请里根和南希商议。斯宾塞回忆说："每个人都认为埃德温·米斯应当成为办公厅主任，但我想'这不可以，我要给出我的理由'"。他前去与里根夫妇商议。"我提出了埃德温·米斯，但我还没往下说，里根夫妇就同时说道：'不，不能是埃德温。'他们明白，他们需要埃德温在身边，也希望他可以做些工作，但他们清楚他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

贝克自己把这一任命归因于南希·里根。“南希是我得到这一职务的原因。”贝克说道。南希清楚米斯的优点和缺点，更重要的是她清楚自己丈夫的优点和缺点。她完全相信里根有能力在思想上引领正确的航向，但她认为他需要帮助，避开华盛顿的暗礁。贝克正是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

无论是谁首先提出的这一议题，里根同意贝克最为合适，但这一任命并不被忠诚分子所接受。林恩·诺夫齐格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贝克，他后来说道：“总统是选来建功立业的，他曾做出某些承诺，做出某些保证。他怀揣一定的执政理念。假如你雇用的人不相信这一理念，此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会努力为这一理念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伤害别人，伤害你为之服务的那个人。”贝克不是保守派，这一点已经在他先是倾向福特，而后倾向布什来对抗里根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他如何能够效忠一位致力于保守变革的总统呢？诺夫齐格认为贝克是一个靠不住的机会主义者，他说：“詹姆斯·贝克就是为自己谋利的。”他又补充说：“詹姆斯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从不会说他愚钝或者其他什么，但我就是认为他在本质上不够忠诚。”

贝克认识到了对于他的敌意，但他认为这很愚蠢，也不利于实现新政府的目标。然而这并没有让他烦恼，因为顶层领导并不同意这种看法。“里根总统理解他的许多追随者所不理解的事：对办公厅主任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胜任工作，忠于领导，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信仰者。”他说，然后又补充道，“我对里根总统的思想非常信任，超出了我所得到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任变得越来越强烈。”贝克说里根总统的远见远不止如此。“他还明白，白宫办公厅主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透过政治棱镜来观察政治问题。在观察了我在1976年和1980年的工作之后，他显然相信我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贝克的副手是迪弗，选他的原因是他对里根的忠诚，并且对南希同样忠诚。“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为我丈夫工作的所有顾问当中，我与迈克尔最为亲近，他是我与白宫西翼的纽带。”南希写道：“我和罗尼同迈克尔是老相识了，在萨克拉门托那些年，他是里根的助理行政秘书。从一开始，我们三人就很投缘。等到他进入白宫以后，他非常了解罗尼，并且知道何时给他提建议，以及如何提建议。迈克尔从不害怕把坏消息带给罗尼，也不害怕告诉罗尼他认为罗尼做错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迪弗认为里根是正确的，尽管不一定是容易理解的。迪弗后来写道：“有时候，罗纳德·里根对我来说很像是一个谜，我从不知道有人会如此没有办法解决关系密切的人之间的冲突。每当出现有关家人的问题，或者是与他办公室人员相关的问题时，南希都不得不挑起解决问题的重担。事实上，我是通过与南希共事才逐渐了解了她的丈夫。”迪弗负责他和其他同事称为“当班老妈”的工作。他这样说道：“可能我发现这种说法比南希发现的更有意思。如果她发现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她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种说法暗示说所有人都需要承担迁就迎合她的工作。”

然而，迁就南希是应对她丈夫的方式。迪弗说：“有段时间罗尼·里根曾诸事不顺，而南希的任务就是保护他。她几乎承担了他们家庭的全部责任，同时还一直是他在公共生活中最亲密的顾问。”迪弗也曾见识过其他名人的太太们，南希却有些特别。“这不仅仅是她认识或理解自己的丈夫，大部分妻子也这样，或者她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她把里根当成自己的事业，而白宫也没有改变或扩大她的方法或动机。在我认识他们的这么多年里，她一直非常谨慎地利用劝说这种方法，并且知道何时运用，也清楚运用这一方法的难度。如果他拒绝听从，她就会缓和下来，再找另外的时机重回这一问题。”

南希的议事日程就是自己的丈夫，而不是政治或政策，但保护和提升自己的丈夫常常带有政治、政策方面的含义。迪弗说道：“必须要指

出来的一点就是，南希根本没有参与到政治中来，除非他的周围出现争议，或者是需要有人说服他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南希知道不能进行干涉，不能告诉他必须解雇理查德·艾伦或詹姆斯·沃特或唐纳德·里甘，也不能告诉他他所欣赏的那个人已经没用了或工作不力。她会悄悄地运作，潜移默化，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向前推进，得出一个结论：外交政策将会遭受损失，我们的盟友将会失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她加入到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来。“她对总统进行游说，缓和他对苏联的方针路线，减少军费开支，不要以贫苦人为代价推行星球大战。她赞成以外交方式解决尼加拉瓜问题，反对总统前往比特堡。”南希的办法不总是奏效，却常常管用——原因是理由正当，迪弗说道。“大多数情况下南希都会赢的。每当她赢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软磨硬泡，而通常是因为站在了事情正确的一边。”

埃德温·米斯不得不接受总统顾问这一职位，他一点儿也不高兴。斯图尔特·斯宾塞说道：“他的反应跟我想的一样，他对这一决定感到有些惊讶。”白宫顾问这一工作让米斯参与到有关政策的问题中来，里根为了缓和任命带给米斯的打击，把这个工作擢升到内阁级别，让米斯在政府的首要机构中占得一席之地。但一席之地与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米斯对詹姆斯·贝克的横空出世心生怨恨，立即开始挑战这位办公厅主任。斯宾塞说道：“我不知道‘反击’这个词的意思，但他决定保护自己的所有权。”

贝克采纳了里根的意见。里根对贝克说：“我希望你能与埃德温处理好关系。”贝克努力这样去做，却毫不退让。他本人是一个律师，并且知道米斯也是一个律师，因此他起草了一份类似合同的东西规划了他们各自的责任。他做得很巧妙，也很高明，把米斯列在首位：“总统政策顾问（内阁级别），超级内阁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总统和副总统缺席的情况下主持会议），作为委托人参加所有内阁全会，协助监督国务院

对内阁承担的责任，协助监督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贝克协助监督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贸易代表以及选拔与培训工作。作为委托人参加所有政策团队的会议。”

按照这份备忘录来看，贝克的责任看起来不太多。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没有任何要求，把总统的大部分工作留给了米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而，他坚持要掌握“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的任免权力”，以及“协调和控制所有递交总统的文件以及总统日程安排和预约”。他还要“履行办公厅主任的常规职责”。

米斯心存疑虑，担心贝克与椭圆形办公室的近距离接触会危及自己的利益。他坚持要贝克在他的备忘录下面加上一条：“在总统的同意下，参加总统出席的任何会议。”贝克同意了，并且在自己的备忘录上也写上了同样的条款。

贝克对这一揽子协议感到满意，他对米斯说道：“您得到了政策方面的权力，而我只需让这列火车按时出发。”但他清楚启动火车是实施政策的前提，这份理解备忘录并不完全等同于一份出发时刻表，但它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贝克回忆说：“这样做很好，从一开始就用律师的方式划分清楚了我们的领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一起为总统工作，各司其职，而不会为谁是第一而争吵。”

贝克对记者们说，这种安排完全是为总统着想。一位记者问道：“你和米斯谁是老板？”

贝克回答道：“罗纳德·里根是老板，我和米斯互为补充为他服务。”

米斯也采取了同样的说辞，只是不那么高兴而已。“总统喜欢呈送到他面前的问题。”米斯后来回忆说。由贝克、迪弗和米斯组成的管理团队被称作“三驾马车”，他们当中的不同意见确保了总统可以听到所有

方面的重要观点。米斯承认这些不同意见带来了摩擦，但他把这些意见归为坦诚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从一开始，由于这些不同政见，总统就得到了高质量的服务。”

另外一些与里根关系亲密的人认为这些摩擦是个人之间的摩擦。林恩·诺夫齐格声称：“这主要是因为贝克想要成为头号人物。任何可以把米斯边缘化或打压下去的事情他都会去做。我认为这与政见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因为贝克想要控制白宫，而米斯曾是与里根最为亲密的人。”

贝克同意米斯的观点：三驾马车的模式达到了其目的——也就是说达到了里根的目的。他回忆说：“这对总统来说的确非常奏效，他从各方都能有所收获。”但这种责任分化对分权者造成了负面影响。“工作很艰难，非常非常困难。”

除了白宫的三驾马车之外，里根还必须要组建内阁。国务卿是资深内阁成员，常常是总统最为重要的人选。但对里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用了10年时间来谴责缓和紧张局势政策，并不希望将其影响力恢复到缓和政策设计师亨利·基辛格的那个时代。里根选择的国务卿是亚历山大·黑格，此人可能是当时美国政府中个人简历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黑格曾当过兵，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起在朝鲜战争中服役过，并凭借在越南的英勇表现被授予勋章。他在尼克松的白宫工作过，在水门事件的乱局中升任为办公厅主任。重返部队之后，他在欧洲统帅北约军队。里根意在打造强力外交形象，因此把黑格将军招致国务院就是传递出了恰当的展现实力的信号。

按照里根的想法，比国务院更重要的部门是国防部。吉米·卡特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年要求并得到了国防开支方面的大幅增加，从而窃取了里根的部分力量。但是，里根计划继续加速扩张。他并不打算发动任何战争，因此像黑格那样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不是国防部所需要的，更关

键的是与数字和预算有关的资质。里根刚好认识这样一个人——卡斯帕·温伯格，此人曾是里根在萨克拉门托的预算主任，之后曾主管尼克松政府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后来就职于卫生、教育、福利部。在卫生、教育、福利部期间，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快刀卡斯帕”，因为他热衷于削减社会开支。在里根的五角大楼，他的任务刚好相反：花更多的钱，比以往多得多的钱。他一直有着节俭开支的名声，这就使得他可以先发制人来对抗有关铺张浪费的指控，这种浪费可能会被用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建设中。

里根希望在除了国防之外的绝大多数领域里削减政府开支，他打算首先削减税收。财政部负责监管联邦税收，因此里根希望派一个可靠的人担任财政部部长。尼克松推荐了威廉·西蒙，此人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担任过这一职位。然而，西蒙对于二次任职并没有太激动，除非他能得到比里根想给他的更多的权力。因此，里根把目光投向华尔街，认为没有人能比金融大师们更懂钱了。唐纳德·里甘是美林证券公司的头儿，尽管里根根本不认识他，但他看起来非常适合这一工作。这一工作最初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的，他创办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悠久的银行，同时也是每一个共和党人心目中财政部部长的楷模。

在级别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处于内阁各部门之下，但是其领导者比大部分内阁部长对政府运作的影响更大。里根尝试使用一位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奇才来领导这一部门。戴维·斯托克曼是一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位热心的财务方面的保守派，为人十分精明。菲尔·格拉姆是斯托克曼在国会中的同事，也是里根执政期间预算战争中的搭档。他曾经说过：“斯托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詹姆斯·贝克表示同意，他说：“此人天赋异禀。”在里根准备竞选辩论期间，斯托克曼作为吉米·卡特的替身参与其中，他为里根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帮助。里根现在认为，斯托克曼能够同样有效地打击那些反对小规模政府的对手。有人担心斯托克曼过于年轻、过于自我，里根对此并不在意，任命他来领导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34

联邦政府的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在不安地等待着罗纳德·里根的到来。几十年以来，里根一直在痛斥臃肿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当他在民调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之后，官员们有理由惴惴不安。

然而，有几个政府部门却希望从中获益。国防部盼望更大的预算，以及更多资金所带来的影响力和特权。但对选举结果感到最欣慰的是中央情报局。在丘奇委员会严厉批评了该机构非法的、令人讨厌的、让人难堪的行动之后，吉米·卡特趁机清理了门户。他任命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来领导这一机构。此人是一位前海军上将，对秘密特务行动不感兴趣。在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事件中，特纳解雇了几百名高级官员，让其余的人开始担心会被解雇。特纳在任期间恰逢另外几起中情局违法行为被披露出来，其中有些是由心存不满的前特工揭发的。弗兰克·斯内普详细描述了美国在越战期间最后那段士气低落的岁月。在这一过程中美方封锁了一些甚至连特纳都想要得到的秘密。中情局当时想要让斯内普保持沉默，但它的做法让媒体对他要说的内容更加感兴趣。中情局这个冷战早期的宠儿，成了让公众感到恐惧和嘲讽的目标：对那些针对美国人的暗杀阴谋和肮脏手段感到恐惧，对其无法成功实施这些阴谋和严守秘密加以嘲讽。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中士气低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里根的当选带来了改变这一趋势的希望。局里的官员知道里根曾反对丘奇委员会，为他们辩护过。一些年纪更大一些的官员还记得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联邦调查局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就反对好莱坞的共产党合作过。当里根选择他们自己的，或者说至少是他们自己的心腹之一来领导这一机构的时候，他们就更有理由期待对他们行动的更多同

情。威廉·凯西曾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工作过，负责“二战”期间欧洲的间谍工作。他同里根一样，认为情报工作对于战争和外交都是非常关键的。他十分精明，曾成功创建了纽约的律师业，担任过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但是，没有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有多精明，因为他含糊其词的表达习惯让大多数人不可能弄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作为里根成功竞选活动的主管，凯西处于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职位的有利位置。他想入主国务院。“这将开创一项超凡辉煌的事业。”马丁·安德森这样说道。安德森曾在尼克松的白宫工作过，之后他断定里根将是共和党的未来。在1976年和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他向候选人里根提供政策咨询；从1981年1月开始，他担任里根总统的政策顾问。安德森是在政府工作和竞选活动中认识凯西的，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他的背景和经验，他展示出来的管理能力以及他聪明狡猾的思维使得他堪当此任。”但里根周围的其他人认为凯西表达含糊其词，风度外表一般，很难成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他的个子很高，有点儿弯腰驼背，秃顶，脑袋两侧及后面长着几缕白发。”罗伯特·盖茨写道。盖茨后来在中情局担任凯西的副手。“他下巴后缩，嘴唇很厚，笑容狡诈，眼神不羁，穿着昂贵而古板，即使是在周末来办公室的时候，他也几乎总是西装革履。所有这一切让他看起来仿佛刚刚结束了一次夜间飞机旅行。他走起路来像是全身的骨头和肌肉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凯西让很多认识他的人对他都心生反感，包括国会议员。田纳西州的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曾聆听过凯西特有的那种含糊其词的陈述，当时里根转过头对他说：“你看，我从来就没有理解过威廉。”霍华德·贝克回答道：“总统先生，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邪门的事情了。”

因此，国务院就交给了亚历山大·黑格，他的风度同他的简历一样引人注目。凯西不得不接受中情局一职。马丁·安德森说道：“他一定很痛苦，大多数人把凯西任职中情局这件事看成一个政治上的肥缺。”——这一机会可以让这位上了年纪的华尔街人士通过再次扮演间谍而焕发青春。安德森说，凯西根本没有这样理解对他的任命。他把中情局看作安慰奖。“这个苦闷的、心怀不甘的老人无奈地接受了这份工

作，这是当时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

凯西决定尽力做好这份工作。“威廉·凯西来中情局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针对苏联的战争。”罗伯特·盖茨说道。凯西根据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的经验把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看成当年的德国，是美国致命的敌人。盖茨说道：“凯西需要能够挑起行动的情报与分析，不仅仅是简单的兴趣或具有教育意义，为自己做评估使用，他需要这些情报来更好地锁定秘密行动，或者有助于美国的宣传活动，或是协助军事行动，抑或是把谈判砝码置于谈判者手中。对凯西来说，美国和中情局都处于战争状态，就像年轻时他在战略情报局一样。”

战争需要战争计划。中情局为里根监督情报工作和外交事务做好了准备，让这位当选总统加速了解世界局势。就在大选之后的几天，中情局的官员就里根的情报喜好询问了里根的工作人员。斯坦斯菲尔德·特纳邀请凯西和米斯以及里根选定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一起来到他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特纳说中情局希望能为总统定制每日简报（用中情局的话说就是PDB），以便让它对里根总统发挥最大的作用。“中情局主任特纳让我们的来访者看了一下PDB，解释了它的作用，明确指出这份PDB是为总统定制的，我们希望利用从现在到宣誓就职这段时间来确定下来当选总统希望它做成什么样子。”会谈记录员这样记录道：“里根团队唯一指出的是字体再大一些就更合适了。”

特纳提出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就世界动荡地区局势向里根做出简报，无论这位当选总统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后一处地点有些困难，因为在里根的牧场附件没有安全的通信设施，而这份PDB必须要非常谨慎地保密。但是，中情局将会想出办法。

特纳提出为中情局提供资金的问题，米斯和其他人都表示同意。记录员写道：“米斯要求我们准备好我们对新政府的‘希望清单’。”特纳做

出回应，邀请里根的团队前往兰利市与中情局其他领导人见面。他们说如果时间允许，他们将非常愿意前往。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中情局的官员们一直在准备他们与里根的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在白宫对面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乔治·布什陪着里根，这让中情局的官员们非常高兴，他们记得布什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过中情局局长。出席会议的还有米斯，艾伦，凯西，以及詹姆斯·贝克。特纳在会议开始时介绍了中情局的任务以及这一情报机构的其他分支。他继续分析了给美国政策带来威胁的世界部分地区的形势：为期两个月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为期一年的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以及依然在持续的伊朗革命。他提到了这些运动的发展可能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中东地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

第二天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特纳和他的助手们向里根、布什以及其他人简要介绍了波兰发生的工会运动，波兰团结工会成功地发起了反对波兰政府的运动；他们还介绍了尼加拉瓜的情况，在那儿，掌权的桑地诺的支持者们正在使国家趋向“左倾”；他们还介绍了萨尔瓦多的情况，在那儿，保守派政府正试图先发制人阻止一场桑地诺式的革命。特纳还讨论了北约和华约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他还打算谈一些苏联的经济状况，但是由于里根的时间限制，会议时间被缩短了。

特纳对两次会议非常满意，他的助手记录道：“总体来说，通气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来自布什大使和艾伦先生。里根州长的问题主要对准一个方向‘我们对此能做什么？’”

12月，里根又收到了一次简报，还是特纳主持会议。尽管布什没有来，米斯、凯西和艾伦再次陪同里根到场，这次的主要议题是苏联经济。几十年以来，中情局一直在监视苏联的经济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模式看起来非常奏效，至少从发展整体经济上来说是这样的。苏联的经济增长超过了美国，这使得克里姆林宫方面可以向刚刚独

立的国家宣称他们的道路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然而，随后的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其增长曲线变得平缓。“自斯大林去世以后，经济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惨淡，政策抉择更加困难。”中情局的分析师在给里根的一份简报中这样写道。工业滞后，农业连遭重创。“莫斯科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在过去的25年里所使用的发展模式——最大化地投入劳力和资本——不再发挥作用了。”

中情局在这方面的主要兴趣就是，苏联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限制了莫斯科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部分源于军事，经济援助也起着重要作用。对克里姆林宫方面来说，未来在经济方面的援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而苏联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困难限制了莫斯科在军备竞赛上同美国的竞争能力。苏联领导人可能会把更多的国民生产投入到国防开支，但是要这样做，他们就必须窃取民生部分，这将招致普通百姓的敌意。苏联不实行选举，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但是，百姓可以运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不满。“工人的士气和生产积极性可能会大幅下降，进一步威胁到莫斯科想要维持哪怕是低速经济增长的努力。”

中情局的分析师预测，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克里姆林宫方面将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但从长远来看，现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苏联的经济问题太过严重。”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克里姆林宫将被迫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选择。第一条道路是更加痛苦地维持现状。“莫斯科可以在国内推行更为紧缩的政策来支持军费开支，消费将遭受更大打击。为了能够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克里姆林宫方面很可能会宣扬来自西方的威胁。第二条道路是通向改革之路，新一代领导人不再沉迷于现状，他们上台之后很可能会进行对消费者更为有利的资源分配方面的改革，这也是一种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更为可行的办法。”领导层的变动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关键岗位上的大部分领导人也都70多岁了。”

在里根通气会的记录中，没有记录他对中情局针对苏联前景所做评估的反应。很显然，他听取汇报之后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想法，但他一定会从共产党正在遭受的困难中得到启发，他曾在早些时候对理查德·艾伦说：“我对冷战的理论是：我们胜出，他们失败。”当时，他还只能揣测一下苏联的经济到底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而今他知道了，于是，就有理由希望胜利会比他想象的来得更早一些。

35

1981年1月20日，里根和南希在白宫外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醒来。9点30分，他们出席了位于拉斐特广场北面拐角处的圣约翰圣公会大教堂举行的一次简短的招待会。南希回忆道："我们坐在乔治·华盛顿的座位上，那天早晨，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

吉米·卡特有着同样的感受，只不过被放大了而已。卡特认为，自己比里根更胜任总统一职，他对自己选举的失败依然耿耿于怀，在释放伊朗人质的最后一刻的努力中，他的态度没有太大改变。交易即将达成，但是伊朗人仿佛执意拒绝让他在在位期间成功解救人质。南希·里根表达了对这位即将离任的政治首脑的同情，她说道："卡特总统一整夜都在忙于伊朗人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也能感受到他为此付出的努力。"

里根表现得就不那么富有同情心了。他是这样描述国会山之旅的："豪华轿车里的气氛有些冷淡，就像几天前白宫里的气氛一样，当时我和南希第一次前往那里，看一下我们要住在哪个房间里。我们曾希望卡特夫妇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家庭生活区，但是他们很快离开了，把我们交给了白宫工作人员。当时，我和南希认为这是有意冒犯，看起来十分失礼。"再次回想起来的时候，里根的想法软化了许多。"8年之后，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卡特总统当时的感受——在经历过身为总统之后，在经历了这一工作的跌宕起伏之后，在努力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之后，在举行了所有的告别晚会之后，在通过人民选举被迫离开白宫之后——这一刻对他来说太艰难了。"

豪华轿车抵达了国会山，里根迈步登上了美国最大的舞台。50万民众前来观看这位新总统就职。他们的到来堵塞了大街小巷，导致华盛顿地铁瘫痪，迫使服务人员打开十字转门，让人们自由进入，以防地铁完全瘫痪。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威胁到了地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在距离国会山最近的站点，乘客们议论说发生了一次震动，就像地震一样。

随着午时就职典礼的临近，人群涌入到国会山西面的国家广场。自19世纪以来，历任总统都是在国会山东面进行就职宣誓，但俄勒冈州的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跟里根一样都来自西部，他担任国会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就职典礼。他认为，是时候让这位新总统在另外一边宣誓就职了，这一边一直代表着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里根很高兴，支持这一创新，因为这次演讲的听众比他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也几乎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次。

演讲的环境再好不过了，光线的变化也极具戏剧性。当天上午的气温打破了华盛顿历史同期的记录，但是乌云笼罩着天空，直到里根迈步向前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云开雾散，阳光普照。他从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那儿接过宣誓词，南希手里拿着内莉·里根的《圣经》，内莉的儿子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要维护、保护、捍卫宪法。

里根转过身，发表他的就职演说，他停了一会儿，感受一下这神圣的时刻。或许他想起了内莉第一次把他带到舞台上的情景；或许他想起了观众第一次鼓掌时他所听到的天籁之音。此刻，人山人海，鼓乐震天。从他所站的地方看不到伊利诺伊州，但他可以看到伊利诺伊州的同乡——在距离国家广场两英里之外的、光彩夺目的林肯大理石雕像。在他们两人之间矗立着乔治·华盛顿纪念碑。今天，在面前的广场上，数十万美国百姓不是前来瞻仰林肯或华盛顿的，而是来一睹里根的风采。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呼喊着里根的名字，在里根开始讲话的时候，他们面带希望地仰视着他。

里根以巧妙的点缀开场，他提到了美国长期以来党派之间权力和平交接的传统，即使面临严峻的考验。他温情脉脉地向卡特点头致意，这超乎他自己的想象。他感谢自己的前任在交接时期给予的配合。

他回到了竞选的主题上来，这一主题把他带到了此时此地，这一主题激励了现场无数的观众。里根说，经济一片混乱。这样说的时候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皱了皱眉。通货膨胀一路飙升失控。“这歪曲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不利，压垮了奋斗中的年轻人和有固定收入的年长者，威胁到了我们数百万百姓的生活。”失业夺走了无数诚实美国人的尊严和希望，而政府用不断增加的税收来惩罚大众。然而，税收无法满足政府的胃口。“几十年来，我们的财政赤字积重难返，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孩子的未来被抵押，来换取当前暂时的便利。”这种破坏性的、混乱的趋势不能再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必须得到控制。

里根知道，在他讲话的时候会有新闻媒体进行原声摘要播出，他在讲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想象到自己在晚间新闻中的形象：“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途径，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他让自己的听众仔细考虑自己这句话的意思：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政府首脑正在对这一政府宣战。

里根继续解释说，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占据着政府，把政府变成它们自己的目的。他说自己是在为更广泛的利益集团——美国人民代言。他承诺要约束政府，还美国人民以正义。他又补充说，自己将更加尊重各个州的权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谨记，并不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各个州，而是这些州创造了联邦政府。”

这位新任总统的一些新听众无疑会怀疑最后这一说法，尤其是这一说法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前州长，因为该州毫无疑问是由联邦政府创造的。但是，里根继续演说。他挖苦了那些认为美国最好的岁月已成过去的人。相反，民族复兴只需要重振开创这个国家的那种英勇的精

神。“我们拥有一切重拾英雄梦的权利。”他说道。英雄主义是美国人的基因代码，这种传承既完全体现在普通美国人身上，也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身上。

里根再次环顾国家广场，向林肯雕像和华盛顿纪念碑做了一个手势，然后举目远眺，说道：“在这些英雄纪念碑和纪念堂的远方就是波托马克河，在河岸远处的山坡上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排一排素白的大理石上面刻着十字架或大卫王之星。”每一块碑都代表了为国尽忠的精神。“在其中的一块墓碑之下安眠着一位名叫马丁·特雷普托的年轻人。1917年，他辞去了在一个小镇上一家理发店的工作，加入著名的‘彩虹师’前往法国。他在西线冒着密集的炮火为部队传递情报，不幸阵亡。我们得知，在他的遗体上发现了一本日记，他在日记的扉页上，以‘我的誓言’为题写下了这些话：‘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会奋斗，会拯救，会牺牲，会忍耐，我会心甘情愿地去打仗，竭尽全力，就好比整个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我一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并不要求我们像马丁·特雷普托那样做出牺牲，里根说道：“然而，它确实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要求我们愿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具有做出丰功伟绩的能力；它还要求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能够并且必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相信这一点呢？因为我们都是美国人。”

36

戴维·斯托克曼没有期望加入里根革命的突击部队。当他的政治导师、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说，自己不会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而要加入里根的竞选团队时，斯托克曼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罗纳德·里根！杰克，我无法相信，您会同里根混到一起去。"他后来解释了自己的惊讶："那个家伙的思想比他的年龄还要老化过时，我认为，他是一个狡猾的蒙昧主义者，其政治基础与盘踞在美国政治幽灵中的狂人和极端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许多其他新保守派分子一样，斯托克曼的公共生活开始于美国政治中的激进左派，同他们一样，他极少关心那些给众多共和党右派带来鼓舞的社会问题。他说："我不在乎道德的多数派、男女公厕问题、学校的祈祷修正案以及新右派分子的其他琐事。"这些琐事干扰了对于当下一些至关重要问题的关注："你如何才能让经济繁荣，阻击苏联人？"事实上，社会问题比带来的干扰更为糟糕，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不信任经济调整，也不信任道德调节。"

斯托克曼知道肯普也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与里根之间的联系如此让人感到震惊。"他与杰里·福尔韦尔、反对枪支管制的冥顽分子、坚持创世论者、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迫害者以及思维狭隘的好莱坞百万富翁们结盟，对这些百万富翁来说，'供给'意味着又要浪费一辆奔驰车。于是，我就在想：'这个老顽固将会如何帮助我们呢？他正是政府所需要的来怀疑我们观点的那个人。'"

对斯托克曼和他的那些供给理论家来说，由华盛顿圈内人士和心腹密友组成的政府是美国复兴的敌人。供给经济学将自己定义为反对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美国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部分时间内的需求方经济学。需求方人士认为，保障性充足的供应会让经济增长，国家繁荣。当私人需求减少时，比如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应当介入，增加公共需求。而供给人士则认为，这种方法注定会失败，因为国家会不可避免地依赖政府开支。他们还认为，在其他方面的依赖，将不得不给予更多的政府开支来防止萎缩。供给人士的证据是最近和当前经济的糟糕表现——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和几乎史无前例的失业率。

供给人士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关注供求关系中的另外一方。供给人士反对凯恩斯主义那种资本经济本身固有繁荣与萧条的观点，他们把萧条和其他形式的病态表现归咎于政府的干扰。解决的办法不是制造人为的需求，而是巩固需求方。正如斯托克曼所描述的供给的工作日程那样："政府必须明白，你无法通过调整工资和控制价格来阻止通货膨胀，你必须停止印刷钞票。政府必须明白，你无法通过增加福利来创造经济增长，你必须开始减少福利，削减税收。"

斯托克曼对里根是只闻其名，他想象不出这位前演员能够掌握供给经济学的本质，但肯普说里根知道。斯托克曼回忆道："里根已经成功'转型'。在日常初选活动前一天晚上，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场集会。埃德温·米斯认为，州长必须刻苦学习供给经济学——于是，他就认真运作起来。"肯普安排里根与供给人士祖德·万尼斯基和阿特·拉弗见面。"据杰克说，他们与里根在一起待了几天，讨论金本位、减免税收、供给理论、经济增长以及全部细节问题，里根州长表现得非常积极，肯普说他对拉弗曲线有一种本能的'感觉'。"拉弗曲线是一种理论曲线，用以表明降低税率能够增加税收，促进经济活动。"'他对我们是90%的投入。'肯普高兴地说道。"

倘若斯托克曼或者肯普曾用心读过几十年来里根的演讲和文章，那么这件事根本算不了什么。里根不是一个主张金本位者，但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宣传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自由，更为了

经济增长。

无论斯托克曼是否对里根支持供给人士的观点感到惊讶，大选之后，当里根邀请他负责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时候，他激动不已。把斯托克曼推荐给总统的肯普告诉他说，马上会有电话打来。斯托克曼回忆说："为此，我还准备了几句漂亮好听的话。"但是，电话迟迟没来，他的灵感也就消失了。"当电话铃声最终响起的时候，我的双手在颤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总统通话，结果一张嘴就是一句平淡无奇的带着中西部口音的'你好？'"里根并没有在意。"正如我之后反复见识到的那样，罗纳德·里根具有那种能让你完全放松下来的本事。里根用一种轻松悦耳的声音说道：'戴维，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跟你扯平，因为在辩论排练中你曾经击败过我。因此，我决定派你到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去工作。'"

与戴维·斯托克曼相比，唐纳德·里甘对于有机会为新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并不感到太惊讶，同时，他对供给经济学也并不陌生。里甘毕业于哈佛大学，这让里根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更让里根印象深刻，他还曾担任华尔街美林证券公司总裁，这让里甘看起来非常适合财政部的工作。他还是一位爱尔兰同乡，这使得里根对里甘很亲近，但后者并没有完全投桃报李。里根肯定他们同祖同宗，尽管他们的名字发音不同。里根非常喜欢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俩像是一棵藤上的两个瓜。在这个故事里，里根刚刚当选州长不久，作为嘉宾，他出席了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午餐会。午餐会的主持人曾见过打印好的里根的名字，但从没听过是怎样发音的。他不知道应该是里根还是里甘，疑惑之中，他沿着贝弗利山散步，遇到了一个正在遛狗的人，这位司仪想，此人可能知道答案，于是就问他，这位新州长的名字应该怎样读，这人说道："应该是里根。"司仪问他是否确定。此人回答道："相信我，就是里根，我认识这家伙好多年了。"这位司仪长舒了一

口气，感谢这个人为他解决了问题。他又说道：“对了，顺便问一下，这狗不错，是什么品种？”这人回答说：“硬面包圈。”

在1980年大选之前，里甘曾见过里根几次。威廉·凯西建议里甘作为优秀的共和党人和同华尔街关系密切人士组织一场募捐，里甘照做了。在这之后，里甘再次遇到了里根。募捐之后，他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同这位候选人讨论了经济形势。里甘回忆说：“他的谈话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好像他已经有了不错的经济方面的建议。”

大选之后，里甘听到风声说，自己正被考虑为财政部部长的人选，但他对这一传闻半信半疑，因为据说威廉·西蒙是第一人选。然而，威廉·西蒙拒绝了，于是，里根打来电话，为他提供这份工作。里甘回答道：“非常感谢您，我接受。”里根仿佛有点儿吃惊，难道里甘不需要考虑一下吗？不需要跟妻子商量一下吗？里甘回答说：“总统先生，为什么要考虑一下呢？当选总统要求为国尽忠之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怎么能拒绝呢？如果您选择了我，我就有责任接受。”里根表示很满意。里甘需要等待白宫工作人员的来信。里根说：“那就华盛顿再见。”

事实上，里根并没有在华盛顿见到里甘，至少不是经常见到。在总统第一任期的8个星期里，里甘给自己写了一份备忘录：“时至今日，我竟然没有得到一分钟与罗纳德·里根单独见面的机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单独坐下来，向我解释需要我做什么，需要我取得什么样的目标，总统需要什么样的结果。”里甘在商界的经历使得他习惯接受书面的、量化的目标，但他在华盛顿没有这样的目标，这让人不安。“如果没有明确目标，这让人如何去工作呢？我一直努力去做我认为应当做的，如果我错了或者没有做正确的事情，就让别人告诉我。”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这样做，里甘禁不住想，这种缺乏指导的工作充满了风险。

里甘的当务之急包括总统不久之后需要提交给国会的预算。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联邦政府预算出自国会，这正如宪法制定者们计划的一样。但是到了20世纪，对于预算的改革——正如对国家管理许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转移到了行政部门。联邦预算变成了一种工具，凭借这种工具，总统的承诺可以转变成公共政策。对里根来说，他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议案将表明他关于减税和小政府的要求如何具体成行。

上任两周之后，里根发起了经济改革运动。他和自己的顾问们曾考虑发表一份正式的国情咨文，但后来用他所谓的“关于我们国家经济现状的报告”来替代。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对此他已经说了无数遍。“自经济大萧条之后，我们现在处于最糟糕的经济泥沼之中。”而政府，正如他在就职演讲中说的那样，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联邦预算完全失控。”当前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会接近800亿美元，这比上一代人全部的联邦预算还要多。20年间，联邦政府的工资单增加了4倍，银行利率比“一战”之后任何时期都要高，失业人数达到700万。“如果这些人站成一排，每人占用3英尺，那么，将从缅因州海滩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海滩。”

在巡回竞选演说中，里根经常抨击扩大政府规模的邪恶企图，也就是对权力的官僚意志。当天晚上，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面向全体美国人民。“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希望从政府中获益。”他说道。这种利益曾经显得唾手可得。全国的收入在“二战”之后的那一代人中翻了一倍，经济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不断扩大的政府带来的负担。通货膨胀在上升，但没有达到警戒水平。

然而，美国人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里根说道。有些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里根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那些黄金岁月，我们可能记得当时有人警告说，通货膨胀就像辐射一样，正在积累，一旦开启，就容易失去控制。”结果现在已经失控，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家，这将会继续下去，除非联邦赤字得到控制。

问题是如何控制。办法之一是增加税赋，但这种方法已经尝试了，结果彻底失败。“在‘二战’之前，税赋是这样的：我们平均只需要每年工作1个月多一点儿，就可以支付我们全部的联邦、州和地方税单。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工作4个月来支付这些税单。”税赋上涨了，但政府规模发展得更快。

解决的方法不是增加税赋，而应当是削减税赋，这听起来有些矛盾，因为这好像会加剧赤字问题，然而，这是控制开支，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曾探讨过缩减政府开支，以便可以减轻税收负担。有时候，我们甚至这样尝试过。但总是有人跟我们说，税赋不能降低，除非减少开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奢侈浪费，直至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者我们只需减少他们的零用钱，就可以改正他们奢侈浪费的毛病。”

里根的听众中可能没有人意识到最后这一句话的意义，里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通过将削减税赋置于减少开支之前，他打算带领美国渡过经济难关。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至今一直把平衡的预算当作他们财政思想的试金石。他们力图削减税赋，但并不以增加债务为代价。他们清楚，削减税赋在政治上简单易行，因为这可以让选民高兴。里根决定，先进行简单的部分，困难的部分可以等到日后再说。

里根并非不重视削减开支。他解释说，他已经下令禁止联邦政府招募新人，命令减少政府差旅开支，裁减联邦政府雇用顾问的数量，并取消政府采购新设备的订单。这仅仅是开始，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他的政府将很快出台一份计划，“计划在几乎每一个政府部门中削减预算”。

然而，针对这份笼统的减少开支的承诺，里根又提出了非常具体、具有实质内容的削减税赋计划。“在未来3年中的每一年，我都将要求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上全面降低10%。”

里根将自己这一揽子计划定位成这个国家最后一次摆脱过于自大的

政府，重拾繁荣、恢复自由的机会。“多年以来，我们让消极经济势力失去了管控。我们拖延了末日的到来，但再也没有了幸福。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未来的后人可以感谢这一计划或者谴责它。“我们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一笔无法偿还的巨大债务和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或者我们可以留给他们自由，在这个自由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那个人。”

37

当戴维·斯托克曼抵达位于白宫西面行政办公大楼里自己的办公室时，他注意到了两件事。办公室很大——“大约有我初中的体育馆那么大。”他说道。这里也很脏。“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它差点儿从我手里滑落，上面油乎乎的。”斯托克曼情愿把这一状况看作卡特政府时期他的前任们在办公室保洁方面值得提倡的节俭，但是，他的一个副手说道：“电话油乎乎的原因是，他们在最后4个月的竞选活动中一直在分发猪肉。”

斯托克曼清理了办公室，开始着手清除掉那些猪肉。里根向国会承诺的经济蓝图迫使总统的经济团队历经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斯托克曼试图控制整个过程，提出对大部分内阁部门大幅削减开支。他认为，由于内阁部长都是由里根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都应同意里根削减政府规模的观点。在理论上，他们确实如此——当削减目标是其他部门的时候，可在实践中——当斯托克曼的手术刀伸到他们自己部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了。詹姆斯·爱德华兹所在的部门是能源部，里根承诺要废除这个部门，爱德华兹反对斯托克曼不给能源部办公室提供资金和终止配给计划的建议。斯托克曼很吃惊，他在提到这种违反规定的做法时说道：“这是我们自由市场方针的核心，我从没想到有人会反对。”反对者并非只有爱德华兹一人。交通部部长德鲁·刘易斯指责斯托克曼通过违反规定的做法来为自己争取权力，他责问道：“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构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官僚机构？”斯托克曼再次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他说：“我瞠目结舌。”他不是在构建一种官僚机构，而是在分解。提到刘易斯的时候，斯托克曼说：“他完全理解反了。”

唐纳德·里甘认为，斯托克曼误解了事情的本质。斯托克曼素有青

年才俊之称，但里甘并不买他的账，他也不会接受斯托克曼对于经济政策的控制。里甘写道：“斯托克曼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他认为联邦预算必须管理经济，进而左右社会政策。这是一种哲学立场，旨在通过官僚手段实施。他的行动计划也相应地较为简单：通过控制流向内阁各个部门的资金，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就可以砍掉几个项目（比方说社会福利），并且来扶持其他从经济角度来说产出性更高的项目。”

里甘并非政客，但他认为，斯托克曼的办法过于自负，并且无视民主进程，他说：“斯托克曼让事情倒退了，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以及里根所承诺的——并不是更多的中央集权，而是更少。当然，我说的是团队（对预算有争议的各个部门的团队），我们希望首先讨论经济问题，利用政策来扭转经济颓势，促进增长，然后再决定需要什么样的预算。”

里甘的问题以及斯托克曼的问题就在于，预算人员从里根那里得到的指导太少了。里甘依然没有在繁多的内阁会议之外与总统会面，斯托克曼也没有。斯托克曼把这一障碍归咎于白宫的三驾马车，特别是埃德温·米斯。斯托克曼回忆说：“当时，很明显，米斯正在保护总统，使他避免在其内阁成员之间选边站。他负责保证里根永远不必在有争议的各方中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这当然会让里根置身事外，但是，总统必须要做出令某些人不快的决定。无论何时，只要有争议，米斯都会介入进来，告诉我们把争论提交到某些临时座谈会。总统当然会笑容可掬地说道：‘很好，你们就看着办吧。’”

卡斯帕·温伯格也是满面春风。他的国防部在行政机构当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不但没有削减预算，而且有望大幅增加资金。在缓和紧张局势期间，保守派，尤其是新保守派，曾坚信美国军队建设缺少资金。他们撰写文章，印刷图表，声称苏联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领先美国，非常危险，尽管他们从没有发现哪位现役或退休将军或海军上将愿

意用美国的军火与苏联的交换，他们把世界末日的大决战描绘成迫在眉睫。里根采纳了这一观点。在做候选人的时候，他就承诺要重塑美国军力，将其恢复到他们之前那种不可撼动的领先地位。

温伯格成了里根指定的重建五角大楼的人选。温伯格的偶像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还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他自己还是个孩子时阅读丘吉尔的文章，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效仿丘吉尔的政治际遇。当时，丘吉尔在议会中警告自己的同胞，要警惕希特勒，提出必须要做好战争准备。1940年，温伯格试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当时，丘吉尔正在组织英国人民抵抗纳粹进攻，但是，他由于视力太差被拒绝了，珍珠港事件让他很兴奋，因为这让美国同英国并肩作战。作为一名美军步兵，他通过广播收听了丘吉尔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号召英裔美国人团结一致，抵抗法西斯。同时，他对自己被迫用来训练的，甚至携带进入太平洋战场的落后的武器装备颇有怨言，因为长期以来，国会对国防拨款一直非常吝啬。“我不会忘记，我们用了多长时间才得到合适的装备，也不会忘记，我们是多么没有经验，更不会忘记，在丛林战中，我们是多么的毫无准备，而对手却非常熟悉丛林战法，并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温伯格回忆道：“因此，40年后，当我受命于此，有能力影响军事发展的时候，当我看到我当时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直接成为威胁我国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国家意志时，我决定要竭尽全力阻止美国重蹈覆辙，踏上随波逐流、自轻自贱、软弱无能的老路。倘若如此，我敢肯定，这会导致另外一场战争。”

温伯格对重建美国军力的坚持得到了里根的积极支持，这使得戴维·斯托克曼的工作变得越发艰难。事实上，斯托克曼并不反对，他后来说道：“我坚决支持对国防实施大笔预算，我的这种鹰派观点与我的情感变化有关，其中大部分缘于我观看了美国军人被烧焦的尸体的残酷镜头。”一号沙漠是人质救援失败的地方。但是，当斯托克曼和其他预算

者计划降低30%税率，却要给五角大楼温伯格想要的资金时，这就使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无法得到可以平衡的预算。斯托克曼用自己的计算器计算了一下温伯格的需求，说道：“我几乎要心脏病发作了，我们将制定一个五年的国防预算，高达1.46万亿美元！”

温伯格不喜欢也不信任斯托克曼，他说：“他的表态非常迅速，他的观点非常直接，这让我有点儿担忧。更让我担忧的是，在他没有切实证据的时候，他竟然还表现得这样直接。”后来，温伯格指责斯托克曼说谎，他所指的是，在一次五角大楼针对国防开支的会议上，温伯格说，斯托克曼的会议记录“最多只能被称作臆想连篇”。

温伯格完全可以瞪得斯托克曼低下头，因为他知道，与平衡预算相比，国防建设对里根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然而，温伯格不但手腕强硬，而且足智多谋，他知道政府将会致力于增加国防开支，同时缩减社会项目，因此，他让五角大楼也接受缩减开支的安排。这种缩减只是名义上的。温伯格在国防预算中列入了更大的开销，随后提交上去，这被称作削减返还。里根看透了这一把戏，却很欣赏它在政治上带给政府的保护。

38

在每一位新总统任期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位总统都会切身感到，这份新工作跟他以往的任何工作都不一样。美国总统拥有权力——这一权力比地球上任何其他人的权力都要大。与总统可以行使的权力相比，州长、参议员以及公司总裁的权力就微不足道了，只要总统一句话，就可以派部队参战，发动空袭，开始核战争。总统候选人渴望这种权力，想象着自己掌权的那一刻。那些充满权力欲望的人盼望着能够掌握权力，而野心一般的人则会将其视作总统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通常都误解了权力。大多数总统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来寻求这一职位，只有少数权力追求者才会把国际事务放在首位。然而，几乎只有在国际事务上总统才能够行使自己独一无二的权力。在国内政坛，总统受到宪法分权的限制；受到国会惯例的限制，这些惯例决定着立法程序；受到政治党派的限制，它们把自身的利益融入政策考量之中；受到无数利益集团的限制，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打算；受到美国人民的限制，与国际事务相比，他们在国内事务中拥有更强大的发言权。

在国内事务中，与其说总统拥有权力，倒不如说他们拥有影响力。任免权能够产生某种形式的影响，对朋友和盟友的善意有助于润滑政府机关的运行。但是，对那些能够运用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形式来自总统对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天字第一号讲坛的垄断。总统之所以能够号令全国，仅仅因为他是总统，那些能够在立法圈内强力推行自己观点的人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占据优势。

里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政坛最强势的传播者，并且他

深知这一点。他精通语言艺术，这反映了他长期作为演员和公众演讲人所积累的经验。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那些年，让他学会了对现场审时度势。他的演员生涯把他训练得可以透过摄像机看到观众。他的演讲糅合了幽默、哀婉、哲理和趣闻轶事。

但是，里根最大的优点是他对工作的专注，他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细节随情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基调一直不变：更小的政府和更低的赋税。

2月18日，里根登上天字第一号讲坛，宣读他的预算草案。他在众议院与参议院的联席会议上讲话，但目标同样瞄准了数百万电视观众。他引用一位中西部工人跟他说的话总结了糟糕的经济形势："我带回家的薪水比我认为自己可能能够赚到的要多，但我好像变得更穷了。"里根重申，国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寄希望于事情会变化。它们不会。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有力行动，否则，经济将会越来越糟。"

里根要求国会颁布一个包含四部分内容的计划。第一部分的目标是政府开支。他要求削减开支490亿美元，尽管他随后做了解释，但民主党还是先发制人，批评里根从数百万美国人赖以生存的项目中榨取利益。里根反驳了这种批评，指出开支减少是在一些计划好的增加项目中的减少，他说："我们只是在减少增长率。"1982年减少490亿美元，但这依然比1981年净增长了410亿美元。

如果说这一点削弱了里根观点的说服力，那当他解释他所免除的一些削减项目的时候，其说服力又进一步被削弱了。他说："我们将继续履行那些来自民族良知的义务。有些人——极度贫困的、残疾的、年纪大的以及真正有需要的人——由于自身以外的原因，必须依赖我们其他人。这些人可以放心，他们所依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免于削减。"社会

保障和医疗保障，连同老兵抚恤金和残障人士救济项目都将免于削减。

接下来就是国防部。里根宣称："这是我们整个计划中唯一一个将会在当前预算金额之上增加预算的部门。"增加是必要的，因为美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安全挑战。"自1970年开始，苏联的军事投入比我们高出3000亿美元。"里根并没有提到，这一数字是有争议的，反映了对苏联的工资和物价以及卢布兑换美元的汇率的估计是有问题的。相反，里根强调了他所认为的这一数字对美国安全以及国防预算的意义。"如果让这一不平衡继续下去，那就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

在不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国防这些高额项目的情况下，里根说明了他的斧头将会落在哪些项目上。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资助将会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联邦政府对于艺术的投入。但这同时也能带来一丝慰藉，里根说道，因为对学校减少资助也就减少了联邦政府对学校的控制，将其归还于各个州和当地的校董会。削减对于艺术的资助将会鼓励慈善捐助，在美国历史上，正是这种慈善捐助支撑着艺术的发展。

里根还列出了其他的削减项目。能源部的合成燃料项目将被终止，因为在发展未来燃料这一方面，私营企业将会做得更好；进出口银行将失去1/3的资金，在此，里根再次依赖的是私营企业；鉴于类似的原因，取消经济发展管理局，贸易调整资助项目将会成倍增加现有的失业补助金；将进一步严格审查食品券领取者的资格，以便剔除掉那些并不真正需要食品补助的人；联邦社会福利法将会进一步加强，制定更高的要求，确保该项目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服务，而不是那些不需要的人；学校早餐和午餐补助计划将进行家庭情况调查；向各州拨发的医疗援助将被取消；邮政服务必须学会靠更少的补助而生存；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太空计划必须更为经济高效。

里根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削减赋税。"我们的计划是针对所有个体纳税人，连续3年，每年整体削减10%的税率，达到总体减税30%。"他说道。里根意识到，经济学家的传统智慧认为，在通货膨胀很高时，削减

赋税只会加剧通货膨胀。里根并不同意，首先，跟削减开支一样，削减税赋只是削减了那些预计增加的税赋，而税赋将会在现有水平之上继续增加。其次，里根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是错误的。里根没有提到“供给侧”这种说法，也没有提到改革供给侧人士的名字，他提到了一些“坚定的经济专家”，他们认为，削减赋税可以降低通货膨胀，扩大输出。“有人向我建议，到了1985年，我们商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量将会增长20%，比今天高出3000亿美元。工人的平均工资将会在实际购买力方面增长8%，这里指的是税后收入。”

除了全面削减税赋之外，里根提议，加速企业消费贬值，鼓励投资，他计划进行分等级纳税来适应通货膨胀，但这种意义重大的改革必须再等上一等。他没有解释清楚，这种分级纳税将极大地增加预计的联邦赤字，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非常清楚，而其他人则不是很明白。出于类似的原因，其他一些改革——婚姻惩罚税改革和遗产税改革——也必须要等。

里根计划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放松监管的。里根同意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把政府监管比作隐藏的赋税。他认为，和其他赋税一样，监管也必须进行削减。他否认有意去除那些对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的监管，许多其他方面的监管却可以也应当免除。里根说，他已经宣布终止行政部门制定的新的监管条例，并召开内阁级别的特别工作组会议，对现有条例进行全面审核。该工作组由副总统布什领导。

里根经济计划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的部分，是关于货币政策的。里根说：“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我们需要减缓货币供应的速度。”他承认，严格来说，货币政策不在总统权限范围之内。“我们完全承认联邦储备制度的独立性，也不会干扰或破坏其独立性。”但是，他希望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美联储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清楚，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并希望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合作。

里根停顿了一下，让他的听众喘口气。他清楚，自新政以后，国会议员还没有接到过如此强势的经济计划。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但是需要国会议员们的同意。里根说道：“今晚，我在此请求大家跟我一起把它变成我们的计划，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改革的征程。”房间内爆发出一阵掌声，最响亮的掌声来自共和党一方，但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加入进来。里根即兴说道：“非常感谢各位，我应该见好就收才对。”国会议员们大笑起来。

但他还有一些东西要说。“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改革的征程，不是让事情变得更简单，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我们的经济制度无法再承受过去几十年曾遭受过的打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马上开始。”美国经济不存在什么美国人民联起手来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美国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然而其结果又取决于美国人民，如果他们能够放开手脚，发挥最大的作用。

里根再次重复了他常用的歌颂美国人民伟大的主题，他说道：“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由那些从工厂、作坊、农场和商店带回家的工资创造的。它们提供的服务在美国无处不在——它们是我们的人民勤俭节约的结果，也是对于他们冒险精神的回馈。美国的生产力掌握在那些从事建设、服务、创造和生产的人们手中。”政府只需要赋予人民自由，不要阻碍人民，它必须立即这样行动起来。“人民在观望，在等待。”里根对国会议员们说道。

39

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关注里根好多年了，这位英国首相后来写道："我在197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就与里根州长见过面。甚至在那之前，由于我丈夫丹尼斯的原因，我对他也了解一点儿。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到家中，对罗纳德·里根刚刚发表的一篇精彩的演讲赞不绝口。"撒切尔拿到了一份演讲稿副本，同样被深深打动了。她立即就安排了与里根的会面。"我当即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坦率所征服。"她关注着他在美国政坛的步步高升，并一直阅读他的演讲。"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

英国选民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品德的欣赏速度要比美国选民欣赏里根的速度还快。她在1979年春成为首相，比里根当选总统早18个月。英国保守党人赞同美国共和党关于小规模政府的构想，而撒切尔则是保守党中最为坦率，也确实最为好战的一位。她处理了英国福利问题，削减开支，减少官僚作风。她向英国工会发起挑战，从而引发了罢工，导致整个经济摇摇欲坠，但是她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罢工垮掉，工会力量四分五裂。她把公共设施私有化，解放了数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英国经济增长的束缚。

撒切尔严厉的政策对她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1980年年末，她的工作支持率降到谷底，低于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首相。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变成了孤家寡人。但她的信仰从没有动摇过，反而比以往更加重视和珍惜她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并对大西洋彼岸志趣相投者的高升表示欢迎。

撒切尔为里根的当选发去贺电，并制订计划尽快访问华盛顿。询问

之后，她很高兴地得知，她是当选总统在就职之后希望看到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出访计划做好了，外交简报也已准备好，随着时间的临近，她充满期待，但也有些焦虑。英国驻美大使尼古拉斯·亨德森回忆道："撒切尔夫人跟我说，她对即将到来的华盛顿之行有一点儿紧张，她并不十分清楚这次出访将会如何，她承认对此有些紧张，她看起来有点儿憔悴——面色苍白，但十分高雅。我尽全力来安慰她，告诉她，里根是多么期待、多么欢迎她的到来。我跟她讲了这伙加利福尼亚人如何来到了华盛顿。我们又一起讨论了行程安排。当我提到她的饭后酒会将会被直播的时候，她有些吃惊，说道：'那么，我必须要仔细地斟酌一下了，我希望得到以往最好的建议，这样就可以得到恰当的提示。'"

撒切尔又问到了礼物方面的问题：里根夫妇喜欢什么？他们决定送翡翠盒子。"随着我们对此次访问的准备工作越来越深入，她的担忧好像消失了，变得不那么纠结。"亨德森说道。他意识到，撒切尔把美国之行看作摆脱国内劳工与政治纠纷的一次机会。在华盛顿，或者至少是在白宫，有人会重视和同意她的保守派观点。"很突出的一点是，我们很少谈及她与里根会谈的实际内容。她非常清楚自己希望能与里根单独见面，然后在小范围内举行会谈——人员越少越好，但是她并没有让我知道，她决定谈论什么样的话题。"

2月底，她飞到了华盛顿，里根在白宫的草坪上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仪仗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典礼。双方领导人互相称颂了美英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之后，他们并肩走向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单独交谈了半个小时。随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也加入进来，谈话再次变得正式起来。大批随行人员簇拥着他们来到内阁大厅，撒切尔注意到了桌子上的软心糖豆，里根解释说，它们有30种口味，包括花生口味。"'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挑出来'，他调侃道，所指的当然是卡特曾种过花生的经历。"亨德森说道。

撒切尔提到了民主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在波兰发生

的危机是争论的一点，另一点是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动乱。里根回答道："拉丁美洲的暴徒与世界大多数暴徒都是一样的。"撒切尔点头表示同意。亨德森这样评价里根："他继续说下去，不时地轻轻摇头，声音低沉，经常面带微笑，魅力十足，和蔼可亲。'美国尝试了多种办法和计划，但是，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北方的巨人，现在我们在尝试新的办法，让选民们团结起来。'我实在弄不清楚他想说什么。"

里根对付中美洲的计划将随着时间慢慢展开，但目前两位领导人都将精力集中在更好地了解对方上。总统和南希·里根在白宫举办了一次晚宴，撒切尔夫妇在英国大使馆举办了一次答谢晚宴。"让我十分失望的是，总统竟然没有邀请撒切尔夫人跳舞，尽管我们准备了许多我们认为很合适的音乐，比方说《贴面舞》和《烟雾迷蒙你的眼》。"亨德森在英方晚宴之后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事先并不知道安排了跳舞，因此也就不清楚是否该请她跳舞。很奇怪的是，在前一天晚上白宫的晚会上，他陪同撒切尔夫妇来到门口，互相道别之后，又回到晚会上，跟里根夫人跳舞。"

撒切尔也很失望。"里根夫妇离开大使馆的晚会之后，其他客人也陆续离开，但撒切尔夫人留了下来，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别人跳舞。"亨德森说道，"之前在伦敦，她曾跟我说过，希望人们不要那样着急离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安排了一支乐队。可是没人邀请她跳舞，于是，我走上前去，对她说：'尊敬的首相，可以请您跳支舞吗？'"他的勇气得到了赞赏。"撒切尔夫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在舞池中刚开始跳舞，她就对我说，她整个晚上都在想着跳舞这件事。她喜欢跳舞，并且非常擅长。许久之后，我读到一份资料，上面说，她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所做的一件无聊的事情就是学跳交谊舞。乐队表现得热情高涨，我想撒切尔夫人非常开心。"

除了跳舞这件事，亨德森认为，晚宴进行得很顺利，里根看起来很

放松，也很投入。“他与每个人握手致意，友好交谈，他非常精于此道。”总统和首相在餐桌前举杯互敬。“撒切尔夫人用了我给她准备的大部分讲稿内容，包括一些笑话，但是自己加了很长的一段，这一段讲的是，在深夜两点醒来的时候，需要有勇气面对你所有的问题。”亨德森说。里根听到那些笑话，忍俊不禁，尤其欣赏她自我反思的那一段。“后来，白宫工作人员，同时也是里根夫妇好朋友的迈克尔·迪弗放下身段跟我说，总统被撒切尔夫人的使馆演讲深深打动了，尤其是关于深夜两点勇气的那一段。”

总体来说，此次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亨德森说道：“尽管英国面临着经济困难，但此次访问为撒切尔夫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耀，甚至超过了预期计划，也为她和英国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正面报道，超过了局势所能保证的。她返回英国，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此刻的英国，失业率和破产率居高不下，她的内阁内部和党派内部对于她的政策普遍存在怀疑，我想，她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能有助于她重塑形象。”

分别时，里根与撒切尔的私下接触证明，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展。亨德森说道：“最后一天晚上，在撒切尔夫妇登上直升机之前，里根夫妇邀请他们前往白宫话别。我相信，这是有意安排的，作为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有太多机会在接二连三的晚宴上闲聊。”亨德森很高兴地注意到，里根的发言人在关于两国领导人的关系上支持自己的观点。“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在此次访问结束之后说道：‘他们真是难舍难分。’”

40

里根喜欢举行记者招待会，喜欢与记者们打交道。他会留心记住他们的名字，也珍惜这样的机会，让大家看到，演员不都是傀儡。如果说他对政策细枝末节的掌握比不上吉米·卡特的话，那么，他在镜头前的形象则要高出对方许多。并且他清楚，对他所在乎的电视观众来说，形象比他回答问题的细节更重要。

里根在宣誓就职一周后，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首先，他简要重申了他在竞选活动和就职演讲中提到的经济主题，随后等待提问。几乎就在他执政的那一刻，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被释放了。合众社的记者海伦·托马斯问他对伊朗的政策将会是报复性的，还是和解。里根回答道："我当然没有想到报复，我也不知道对目前的政府来说，和解是否可行。"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萨姆·唐纳森问道，总统认为苏联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克里姆林宫方面是要统治世界，还是说缓和紧张局势是可行的？很明显，唐纳森想看一下，作为总统的里根是否会采取作为候选人时的强硬路线。里根明确表明他会的，说道："到目前为止，缓和紧张局势是一个单行线，苏联方面一直借此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我无须思考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意图所在，他们一再重复这一点。自俄国革命之后，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包括现任领导人，都屡次在其各级党代会中重复他们的目标——促成世界革命，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不管你想用哪个词都可以。现在，只要他们这样做，同时只要他们公开宣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的道义是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事业，这就表明，他们自己保留了犯罪的权力、说谎的权力、欺骗的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有悖道德的，我们都是按

照不同的标准在运作——我认为，当你与他们做交易的时候，即使是在进行缓和紧张局势的对话时，你也要记住这一点。”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政府对其实行了粮食禁运。另外一位记者想知道，总统对粮食禁运发表的谈话有何含义。作为候选人的时候，里根曾批评过粮食禁运，他现在是否打算撤销禁令？里根回答道：“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粮食禁运这种做法仅仅是要求美国人一方参与其中，即农民们。对于粮食禁运，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撤销禁运，要么扩大禁运范围。”他还没有决定如何去做，但他稍微抬了抬手，说道：“正如我所说过的，粮食禁运只是在要求美国一方来承担后果。我一直认为，与其说粮食禁运具有实际意义，倒不如说它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

3月初，在与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一次访谈中，里根又回到了与苏联关系这一话题。再有几天，克朗凯特就要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播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对里根的专访将是最后的绝唱。克朗凯特说道：“您对苏联的强硬路线一直与您的竞选宣言、竞选承诺保持一致，有些人虽然欢迎这一立场，但是，他们感到您可能言重了——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骗子、窃贼，等等。”

里根回答道：“好吧，让我们重新简要陈述一下。我清楚，我说过的话受到了媒体极大的关注，对此，我不能批评新闻媒体。我确实那样说过。但是，有些事情似乎被忽略了——大概有两件事——第一，我没有主动说过那样的话，这句话不是我冲进新闻发布会，对着记者们说：‘大家注意，我想说下面这句话。’我是被问及这个问题的。当时的问题是，我是如何看待苏联的目的的？在我看来，苏联将走向何方？”里根向克朗凯特重申了他对萨姆·唐纳森说过的关于苏联方面行为不道德的那些话。他又补充说：“请记住，他们的信仰中没有上帝，没有我们宗教意义上的道德观念。”他又指出：“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我所

说的话的真实性。”

克朗凯特追问里根：“如果将来您最终能够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面对面坐下来谈判，难道您不认为，这种辱骂可能会使谈判变得更为困难吗？”

里根回答说：“不，自从我提出举行高层会谈之后，我一直非常感兴趣，想看一下他能否也有此提议。”

克朗凯特注意到，里根的国务院已经取消了给予苏联大使在大楼地下车库停车的特权。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车被特意拖走了，他本人也得到通知，要像其他外交官一样使用临街大门。“这很明显是在暗示媒体说有事情要发生。”克朗凯特说道，“像这样让苏联大使难堪有什么好处吗？本来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喂，以后你不能再走地下室那个门了啊。’这种做法对于国人来说，难道仅仅是展示一种大丈夫所为？”

里根回答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我自己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如何决定的，也不知道它是否只是一个政府行为。”

克朗凯特问道：“您也没有询问黑格国务卿？”

“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您难道不认为苏联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把车给拖走这件事有些幼稚？”

“我不清楚，也不知道。”里根面带微笑地补充道，“或许他们得到了消息。”

克朗凯特问，在他同意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峰会之前，他会向苏联方面提出什么要求。

里根说自己并不着急。“这种峰会需要大量准备工作，从我们的立场来说，首先，需要准备的是，我们对我们盟友的保证——我们不会采取单边行动。我们只会在与他们充分协商后才会采取行动。”里根希望可以得到盟友的支持，这样才可以向勃列日涅夫展现统一战线。在回答克朗凯特的问题时，总统说道：“假如苏联表现出诚意，愿意缓和其帝国主义以及侵略行径——阿富汗就是个例子，那么这将有助于召开此类会议。假如有迹象表明，他们愿意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中的一员，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那么，很多问题都好说。”

克朗凯特问道：“这难道不是您必须与之协商谈判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吗——您希望他们改变心思，改变说法，这样在您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坐下来谈判之前，就可以相信苏联方面的诚意？”

里根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我记得，当希特勒在武装自己、积极备战的时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芝加哥河上一座大桥的落成典礼上讲过一段话，在讲话中，他号召自由世界封锁纳粹德国，停止与它们的所有联系，直至它们放弃军国主义路线，同意加入到寻求和平的自由世界中来。”

即使克朗凯特知道，他也没有指出，其实罗斯福并没有说得这么具体，而那个关于封锁的演讲，事实上是因为日本侵略亚洲才引发的，而不是德国侵略欧洲。但不管怎样，克朗凯特不无嘲讽地说道：“这太了不起了！”

“是的，但有趣的是，因为说了这样的话，他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受到了攻击。”里根继续说道：“我们现在能否客观地回顾一下过去，认为假如我们做了他希望我们去做的那些事，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会发生呢？”话题回到当前之后，里根重申道：“正如我所说过的，我认为，来自苏联方面的某些迹象才有助于召开这样的峰会。”

克朗凯特说道："先生，这听起来好像是说不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任何高层会谈了。"

"不是的，我没有说得那么确定。"里根说道，但他又重复说，假如苏联能够改善它们的行为，那么召开此类峰会会容易许多。

克朗凯特提出，许多欧洲国家希望美国和苏联通过谈判达成武器控制条约。欧洲人担心新的军备竞赛，希望在局势失控之前阻止美苏争霸。

里根回应道："这有些为时过晚，还不好说。但我坚决认为，单方面削减军备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就像我们过去做的那样——使我们的国防安全每况愈下。之后，你还想与全副武装的对手坐下来谈判？你有何谈判的资本？你要么要求他们削减到和自己一样，要么你可以自己强大起来，和他们一样。"后者更为现实。重建美国力量也正是这届政府的计划。一旦克里姆林宫方面得到消息，或许还有谈判的余地。

41

南希·里根回忆说：“人们经常问我，白宫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天在那儿做些什么。”她继续解释道：“通常每天7点30分，白宫的一位接线员会拨打我床边的电话说道：‘早上好，现在是7点30分。’”南希提到她丈夫此刻也会醒来。她会按下一个按钮通知白宫管家该把报纸拿进来、把窗帘打开了。

她和里根会待在床上看报纸、吃早饭。里根会看一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周一的时候，他会浏览一下刚出版的周刊：《时代》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南希会看一下《今日美国》和《华盛顿时报》。电视会被调到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早饭包括果汁、蓝麦、咖啡、烤面包，以及大约每周一次的鸡蛋。

大约8点30分，里根起床梳洗准备工作。他会吻别南希，乘电梯下楼。他的私人助理吉姆·库恩会迎候着他。一位特工人员会陪着他前往白宫西翼和椭圆形办公室。他的医生约翰·赫顿会在大厅等候并问声早安，再目测一下他的健康状况。

里根的第一次会议在上午9点，是与詹姆斯·贝克进行的，乔治·布什也常常参加。上午的会议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午饭时刻。里根一般在办公桌或椭圆形办公室的小书房内吃午饭，他一边喝汤、吃水果，一边读简报或打电话。每周四他与副总统一起吃午饭。

下午通常都用来办公，必要的时候或者是在适当的时候会与国会议员、国际名流、学校的孩子们、消防队员、体育冠军团队等会面或拍照。他在傍晚5点钟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到住所。6点钟，他会在由卧室

改装成的私人健身房运动，使用跑步机和拉力练习器。随后，淋浴，吃晚饭——通常在书房的小餐桌上进行——同时，看一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另外一位管家会把晚饭送过来。南希说道：“每一个为我们服务的人都是白宫的工作人员。”她又补充道：“很明显，我们是那些少数的总统家庭，来到这儿，没有带自己的仆人。”这种说法比较民主，但不十分准确。每个月会有几次国宴或者其他公共活动。晚饭过后，里根和南希会读读书。星期六晚上，他们通常会看电视节目：《60分钟》和《她书写谋杀》。

里根和南希都感觉到白宫的生活不太自由，几乎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在周五下午飞往戴维营。他们通常会搭乘直升机，除非天气不允许，这时他们就会乘车前往。南希写道：“谢天谢地，幸亏还有戴维营。”总统夫妇回到马里兰的山区，这让他们可以散步、骑马。理查德·尼克松曾在这里铺过一些小路，里根下令在路两边沿途配备一些高尔夫球车，恢复到原来的自然状态。这使得骑马更让人感到惬意。在这儿，里根的工作如影随形，但除了安保特工，他的手下就不会来了。朋友和家人会来到戴维营，还有一些里根想交往的外国客人。周五和周六晚上，戴维营会播放电影，里根和南希会筛选一些他们在好莱坞时期的电影，不大经常也不喜欢看现代电影。星期天早上，他们会看新闻节目，尤其是《戴维·布林克利一周谈》。星期天用完午饭之后，他们就会离开，前往白宫。南希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这样写道：“返回白宫总是让人有些失望，即使是现在，每当罗尼看到那些在戴维营拍摄的照片，他都会激动不已。”

尽管戴维营的生活让人感到很平静，但里根和南希自己的世外桃源——空中牧场——更加让人感到放松惬意。每隔几个月，空军一号都会把他们带到加利福尼亚的空中牧场度假。此时，记者和摄影师通常是禁止入内的。里根会徒步闲逛或骑马漫游，也会修理修理栅栏，劈劈柴。这样他就可以想起自己在成为总统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直到电话铃声响起，他不得不处理危机或者其他事务，这些事情迫在眉睫，来不

及等到他返回华盛顿。

没有哪一对儿总统夫妇能像里根夫妇那样发现彼此的陪伴是如此情投意合、琴瑟和鸣。除了里根的工作时间之外，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当里根工作的时候，南希总是在想着他，他也在惦记着她。南希称他罗尼，里根叫她妈妈。

里根对南希的爱称可能最主要体现的就是南希是他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它还反映了另外的东西：他在南希身上发现了他儿时在自己母亲身上所发现的爱、关心和安全感。当里根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感到强大而自信，当他们偶尔分开的时候，里根会度日如年，直到他们再次团聚。可能由于酒鬼父亲造成的创伤，里根的内心接受力不强，他把它全给了南希——正如孩子们多次看到的那样——这让孩子们很失望。从感情上来说，南希是他的一切，在他看来，有她就足够了。

就像里根依赖南希一样，南希也以自己的方式依赖着里根。每当生活要求他们分开的时候，南希都会表现得同样惴惴不安。她就像妈妈一样，保护着里根。如果有必要，她会比内莉更勇猛地保护他。倘若里根没有从政，南希可能不会太关注这件事。既然里根已经从政，那么，南希的政治工作就只有一件事：保护他，并助他成功。迈克尔·迪弗是她的同伙，迪弗一接到南希的电话就会小心翼翼地解读她的意思，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会付诸行动。

南希目睹了自己丈夫所有的重大演讲和许多一般性演讲，但她没有看到1981年3月30日的那次演讲。当时，里根在白宫附近康涅狄格大道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筑与建设贸易部的领导们发表演讲。对共和党来说，有组织的劳工并非他们的固有选民，但是有些工会——比方说卡车司机工会——支持里根，反对卡特。蓝领保守派们成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的中坚力量。

在那一天，总统呼吁倡导职业道德，他说自己赞同工会成员的观点。他提醒大家，自己曾经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在个人创造性这一话题上，他引用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塞缪尔·龚帕斯的话。“做那些人们自己能做也应当自己做的事情是一个危险的尝试。”里根引用龚帕斯的话说道，“归根结底，工人们的社会福利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无论做什么，只要是打着慈善事业或社会道德的旗号——这些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削弱创造性——都是针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里根指出，龚帕斯的言论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同样的说法适用于福利国家。他说：“美国依靠工人的工作，而我们打造的经济应当回馈并鼓励这些工人，当作我们未来的希望。龚帕斯笃信工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却远远地偏离此人制定的路线。”里根说，政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重新唤起美国的企业精神。“其目的是解放美国工人，鼓励美国的投资者，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大众更好地生活而努力奋斗。”他希望可以寄希望于工会成员。“你们以及你们的前辈创建了这个国家，现在请协助我们重建这个国家。”

工会领导人满怀敬意地聆听着，但心存怀疑。他们当中的一位领导人已经警告过总统，说一定不能把工人当作政府经济改革工作中的替罪羊。在里根演讲结束之后，几位接受采访的代表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之情——总统拒绝对公共交通和能源项目提供联邦政府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可能为全国大约66万待业的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他们信任他，让他来对自己演讲，但如果他想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他必须付出更多才能赢得这种支持。

当天，南希·里根自己一个人吃的午饭，当时她刚刚返回白宫。这时，特工处的负责人乔治·奥普弗把她拉到一边说道：“酒店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人受伤，但您丈夫安然无恙。所有人都在医院。”

南希马上说自己要前往医院，但奥普弗说这样做没有必要，也不合

适，因为第一夫人还没去，现场已经是混乱不堪了。但南希坚持要去，她说即使是走着去，她也要去。无奈之下，奥普弗叫来一辆车。

他们去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路上挤满了警车、应急车辆、记者和好奇的旁观者。南希变得越发焦躁不安，她后来回忆说：“我都要疯掉了。”她跟奥普弗说道：“如果一直这样堵下去，我就跑着去。”

奥普弗让南希待在车里，最终他们到达了医院。迈克尔·迪弗已经得到特工处的通知说她正在路上，于是到门前迎接。迪弗说道：“总统受伤了。”

南希驳斥道：“可其他人跟我说他没有受伤。”当时，南希更为担心了。

迪弗和其他人回顾了一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在离开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时候，里根刚打算上车，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声。里根后来说枪声听起来好像鞭炮，但现场的特工人员和警察立即意识到这是手枪的声音。

一颗子弹击中了里根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的头部，他跌倒在地，严重受伤。第二颗子弹击中了警官托马斯·德拉汉蒂的背部。第三颗子弹击中了特工蒂姆·麦卡锡的胸部。另外三颗子弹除了打在总统的豪华轿车和人行道上之外，没有造成别的伤害。

在听到第一声枪响的那一刻，特工杰里·帕尔不顾一切地把里根推进车内，让他躺到车的后部。另一位特工把帕尔推到总统身上，在他们身后狠狠地关上了车门。帕尔命令司机尽快离开，同时，他汇报说总统没有受伤。他通过无线电向特工处指挥中心报告说：“生牛皮完好无损。”他用的是里根的代号。他又重复道：“生牛皮完好无损。”

里根并没有感到“完好无损”，他在几天之后这样写道：“我感到我

的背部上方疼痛难忍，我想他一定是弄断了我的肋骨。”当汽车高速离开酒店驶向白宫的时候，里根试图坐得更舒服一些，但没有用。他回忆说：“我坐在座位边上，疼得几乎要瘫痪了，然后，我开始咯血，这让我们俩都认为，我的肋骨折了，刺穿了肺部。”

帕尔命令司机改变路线，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这家医院位于白宫西北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行程只有几分钟，但在这期间，里根的状况越来越糟。他回忆说：“我的呼吸非常困难。”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从车里走到急诊室，但刚穿过双重门，他就昏倒了。他的头很可能撞到地上，但帕尔和另一名特工扶住了他。他们和一些医护人员架着他来到急诊室，把他放在带轮医用床上。

医生最初以为里根得的是心脏病，他们扒开他的衣服，准备插入静脉管。

里根苏醒过来，断断续续地说：“我喘不过气来。”

一位实习医生给他的面部戴上了一个氧气面罩。

里根问道：“我要死了吗？”

这位实习医生说：“不会的，您会好起来的。”

氧气作用不大。里根重复道：“我无法呼吸，我的胸疼。”

现场一位资深外科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里根的肺部，右边的肺听起来正常，但左边的肺停止了工作。这名医生命令医护人员把里根向右侧翻起。

他们在翻转里根的身体时，这名医生注意到，在里根左侧腋下的皮肤上有一个淌血的小口。华盛顿的急诊室经常接到枪伤病人，这位医生认为，这是一处子弹伤，尽管形状很特别，他没有时间去想这颗子弹是

怎样击中里根的那个部位的，但很明显，一颗子弹从豪华轿车的防弹玻璃或防弹装甲上弹了起来，减轻了冲击力，而后又射进里根的身体里。显然，这颗邪恶的弹头还在总统的身体里，因为没有贯穿伤。

发现了里根痛苦的原因之后，外科团队就明白该如何来缓解这种痛苦了。插到胸部的管子开始把胸腔内妨碍总统呼吸的积血抽出来，静脉输液帮助他恢复了血压。

当血液从肺部抽出来之后，里根的呼吸顺畅多了，他身上那种演员的搞怪特性又恢复了。看着围在他身边的人，他对杰里·帕尔诙谐地说道："我希望他们都是共和党人。"

一台X射线机被搬了进来，寻找那颗子弹。图像不是很准确，但那颗子弹好像距离心脏非常近。可以想象得出，子弹擦伤了主动脉，距离肺叶下部很近。

有时候，子弹会被留在枪击受害者的体内。手术总是存在风险的，子弹可以留在人的体内数年而不引发事故。里根的一位前任——安德鲁·杰克逊——的体内就残留着一次决斗中得到的纪念品——一颗子弹。但是，自19世纪以来，外科手术的存活率得到提高。经过再三考虑，里根的主治医生决定，不能让一颗子弹留在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心脏旁边。

当外科医生们在稳定她丈夫病情的时候，南希·里根在等候室内焦急地来回踱步。最终，他们让她见到了丈夫。南希回忆说："我走进去，发现可怕极了——丢弃的绷带、插管、血迹。角落里放着罗尼那件残缺不全的蓝色细条纹的新西装，那天是他第一次穿这件新西装。我之前曾见过急诊室，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我丈夫在里面。"

里根面色灰白，疲惫不堪，但一见到她，立刻就有了精神。他把氧

气面罩放到一边，说道："亲爱的，我忘记躲开了。"南希忍住泪水，强作笑脸，她亲吻了他，说道："请不要说话。"

当他们推着里根走向手术室的时候，南希跟在带轮医用床的旁边。走廊里还有詹姆斯·贝克、埃德温·米斯和迈克尔·迪弗。里根认出了他的三驾马车，在氧气面罩下露出微笑，问贝克："谁在照看我们的店？"到了手术室门口，南希和其他人必须留在外面。南希吻了里根一下，说道："我爱你。"

手术室内，他们把里根从带轮医用床搬到手术台上。手术团队围在他的身边，麻醉师准备为他注射。里根意识到，他有了一批新听众，于是又回到他之前说过的那句俏皮话上："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

主刀医生回答道："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

42

刚一听到枪击的消息，白宫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詹姆斯·贝克和其他人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贝克借口有新闻工作要做，婉拒了同里根一起前往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当他听到枪击的消息时，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埃德温·米斯很快过来与他会合。几分钟之后，他们也没弄明白谁遭到了枪击以及伤情如何。迈克尔·迪弗从医院打来电话，说詹姆斯·布雷迪伤情严重，里根体内有颗子弹。一位医生接过迪弗的电话，说总统大量失血，情况非常危急。

贝克和米斯决定前往医院与迪弗会合。就在贝克离开办公室之前，他接到了亚历山大·黑格的电话。这位国务卿对总统的缺位非常警惕，哪怕只是暂时的，而副总统也不在华盛顿，正在得克萨斯。黑格的军事经验开始发挥作用，他强调需要保证指挥畅通。他告诉贝克他将召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内阁成员开会：国防部的温伯格、财政部的里甘、中情局的凯西、司法部的威廉·弗伦奇·史密斯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理查德·艾伦。黑格说他将与乔治·布什取得联系。

对办公厅主任贝克来说，他要决定是否启动第二十五条修正案——在总统缺位的情况下，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行使。等到他有了足够证据要做出合理决定的时候，医生已经稳定了里根的伤情。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手术期间是否构成总统缺位，需要启动这一修正案。

贝克认为这不足以造成总统缺位。首先，这只是暂时的。其次，这将使布什行使总统权力。贝克对布什并没有疑虑，但他知道，里根的许多支持者仍然怀疑布什的忠心，并且这些支持者也怀疑自己，因为他是布什最好的朋友，也是他之前的竞选主管。贝克回忆说："那些支持者

可能会把这种权力转移看作一场布什–贝克发动的政变。”

贝克缺乏自信的做法与白宫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一致。詹姆斯·布雷迪受伤，迫使他的助手拉里·斯皮克斯担负起对付媒体的主要责任。媒体穷追不舍，要求得到比斯皮克斯得到的还要多的信息。在刺眼的电视灯光的照射下，他一不留神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总统的处境使得政府群龙无首。

亚历山大·黑格和理查德·艾伦都在观察斯皮克斯的表现。他们认为，他在穷于应付，担心这将向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们还没有理由认为，枪手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当时，华盛顿警方认定，枪手是小约翰·欣克利，他因为单恋女演员朱迪·福斯特，希望能通过刺杀总统让她对自己刮目相看。但是，他们无法确定他是不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或许是与苏联有关的阴谋——因此，他们不想冒险。

艾伦对黑格说：“这太糟糕了，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黑格表示同意，说道：“我们应该让他滚蛋。”他指的是斯皮克斯。正如黑格后来解释的那样：“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要让国家和世界相信，我们拥有一个高效的政府。”他邀请艾伦同他并肩战斗。“我和艾伦一起冲出了战情室，一直冲向狭窄的楼梯，然后，匆忙绕过白宫西翼曲折的走廊，冲进新闻发布会现场。”

他们赶到的时候，满脸通红，气喘吁吁。黑格抢占了主席台，向记者们发布了关于里根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一位记者问道，现在谁在统领政府。

黑格回答道：“先生们，按照宪法规定，你们有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就以这样的顺序。假如总统真的决定希望移交权力，那他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没有。现在，我在白宫负责这里的一切，等待副总统返回，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然，如果有事情发生，我会向他汇报。”

黑格原本打算让国人保持镇定，让世界放心，但是，当时他涨红的脸庞、气喘吁吁的样子以及他的话刚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国务卿并不是总统顺位的第三人选，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都排在他前面。黑格大声叫嚷的“我负责这里的一切”极容易被新闻媒体断章取义，引起抵制，这会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权力狂人。他后来反思道：“或许摄像机和麦克风放大了我跑上楼梯的动作，或许我在面对镜头之前应当先洗把脸或做十几次深呼吸……当然，我对我糟糕的措辞感到内疚。”但是他达到了目的，表明白宫指挥链一切正常，正在等着副总统返回。“我是现场的资深内阁官员。”

里根的手术开始得很顺利。新鲜血液补充了他失去的大量血液，呼吸插管让他补充了氧气，他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为他做手术的医疗团队在他们多次行医过程中取出过许多子弹，这颗子弹看起来也不在话下。如果他们无法确定子弹的位置，X射线机会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

但这颗子弹看起来不想被找到。主刀医生搜索了总统的左肺，没有发现硬物。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让自己的助手来试一下，然而她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主刀医生非常迷惑，命令X射线机再次扫描，同时在想自己是否不得不把这颗子弹留在总统的身体里。

X射线找到了弹头，就在刚开始那个地方，也就是医生一直在搜索的那个地方附近。医生断定他用来搜索的手指可能让弹头移位了，总是刚好在他的手指范围之外。这一次，他格外小心，防止让它移位。最终，他找到了弹头。手术刀切开肺部，子弹被取了出来。

手术余下的部分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也有风险。导致大部分失血的一根破损的动脉被修复好了。手术切开的肺部的伤口也被缝合了。病人被清理干净，送回去康复。

罗恩·里根是第一个来到医院的孩子。听到枪击的消息时，他正在内布拉斯加州。计划内的航班没有马上出发的，于是他为自己和妻子多莉亚包了一架飞机。他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父亲还在进行手术，他的母亲还处在极度震惊的状态。“我太害怕了！”她边说边向他伸出手。“我明白，妈妈。”他回答道，“但请坚持住。”

当晚7点30分左右，也就是枪击发生5个小时之后，南希和罗恩才被允许进入康复病房。里根看起来跟许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一样：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喉咙里、胳膊上插满了管子，导线连接着身体和监控仪器。南希一见到这种情景就哭了起来。她眼含泪水告诉他：“我爱你。”

里根无力地盯着南希，眼里有一丝害怕。他摸索着找到纸和笔，写道：“我无法呼吸。”

“他无法呼吸！”南希冲着屋子里的人大叫起来。

医生告诉她不要担心。呼吸机需要时间适应，但它供给的氧气足够总统需要的了。

罗恩·里根对父亲说：“没事的，爸爸。你喉咙里插着管子呢，这就像深潜一样，你让那个机器替你呼吸就行了。”后来罗恩经常想，当时自己为什么做了那样一个比喻。“父亲从没有潜过水，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把一根塑料管子插到你的喉咙里，与一边从氧气罐里呼吸着加压的氧气，一边与五颜六色的鱼互动可能完全不同，也更令人不舒服。但不管怎样，这一不合理的比喻仿佛让每一个需要安慰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可能除了我父亲，尽管我不相信这伤害到了他。”

探视时间很短，里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医生让他们离开，让里根休息。

在驱车从医院前往白宫的时候，他们经过在夜里守护的人群。他们手持标语，表达对里根的祝愿。上面写着："尽快好起来！""今晚我们都是共和党人。"

到了白宫，南希无法入眠，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罗尼不会出事的，否则我也不活了。"

里根康复了，南希却没有康复。枪击之后的第4天，里根发高烧了，医生无法找到发烧原因，但他们对他进行抗生素治疗，以防感染发生。高烧渐渐退去。

前来探视的人很多，从家庭成员到工作人员。枪击发生8天之后，民主党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被允许进来探视。"上帝保佑您，总统先生。"奥尼尔说道，他开始背诵《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里根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与他一起唱着。

随着里根逐渐恢复体力，他开始反思此次几近死亡经历的意义。罗恩·里根后来回忆道："此次经历提升了他的使命感，他认为上帝挽救了他的生命，因此他的责任更重大了。"里根自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无论发生什么，我的生命属于上帝，我必将尽我所能为上帝服务。"

13天之后，里根从医院出院。在得知会有摄像机和记者后，他拒绝使用大多数不是总统的病人所需要的轮椅，而是坚持步行。他努力微笑着招手致意。

在随后两周的时间里，里根在白宫恢复身体。南希安排了一个日光浴室，这样他就可以在明媚的春光里消磨时光。每当下午最暖和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外边的阳台上。不久，里根就开始说笑，以此摆脱自

己遭受的生死劫难。他对依然焦虑的南希说：“我不知道你还在忧虑什么，我只知道我没事了。”

但是，南希还是无法停止担忧，她回忆说：“枪击发生之后，我整个人都崩溃了。罗尼康复了，但我依然担惊受怕。现在我的确非常担忧：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或许下一次我就会永远失去他了。”南希原本以为时间可以让自己缓和下来，却不是这样。她说：“我不断地想到这可怕的一切，也想到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的结局。在罗尼余下的总统任期内——几乎8年的时间——每一次他离开房间，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他回来为止。”

随后发生的事件增加了南希的预感。在里根遇刺6周之后，罗马教皇遇刺受伤。5个月之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开罗遇刺身亡。

南希回忆说：“每个人都在说那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我还是担心不已。任何公众人物如何才能免受暴力袭击？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三起事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将如何是好呢？”

南希了解到，每20年，当选总统都会遭遇这种致命的袭击。从1840年起，每一位当选的政府首脑都在任期内死亡：威廉·亨利·哈里森、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哈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肯尼迪，其中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肯尼迪都是遇刺身亡。现在，她的丈夫又差一点儿被刺杀。任期内的死神还在等待着他吗？

死亡的幽灵并没有离她远去，她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原本就瘦弱的身体如今更憔悴了。她祈祷上苍，但没什么效果。南希回忆说：“每当罗尼不在身边，我就会掉眼泪。有时候即使他在身边，我也会哭泣，但这个时候我一般会悄悄溜进卧室或浴室，这样他就看不到我哭了。”

南希向可以信任的朋友寻求帮助。有些人是当面请教，有一些则打电话咨询。南希回忆说：“一天下午我和梅夫·格里芬通电话，他是我在

好莱坞时期的一位老朋友。他跟我说最近他与旧金山的一位占星师琼·奎格利聊过。几年前，我在梅夫的电视节目中见过她，当时她是占星师小组中的一员。后来，梅夫有意介绍我们认识，尽管我现在不记得见过她，当时琼主动提出了她对罗尼1980年竞选活动的建议，并且跟我通过几次电话，讨论罗尼的‘吉时’和‘衰时’。我对她说的很感兴趣，当她告诉我罗尼会获胜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这在我和罗尼的运势图里都有的。”

格里芬说，他和奎格利曾谈论过针对里根的谋杀。8年之后，南希说道：“我现在记得，当梅夫在电话里跟我提起时我当时的反应，仿佛就在昨天一样。琼当时说，她原本可以对3月30日发生的事情向我发出警告。按照梅夫的说法，琼当时说：‘总统那天应当待在家里，我可以从我的运势图中看到，这对他来说将是危险的一天。’”

南希记得她当时对格里芬的回应：“天啊！我本来可以阻止这一切的！”

她立即挂掉格里芬的电话，拨通了奎格利的电话，说道：“梅夫告诉我你知道3月30日的事情。”

奎格利回答道：“是的，我能够看出那一天对总统非常不利。”

南希说道：“我非常害怕，每当他离开家，我都非常害怕，我想我都要窒息了，直到他回到家。每一次走下汽车或离开大楼的时候，我都全身哆嗦。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再次向他开枪。”

奎格利表示同情。之后，南希不断地给她打电话。她担心和关心的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孩子和父母。南希说道：“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琼都来帮助我，安慰我。我们形成了一种职业关系，但我逐渐地把她看作我的朋友。现在，我认为，她同时还是一个治疗师。”

奎格利暗示说，她可以帮助南希分辨出对她丈夫有利或不利的日子。

南希回忆说：“我当时认为这很好，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每个月我会与琼谈上一两次（有时是提前约好的，有时不是）。我会把罗尼的日程安排放在面前，我想知道的非常简单：具体的那些日子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比方说，假如罗尼计划5月3日在芝加哥发表演讲，那么，他应该上午离开华盛顿，还是最好在前一天下午飞过去？”奎格利边听边记，她会问卜星象以及其他资料，然后给南希回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建议。南希说道：“如果有必要，我会打电话给迈克尔·迪弗，他负责罗尼的行程安排。有时候，会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迪弗离开白宫之后，唐纳德·里甘成为办公厅主任，负责日程安排。南希就通过里甘来做工作。

南希说道：“我当然清楚，此事如果曝光，那将让罗尼尴尬。但只要我是通过迈克尔·迪弗来做，我就知道我的秘密是安全的，因为迈克尔非常谨慎，他与罗尼和我相识多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甚至从没想过要求他保密，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保守秘密的。”

43

枪击事件发生29天之后，里根重返政坛。他要求获准向国会发表演讲，之后，适时地收到邀请。当他进入众议院议事厅的时候，参议员和众议员欢呼雀跃，一是出于政治要求，二是发自内心的欣慰，因为民主并没有因为一个疯子的举动而脱离正轨。众人纷纷向他伸出双手，里根不得不频频与大家握手，挤了过去。他就像之前当明星时一样，陶醉于这美好的感受，并予以回报。当他登上讲台的时候，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不断。里根微笑，挥手，点头致意，再次微笑，挥手，点头致意，掌声还在继续。最后，里根又开始调侃了，很明显指的是他的这次死里逃生：“各位不是想让我再来一次吧？”

接下来，他必须要谈到政府工作。但他首先要表达的是一条个人信息：“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以及今晚收看电视、收听广播的观众和听众说几句肺腑之言，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可以表达我和南希的谢意，感谢大家的鼓励和鲜花。最重要的是，感谢你们的祈祷，不但为我，更为那些倒在我身边的人。你们带来的温暖、友谊和关爱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超乎你们的想象。你们带给我们的这一段记忆，我们将永远珍惜。”

观众被感动了，他自己也很动情，全场掌声如潮。里根提到了他收到的卡片和信件，他从西服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写信人是纽约罗克维尔中心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信中写道：“我希望您能很快好起来，否则的话，您可能只能穿着睡袍演讲了。”里根读了这封信，一下子驱散了掌声中包含的阴霾，所有人一下都想起来他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家伙，大家很高兴看到他又回来了。里根任由笑声响起，慢慢回落。他用自己的这位小信使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结束了这个故事：“还有一件事

要说一下，如果您不得不穿着睡袍演讲的话，那我可得提醒您，那太不像话了。”国会议员们再次欢呼起来，民主党人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

里根的开场白没有结束。就像在竞选活动当中一样，里根提到了吉米·卡特对病态社会的哀叹，这种病态曾让美国人备感痛苦。如今，又有人说只有病态社会才会造就像约翰·欣克利这样疯狂的枪手。这一说法又增强了这种悲观的论调。里根重复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美国根本没有问题，也没有生病。他引用了自己最近的经历，说道：“病态社会不会造就像特工蒂姆·麦卡锡这样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身体挡在我和枪手之间，完全是因为他感到他有责任这样做。”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病态社会不会造就像汤姆·德拉汉蒂这样忠心耿耿的警官。”观众再次鼓掌。“也不会造就像詹姆斯·布雷迪这样精干、勇于献身的公务员。”掌声更加热烈了，国会议员们的目光随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转向了坐在旁听席里的布雷迪的妻子萨拉的身上。“病态社会不会让像我们这样的人以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同时为我们的同胞感到自豪。”

里根总是非常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应当对观众讲些什么，对此他相当自信。他接下来开始探讨目前的工作，说道：“下面，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控制开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如何削减大家的税率。多亏那些非常优秀的人士，才使得我的健康改善了许多，我现在才能够谈一下经济的健康问题。”但是，他无法做到。大选之后6个月以来——在这次大选中，选民们明确表示希望改变经济走向——经济依然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通货膨胀几乎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利率依然高得吓人，将近800万美国人依然失业，实际工资还在减少。“6个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美国人民现在希望我们行动起来，而不是一味地计划。他们要求并且已经在进行全方位的努力来清理我们的经济乱象。”

这种努力必须从预算开始。里根重申了选举时的想法：“我们的政府过于庞大，开支过高。”他很高兴地报告说，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当天

刚刚批准了一份代表两党的预算决议，这份决议与政府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遗憾的是，众议院落在了后面。由民主党掌握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也提出了一份草案，但这份草案存在严重缺陷。它在社会项目中削减得太少，并且愚弄国防开支。它没有减少赋税，反而有所增加。“这一草案咬住失败的政策不放，试图依靠纳税人来平衡预算。”里根说道。民主党的做法是保守的，从保守这个词的最糟糕的含义来理解就是：对于过去失败的政策恋恋不舍，故步自封。“高税赋和过分增长的开支造成了我们目前的经济困境，继续下去的话，无益于解决其强加在美国人民身上的苦难、焦虑和失望。”

有人担心政府削减开支和税赋的计划会带来巨大的赤字。民意测验专家曾经问美国人，他们更看重的是更低的赋税还是平衡的预算，大部分人选择了平衡的预算。里根回应了这种担心，指出这一问题设计的不对。他重申，自己提出的削减税赋的计划事实上在将来就是拒绝增加赋税。他说：“大幅增加赋税就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他提到了通货膨胀在刺激人们接受分级纳税方面的作用。“我们提倡的就是在增长中进行削减。”民意测验专家应当把这一点表述清楚。“我们不是在平衡的预算和削减税赋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正确的提问方式应当是：‘今年你是希望你的税赋大幅增加呢，还是从最糟糕的情况来说，希望增加一点点儿，同时希望得到税赋减免和平衡的预算呢？’我相信，我们都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里根重申，民主党众议院的草案不令人满意，幸运的是，还有选择的余地。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保守派议员菲尔·格拉姆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密切合作。正如格拉姆后来说的那样：“我和斯托克曼起草了里根的预算。”格拉姆把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德尔·拉塔招致麾下，两人提出了一个法案，得到了里根的支持。“我们欢迎并且完全支持这份代表两党的替代草案。”总统说道。这将实现削减开支、降低赋税和支持国防的关键目标，也会有助于经济增长。

两周前，美国航空航天局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让一架航天飞机在事隔6年之后把美国重新带回太空。这一时机对里根来说好得不能再好了，他引用这一例子证明美国正处于其巅峰时期。“我们利用这一航天飞机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创造性，超越了昔日的成就，为未来带来希望和更大的探索空间。”里根说道，“航天飞机不仅仅证明了我们的技术能力，它还再次提高了我们的期望值，让我们开始再次对未来充满梦想。”

里根引用了卡尔·桑德堡关于“美国梦”的说法：“共和国是一个梦想，梦想先于一切。”里根又用自己的话说道：“正是梦想让我们美国人与众不同。我们一直在寻求新的精神，瞄准更高的目标。”里根要求国会同他一起梦想未来：“昔日我们成就辉煌，我们可以重振我们的经济力量，创造昔日我们没有创造的机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信心——相信梦想一定会实现。”

44

枪击事件带来的震动，里根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淡定从容，以及戏剧性的回归使得他在政治上势如破竹。当数十名民主党人士加入到欢呼的行列时，里根清楚，自己的演讲成功了。一夜之间，打到白宫的电话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里根的工作支持率飞速上扬到了史无前例的68%。

参议院在共和党人以及来自田纳西州的多数党领导人霍华德·贝克的领导下，顺利地接受了里根的预算提案。在众议院，蒂普·奥尼尔和民主党人表示反对。但是，当支持总统的电话被打爆、支持信件塞满众议员的邮箱时，奥尼尔发现自己处境不妙。他反问记者们："我是在说服人民吗？答案是肯定的。我是在获取承诺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解释说，里根简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人气问题，我们一直在坚持顶住。"但里根的人气太旺了。"他做的推销工作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

5月7日，也就是总统向人民发出呼吁的第9天，里根击败了奥尼尔。63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少数派，顺利批准了格拉姆–拉塔法案。里根私下评论道："我们从没有期望过这种一边倒的胜利，共和党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过像这样的胜利了。"政府开始庆祝，准备协调参众两院的草案，以便确保这一胜利。

詹姆斯·贝克回忆说："不久后，我们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块石头就是社会保障。半个世纪以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把社会保障当

作美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标志性项目，它发展了一大批力量强大的选民。那些退休和接近退休的人被迫接受低收入，其中有些收入分给了社会保障。他们有理由认为，社会曾向他们庄严承诺，但用于社会保障那一部分被削减体现了最恶劣的背叛。并且，救济金领取者以及近乎要领取救济金的人在投票时是按比例投票的，这让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感到耻辱。里根理解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社会保障从首轮的预算削减中拿了出去。但是，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这一制度在经济上显得越来越不合理。工资很快会超出工人的付出，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糟。”

如何改革这一制度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斗。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前国会议员理查德·施韦克提出扩大社会保障基数，将其延伸至当前被排除在外的政府工作人员和非营利组织的雇员。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税收，并且不需要立即增加开支，还可以获得数年，或许数十年的补助金。

戴维·斯托克曼认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我和施韦克仿佛是站在不同的星球上。”斯托克曼写道。他把社会保障称作“庞氏骗局”，指出纳入更多的捐助人将会使得这一骗局更加复杂化。“我们的工作是要缩小社会保障这一怪兽，而不是以契约来约束数百万的工人参与到这一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中来。”

斯托克曼利用供给逻辑以及一些战术性的妥协来影响他在政府中的同事，最终甚至连施韦克都被争取了过来。他在总统办公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削减计划，把自己的观点包装在神秘莫测的预算里，会议上没有人可以反驳。里根在做候选人的时候，经常指责民主党关于社会保障的虚假做法。在此次会议上，他再次猛烈抨击了卡特政府。他说：“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史上最大的税赋增加，并说在2030年以前都是合理的，4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发现它已经破产。这刚好证明了我们之前一直所讲的。”

斯托克曼极力表示赞同，并称赞了总统的远见卓识。里根接受了斯托克曼的提议，并且一想到最终使得社会保障合理化了，就感到高兴。斯托克曼连同马丁·安德森为取得的真正突破向总统表示祝贺。安德森说道：“您将成为史上第一位实实在在地、永久性地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的总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勇气这样做。”

詹姆斯·贝克没有为这场供给闪电战做好准备。“我非常愤怒。”他后来说道。贝克肯定削减社会保障计划会遭遇强烈抵制，他认为没有人提醒总统。“我们在预算决议上的成功可能鼓励了总统，让他在这个他谈论了数年的问题上想上九天揽月。”

在考虑到处理了社会保障问题带给总统的快乐之后，贝克认为自己无法直接改变里根的想法，于是，贝克努力转移针对白宫的批评。他召集了立法战略团队会议，说道：“大家注意，我们在此都同意经济计划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当务之急。因此，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是否搞砸了这一计划。”他下令说，社会保障计划在提交给媒体和公众的时候，必须说成是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计划，而不是出自白宫的计划。他强调说：“确切地说，这不是罗纳德·里根的计划，而是理查德·施韦克的计划。大家都明白了吗？”

戴维·斯托克曼反对道：“这并非与总统的经济计划无关，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它，整个计划就不完整了。”

施韦克说贝克在破坏社会保障提案。“假如对于总统的立场存在任何的怀疑，那么等这一提案提交到国会的时候只有死路一条。”施韦克一直在想贝克怎么就认为他可以对政治战略发号施令。“真见鬼，我在国会工作了20年，我清楚什么是行得通的。因此，不要缩手缩脚，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引以为荣的计划。”

贝克拒绝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说，社会保障计划一定不能有里根的影子在里面，这是施韦克的责任。

斯托克曼回忆说："我极其愤怒，却无能为力，因为贝克是办公厅主任。"

贝克的担忧被证明是正确的。斯托克曼回忆说："两天之内，我知道我们的麻烦大了。"这位预算主管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会面，来解释社会保障改革。"我刚刚说完开场白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卡罗尔·坎贝尔就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向我攻击。'你的这个社会保障计划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激动地说道，'我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数千名60岁的纺织工人认为这是世界末日。该死，我应当怎么向他们解释呢？'"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兴冲冲地火上浇油，称这一计划"卑鄙可耻"，是对老年人做的一种"下三烂的勾当"。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詹姆斯·香农将其归咎于里根，他说道："他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应当起来反抗了。"

事实上，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参议院。还没有等到政府社会保障计划送过来，参议院就先发制人，全票把它埋葬掉了。

"事情就是这样。"贝克后来说道。政府放弃了斯托克曼计划，不再提及此事。"社会保障问题不再是首要事务，但我们的立法动力遭受了极大损失。"贝克反思道。

45

社会保障计划的失败耗费了政府几周的时间，也为整个税收计划和预算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里根与失败抗争，但拒绝撤退。春天来了，也带来了参加大学毕业典礼的邀请。里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在公众心里，他早已被看作这所大学中的一员。圣母大学曾向其他总统颁发过学位，但他们中没有哪一个人曾演过乔治·吉普这个人物。一开始，里根用那个他自己也认为是个老掉牙的笑话来暖场——“像这样的一所大学，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因为新生满载而来，而老生则空手而归”——随后，他即兴谈到了自己著名的角色。“现如今，我经常听人们很幽默地说道：‘为了吉普也要赢下一场比赛。’”里根说道：“我听到国会议员这样说过，他们支持我提出的改革计划。”他指出，这个故事比大家通常所知道的要复杂许多。他说，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当前的一个寓言故事。“罗克尼本来可以利用吉普的临终遗言赢得任何时候的一场比赛，但8年过去了，洛克纳一直没有透露他的临终遗言。之后，在半场休息的时候，他向一支落后的队伍——也就是他平生所执教过的唯一一支队伍讲了这个故事。这支队伍当时被内讧、嫉妒和摩擦搞得四分五裂……罗克尼就是向这支队伍讲了这个故事，鼓舞他们放下个人成见，奋勇争先。”国会应当吸取这一教训，通过政府的税收和预算法案。

然而，国会并没有在倾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草案被提交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72名参议员和183名众议员组成。在那儿举行的讨论简要重述了两院独立讨论的结果，还额外增加了参与者所反映出来的两院共同具有的一些传统困难，而不是单独具有的。民主党拖延讨论进程，希望公众进行干扰，或许希望政府犯下更多的错

误。

里根进一步了解了蒂普·奥尼尔。奥尼尔可以和里根互相交换有关爱尔兰的故事，但一谈到政治，他马上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里根在日记中写道：“奥尼尔真是难缠，我看到他在电视上跟联合钢铁公司工会说我要毁掉这个国家。”还有一天，奥尼尔直接向里根抱怨。“蒂普在电话中大声咆哮，指责我不懂宪法，不懂权力制衡，等等。”在这件事上，里根提议扩大对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控制。奥尼尔反对，争辩说国会有义务监督联邦税收如何花费。“他声称，国会正在放弃自己的责任。”里根草草写道。总统对此并不同意，他说道：“事实上，华盛顿方面无意命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运作这些项目。”但是，里根从不希望从奥尼尔那里得到什么不同的说法。“蒂姆是个顽固的新政支持者，他依然相信要把各个州削减成联邦政府的行政区。他依然试图破坏我们的计划，因为他崇尚高额开支。”

奥尼尔的咆哮并非没有效果。民主党长时间地阻止税收法案的通过，里根感到必须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希望第一年小幅削减，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接受对非工资性收入进行最高税率削减，从70%减到50%。这是里根希望的，但没有提出来。总统对自己说：“我会勉强接受的，只要他们接受为期3年的全面削减计划，即5%—10%—10%，而不是我们最初提出的10%—10%—10%。”里根这位老道的谈判专家私下里很满意：“我为此感到高兴，将其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两党解决方案。这比我预期我们能够得到的要多。我很高兴可以从70%降到50%。我们所放弃的就是去年1月开始的10%，改成今年10月开始的5%。取消原来3年（36个月）的30%，取而代之的是27个月的25%。”

然而即使这样妥协，税收和预算改革还是推进缓慢。“吉姆·赖特在耍把戏。”里根这样评价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赖特又在重新审视社会保障问题，谴责政府想要取消个人工资收入的基础，而这都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预算法案中的内容。里根评论说：“这是一种

政治诡计，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民主党1982年的竞选制造话题。”参议院领导人则把这一问题扔还给了白宫。“参议员贝克说我可以选择斗争或撤退——他不确定我们是能在议员中还是能在会议委员会中获胜。”里根发誓要斗争到底。“假如我撤退，那么我们在降低通货膨胀中取得的成果就会丧失。这将被视为一次对我的决心的考验，也将被视作一次我支持艰难决定的标志。我无意撤退，我已经给国会的领导人送去一封信，通知他们8月初我将在电视上讨论社会保障问题。我想这将让吉姆·赖特大吃一惊。”

事实上，他没有等到8月。里根很清楚自己的特长，他知道自己亲近选民、让他们能够听懂并理解自己的能力是他的政府最有力的武器。每次当他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再加一把劲儿，僵局就一定会被打破。

“今晚，我打算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根对全国的电视观众说道：“但是，国会对于税收计划的直接行动——这也是我们经济一揽子计划中的关键内容——必须先行。”这种表达上的婉转——他一直打算这样来讨论经济计划——让他可以驳斥反对经济计划那些人提出的涉及社会保障的观点。“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做法一直让我十分困惑。你们这些人依赖社会保障，却杞人忧天，受到一些广为传播的小道消息的干扰。”里根力图通过坦率的承诺来缓和这些担忧。“我不会袖手旁观，眼看着你们这些依靠社会保障生活的人们失去你们努力争取来的利益。我以你们总统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你们没有理由感到担忧，你们将继续领到你们应得的全额支票。”

蒂姆·奥尼尔和其他民主党人无疑对里根错误地阐释他们的立场感到生气。他们指责的不是当前社会保障金的领取者会领不到全额保障金，而是未来的领取者领不到当前计划的那么多保障金。但民主党人不得不佩服里根在修辞上的娴熟手法，并且里根拥有观众，而他们没有。

里根继续讽刺由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提出的税赋草案替代方

案。“如果我可以改述一下威尔·罗杰斯的那句名言——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恐怕我要说，这儿有些人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自己不抬高的赋税。”民主党的草案说是要削减赋税，但这种削减是短命的，里根说道。他拿出一张图表，上面显示了未来税赋的两条路线：民主党草案制定的路线比政府支持的代表两党的草案要低，但只低两年。两年之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增加和社会保障税率的增加，赋税将会比代表两党的路线高出1000亿美元。“多数党领导人声称他们的草案与我们的相比，可以给工人带来更大的税率下降。”里根说道，脸上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的确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打算再活两年的话。”

里根号召美国人民要相信他们的当政官员，他说道：“请大家联系你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告诉他们你们支持代表两党的提案，告诉他们你们认为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帮助美国重振经济，实现繁荣昌盛，并且可以让政府再次成为人民的公仆。”

里根的感染力再次展现出了魔力。选民的反应积极肯定，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第二天，里根遇到了几位国会议员，他们强烈地表达了对里根的支持。里根后来写道：“他们所有人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他们选区的电话以及他们在国会的电话都要把房子给震塌了……毫无疑问，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国会沿着人民以及总统指引的方向前进。关于预算的谈判“死胡同”终于被打通了。霍华德·贝克给白宫打去电话：“草案通过了。”讨价还价的结果规定在1982财年削减计划开支的3%，1983年削减4%，1984年削减4.5%。削减范围涉及联邦政府方方面面的活动：学校开支降低20%，食品券开支削减15%，学校午餐降低1/3，医疗保健降低大约10亿美元，就业培训团放弃了1/5的预算，相当于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中培训项目的全部费用。公共住房补助降低了40%，艺术及人文补助降低了

30%。

里根称赞了这一预算法案，说它带来了“联邦预算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削减”。他向所有帮助实现这一法案的人表示感谢和祝贺。随后，他开始等待税赋法案的消息。

第二天，消息传了过来。众议院在7月29日这天讨论了7个小时，在讨论结束时，议员们投票表决。48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到190名共和党议员这边，让里根在关键点名计数中得到了一个238：195的绝对胜利。参议院的决定是支持里根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之前没有预测到结果是一边倒的89：11。这一税法几乎让里根得到了他期望的一切，还包括一些他之前只能想想而已的事。税法规定，将在第一年里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5%，在随后两年里每年削减10%。在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方面，最高税率都从70%降到50%，最低税率从14%降到11%，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到20%，企业折旧有所增加，针对双职工的婚姻惩罚税被取消了。不动产税的征收范围缩小了，只剩下了非常富有的人。对政府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用于消除税档潜升的税率指数化。

政府官员们私下里为他们取得的辉煌战果拍手庆贺。“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这样来更好地助推经济发展。”卡斯帕·温伯格跟唐纳德·里甘说道，里甘也完全同意。里根在日记里把税率与预算之战的结果称作“半个世纪里最伟大的政治胜利”。

在胜利的那一刻，进行一些自我庆祝活动是很正常的。里根及其团队确实赢得了一场伟大的战役，但前面还有一场战役。假如没有得意忘形的话，就应当有人告诉里根，前面的这场战斗要比刚刚结束的这场更加艰苦。打个比方来说，虽然削减税率已经被写进了政治里程碑，削减开支也被写到了纸上，但是，这些墨迹随时都可能挥发掉。国会削减税率的承诺几乎可以按照字面理解，交给银行就可以了；而国会削减开支的承诺则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付一个又一个充满敌意的委员会。

但无论如何，这一天都是里根的庆祝日。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里，他和记者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会上，总统提到了这些新法案。“它们标志着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运行轨迹的转变，终结了政府官僚机构、政府开支和政府税赋方面的过量增加。”里根表扬了国会中共和党领导人和那些提供关键帮助的民主党人。无论如何，这些当选官员们还是完全听从了大众的意志。“真正的功劳属于美国人民，是他们最终明确表明他们需要变革。”

46

在此次见面会上，一位记者问了里根一个与税率和预算无关的问题，他说道："总统先生，在航空管制人员罢工中，国际航空管制协会请求您与职业航空交通管制人员组织进行谈判。为什么您坚持认为，不应当与他们谈判？"

职业航空交通管制人员组织，简称PATCO，代表的是为美国领空内商用飞机导航的人们。该工会同其他劳工组织曾经做过的一样，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蔓延的通货膨胀做出了回应：要求涨工资。但他们的立场与许多其他工会的立场不同，因为航空管制的员工不是私营企业的员工，而是联邦政府的雇员。1981年春天，该工会与交通部展开谈判，寻求每年全面增加工资10000美元，同时，把每周工作时间从40个小时减少到32个小时。减少工作时间主要是考虑到空管工作的特殊压力。但是，PATCO总裁罗伯特·波利和交通部部长德鲁·刘易斯在工会规定的6月22日罢工最后期限的前三个小时，达成了一个小得多的协议：对他们现在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加薪4000美元。波利支持这一决定，认为它很合理，即使它没有达到工会的要求。他将这一点提交给属下讨论，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以20：1的比例反对这一计划。

刘易斯和波利重启他们的谈判，但毫无进展。"我们之间相去甚远，没有太大的谈判余地。"这位联邦调解人一个月后说道。刘易斯把工会的最新要求称作"完全离谱儿的"，这些要求与其最初的立场相当接近。同时，工会又设定了一次罢工最后期限——8月3日。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波利声称："目前前景很不乐观。"刘易斯也回应说，作为联邦雇员，空管人员的罢工是非法的。他警告说："我们将动用司法部的一切力量来应对交通管制人员。这可能将是民事和刑事处罚，处罚将立即生

效。”

刘易斯的立场得到了里根的完全支持，总统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谈判。在第一个罢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谈判依然在进行中，试图阻止明天空管人员的非法罢工。我让德鲁·刘易斯转告他们的工会领导人，我是他们在白宫中最好的朋友，但我不会支持非法罢工，也不允许罢工期间进行谈判。”

当第二个最后期限过去之后，工会履行了罢工威胁的诺言，里根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今早7点，代表美国空管机构的工会号召举行罢工。”里根在8月3日向记者们说道，“这达到了7个月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与工会之间谈判活动的顶点。在这些谈判中，双方曾达成并签署了协议，增加了4000万美元的工资和福利，这是其他政府雇员所能期望的两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这些人工作中固有的困难。然而，现如今，该工会又要求7倍于曾达成的协议的数额——6.81亿美元。这将增加他们同胞的税务负担，这是无法接受的。”

里根解释说，尽管发生了罢工，但是，全国的航空交通体系仍继续运转着。监管人员努力投身其中，顶上了本来由空管人员担任的职位。“比方说，在纽约地区，4名监管人员按计划到工作岗位报到，另外还有17名志愿者。”一些空管人员退出了工会，越过了工会纠察线。里根表扬了他们这种公共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里：“假如我不遵纪守法，我又如何能够要求我的孩子遵守法律呢？”

里根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人的观点，说道：“请允许我解释清楚这件事情。我尊重私营企业工人罢工的权利。事实上，我自己曾作为工会主席，领导了工会提出的第一次罢工。我猜我可能是第一个曾做到总统，并且终生都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把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与政府中的劳资关系相提并论。政府无法关闭生产线，它必须不受干扰，提供保护性的服务。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共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里根对罢工组织者采取了制裁措施。他一直敬佩卡尔文·柯立芝的诚实和小政府的观点，也清楚柯立芝作为马萨诸塞州州长之所以能在全国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在一次波士顿警察罢工中宣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无权针对公共安全采取罢工。”这也正是里根针对空管人员罢工采取的态度，也是他与国会共同的态度。国会曾通过大量法律，禁止联邦雇员罢工。况且，作为复工条件，空管人员曾签署了不举行罢工的誓言。里根说道：“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里根强调的是个人誓言），我必须警告那些今早没有上班的人员，他们违反了法律，假如不能在48个小时以内复工，他们将失去自己的工作，并被解雇。”

许多空管人员不相信里根。技术熟练的工人总会在合同谈判中对老板施加影响，因为他们的技术难以在短期内被别人替代。空管人员认为，罢工将会使航空运输瘫痪，迫使政府提高他们开出的条件。

另外一方面，政府拥有法律杠杆，同时对垄断行业的老板也可以施加影响。空管人员在私营企业中的市场就业率非常小。假如PATCO的工人们失去了他们在联邦政府中的工作，那么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寻找新的职业。

里根希望，空管人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誓言的承诺以及对于惩罚的恐惧可以使他们重返机场的控制塔台。许多人表现得像他希望的那样。大约有1/4的PATCO员工没有响应罢工号召，返回了工作岗位。这些空管人员，连同那些监管人员，保证了这个国家大约一半的飞机正常飞行。

但这意味着还有另外一半的飞机停飞了。航空公司因失去的生意而蒙受巨额损失。它们报告说，由于航班取消和客户流失的原因，每天损失高达1000万美元。空管人员因此认为，航空公司是自己的盟友，希望

即使共和党政府不重视工会领导人，那它也可能会听从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然而，里根立场坚定。政府采取行动，收回了PATCO作为空管人员谈判代理人身份。司法部起诉罗伯特·波利，一家联邦法院认定，他蔑视法庭。该法院裁定，如果工会领导者不取消罢工，那么，每天罚款1000美元，而作为组织者的工会，每天罚款100万美元。德鲁·刘易斯声称，总统对于8月5日的最后期限非常认真。他说道：“我不在乎到底是9000人还是12000人或者是10万人，只要没有上班，就要被解雇。”不仅如此，刘易斯还表示，政府正准备更换罢工者。“我们将打出广告，现在已经有人在申请加入了，还有一些人在等待，希望能成为空管人员。”

最后期限过去了，大多数空管人员依然没有回去上班，于是解雇工作开始了。解雇通知被送到了罢工者手中，几名罢工领导者被抓了起来。里根对记者说：“我很抱歉，对他们十分抱歉。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快乐。”但是，这些罢工者咎由自取，而里根无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罢工进行到第5天，联邦航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成功地让3/4的飞机重返蓝天。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打出广告说：“美联航依然在飞，您也可以照飞不误。”达美航空公司的广告是：“您准备好了，达美航班就准备好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允许航空公司自己决定取消哪些航班，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最佳航线上。美国航空公司一位发言人说道：“我们取消了乘客最少的航班，以及那些最不紧迫的航班。”这样一来，公司每趟航班的利润增加了，尽管总收入依然不高。

一周之后，很明显里根赢了。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称，对总统来说，这次罢工是一次“天堂危机”，因为它再次助推了他的原则立场，给他带来了政治便利。总统展示了他坚决打击那些怀疑和反对他的人的决心和毅力。

然而，里根没有发表获胜演讲，即使有过，他也没有幸灾乐祸。一位勃朗宁夫人给白宫写了一封信，抱怨说自己的儿子——一位退伍军人，也在被解雇的空管人员之列。里根回信表示同情：“我可以理解您的忧虑和难过。”随后，他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的立场：“我只能希望您理解，为什么我不可能让所有那些罢工者再回去工作。法律明确禁止公职人员参加罢工。正如您所说的，罢工‘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对政府雇员来说并非如此。”公共部门中的罢工与私营企业中的罢工完全不同。“当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罢工是劳资双方之间的一场经济较量，但是政府不能关闭生产线。为人民提供的服务必须能够持续下去，在这件事上，人民指的就是政府中我们所有的雇主和老板。”里根让来信者思考一下她的请求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其初衷是多么美好。“勃朗宁夫人，像您儿子这样的联邦雇员有200多万。如果我们允许某些人罢工，这些人真的罢工了，我们却特赦了他们，那么，我们给他们所有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相信我，我们这种做法并没有想到要惩罚，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来树立法律的威严。”即便如此，里根还是在寻求办法，来缓解这些被解雇的空管人员的困境。法律规定，禁止被解雇的联邦雇员在三年内重新申请联邦工作。“我正在试图安排弃用这一规定，这样一来，所有这12000名工人无须等待，可以马上申请现有的联邦政府工作。”里根重申了他对勃朗宁夫人的儿子这件事的关心：“我对那些听信工会领导者的话、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人的确感到非常难过，尤其是对像您儿子这样的人，他们曾在部队为我们国家服过役。”

然而，里根更为同情的是那些穿过纠察线、尊重他们对公共福利事业所做承诺的空管员。下面就是里根对另外一位忠诚的空管员的回信：“我无法表达对你们所有人的感激，你们加班加点，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保证了我们的飞机正常飞行。”收信人是亚特兰大的杰里·麦克米伦，此人曾强烈要求总统坚持到底，里根回答说，他会的。“对你，我们有义务坚持到底。同时，我当然并不打算削弱自己对那些违背誓言的人的立场。”

47

里根清楚，还将有另外一场预算之战，但他没有意识到，这场战斗来得如此之快，也没有想到，战争条件竟然如此不利。就在他在国会取得胜利之后不久，总统与戴维·斯托克曼以及政府经济团队的其他人碰了一次面，斯托克曼已经意识到，他对未来4~5年的经济规划缺乏具体的想法，然而，面对着在国会中获取选票的需要，他把这种不安藏在了内心。现在，法案已经通过，他又开始进行自己的规划，结果却发现，他的规划比以往更加糟糕。要想平衡预算，除了削减已经包含在预算内的项目之外，还需要大幅削减其他项目。在此次会议上，斯托克曼提交了一些黑色的活页夹，里面详细记录了糟糕的消息。他说道："胜利的芬芳依然在空气中飘荡，但我不会装腔作势，粉饰太平。在预算方面，我们正在紧急着陆，面临的潜在赤字十分巨大，它们可能破坏总统的整个经济计划。即使到了1986年，要想得到一个平衡的预算，也是难于上青天。简单来说，预算中的每一个单独数字的走向都是相反的。"斯托克曼提醒与会人员，预算草案包含了大量数额巨大的、不确定的储备金，这些数字必须详细说明，以免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更让人担忧的是经济方面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认为，预算草案是假定的。斯托克曼认为，削减税率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即使是他也知道，自己仿佛是在一意孤行。现在，在闭门磋商的内阁会议上，他的发言更为坦率，到1983财年，联邦赤字可能会超过800亿美元，而到了1986年，更会高达1100亿美元。

斯托克曼回忆说："总统大吃一惊。他怒气冲冲、结结巴巴地说道：'戴维，如果你说的是实情，那蒂普·奥尼尔就是正确的了！'"

埃德温·米斯反驳说，斯托克曼没有把削减税率产生的新税收计算

在内。“米斯指的当然是拉弗曲线。”斯托克曼说道，他从没有相信过拉弗曲线，并且对政府中相信这一曲线的人感到不快。他回忆说：“整个加利福尼亚一派都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它（也是最原始的意义）。从他们谈论的方式来看，仿佛他们都希望，一旦供给税率进行了削减，那么额外税收就会开始降临，像甘露一样，从天而降。”他们错了。他继续对米斯和与会的其他人员讲道：“更高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就业率的增加不会增加一分钱的计划内税收。”他说道：“请大家记住，我们同时还在挤压通货膨胀，这将会降低以现行货币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及联邦税收的增长率。”

斯托克曼的讲话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回忆说：“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很显然，我一无所获。”极少数理解他的人点了点头，但保持沉默。“其他人则面带迷惑、厌烦甚至怒气。”他说，经济的预期恢复收益已经被计算在经济计划之内。“因此，降低赤字的唯一办法就是削减更多开支，或者增加新的收入。这是我们面临的战略选择。”另外一方面，政府当然完全可以苟活于现在的赤字之下，放弃其平衡预算的许诺。

里根拒绝支持这种失败的论调，他说道：“不行，我们不能放弃平衡预算。赤字性支出才是我们陷入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斯托克曼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五角大楼按计划每年将增加近10%的预算，如果将其削减到7%，那么结余下来的就可以有大幅增加。

里根再次拒绝了。他说道：“世上的任何人都不要惦记着我们会在国防开支上有丝毫的退缩。竞选期间，曾有人问我，如果我要在国防和赤字中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将如何选择。我总是回答说，国家安全必须排在首位。当时，人们每次都报以掌声。”他说，自己不会食言的，不会背叛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们。

但是，有些东西必须放弃，斯托克曼坚持道。或许政府应当考虑适当增加特许权税——比方说，烟草、酒以及进口石油等——以及使用费。

这次唐纳德·里甘发话了："我强烈反对关于增加这些税赋的说法。"这位财政部部长说道："我们刚刚历尽千辛万苦，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税赋削减。"他使用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喻，继续说道："你可以抬升桥面，或者降低水位。我们要做的是后者——削减开支。"

里甘一直在做里根的工作——努力接近总统，尽管存在贝克–迪弗–米斯这三驾马车的阻挠——并一直在努力让总统熟悉预算细节和政府财政问题。里甘回忆说："我的工作是与总统建立一种坦诚相见的平等交换意见的氛围，这将使总统了解并批准财政部建议实施的政策和行动。我一直倾向于私下阐述我的观点，但正如我提到的，我从没有私下单独见过总统。因此，我只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阐述我的观点。这些人挤在椭圆形办公室或任何其他房间里，而总统也碰巧来此接见他的顾问。"里甘生性有些随意，难以打破这种重大事务难免具有的正式礼仪。

然而有一次，他找到了一种从情感上亲近里根的办法。多年以来，财政部一直在销售E系列债券。这是战争债券的延续，在内战期间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向爱国民众推销过。财政部依然依靠爱国主义在推销这种债券，因为E系列债券的利率只有5%，远远低于债券市场的利率，也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因而购买者每购买一笔债券都是在赔钱。里甘对此良心不安，于是决定向里根提出这一问题。

他说道："总统先生，我不清楚，您是希望我如何销售这些混账东西，因为我心里清楚，购买者是在挨宰。政府没有就E系列债券推出招股说明书，但如果政府这样做了，我们都应当进监狱。利率仅为5%，但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3%？这是欺诈，我们是在对那些人犯罪，这些人非常相信我们，而他们自己对理财又一窍不通。"

里根的反应正是里甘所希望的那样。总统说道："我不相信我刚刚听到的，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人民。我想你是打算改变这一形势？"

里甘说道："我当然想改变。"

里根回答道："那就放手去做吧。"

里甘对这次会议十分满意，他既纠正了一项站不住脚的政策，又与里根建立起了联系。他后来说道："这是我第一次与总统进行正式的谈话。"

当迫在眉睫的赤字威胁到要破坏里根的经济计划时，里甘希望能更多地与总统对话。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对于斯托克曼采用预算驱动的方法来实行政府改革的怀疑。国会承诺削减开支是一回事，而真正的削减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甚至连政府部门的一些机构也靠不住。里甘回忆说："内阁部门和其他机构抵制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工作，反对它们操作自己部门的预算，干涉自己的计划，对自己的部门指手画脚。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在国会找到了有效的盟友。"民主党人士和一些共和党人士猜想，总统不可能再次无限期地向人民发出呼吁，于是再次恢复到以前的开支状况，让选民满意，也可以有助于他们再次当选。同时，经济陷入衰退，减少了税收收入，增加了失业补偿和其他救济开销，使得本来就糟糕的赤字形势更加严峻。

里甘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把经济衰退归咎于联邦储备系统。政府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保罗·沃尔克拒绝了总统的邀请，没有到白宫商讨货币政策。沃尔克说，接受邀请就会危害到美联储的独立性。他同样拒绝了里根提出到美联储访问的要求。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同意和总统在相对中立的财政部大楼共进午餐。里根从白宫步行了400米，这让特工处如临大敌，封锁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午餐会一开始，里根就让沃尔克

大吃一惊，说道：“我一直在想，你是否可以帮助我解决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收到几封人民来信，他们问我，我们为什么需要美联储这样的机构。他们仿佛认为，正是美联储造成了这么多的货币问题，认为如果把它废掉，可能我们会过得更好。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美联储呢？”

“总统非常严肃。”马丁·安德森回忆说。安德森非常了解里根，对这一问题并不感到惊讶。里根的问题反映了他性格中坦率和自信的两个方面：说他坦率，是因为他的确想知道美联储的做法以及原因；说他自信，是因为他敢于提问。来自得克萨斯的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菲尔·格拉姆后来简单分析了里根的性格特征：“他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因此愿闻其详。

但是，沃尔克并不了解里根。安德森写道：“我当时坐在沃尔克对面，看得一清二楚。他面部肌肉松弛，一开口说话下巴就会下垂半英寸那么长。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他一直呆呆地盯着里根，面露惊讶，哑口无言。幸好此时，他没有点上自己的长雪茄，否则他可能会吞下去。他一定在想，天啊，我目前掌管世界上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金融系统，而这个家伙——他将在至少未来4年的时间里担任美国总统——一开口就怀疑我存在的理由。”

沃尔克恢复常态以后，向总统简单地介绍了美联储的工作及其作用。里根看起来很满意，午餐进行得波澜不惊。但沃尔克成了政府方面的一颗毒刺，因为他执意要从经济通胀中榨取利益，无视他的这种行为所引发的痛苦。沃尔克既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也是一个货币主义者，他认为，大众的期望使得工资和物价上涨，也让他们反对约束，即使在货币供应停止增长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休克疗法：尽可能长时间地紧缩银根，以此来改变市场和个人的想法和期望。沃尔克的政策对整个经济造成了重创，高利率绞杀了需求，把整个国家拖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

唐纳德·里甘认为，自己跟沃尔克同样懂得货币，他认为，这位美联储老大做得太过分了。里甘写道："沃尔克一心想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逐出去，采取限制性政策，在货币供应中造成了巨大的、难以预测的震荡。"当国会继续以往的开支模式时，沃尔克挤压得更严厉了。"这样一来，国会方面在猛踩经济发展的油门，而沃尔克却同时在猛踩刹车。此时，要想控制这辆侧滑的老爷车的方向盘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政府干脆放开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里甘试图调和沃尔克的政策。他清楚，美联储作为一个机构具有独立性，但还是开始做其老板的工作。每个星期四，里甘都会同沃尔克一起吃早饭，这一周在财政部，下一周在美联储。里甘回忆道："我和沃尔克就稳定、可预测的货币政策展开讨论，这样的政策可以确保向私营企业提供足够、可靠的资金供应。"沃尔克回应说，过去10年的通货膨胀使得他那种严苛的政策十分有必要。里甘请他考虑一下代价。"沃尔克十分聪明、敬业，毫无疑问，他的行为的确灼伤了通货膨胀。"里甘后来写道，"但这种灼伤让病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无法使用自己的右臂。"

里甘认为，沃尔克有时会惩戒银行家，这只是因为沃尔克认为他们需要被惩戒。"每当他又喂给银行家们一勺药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保罗，你真是个奶妈！'"然而，银行家们喜欢吃药，认为作为债权人，他们最终一定会从更为坚挺的美元中受益的。里甘说道："银行家们喜欢他，媒体也喜欢他。"里甘认为，沃尔克之所以被人喜欢，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主席是首都唯一一位可以和里根总统在知名度上一较高下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沃尔克很招媒体待见——这一点没有逃过白宫公共关系专家们的眼睛。"

让政府灰心丧气的是，沃尔克策划了自"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年初，失业率超过8%，逼近11%。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还没有过这么多的美国人失去工作，并且联邦赤字也比以往都要大。

48

在与自己的经济团队会面之后，里根在日记中写道："又一枚炸弹！最新的赤字！太糟了！"

在向更小规模的政府调整期间，总统曾预料到会有痛苦，但他没有想到痛苦会如此之大。通货膨胀率正在降低，但计划内的税收也在降低。本来税收还指望通胀可以让纳税人提升纳税等级，直至分级纳税产生效果。里根写道："我们有望实现低通胀和更低利率，这样一切都再好不过，但巨大的赤字糟透了。这是非常晦暗的经济景象。"

11月初，政府遭遇了一次极度尴尬的事件。戴维·斯托克曼一直在与威廉·格雷德私下会面。格雷德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编辑，偶尔也会向《大西洋月刊》投稿。斯托克曼后来解释说，格雷德是他的朋友，非常精明，他喜欢与之一起提升自己的见解。斯托克曼还说，自己误解了两人谈话的基本原则。格雷德同意，在预算草案通过或没有通过之前，自己不会发表任何文章。很显然，他并没有同意不提及斯托克曼的名字。1981年12月，格雷德写的一篇文章在当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该期杂志在11月初就被摆上了报摊。文章题目是"戴维·斯托克曼之学识"，里面对斯托克曼的刻画充满同情，但对供给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文中包含了一些引语，这些引语在这篇长文的语境中不会让人感到惊诧，但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则会带来破坏性的伤害。"对于降低最高税率来说，肯普·罗斯一直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格雷德笔下的斯托克曼在提及普遍削减税率时这样说道。这就让政府看起来好像是富人雇来的骗子。"供给经济学是一种'涓滴理论'。"

政府官员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比较慢，部分原因在于文章篇幅太长而

他们太忙。詹姆斯·贝克和政府立法战略团队对斯托克曼的狼狈模样一笑了之，送给他一张加了画框的杂志封面。贝克回忆说："我们甚至在这个破玩意儿上签下了我们的名字。"

但是，民主党抓住了文章中"特洛伊木马"和"涓滴"这样的字眼，将其视为反映了里根经济学核心部分中的基本欺诈特征。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里·哈特指责斯托克曼的言论是"越战之后政府官员最具嘲讽性的表现之一"。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称斯托克曼的行为是"我们在百老汇之外看到的最好表演"。媒体对这一故事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贝克说："新闻媒体对我们狂轰滥炸了两整夜，与其说是在谈论文章的内容，不如说是在谈论民主党对其做出的评价。"

埃德温·米斯和迈克尔·迪弗希望马上解雇斯托克曼，他们说总统别无选择，但贝克不同意。他认为，政府需要斯托克曼在数字方面的天赋，贝克回忆说："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除了他还有哪个家伙可以胜任那份工作。"

但斯托克曼需要得到一次教训，贝克找他谈话。在里根上任的这9个月里，斯托克曼经常到贝克的办公室来，跟他处得很熟，甚至很轻松。"但那一天不同。"斯托克曼回忆说，"一个完全不同的詹姆斯·贝克坐在离我两米多远的地方。他刚刚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一言不发。他惯有的开场白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讲低格的笑话，也没有在坐下前，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跳起华尔兹舞步，没有拿着纸团做跳投动作，让它以一道弧线飞过屋子落入垃圾桶。这一次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双眼透着寒光。"

斯托克曼知道贝克听到了米斯、迪弗以及政府中其他人的说法，贝克的话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说道："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听好了。你马上要拍屁股走人了。其他所有人都希望你马上滚蛋，马上，就今天下午。如果不是我，你已经卷铺盖走人了。但我给你争取了最后一次机会来自我救赎。因此，你一定要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话去做。否则，你就

到此为止了……你将与总统吃饭，当面谢罪。你将把苦果全部咽下，成为这个世上最追悔莫及的那个浑蛋。”

斯托克曼一字一句地全听了进去。贝克问他是否明白，斯托克曼点了点头。贝克站起来示意会见结束，斯托克曼向门口走去。贝克再次用阴冷的目光盯着他，说道：“我再说一遍，你可别听不明白。我希望你经过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的时候，能看到你夹着尾巴做人。”

贝克这样做主要是装装样子，因为他不信任斯托克曼。贝克后来说道：“他不忠诚。”但斯托克曼很精明，既然自己现在成了众矢之的，那他就把原本可能攻击里根的批评全部揽了过来。如果有必要，在这之后，他还可能被解雇。同时，他必须学会守口如瓶，必须经过鞭策以后表现得更好。

贝克清楚，自己必须进行鞭策，因为总统无法那样做。工作人员都知道，里根为人温和，无法责备他认定的那些自己人。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戴维·斯托克曼被认为向《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记者和盘托出了我们的一切。如果情况属实，那戴维就是叛徒——但事实上，他也是受害者，害他的人是他一直当作好朋友的那个人。”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午间会议上，里根表现出对斯托克曼的同情。斯托克曼进门时的表现很恰当：一脸懊悔，等着挨训。里根在日记里写道：“我吃了午饭，但他没有吃。他承担了责任——承认对外发表不当言论——然后正式提出辞职。我让他讲了一下关于他认为是朋友，却出卖了他的那个人的全部经过，然后拒绝接受他的辞职，并告诉他，在媒体面前应当承认错误，消除这件事造成的误解。”

斯托克曼对这次会面记得更为清楚，他写道：“总统的眼睛湿润了，没错，闪着泪光。”斯托克曼本来想到的是总统会大发雷霆，但他

得到的却更近乎是悲伤。总统问道："戴维，你对此如何解释？你伤害到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斯托克曼结结巴巴地说了事情的经过，但什么也没说清楚。最后，他放弃了，说道："先生，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开除我吧，我把一切都搞砸了。"他提出辞职。

"总统把他的手放到了我的手上。"斯托克曼回忆说，"他说：'不，戴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读了整篇文章，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明白，那些引语让文章看起来不一样。我希望你没有说过那些话，但你成了媒体蓄意使坏的牺牲品，他们试图打垮你，因为你帮助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

里根站起来向斯托克曼伸出手，说道："戴维，我希望你留下来，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他走向办公桌，但随后又转过身来，说道："对了，那些小伙子们认为事情快要失控了，他们希望你起草一份声明，今天下午到媒体面前解释清楚这一切。你会照做吗？"

49

威廉·凯西被赶出了国务院，他吞下了这枚苦果，但这味药并不合他的胃口，中情局觉察到了他的消化不良。“许多事情让他感到很失望：庞大的官僚机构、完成简单任务所需要的大量时间、故步自封、胆小怕事以及缺乏变通。”罗伯特·盖茨在提到自己的新老板时这样说道，“这位战略情报局的老兵到中情局来发动战争，结果没有发现暗藏的敌意，却发现了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凯西马上开始治理整顿。“我想要告诉您一些关于我在中情局已经进行和即将进行的人事、组织以及观念上的改变。”他在1981年5月写给里根的信中写道，“机构配备不错，机构人员忠心耿耿，情绪饱满。但是，一直运作不佳，在高层人士方面以及发展潜力方面太过狭窄。”凯西指责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削弱了该机构的能力，指责媒体蓄意破坏。但是，体制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关于中情局人员（以及其他联邦官员）的薪水上限问题。有能力的人在政府之外的收入远比他们在中情局内的收入要高得多，其结果就是，这些人在刚要达到自己事业顶峰的时候，不少人离开了中情局。

凯西无力改变薪水问题，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到了其他事情上，他向里根解释说，中情局由四个主要部门组成：分析部门、行动部门、技术部门和管理部门。他写道：“在我清理整顿期间，分析部门和行动部门是最需要改善和加强的。分析工作一直学究气太浓，不够扎实，相关性不高，并且与现实脱节。”凯西说，他正在改变这一局势，把行动部主任调整到分析部门。“我经常发现，从大街上、从现场行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要比从学究气十足的分析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可靠得多。”

关于行动部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用过去3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来与行动部门的所有人员谈话，仔细评估行动部门的所有行动。很快，我

就清楚地发现，这里人浮于事。”因此，凯西把行动部门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的主管下面配备两名副手，其中一个负责“全球秘密行动”，另一个负责提供行动支持。凯西这样描述了他对行动部门合适主管人选的考虑：“我有一块硬骨头要啃。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和经验，我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推动我们所需要的重建工作，此人就是马克斯·休格尔。”凯西提醒里根，休格尔曾为1980年的大选出过力。此人曾在部队情报部门工作过，也在企业部门工作过，但他缺乏在情报行动部门的工作经验，也正因此而受到批评。但凯西愿意维护他：“一旦我认定任命休格尔是最佳选择，那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咬紧牙关撑下来，勇于为此受过。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做法。”

凯西振兴中情局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体现了里根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好是坏。他任命马克斯·休格尔这件事立刻被证明不是件好事。“这是极为糟糕的一次任命。”罗伯特·盖茨回忆道。盖茨也认为中情局一直是近亲繁殖，需要外来的思想和力量，但他认为，行动部门不适宜安排这样一个新手。不只盖茨一个人这样想，部门内的一些老职员也故意刁难休格尔。“他们几乎马上开始向媒体透露休格尔的错误、怪癖和失礼。”盖茨说。休格尔的无知对自己也非常不利。“所有人陪他到国会做证或者到白宫开会都会感到很尴尬，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处于视线之外。”凯西最终也承认这一任命适得其反，他找到一个借口——针对早期内部交易的指控引发的一次小丑闻——把休格尔打发走了。这些指控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但凯西无意再让他回来。

盖茨说，凯西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训。“这是凯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组织机构上挑战行动处，结果却引火烧身。从那之后，他就只围绕着行动部门展开工作，不再试图改变它，这将引发可怕的后果。现在，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扮演起多诺万的角色。”威廉·多诺万是战争时期战略情报局的传奇领袖。“他会屈尊深入到秘密行动中去，直接与自己的心腹一起工作。”他会把自己的人隐藏起来，把他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凯西的首任副局长博比·雷·

英曼坦率地指出：“他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骗子。”

里根允许凯西扮演多诺万，但他要求自己的情报主管同时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从他一上台，里根的外交政策就致力于与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博弈。尽管他并没有一直监督，但他鼓励所有对博弈有利的行动，反对或忽略对博弈不利的行动。里根命令凯西和中情局，针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行动和动机，制定出美国情报机构的最佳预判。这一活动历时数月，1981夏天，凯西提交了报告。

“我们认为，苏联军队领导人把军事力量看作苏联维持其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是凸显苏联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因素。”这份秘密报告这样写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苏联领导人发现，过去20年里的巨额军事投资正在带来回报，在整个军事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积极发展。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取得了政治收益，军事力量或军事援助成为苏联外交真正的政策工具或决定因素。”苏联人在不结盟世界中特别活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支持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左翼分子，并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联人的这种过于自信的全球行为有可能持续下去，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力量正在减弱，它会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作为其实现全球野心的手段。”克里姆林宫方面的野心可能会引发与美国的冲突。“莫斯科依然把这种可能看作极度危险的，但是，从战略平衡的变化以及一般性部队的持续增长来看，苏联人现在准备得更为充分，或许也更愿意在严重的危机中接受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在那些他们拥有军事优势或者地缘政治优势的地区。”

然而，莫斯科方面也非常愿意与西方改善关系。这份情报报告写道：“苏联人依然强调与华盛顿方面展开军备控制对话的重要性，将其视作双边关系的关键，他们将试图恢复缓和，将其视作限制美国军事政策、推进自己军事与政治目标，以及控制由不断提升的国际紧张局势带来的代价与风险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如果他们的想法成功了，他们会继

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如果没有成功，他们就会改弦易辙。如果他们断定，近期没有希望从最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他们可能决定突破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中的限制，试图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美方，并利用这次失败，扩大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影响力。”

这份报告还提到，克里姆林宫方面在欧洲发现了一个突破口。“苏联发现西方世界的声音并不一致——比方说，在实施北约关于实现远程核威慑武力现代化的计划中。他们试图利用这些分歧，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使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恶化，也可以从欧洲人那里寻求到某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益；对西欧一些政府施加压力，影响华盛顿方面，在对苏关系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手段。”

然而，围绕团结工会运动而产生的波兰问题抵消了苏联进一步向西发展的优势。“波兰对苏联构成了最为危险和复杂的挑战，挑战了苏联战后在东欧确立的核心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认为，波兰发生的变化威胁到了苏联对于东欧的霸权地位，那么，他们就准备采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其控制地位。然而，由于他们清楚，政治、军事和经济干预的代价极其高昂，因此，只要能确保波兰对于华约的忠诚，他们就可能让自己接受波兰国内实行修正的共产主义制度。”

50

担任过大州州长的许多经历可以为担任总统做好准备工作：人事关系、预算以及与立法机构和媒体的关系。但州长无法在重要的外交政策领域做好准备。偶尔入主白宫的参议员比州长们略微有些优势，因为参议院需要审批条约，并在资助外交政策方面与白宫一起合作。

里根比其他那些升级到白宫的州长们多了一种优势，因为他在当选总统之前参加了3次竞选。他的第一次竞选是在1968年，当时他行动迟缓，表现拘谨，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他坚持学习、思考，并在准备和进行1976年和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大谈特谈国际事务。

即便如此，对外交政策进行决策与竞选承诺或批评他人的决策是不同的。里根的“在岗培训”主要发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及在范围更小、主题更集中的国家安全规划团队的会议上。里根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尽管不是始终如一的专注。博比·雷·英曼回忆说，在为时1个小时的会议中，里根通常在前50分钟的时间里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偶尔会点点头。但英曼留意到，这些点头的动作并不总是发生在需要表达同意或反对的发言之后。很显然，他走神了。然而，在会议结束的前几分钟，他会重新振作起来，此时埃德·米斯会开始提出一些简短而尖锐的问题，意在推导出与会人员的观点。里根会领会精神，然后很内行地根据这些问题和回答来总结此次会议。

在里根的外交政策培训课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十分投入的。他第一次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加勒比海盆地区有关。“这一地区有33个国家，其中19个独立国家和14个自治政府。”理查德·艾伦开场介绍道，“这些国家都很小，问题很多，容易受到外部力量攻击。”这位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针对这一地区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综合性计划。“一项综合性政策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对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插话道：“这一地区是我们的第三边界。毫无疑问，目前该地区动荡不安。该地区的中产阶级正要求从社会中得到更大利益，但社会难以应对变革的需要。然而，假如不是因为古巴的原因，这些国家可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古巴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为自己服务，出口武器，进行颠覆活动。”萨尔瓦多是古巴的主要目标。“600吨武器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是古巴的同谋，因为它依然在接受美国的援助，所以容易受到美国方面压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告诉尼加拉瓜人，我们像之前的政府一样，绝不容忍违反协议的行为。”——地区协议规定不允许干涉他国事务。

里根发言了，他说：“我个人觉得——对此我详细讲过，我们在与这两个美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方面已经落后了，或许落后了几十年。”前任政府的行为是在倒行逆施。“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外交使团的态度，不要以人权的名义使别国政府垮台。它们两个国家都没有像古巴和苏联那样违反人权，犯下罪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针对人权的唾液测试就抛弃我们的朋友。我希望看到这种做法停止。我们需要认清这种思想的人。”

卡斯帕·温伯格主张采取行动。这位国防部部长说道：“我们可以进行某些秘密援助来破坏古巴的行动。”采取秘密路线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美国人并不了解古巴的行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但随着秘密行动的推进，还需要进行教育工作。“我们需要向人们解释，这对美国来说形势危急，我们必须坚决行动起来。”

里根认为，应当在萨尔瓦多这件事上表明立场，做出声明。他说道：“萨尔瓦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在这儿取得的胜利可以为其他地区

树立榜样。”

威廉·凯西指出，时机并不在美国一方，因为英国正从伯利兹撤出，几个月后，这个长期的殖民地就将取得独立。这位中情局局长说，这将给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严重影响。

里根重复说萨尔瓦多是关键。“我们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萨尔瓦多必须是我们的取胜之地。”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直是随后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的焦点。亚历山大·黑格把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召回国，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劳伦斯·佩苏略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印象不是很好。他说道：“他们领导水平不高。他们是在尼加拉瓜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到反对索摩查的全国起义之后才上台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没有管理政府的经验，在领导国家方面表现得乏善可陈。至于他们与萨尔瓦多的关系，佩苏略说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受到革命过程中传奇故事的强烈感染。他们在中美洲看到过这种传奇，因而热切希望在萨尔瓦多也能发生这样的传奇。他们还发现，革命的萨尔瓦多对他们自己的革命也能构成一道前沿防御阵地，或许被卡斯特罗说服，决定参与其中。”

佩苏略对里根政府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能否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萨尔瓦多问题上退让？我们能否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继续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能否在他们跟古巴人之间制造分裂？”佩苏略没有否认强硬措施可能有必要，但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这种必要，政府必须谨慎从事。他说道：“要避免任何鲁莽行为，暂时不要终止援助。当地局势表明，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我方的突然行动将在尼加拉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带来连锁反应，这会冷却或者终止双边关系。”

黑格提议，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30天的考虑时间，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停止在萨尔瓦多的行动，那么美国将中止一切援助，或许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在此次会议上，里根考虑是否可以深入到中美洲问题的始作俑者那里。“对古巴我们能采取什么特别措施？”他问大家。

黑格在国务院的副手威廉·克拉克说，国务院计划向国会领导人展示古巴人在萨尔瓦多问题中沆瀣一气的证据。

里根想要的更多。他追问道：“对古巴，我们可以施加什么样的具体压力？”

卡斯帕·温伯格回答说，秘密行动是一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是经济压力。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贸易禁运，但政府可以尝试说服美国的盟国加入到贸易禁运中来。

里根又询问了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黑格对总统的问题表现得直截了当，但当此次绝密会议被撤销密级时，他的话也就被删除了。

温伯格指出，选择军事行动可能带来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是秘密行动中所没有的。这位国防部部长说道：“军事行动的问题就是，随着行动的升级，国会的检查就会开始起作用。”

里根没有理会温伯格的反对，相反，他又回到了萨尔瓦多的话题上，说道：“如果萨尔瓦多的执政团倒台，那将会被视作美国的失败。”他支持对尼加拉瓜提出30天的警告，但也在准备考虑行动升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中美洲成为大陆上的另一个古巴。这绝不能发生。”

51

里根从来就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的职业进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谨慎实施。他用了几年时间从广播电台跃升至电影界，又用了10年时间从电影业跻身政坛。甚至在认定南希是他人生真爱这一点上，里根也表现得不急不慢。

大部分情况下，里根作为总统在决策时也表现得同样深思熟虑。尽管他决意要阻止中美洲地区变成另外一个古巴，但他依然拒绝莽撞行事。

虽说如此，有时候里根还是会禁不住想要行动得更迅速些。几十年来，波兰在政府领导下一直表现得我行我素。在20世纪50年代，波兰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中糟糕、危险的条件以及政府中的腐败现象。1970年，格但斯克的船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发生骚乱，抵制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引发了其他城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去。1978年，波兰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升任罗马教皇，史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件事给了波兰抗议者更多的信心。第二年，教皇的来访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走上街头，直接指责现有政权。1980年夏天，肉价飞涨，引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催生了由魅力超群的莱赫·瓦文萨领导的格但斯克波兰团结工会。罢工席卷全国，导致国家经济瘫痪，并让政府领导人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要么调动军队镇压罢工者，要么答应他们的一些要求。政府选择了后者，这让瓦文萨和工人们认为，事情在向着他们的方向发展，也促使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正如中情局指出的那样，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政府密切关

注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克里姆林宫方面十分关心谁来管理这个国家。自“二战”以来，苏联对紧邻其领土西面的国家的首要政策一直是阻止这些国家落入敌对势力手中。

里根继承总统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波兰问题，同时还继承了一项美国政策，这一政策比他对吉米·卡特的赞扬更为持久。卡特在1980年12月宣布：“美国正持续关注苏联军队在波兰边境上史无前例的屯兵。波兰人民和政府应当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不应当受到外部干涉。”卡特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来缓解这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整体贫苦状况。同时，卡特发布了言辞激烈的警告：“苏联在波兰的任何武装行动都将对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和未来的政策产生直接的、极其不利的影响。”

里根在竞选中曾攻击民主党外交政策的软弱无能，因此他的表现比起卡特毫不示弱。他重复了卡特政府的表态。宣誓就职后不久，里根说道：“波兰人民必须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发生在那里的外来干涉必将对整个东西方关系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在里根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美国情报分析师一直在潜心研究苏联方面是否会进行干涉。情报来源的关键渠道是一位波兰上校理夏德·库克林斯基，他与中情局已合作多年。中情局的罗伯特·盖茨回忆道：“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每一份报告。”政府则做好了两手准备：“最糟糕的情况——苏联干涉，抵抗，重大流血事件。”盖茨这样写道，波兰国内采取的镇压或许可以预先阻止苏联干涉。美国人的应对措施包括召回美国驻波兰大使，削减经济援助，对波兰政府采取更严厉的信用贷款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没有考虑过更强硬的措施，即使是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盖茨在提到里根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谈话时回忆说：“在他们所有强硬的措辞中，这个保守派的新团队对于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讨论的全部是严厉的警告和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至于更严厉的措施甚至都没有讨论过。”

几个月后，波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库克林斯基上校传来消息说，由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的波兰政府正在与克里姆林宫方面讨论要在波兰实行戒严。这是否将成为苏联进行干涉的前奏还不好说，但是盖茨和中情局认为这很有可能，为此他们为里根准备了一份针对这种情况可能会用到的声明。这一计划是让总统公开赞扬“波兰爱国者日”，并要求美国人民“与波兰兄弟姐妹站在一起”，佩戴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颜色的绶带。

然而，中情局认为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目前是这样。威廉·凯西在呈送给里根的报告中写道：“苏联人现在是‘进退维谷’。如果他们行动，那么巨大的债务、波兰全体工人的怠工以及数百万波兰人针对他们展开的游击战将使其经济陷入混乱；如果他们不行动，那么他们将会直面西方国家和一股可以拆散他们整个体系的政治势力。”这是一个苏联领导人不希望做出的决定。凯西推测说：“在派出部队进入波兰之前，他们将会穷尽一切手段让波兰人自己进行镇压。”

里根意识到自己也是进退维谷，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行动或者是否采取行动来帮助波兰人民。他们的经济完蛋了，这是红色堤坝第一次决口——波兰对苏联共产党不再抱有幻想。我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波兰垮台的风险呢？但就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我们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援助吗？”

1981年夏天，波兰的紧张局势慢慢出现了缓和。波兰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恳求瓦文萨和波兰团结工会不要举行大罢工，因为他认为如若不然，必然会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刚开始瓦文萨拒绝了，可这位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的主教跪倒在这位团结工会领导人面前，说自己将长跪不起直至死去，除非瓦文萨取消罢工。此时，瓦文萨让步了。

但到了秋天，形势再次变得令人担忧。缓慢的改革步伐让团结工会

再次威胁要举行大罢工，而波兰政府对此提出警告，苏联也派遣包括华约军事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元帅在内的顾问前往华沙，坚定波兰政府的决心。

12月，波兰政府强制实施戒严，逮捕了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取缔了工会，剥夺了外出和通信的权力，关闭了大学，波兰边境遭到封锁，实施宵禁。镇压行动导致至少12人——或许几十人——死亡。

当库克林斯基上校觉得自己的伪装身份受到威胁时，他逃离了波兰。这让中情局丧失了它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情报资源。但他提出的关于可能实施戒严的警告让美国政府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有所准备，里根马上给教皇打去电话。据一份透露给媒体的材料显示，里根是这样说的："教皇陛下，我希望您明白我们对您家乡的形势深表关切。我们同情波兰人民，但不是波兰政府。"里根赞扬了约翰·保罗二世的行为，赞扬他使波兰的斗争成为全球争取自由斗争的一部分。"在您访问波兰，确保他们信仰宗教、信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国家深受鼓舞。这对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激动。"

总统在秘密斟酌自己的选择。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会。会上，里根听取了针对苏联及波兰采取强硬行动的不同观点，他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权衡了大家的观点。亚历山大·黑格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讲述了波兰当前的局势，他说："波兰人民普遍反对波兰政府，却没有大规模地公开挑战它。"宗教领导人，包括华沙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都在谨慎行事。黑格说道："格莱姆普大主教见风使舵，从强烈谴责已经实施的戒严的立场转变成了恳求温和处理问题，不要发生流血冲突。"波兰军方警告教区牧师不要诋毁戒严，大部分牧师看起来都顺从了。

黑格说国务院从驻莫斯科大使那里收到了一份有关苏联立场的详细分析报告。"这份报告主要讲的是苏联人正在进行冷处理，他们不打算

进行干涉。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动员苏联人民为干涉做好准备。”黑格说道。大使断定克里姆林宫方面缺乏进行干涉的胃口。“苏联害怕进行干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无法控制局面。”黑格说道。他们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才可以使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免于灭顶之灾。“苏联人正准备向波兰运送食品，准备向波兰经济提供大规模紧急援助。”

在介绍完情况之后，黑格强烈提请大家注意：“我不赞成那种歪门邪说，认为一切都无可挽回，认为苏联人掌控了一切，认为团结工会已经完蛋，或者认为在这件事上苏联进行了干涉或没有进行干涉。我认为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假设采取行动。”相反，政府应当仔细观察，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我们应当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等到形势变化时再使用。”

里根寻求的是更为强硬的回应。他说道：“这是60年来我们第一次拥有这样的机会。”他指的是团结工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所打开的缺口。“在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假如我们不全力以赴，我们是否会后悔莫及呢？我说的是对苏联进行全面封锁，不要什么缓和！我们都清楚，世界也清楚，他们在背后插手，我们已经多次做出了让步！里根指出，莱恩·柯克兰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波兰团结工会。”里根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道：“柯克兰曾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我们的工会将拒绝装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同意的话，但我们的工会，我们自己的‘团结工会’却拒绝装船，那成何体统！”他指的是允许美国继续向苏联出口这件事。里根承认，与波兰做生意的大公司会因为禁运而遭受损失。“我清楚，这对国际收割机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可能意味着数千人失业。”但是，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能允许形势继续下去吗？”里根认为不能，尽管他提议寻求办法来缓解对美国的冲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办法来补偿我们的公司，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些商品列入库存清单，采取另外的办法来处理。”但政府必须有所行动。“我们能什么都不做，只是对我们的盟友说：‘这是一个大赌局’？

或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里根把团结工会和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比作美国的建国者们。“这就像是我们自己《独立宣言》中的开场白：‘处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这正是他们目前在进行的事业。”

乔治·布什支持里根的言论，这位副总统说道：“我在这个周末对这一问题考虑了许多，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布什要求里根宣布对波兰的要求。“总统应当切实同瓦文萨和波兰大使在谈话中把观点统一起来。我真的认为——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国家应当更进一步，这不单纯是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

卡斯帕·温伯格支持布什的建议。这位国防部部长告诉里根：“我建议您应当向世界发表讲话。现在不是谨小慎微的时候，需要有人告诉世界，它有一个领袖。”温伯格希望里根毫不含糊地把责任推到克里姆林宫方面。他说：“大家不要弄错，波兰现在的雅鲁泽尔斯基就是一个穿着波兰制服的苏联将军，苏联正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温伯格强烈要求采取行动：“这是抓住主动的一次机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威廉·凯西插话表示赞同：“假如我们没有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会丧失信誉。”凯西警告说，美国的欧洲盟友可能不会支持禁运，但他认为他们的这种胆怯不应当阻止总统采取必要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全面的经济制裁。”

农业部部长约翰·布洛克试图缓和一下局势。布洛克需要应对的是那些可能受到禁运冲击的农民，但他提议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谨慎行事。他说道：“苏联正由于自身的负担而垮台。我认为总统应当说些什么，但我们必须谨慎。假如这次我们摊出了我们的王牌——全面经济制裁，那么以后怎么办？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再动用王牌，不要过早地使用。”

里根再次发话了，他说道：“我跟大家谈一下我的想法。我们是西

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多年以来，除了名义上是这样的之外，我们一直没有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现在，我们必须担负起这一责任。我说的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告诉我们的盟友，请求他们——不是乞求他们——加入到对苏联的全面封锁中来。取消所有的许可，告诉盟国假如它们不与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让它们明白——但不是采取威胁的方式——我们可能会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盟友关系。”总统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我想起了1938年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次绝佳的统一行动的机会。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自由世界携起手来抵制德国。在发出那一请求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房间内没有一位指出里根（再次）混淆了那次抵制演讲的关键细节。相反，他们聆听着他讲述关于好莱坞的故事，关于华纳兄弟公司如何拍摄了一部影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这部影片惹恼了某些电影公司，因为他们试图在德国上映该片。这些公司试图打压该电影，但是华纳坚持自己的立场。里根说道：“电影发行之后，影响力极大。”向世人发出了警告，揭露了希特勒的险恶用心。

里根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美国需要维护其立场。“如果我们展现出这种力量，并且有人追随着我们，如果我们坚决要求波兰团结工会得到自身的权利——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的话——那么什么也不需要做。但是，假如事不遂人愿，那么我们必须要采取制裁。那些不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的，也将受到抵制，并被视作与我们作对。”里根嘲笑卡特政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对莫斯科采取的制裁。他说道：“小麦事件和抵制奥运会行动都十分荒谬。是时候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唐纳德·里甘同约翰·布洛克和亚历山大·黑格一道，试图缓和会议上的强硬，他说道：“我们希望传递出某种信息，但我们不想引发街头打斗。”里甘认为，盟国的协助对有效的制裁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假如事情发展到了那一步的话。“亚历山大需要时间，来让我们的盟友参与进来，而不是强迫它们。向它们表明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这

需要时间。”

黑格支持布洛克的担忧，反对孤注一掷的做法。这位国务卿说道，苏联人还不确定会对波兰采取什么行动。“假如现在就实施全场紧逼，那么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

“我根本不担心这个。”里根回答道。很明显，总统希望采取坚定的行动。“假如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从现在开始，三四年以后，我们将面临另外一种局面。到那时，我们就会想，当时全国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呢？我厌倦了不断回顾过去。”

乔治·布什转向了中间立场，他说道：“我同意唐纳德和亚历山大的意见。我们需要时间来协商，但目前，做出声明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需要的是道德上的领袖。”布什要求里根展示自己最擅长的一面：“您应当表明自己十分关心瓦文萨，关心团结工会，关心波兰大使及波兰人民。您可以笼统地提一下，不必讲清细节。”布什再次转述了里根的立场，说道：“我们现在处于情感上的转折点。”

温伯格再次紧逼上来。这位五角大楼的长官说道：“我担心我们等的时间过长，因为一个盟国就可以让我们耽搁下来。如果有办法可以缓和苏联的立场，那么，我们需要的就不是阻止他们，而是发表演讲，如果这样做没有结果，那就讲清楚我们想要做的具体事情。”

黑格不喜欢进行威胁，哪怕是遮遮掩掩的威胁，除非决策已定，而苏联人又没有做出回应。他说道：“我们要做的不是发表演讲，而是制定政策。除非我们准备行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发表演讲。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处境还没有那么糟糕。”

里根回答说：“不，不要长篇大论。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来全面封锁贸易，就像罗斯福总统1938年提议的那样。”

黑格回应道："再次警告他们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应当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你已经决定有所行动。"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插话进来。里根让这位乔治城大学的教授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那儿，她就像在大学里一样，经常发表演讲。她说道："总统先生，您必须实话实说，必须支持本届政府的核心立场。"柯克帕特里克指出，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为首的保守派权威人士一直在指责总统三缄其口、优柔寡断。里根需要改变这种印象。柯克帕特里克说道："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防止因为优柔寡断而导致我们士气低落。今天早晨，我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一篇关于阿富汗的文章，让我非常难受。或许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向阿富汗人提供更有效的援助。对此我们不需要讨论——直接去做就行了。"

埃德温·米斯希望与会人员，尤其是总统考虑一下禁运或封锁措施的实施范围。米斯问道："我们是否要取消所有的贸易，还是部分贸易？或者所有的联系，包括航班和电话？我们是否要切断外交和政治接触？我们是否要召回我们的大使？"

里根回答说："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包括在内，没必要有所保留。"然而，在关闭使馆这一点上他画了一条界线。"我们必须送还在那儿的7位基督教教徒。"他解释说。他指的是那些在使馆寻求庇护的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我们还必须让武器限制谈判进行下去。"他补充说，"但要做好撤出谈判的准备。"

黑格同意使馆必须继续开放，他说道："我们不希望关闭我们的使馆或中断外交接触，不希望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黑格提醒大家注意波兰对于莫斯科是何等的重要。"请大家不要误判，这对苏联来说是生死攸关，为此它们不惜一战。"

卡斯帕·温伯格认为黑格有些夸大其词，这位国防部部长说道："苏联可能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不是世界大战。"

总统说他打算写封信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信中会提醒这位苏联领导人经济制裁的危险性。里根说道：“信里会指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他们希望的生活水平，失去贸易之后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我们可以说我们无法继续进行贸易，也会迫使我们的盟国同我们一道行动，除非波兰局势得到改善。但同时我们也伸出和解之手。他能想象得到如果与西方的贸易敞开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吗？那将是一个不同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他可以得到这样的世界，同时不必放弃任何事物，或者得到那样的世界——假如我们被迫采取贸易制裁的话。”

里根很少在像这样的重要会议上进行决策。当埃德温·米斯告诉他，他下面要参加的一个来访妇女团体的会议已经迟到15分钟的时候，他还没有就波兰问题做出决定。里根站起来准备出发，边走边开了句玩笑：“大家记住，回去囤点儿伏特加！”

第二天，里根接见了波兰驻美国大使及夫人。他们在戒严之后投靠了美国。大使赞扬了美国政府这些年来提供的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提到了《自由欧洲之声》，说他希望这一节目可以继续广播下去。随后他请求美方帮个忙，说道：“总统先生，今晚您能否为波兰人民点上一支蜡烛放在窗口呢？”

迈克尔·迪弗参加了会见，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罗纳德·里根当即起身来到二楼，点燃一支蜡烛，放在餐厅的窗口。后来发生的事是我记忆中里根总统在任期内最为感人的一幕。他护送着自己的客人穿过走廊，来到白宫外南草坪环形车道边。他冒着雨，为波兰大使夫人撑着伞，穿过C–9特勤处岗哨，把他们护送到车上。一路上，大使夫人靠在里根的肩头哭泣。”

第二天晚上，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圣诞演说，核心内容是波兰问题。他说道：“今晚当我对大家演讲的时候，一个自豪而古老的国家的

命运正命悬一线。一千年以来，波兰，这一虔诚的宗教之国，一直都过圣诞节。可是，今年的圣诞节几乎无法给英勇的波兰人民带去欢乐，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政府背叛了。”在戒严之下，波兰发生了暴力事件和大范围的逮捕行为，这使得波兰在《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赫尔辛基协议》，以及几年前它自己的《格但斯克协议》中的誓言成为笑柄。跟以往一样，里根谴责了苏联。“当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苏联元帅兼华约军事总司令库利科夫以及苏联军队的其他高级官员都在波兰，这绝非巧合，波兰政府在12月实施戒严的公告是9月在苏联印刷的，这也绝不是巧合。”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攻击的目标是波兰团结工会，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伤害了整个国家。“波兰政府通过迫害团结工会，向自己的人民发动了战争。”

里根像一年前的卡特一样，拿出了经济援助的胡萝卜，假如波兰政府撤销戒严，释放被捕人士。同时他也举起了经济制裁的大棒，里根强调了后者，他说道：“假如波兰的暴行没有停止，我们不能，也不会像往常一样，同那些凶手和帮凶做生意。毫无疑问，他们的罪行将使他们在未来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自由民族交往时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的这一声明是严肃认真、经过深思熟虑的。”里根说，一些制裁已经开始实施了。运往波兰政府的农产品已经中止，尽管食品援助还在通过秘密的人权组织继续进行；进出口银行负责的信贷保险已经中止；波兰飞机在美国机场着陆的特权以及波兰船只在美国海域捕鱼作业的特权已经被取消；美国政府正在与盟友协作，要减少向波兰的技术出口。里根解释说：“这些行为不是针对波兰人民的，而是警告波兰政府——在面对残酷的压迫时，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能，也不会袖手旁观。”

总统透露说，他已经给雅鲁泽尔斯基写信，敦促他撤销戒严命令，并重申莫斯科对波兰发生的事情负有“主要责任”。他说自己也给勃列日涅夫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他，如果压迫继续下去，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进一步具体的、影响我们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里根要求美国人民同他一道，表达对波兰人民的支持。“昨天，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同罗穆亚尔德·斯帕索夫斯基会面。这位著名的前波兰驻美国大使在我们国家寻求庇护，抗议自己国家发生的镇压活动。他告诉我，波兰人民面对戒严时会采取一种办法来展示他们团结一致的决心，那就是在他们的窗口放置一支点燃的蜡烛，以此来表明他们心中依然闪烁着自由之光。”里根讲述了他在窗口放置蜡烛的事情。“我恳请大家今晚，在平安夜，都这样做，以此表达个人决心，支持我们即将采取的措施，支持处于苦难之中的英勇的波兰人民。”

波兰问题成了里根外交政策方面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这些问题给了他一次机会，勇敢地面对苏联。这些问题也使他非常想这样做。但最终，他的大部分决策都体现了谨慎的特点。经过再三思量，里根意识到，在波兰问题上，他对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在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对美国人和波兰人造成的伤害比对苏联人造成的伤害更大。他当然不想因为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被抓捕这件事而冒战争的风险。最后，他对戒严的回应措施没有超出他在圣诞演讲中提到的那些措施，而波兰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继续镇压波兰团结工会。

然而，波兰危机让里根做了自己一直最为擅长做的事情：阐明了对自由的支持，对压制自由的反对。他的讲话没有使任何犯人获得自由，但波兰人和其他人听到了里根呼吁波兰自治的呼声，许多人从他的支持中得到了勇气。

52

在美国国内，预算之战继续进行，12月也没有带来多少节日的快乐。戴维·斯托克曼的预算变得越来越恐怖，而里根也变得更不安。他在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越是想平衡预算，面临的预算赤字就越大。”越来越高的赤字让脆弱的财政人员心惊胆战，但里根拒绝撤销削减赋税计划。当时，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他在12月10日同自己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碰面。“尽管有一两个人提到在1982年之后可能增加赋税，但其他人（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这样写道，“增加赋税并不能消除赤字，相反会增加政府开支。”

跟唐纳德·里甘一样，里根把经济衰退归咎于保罗·沃尔克和美联储颁布的紧缩货币政策。里根与沃尔克会面，试图让他放松货币政策，但没有成功。里根在会见后写道：“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认识到了让货币供应增加的必要性。这次衰退是因为他们在4月关闭了大门，一直持续到9月——几乎到了10月。”里根希望沃尔克能够改变主意。“只有在美联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的计划才会让经济向前发展。”

随着预算赤字继续膨胀，里根遭遇到了来自传统保守派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增加税赋。他写道：“与那些开始对税赋感到不安的参议院领导人会面。他们希望我们增加赋税或者推行新的税赋。我表示反对。该死，我们的计划会奏效的，这取决于减少赋税。”

里根命令自己的团队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减少开支，缓和税赋飙升的压力，但国会拒绝削减除了国防之外的任何大量开支。里根说道：“他们已经习惯了（为了拉选票）花钱。他们变得紧张不安，因为1982年是选举年。”

里根自己的顾问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认为增加新税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赤字持续增加，而国会又不配合工作。里根在12月底写道："经济更不景气了，我们之前的数字不断被刷新。现在，我的团队也要求增加税赋来帮助降低赤字。"然而，里根却更加寸步不让，他写道："我一直很坚定，认为我们的减税计划会刺激经济，带来更多的税收。所以，我打算等待下去，看看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变得越来越孤单了。他在1月的第二个星期与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见面，会后里根说道："除了杰克·肯普之外，他们都一心要增加新税赋，削减国防开支。未来这一年看来任重道远啊。"

唐纳德·里甘比其他任何人支持里根的时间都要长。这位财政部部长不耐烦地听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鲍勃·多尔的解释，说什么国会将坚持采取新税收来减少赤字。里甘总结说，多尔喋喋不休所讲的与立法机构惯用的路线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国会在1982财政年度的授权开支是1280亿美元，这要比财政部从税赋和其他收益中的收入要多。国会声称想要更多的钱，这样就可以平衡账目，一切又可以从零开始。在我看来，这种奥威尔式的观点实际上毫无意义，或者从总统承诺控制政府开支和削减赋税来说，也毫无意义。"里甘认为，采用新税收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赋税削减成果。"这意味着不但会牺牲这一政策带来的切实利益，而且还会牺牲其象征意义。"增加税赋也不会产生那些提出这一做法的人所预期的效果。"假设总统违背其削减税赋的承诺，这种做法也没有对其政治可信度造成致命伤害，那又怎么样？我认为假如增加赋税，另外再加上那种已经导致行业资金匮乏的货币政策，那我们的经济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当前，经济几乎被高利率压垮，这种高利率破坏了利润，摧毁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加新的税赋负担，经济也不会好转。"

里甘认为，最后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据我判断，八九百万人的失业远比1280亿美元的赤字更为严重。”——这一数字是斯托克曼最近预测的。里甘认为，一味地考虑赤字会束缚政府的手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他说道：“我以前和现在都认为，短期来看赤字问题不那么重要。而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会带来足够的收入清偿赤字，而政府开支的比率就会得到有效控制，一直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的数量。”问题的关键是要长期一致，并且要得到美联储的帮助。“如果能够得到缓慢持续的货币供应，赤字能够减少，信心也能够恢复。”——他一直在就这一点做沃尔克的工作——“同时，控制联邦开支的水平。”求助于新税收的做法只能毁掉一切，它将会消除施加给国会的要求他们同意限制开支的压力——这是实现长期平衡预算的必要条件。同时，它还会破坏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的结束经济衰退的进展。

里甘坚决要求总统坚持削减税收，不要理会赤字，直至经济恢复。“在经济复苏、人们复工期间，更好的做法是借钱来清偿赤字，而不是增加税赋，这只会减缓经济复苏或者彻底阻止经济复苏。我从没有认为、也永远不会认为增加税赋可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里甘忽略赤字的建议让政府进一步跨越了意大利的防御屏障卢比孔河，放弃了财政责任，让高卢人实施无条件的削减税赋。里甘是一位财政专家，如果他同意把平衡预算搁置一边，那谁又能反对他呢？

詹姆斯·贝克不打算像里甘那样极端，这位办公厅主任也认为一味地纠缠于赤字可能会适得其反。他在给总统的一份战术备忘录中写道：“不予重视赤字，避免提及具体的赤字数额。”然而，贝克很欣赏里甘建议中的革命性，也意识到革命会招致抵制。贝克清楚，迫在眉睫的赤字问题让许多共和党人担忧，国会也打算对赤字采取行动，无论白宫方面喜欢与否。与增加税赋相比，贝克依然倾向于缩减开支，但他意识到缩减开支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后来回忆说：“国会中的两个政党都完

全失去了对于大幅削减开支的兴趣，许多内阁官员也是如此。”政府被迫面对政治现实。“我们可以为1981年的预算削减感到自豪，但我们永远不会再复制那种成功了。”

贝克认为，增加新税收是唯一的选择。他让米斯和迪弗支持自己，然后又找到了南希·里根这位盟友。第一夫人十分痛苦，因为自己的丈夫遭到批评，被说成是麻木不仁，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增加国防开支的时候，还要求更多地削减社会项目。南希悄悄地加入到了支持新税收的声音中。

她的丈夫依然顽固不化。里根在1月22日写道：“我告诉手下我不主张增加税赋。如果我就是要遭到批评，那么我宁愿因为赤字被批评，也不愿意因为从我们的经济改革计划中退却而遭到批评。”

里根认为自己必须再次向公众发出呼吁。他指责媒体夸大经济衰退情况，错误解读衰退现象。他说道：“媒体对我们做了手脚，民调数据显示了它的这种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改革计划感到不解，媒体对他们说改革失败了，而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贝克拒绝安排总统演讲，认为这只是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从冬末到春天，经济数字持续恶化，里根的工作评级也日趋糟糕。4月，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43%的美国人认可他的总统工作。里根再次指责媒体，说道：“这一数字反映了媒体持续带有偏见地报道我们的辛勤工作。”

在贝克的要求下，里根勉强同意白宫和国会进行谈判。参议院派出5名代表，众议院7名，政府5名。这个“17人帮”几乎连续会面了几个星期。里甘回忆说：“我们会谈的地点包括布莱尔大厅、白宫的家庭影院、罗斯福大厅以及副总统的官邸。”谈判并不是完全保密的，但是与会人员同样不希望公开谈判内容——这也是变换谈判地点的原因。谈判进展缓慢，里甘说：“我们讨论了无数组数据，提出了无数计算公式，

却并没有达成明显的妥协。我们甚至无法就赤字的规模达成一致。”对此，里甘承认了所有参与人员的诚意，然而，双方之间的分歧似乎难以消除。“政府希望在国内项目上削减开支，在国防项目上严格控制；而国会希望增加税收，大幅削减国防开支，以便维持高水平的国内开支。我们认为国会在提高账单，没有考虑后果；他们认为政府在史无前例地削减税收，导致无数收入从指间溜走。”

里根对谈判的缓慢进展变得很不耐烦，再次威胁要向公众演讲。他打算告诉全国人民，民主党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发誓说：“有人要因此祭旗下台。”

贝克认为，祭旗之举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于是再次拖延下去。里根变得更加焦躁，他咆哮着指责蒂普·奥尼尔的人说：“民主党人在耍诈。”民主党要求里根废除第三年的税赋削减计划。里根发誓说：“100万年之后也不会废除！”

里根给奥尼尔打电话，建议进行一次私人谈话，这位众议院议长同意了。里根马上赶到国会。总统最初提出削减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奥尼尔和民主党只同意削减350亿美元。在“17人帮”谈判期间，政府把削减数额降低到600亿美元，但民主党没有让步。里根希望在他与奥尼尔会面期间可以有所突破，然而3个小时过去了，他丝毫没有取得进展。里根提出了最后的条件——把政府的600亿美元与民主党的350亿美元做平均。奥尼尔再次拒绝了。里根收拾起文件，转身离开。

第二天，里根终于开始向美国人民介绍情况。他介绍了政府愿意做出的让步，强烈抨击了民主党的顽固不化。他借助表格分析说，民主党的政策将会导致开支无法维持，税收无法继续。里根说道：“我们之间的理念差异就在于，他们想得到越来越多的开支和越来越多的税收。我认为我们应当减少开支、减少税赋，增加更多的繁荣机会。”他发誓要继续与民主党中“有责任心的人”继续工作下去，找到解决财政僵局的办法。里根再次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表达出你们的观点，让你们的代

表们知道你们支持我今晚提出的这种公平、有效的方法。让他们知道你们支持我们的经济复苏计划。你们曾做过一次，当然也能做第二次。”

这一次里根的魔力失效了。公众拒绝团结在总统身边，他的支持率进一步下滑。里根继续否认自己的政策有任何问题，他说道：“人们没有弄明白整个预算问题。”

奥尼尔和民主党人看到民调数据之后变得更坚定，坚决要坚持他们的立场。贝克敦促里根在完全失去民意之前达成协议。贝克召集了埃德温·米斯和迈克尔·迪弗，这三巨头共同要求达成交易，包括征收更高的赋税。

里根跟一开始一样，不喜欢这一主意，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已别无选择。贝克回忆说：“总统听着我们汇报，然后摘下眼镜，扔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好吧，该死的。’他说道：‘我会做的，但这样做是错误的。’”几十年之后，贝克回想起了总统激动的情绪。“我想它们一定碎了。”他指的是那副被摔下来的眼镜。

里根同意增加商业税和消费税，这样，在3年的时间里可以为财政部带来将近1000亿美元的收入。1981年制订的个人所得税削减计划保持不变。里根不开心，但他清楚，政治很少能让人真正快乐。他说道：“没有人会真正喜欢妥协，这只是你能得到的最佳结果，里面包含了大量你想证明是正确的，却不得不放弃的东西。”

里根希望通过在税收问题上的妥协，他可以在削减开支问题上取得胜利。“增加税赋是我们为了达到削减预算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53

对任何政府来说，问题并不是是否会遭到丑闻的打击，而是何时会遭到打击。政府部门有数千名男女员工，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犯罪的诱惑和犯错的机会，这是人类的通病。距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面临的诱惑和机会也就越多，而媒体和公众监视得也就越严格。

里根政府的第一桩丑闻无足轻重，但它还是震惊了里根的核心集团。1981年9月，有人在理查德·艾伦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1000美元。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调换了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这笔钱却遗落在原来的办公室。艾伦跟里根解释说，一家日本杂志采访了南希·里根，这家杂志想为这次采访付钱。艾伦截下了这笔钱，避免让南希或这家杂志感到尴尬。他的秘书把这笔钱放到了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他也是直到最近钱被发现才想起这件事。里根接受了艾伦的解释，但联邦调查局必须展开调查。可是，调查被泄露了出去，让总统十分难堪。

里根从政治上解读了这次泄密事件，他写道："我怀疑这是官僚政治在从中破坏，理查德·艾伦不是目标，我们的政府才是。"联邦调查局没有找到对艾伦不利的证据，艾伦也希望可以保住这份工作。

但里根——尽管通常是个宽宏大量的老板——这一次决定开除他。里根的外交政策团队的工作一直不是很顺畅。艾伦经常与亚历山大·黑格或卡斯帕·温伯格发生争执，有时还会与他俩一起争吵。里根认为艾伦是他们三人中最不值得留用的。总统写道："如果他继续留任，那媒体是不会消停的。"

威廉·克拉克从国务院调过来顶替艾伦的位置。里根在加利福尼亚时就认识克拉克，当时威廉·克拉克在加州最高法院工作。克拉克还有一个牧场，就在里根的牧场旁边，两人都喜欢户外运动。克拉克沉稳的风格保证了他很少受到外交政策本质内容以外的干扰，当时这种本质内容就是关注加勒比地区局势。1982年2月，克拉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加勒比海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就像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它是我们的前院——不是后院，这一比喻说明该地区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利益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一地区成了美国控制的安全区。克拉克说道："现在形势完全发生了变化，我们目前在这一地区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疲软的经济和无能的政府招致了反美力量的颠覆活动。"主要的煽动者就是古巴及其保护伞——苏联。"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左翼分子也加剧了这种动乱。"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种可怕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宣传组织，是一直在发展的新的机会和目标。"克拉克不在乎自己听起来像是一个杞人忧天者。"加勒比地区所面临的威胁的严重程度、紧迫程度和复杂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威胁以及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的威胁在范围上都更为有限，需要的资源相对较少，其战略意义相对不那么复杂，持续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随后，克拉克把发言权交给了威廉·凯西。凯西详细介绍了古巴在这一地区的行动。他说，古巴正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招募那些构成这个国家人口主体的年轻人，他们在古巴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无法找到工作。古巴军队装备精良，保障有力。"去年，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大约6.6万吨的军事装备——其中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萨姆–6防空导弹、米格–23战斗机、T–62主战坦克、米–24武装运输直升机，等等。古巴拥有一支现代化部队，配备大量战略储备，外加200架米格战斗机。它每天可以得到价值800万美元的廉价石油，并且从其出口产品镍和糖中得到价格补贴。"卡斯特罗在这一地区推行一种战略，破坏保守派和温和派政府的稳定。"古巴和卡斯特罗把目标国家的各种游击

队力量整合起来，在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哈瓦那方面就会向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等，目的是让这些游击队更具战斗力。”

凯西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政府复制了古巴的颠覆模式。“尼加拉瓜在继续打造自己的军事实力，很快就有望得到米格战斗机。尼加拉瓜军事实力的增强将会威胁到邻国，破坏萨尔瓦多国内的平衡，支持游击队对抗政府军，因为很明显，人们会加入看似要获胜的一方。”

凯西认为，美国在对莫斯科及其加勒比海盆地区盟国的处境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位中情局局长说道：“苏联现在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失去信誉，而苏联就会在我们的半球赢得越来越多的盟友；如果我们做出强烈回应，苏联就可以说，同苏联在波兰的行为一样，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报告说，一个跨部门的团队一直在就加勒比海盆地区的问题开展工作。这个团队就如何回击古巴和苏联势力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恩德斯把这一计划总结为三点：“首先，我们必须在萨尔瓦多国内取得胜利，进而处理尼加拉瓜和古巴国内的武器来源问题；其次，我们需要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的支持；再次，我们需要动员并得到该地区——也就是这一半球的支持。”

通过动员而得到支持，尤其是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是里根的特长。威廉·克拉克召集此次会议就是要决定总统就加勒比地区的问题发表演讲。克拉克的副手罗伯特·麦克法兰向总统汇报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尽管我们可以提出解决方案，但没有美国人民的支持，我们无法实施这些方案。美国公众必须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因为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我们这半球一直看起来平安无事，甚至是个容易控制的地区，根本不存在威胁。”总统的沟通技巧对于改变这种印象至关重要——尽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麦克法兰说：“关键是我们不能看起来像是在杞

人忧天。总统先生，今天上午我们就一直在杞人忧天。”但是，总统知道如何更平和地解释这种威胁。“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我们必须提升人们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这就意味着三件事情：为什么这一地区非常重要？这一地区受到了什么威胁？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什么行动？军事行动将会是最后一点，但美国人民必须了解所有这一切。”

詹姆斯·贝克不希望里根发表克拉克和麦克法兰想要的任何演讲。贝克怀疑形势并不像凯西描述的那样危机重重，担心在加勒比地区采取冒险行动可能会延缓政府国内事务的发展。并且，他不希望里根冲到任何不成熟计划的前线。贝克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道：“单独的一次演讲不会解决问题，不会让我们达成一致，并且可能会发生重现越南问题的风险。总统应当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发表关于经济形势的演讲，但与安全问题有关的演讲会加剧我们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我们必须先找到国会，不能让总统抛头露面，除非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有了行动战略。”

埃德温·米斯支持贝克的观点，他说，克拉克提出的加勒比盆地计划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援助一揽子计划。“它是我们政府现有的最好的计划之一，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但是，把它同军事和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我们一定不要在萨尔瓦多混合使用加勒比盆地计划，因为这会扼杀该计划。假如我们试图同时采用经济和安全手段，那么我们会一事无成。”

唐纳德·里甘也加入到怀疑者的队伍中，他说：“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份演讲是针对谁的？是针对哈瓦那和莫斯科，还是针对德卢斯？鉴于我们国内的经济问题，我们很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美国之外的地区。并且，通过提出安全问题，您是因为担心威胁问题而在加大赌注。”

威廉·凯西予以反击。这位中情局局长说道：“除非您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否则不会从国会或国人那里得到针对加勒比盆地计划的支持。您必须实事求是地阐明整个问题。”

“如何阐明？”贝克问道。

凯西回答说：“我们必须解释清楚加勒比盆地计划，因为该计划在没有威胁感的情况下，自己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必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贝克说道，但总统不必亲自上阵，“不能让总统抛头露面，除非公众和国会比现在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会议的前90分钟时间里，里根一直在倾听，让克拉克、麦克法兰和凯西同贝克、米斯和里甘展开论战。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沉默可能表示他缺乏兴趣，但中美洲问题激起了他的反共热情，因此里根密切关注着这些辩论。现在他开始参与其中了，他说他赞同需要在加勒比海盆地区组织实施美国影响的观点。“如果总统无法动员其各方力量，我们会落后多远呢？”里根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然而，他不想吓到任何人，他的批评者已经在称其为战争贩子了。“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将很快开战。”他希望不要加深这种印象。“我如何才能避免对大众造成那种‘我告诉你们这样做’的印象呢？”但他不能保持沉默。“假如我们看得远一些，我不希望历史会记录下这样的一笔：曾经出现过一次机遇，我们本来可以阻止这个半球变成华约的延伸。到那时，列宁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他曾经说过，有朝一日西半球将步欧洲后尘，成为他们的胜利果实。”

里根同意，需要提醒美国人民注意，加勒比海地区是美国的南部边界。“如果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联系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联系一

样，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坚强堡垒啊。克里姆林宫方面没人希望接受这一点。”里根再次反思了直接应对这一威胁的困难——难免会激怒反战的左翼分子。“我们如何来设计演讲，不给抗议者以口实？”他详细谈了一下贝克提到的那个关于越南的比喻。“我们从来没有对越南问题做出解释，是不是？当年艾森豪威尔告诉肯尼迪说需要更多的部队。我们试图打一场假装没有的战争。”

至于有关加勒比的演讲，需要进一步的考虑。“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演讲中需要讲些什么。我们是不是不应当说当下存在许多错误的信息、本届政府没有发现萨尔瓦多的问题、我们试图解决萨尔瓦多的经济问题、我们希望能做朋友、加勒比盆地计划是我们帮助那些国家取得自给自足发展的办法、我们还将继续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美洲人？我们能否在演讲时让它听起来不像是战争宣言？我们在寻求向他国提供我们经济制度中的先进之处。我们之前曾有过出色的邻国外交政策，但没有一样成功过。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规模和实力。过去，我们试图推行我们的方法，现在，我们应当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告诉他们我们都是邻居，请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想法，共同实现你们感兴趣的目标。”

总统又退了一步，提到了美国人民对他的看法。“问题是人们如何看待我。越南战争期间，我是鹰派人物，因为我相信假如你要求人们赴死，那你必须给他们一个获胜的机会。预防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提早介入问题。我能做到不给人留下我是个鹰派人物的印象吗？”

里根在会议结束时又回到了古巴的话题上，虽然是拐弯抹角地。“我们讨论一下其他问题，不是古巴问题。”他说的是自己可能要做的演讲。“让我们孤立他们。它是唯一一个不是美洲大陆上的国家。让我们给古巴一次加入西半球的机会。”他说这一主题不是针对讨论中的演讲，而是针对更宽泛的场合，具有更高的目标。“南北美洲的人口加起来相当于中国人那么多。假如我们都是铁哥们儿的话，那将形成一股

相当巨大的势力。”

54

里根虽然避免杞人忧天，但他还是非常关注的。里根在日记中写道："中美洲的确是世界上又一个热点地区。尼加拉瓜成了由古巴资助的武装营地，随时会有共产党占领整个中美洲的危险。"不久，他重申道："毫无疑问，整个中美洲都成了共产党占领的目标。"

为阻止被占领，里根发动了一场隐秘的行动。加勒比盆地计划是政府政策公开的一面，该计划的资金援助需要国会批准，因而需要时间。为了阻止在国会行动前共产党占领中美洲，里根求助于他的影子战士。他在1981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制订了秘密行动计划，切断古巴向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援助。"这些秘密手段包括武装被称为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反对桑地诺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人。这些反政府军被寄希望于让被占领区的桑地诺分子待在国内，进而阻止他们支持萨尔瓦多的左翼叛乱者。行动进展得非常缓慢，里根在1982年2月写道："我们在萨尔瓦多遇到了麻烦，叛乱者好像要赢。"这对该地区来说是个坏消息。里根说道："危地马拉随时都可能失控，而尼加拉瓜很快将成为另一个古巴。"

总统收到了一份由中情局提供的关于萨尔瓦多的简报。后来里根说："游击队的组成十分复杂。之前我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组织和沟通。他们把国家划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有独立的指挥集团和永久性的营地网络，戒备森严。"他又补充说："现在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它。"那些美国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也不合作。"爱德华·阿斯纳和一些演员带着他们为游击队募集的25000美元现身华盛顿。"

里根清楚，在外交政策中，“隐秘的”和“秘密的”这两个单词不是同义词。他知道美国此次隐秘行动的目标国会获悉这次行动的。事实上，里根打算让他们获悉这一切。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让桑地诺解放阵线和该地区其他左翼分子改变他们的路线。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次隐秘行动——它只是隐藏了行动细节，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也就终止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里根此次行动的终极目标。为了评估这次行动对这位古巴领导人的影响，总统派遣美国一位资深的调解纠纷的高手弗农·沃尔特斯前往哈瓦那。沃尔特斯奉命讨论三个问题：古巴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武器援助、古巴对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以及古巴罪犯和精神病人可能的遣返问题。这些人中包括1980年从马里埃尔港逃出来的古巴难民。沃尔特斯所要传递的潜在信息是，美国政府正非常严肃地重新考虑清理整顿加勒比地区。

里根没有期望奇迹的发生。他深知，卡斯特罗之所以可以在古巴执政20年绝非偶然，但他认为这将会是一次让古巴臣服的绝佳机会。他指望在马里埃尔问题上取得进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或许我们会把卡斯特罗的那些囚犯和疯子送还给他。”

结果，沃尔特斯此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古巴继续支持其在中美洲的盟友，而马里埃尔难民依然滞留在美国，但里根认为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他在提到卡斯特罗及其同志的时候写道：“他们非常紧张，认为我们可能打算入侵。我们不会入侵，但我们要惊出他们一身冷汗。”

1982年2月底，里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过的演讲。他冒险从白宫出发，穿过几个街区，赶到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向该组织常设理事会的人以及对拉丁美洲事务感兴趣的其他人发表演讲。里根演讲的第一部分像詹姆斯·贝克希望的那样无伤大雅。里根说道：“在维护自由和独立方面，这一半球的民族是一个整体。从这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美洲人。”他提议从消除美国

对该地区这些国家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促进这些国家的繁荣。对此，他将对美国公司增加赋税刺激，鼓励在加勒比地区投资，并提供3.5亿美元的新的经济援助。里根说："这是一份综合计划，帮助我们的邻国实现自助。这份计划将创造条件，让具有创新精神的私营企业和自助精神发扬光大。"

演讲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克拉克和凯西希望的更加严厉的主题。里根说道："一种新殖民主义正在当今世界悄悄蔓延，威胁到了我们的独立。它很残忍，也高度集权。它不在我们这半球，但威胁到了我们这半球，并且由于其殖民野心的扩张，它已经在美洲大陆建立起了据点。"加勒比地区目前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道路通往光明民主的未来，这已经被该地区2/3的国家所接受，另一条道路的走向截然相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前景黯淡，贫穷和镇压笼罩在前方。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落入集权左翼分子的掌握之中。"

里根指出，他所提议的经济改革只能在解决该地区安全威胁的政治和军事框架下才可以进行。"假如我们的邻国无法和平地追求它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未来，相反，却不得不转移它们的资源，用来抵抗外来恐怖主义和武装攻击，那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就无法进行。在游击队有组织地进行纵火、爆破和破坏桥梁、农场、电站和交通设施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故意要加剧经济和社会问题，希望激化已经身处苦难中的民众——我们是无法取得经济进展的。"里根公布了一些凯西在国家安全委员上展示的情报。"去年，古巴从苏联那里收到了6.6万吨的武器援助——这比1962年导弹危机之后的任何一年都要多。上个月，又运抵古巴的高性能米格–23战斗机让古巴军火库中的苏制战机超过了200架——这一数字要比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其他所有国家战斗机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为古巴人的恐怖主义目的提供协助。"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尼加拉瓜一直充当秘密军事行动平台。武器装备通过尼加拉瓜被走私给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

里根说，萨尔瓦多处于危机之中。萨尔瓦多游击队虽然声称要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讲话，却反对进行人民授权的选举。

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反对这些进行颠覆活动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维护自由，那么从今天冲突的废墟上就会产生新的像古巴这样的国家。我们将面对更多与苏联有军事联系的集权政权。”那些熟悉美国冷战围堵政策来龙去脉的听众在听到里根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仿佛听到了杜鲁门主义的声音。里根说道：“我相信，我们这半球自由和平的发展需要我们帮助那些政府保护自己，因为它们正遭遇来自国界之外的侵略。鉴于这一原因，我将要求国会继续增加安全援助，帮助那些友好国家阻击那些破坏他们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破坏政治民主的敌人。”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要让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将采取一切明智、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里根的批评者们批驳了里根演讲中的好战言论。“假如他刚刚结束第一部分演讲，那我很可能就会带着不同的心情离开演讲大厅。”约瑟夫·埃尔德里奇牧师说道。埃尔德里奇是代表拉丁美洲事务华盛顿办事处讲的这番话，该组织是众多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不满的组织之一。埃尔德里奇和其他批评者，包括美国天主教协会的小布莱恩·赫尔牧师在内，都认为里根明显歪曲了造成该地区动荡不安的原因。赫尔说道：“萨尔瓦多冲突的根源在于长期的司法不公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根本权利。”

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认为里根的讲话无知而且无用。他说道：“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古巴人的做法十分荒谬。我承认，古巴人一直敢于利用形势，但要说是他们造成这样的形势，那是很荒唐的。如果总统真心希望得到两党的支持，那他必须摆脱这种观念。”民主党女议员玛丽·罗斯·奥卡是克利夫兰

的代表，美国4位女信徒在萨尔瓦多被杀害，其中有两位就来自克利夫兰。凶手被指控与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政府有联系，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奥卡甚至憎恨里根经济方面的提议，认为它会怂恿更多的谋杀。“我希望他能向克利夫兰提供3.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把萨尔瓦多比作越南，声称：“就像当年在越南一样，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对历史无知的基础上的。华盛顿方面在萨尔瓦多发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种威胁极易马上引发军事手段的对抗。但事实上，现在发生的一切是萨尔瓦多几十年来历史压迫的结果，因而任何美国政策都不可能轻巧地达到目的。”

里根指责这些非议误导了自由主义精神，他更关注的是大厅中听他演讲的大部分人的反应。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演讲反响良好，从大使那儿传递给我的信息大致是说，这是迄今为止对美洲国家组织所做的最成功的演讲。”他补充说，国会最初的反响也是正面积极的。他在与两党领导人会面后写道：“我想我们可以就此得到支持。民主党人吉姆·怀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看起来热情高涨。”

拖而不决的预算谈判推迟了国会就加勒比计划采取行动，却没有阻止政府隐秘行动的推进。里根在4月初的日记中写道：“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司会谈，答复尼加拉瓜前叛军首领，此人脱离了当地政府，希望能领导一支反革命武装。这位反革命分子是埃登·帕斯托拉，他曾经是桑地诺革命阵线显赫一时的‘总指挥’，但后来对新政权内部的腐败越来越失望。中情局开始帮助他和他的叛军。这支部队包括尼加拉瓜国家卫队的前成员、米斯基托原住民以及原先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行动的成员。”

反叛运动在1982年夏天和初秋看起来前景不错。中情局的中美洲问题专家杜安·克拉里奇在11月的一次会议上对里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米斯基托人就会完全控制尼加拉瓜东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帕斯托拉军中的两个纵队将从南部挺进尼加拉瓜，曾效

力洪都拉斯的1200名尼加拉瓜人将在尼加拉瓜展开行动。”帕斯托拉在尼加拉瓜北方的部队很快也会加入战斗。“这部分人数量不多，但政治意义重大，因为人们希望帕斯托拉的出现会让个人和军队倒戈到他这边来。”在威廉·凯西的敦促下，克拉里奇又详细介绍了此次叛乱的兵力情况：大约1200名武装叛军在尼加拉瓜国内行动，200~300人被派往洪都拉斯接受培训，在尼加拉瓜北部山区咖啡种植地居住的4000~6000名农民被认为可以被招募进来，洪都拉斯营地内的1700名米斯基托人在等待武器。克拉里奇说：“等到全部部署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期盼米斯基托人的部队将会达到4800人。”

55

世界有给总统突然袭击的习惯。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不大常见，因为当时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官员们常常忽略发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外的事情。然而，珍珠港事件使他们不再相信半球孤立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全球战略以应对国家安全。之后，总统们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对遥远国家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无论他们愿意与否。

里根把中美洲当作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核心舞台，自他担任总统起，中东地区对他来说就意义不大。诚然，该地区富含石油，对西方经济顺利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这也是以色列的故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色列就成了美国特殊的伙伴国，美国有责任保护它。但里根是一名意识形态专家，而不是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因此，对他来说，与争夺自然资源的斗争比较起来，思想领域的斗争意义更为重大。尽管他的宗教信仰偶尔会让他揣测世界末日是否近在咫尺——有可能会在耶路撒冷开始——但他并没有十分紧张。

然而，中东地区对里根来说意义越来越重大。他在执政第一年就对中东地区开始有了重新认识。当时，里根同以色列政府就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展开斗争。尤其是配备了改进的雷达和空气控制系统的AWACS（空中警戒和控制系统）预警机，和对F–15战斗机的升级。里根希望借助武器交易把沙特阿拉伯提升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盟友，但是以色列官员指责说，这种做法增强了阿拉伯反对以色列阵线的力量。美国媒体以及国会中以色列的支持者们奋起抗争，抨击政府危及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一位真正的朋友的安全。

反应程度之强烈着实让总统大吃一惊。里根在日记中写道：“犹太

社区中这么多团体的反应和反对让我很是不安。他们必须要明白一点，那就是他们在白宫中还没有谁能像现在的总统这样对以色列更友好了。”总统认为批评他的那些人曲解了他的意图。“我们在尽力保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减少苏联向那一方向发展带来的威胁。这种稳定的基础必须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而沙特人是其中的关键。如果他们能够遵循埃及的忠告，那么剩下的都会一切顺利。在1985年之前他们不会得到AWACS预警机，同时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发展戴维营模式，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已经向以色列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确保对阿拉伯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会改变他们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

这些争执使得总统推迟了向国会提交援助沙特的一揽子计划。他不希望把立法者的注意力从他的税收和预算提案中分散出来。他希望这种小题大做能够消散，然而，里根认为武器销售十分重要，刚一清除掉了国会方面的经济改革障碍，里根马上就提出了自己的AWACS预警机和F–15战斗机计划。他在援助提案的说明信中写道：“我相信向沙特阿拉伯提供这批装备会提升我们朋友的安全感，增强我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可以向当地政府和苏联领导人明确表明，美国决意为维护西南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帮助。我也很清楚，关于此次军售，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一直在国会中传阅，许多人迫于某种压力早早地表示反对。我希望在提交这份提案之前不要有人妄下断语，我们将努力向国会说明这份提案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从西方盟国的利益出发，是为了中东地区的稳定。”

里根确实进行了说明，并反复地说明。他向一群记者们说道：“我之所以提出进行此次军售，原因在于它可以极大地提升我们自己在中东地区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通过打造对美国的信心，将其塑造成一位可靠的安全伙伴，这笔军售将大大增加我们与沙特以及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机会——建立正义持久的和平。这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通过帮助实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它

甚至将有利于以色列的长远利益。并且，此次军售将会极大地提高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保护油田的能力，这些油田是自由世界安全之根本。”

总统警告以色列不要介入：“作为总统，确定和保护我们广泛的国家安全目标是我的责任。当然，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必须一直把我们盟友的重要利益考虑在内，但美国的安全利益必须始终是我们对内的责任。其他国家无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

然而，以色列并没有后退，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前来访问。里根施展出了自己的魅力。“我们互相介绍认识，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他指的是当天晚上。贝京提出了有关AWACS预警机的话题。里根说道：“他当然反对此次军售。”总统重申了他希望把沙特纳入和平进程中的愿望。他向贝京保证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里根认为他的表态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他在提到贝京时说道：“尽管他没有放弃自己反对的立场，但他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总统对于自己可以应付这个有时候很棘手的总理也很高兴。“我想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里根很快发现自己错了。贝京离开白宫后直接去了国会，在那里大力游说反对AWACS军售。里根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他说过不会这样做的。”

刚一开始，贝京的游说显得比里根的游说更有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把政府的要求提交到参议院全体会议讨论，其中带了一点点儿的消极表述。里根竭尽所能地对这一不利局面做出正面解释。他告诉记者们：“坦率地说，对于双方能如此接近，我很高兴。当然，我希望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们中有人有个头疼脑热必须提前回家或是别的什么，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里根没有气馁。“我现在依然坚信，我们可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取得成功。”

为了此次军售，里根开始加倍努力，他亲自会见或通过电话与大多数参议员沟通，他恳请并且得到了上届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的支持。他给多数党领导人霍华德·贝克送去一封信，信中保证了他曾口头提出的自己对于以色列安全问题的关注。

这一次，里根的努力成功了。参议院全体会议的关键投票支持政府的决定，投票比例是52：48。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霍华德·贝克称赞了总统为此次军售付出的努力。他说道："曾经有几次我希望总统能拜访每一位参议员或差不多每一位参议院成员，其中有一些他见过不止一次。有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把他叫到这儿问他是否想见某某人。有时候总统会说：'我已经见过他了。'我会说：'那好吧，我知道了，但你应当再见一次。'"贝克提到了一位拒不退让的人，他最终在总统的游说下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观点。"那个人说：'你知道的，那个白宫的家伙可以把冰箱卖给因纽特人。'我说道：'嗯，我很高兴他能把AWACS预警机卖给你。'"

里根在AWACS预警机上的胜利彻底加剧了以色列政府的怒火。贝京严厉指责美国政府的行为更像是敌人的行为，而不是朋友之间的行为。贝京说，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里根曾三次在以色列国防方面惩罚了以色列。以色列曾破坏了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结果美国政府中止了战机交付；以色列袭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贝鲁特总部，以报复以色列平民遭到的谋杀，结果美国政府再次中止了武器交付；最近的一次，以色列宣布兼并戈兰高地，结果美国政府中止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紧接着，美国政府又一心打算要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战斗机。

贝京猛烈抨击里根，还没有哪位以色列总理对美国总统说过这样的话。他质问道："难道我们是你们的附庸国吗？难道我们是香蕉共和国吗？难道我们是14岁的孩子吗，做错事的时候还要被打耳光？"贝京指责美国政府在进行或容忍"一项丑陋的反犹太人的运动"，努力赢得参议

院批准AWACS军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口号是‘贝京还是里根’，接下来所有反对与沙特进行交易的人都支持外国元首，不忠于美国……之后，我们听到这样的口号：‘我们不会让犹太人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贝京打出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张牌，许诺说美国的犹太人将不会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而会支持以色列政府。“没有人会威胁庞大自由的美国犹太民众。没有人会成功利用反犹太宣传阻止他们。他们会站在我们一边。这是他们先辈的祖国，他们有权利和责任来支持它。”

里根认为贝京有些越轨，他非常想这样说贝克。但里根还是非常务实地控制住了自己的嘴巴，试图缓和这一局势。有个记者提问说，这种持续紧张的局势是否预示了美国会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里根没有理会这一问题，他说：“不，这只是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的争执，我想这不足为奇。”有人问他是否反对贝京的措辞，里根承认说：“语气确实有些过火。”但他还是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然而，里根并没有撤销自己的决定。他希望阿拉伯国家明白美国没有忘记它们。“我们希望它们知道，我们对它们一视同仁。”他说道，然后又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同时，他派遣亚历山大·黑格前往以色列。这位国务卿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不是来自贝京——当时他刚摔坏了屁股，正在疗伤。教训他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黑格回忆说：“沙龙是个壮汉，他利用自己强壮的身躯、极高的嗓门和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我猜想他是为了达到效果才这样做的——来压制反对意见。‘我们是你们的盟国和朋友，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他一边咆哮，一边敲着桌子，杯盘震得乱蹦。”黑格自己也可以大声喊叫，但这次他控制住了自己，跟沙龙说：“将军阁下，如果您表现得像个盟友，那您就会被当成盟友来对待。”

黑格一回到华盛顿，就向里根汇报了好坏参半的结果。他说，贝京和沙龙好像打消了些疑虑。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对于黎巴嫩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的局势一直十分敏感。里根写道：“黑格担心他们可能动不动就会对黎巴嫩发动战争。”

这种敏感一直在增加。一周后，威廉·克拉克打电话给里根，报告说以色列即将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以清除那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里根再次试图说服以色列退兵。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能行动，除非发生挑衅事件，这样世人就可以承认以色列有权进行报复，因为最近以色列失去了许多世人的同情。”

当以色列在那年春天完成了其计划已久的从西奈半岛的撤离计划以后，它又赢回了一些同情。里根打电话给贝京，祝贺他做出了尽管艰难，却像是政治家一般的决定。里根写道：“他的许多国人反对离开西奈半岛，军队不得不驱逐他们离开。部队进入时没带武器，他们做得非常出色。”

事实证明，从西奈半岛撤离为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清除了道路。6年的内战在黎巴嫩制造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当地充斥着与黎巴嫩境内各种武装派别和某些邻国有联系的民兵组织。叙利亚派遣正规军进入黎巴嫩，来表明其对这个明显分裂的国家至少拥有部分权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活动，他们的士兵从那里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用空中打击还以颜色，并威胁要采取地面行动。1982年6月，伦敦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开枪射击，导致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严重受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对此负责，将其归咎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但以色列政府拒绝对其敌人进行区分。贝京和沙龙派遣部队进入黎巴嫩。

“我担心我们面临着一场真正的危机。”里根写道。

56

在那个季节爆发了大量的危机。在里根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做出反应之前，他必须处理南大西洋针对某些岛屿的一场战争，大多数美国人几乎不知道这些岛屿的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然而也是冷战时期的回响。英国宣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控制已有400年的历史，其凭借的就是发现了这个位于南美洲南部海岸的、当时无人居住的群岛。西班牙和当时已经独立的阿根廷也几乎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质疑英国对这些岛屿的所有权。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群岛距离英国之远（将近8000英里）和距离阿根廷之近（大约300英里）。最终，英国和阿根廷就岛屿的未来展开谈判，但是谈判进展得异常缓慢。到了1982年年初，谈判依然没有提速的迹象。

此时，近期自己任命上台的新一届阿根廷政府决定拿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做文章。新总统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显然希望通过大胆的外交动作来找回自己政变政府昔日的名声。1982年3月，阿根廷海军扮成平民登上了南乔治亚岛。这是一处英国占领地，位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以东600英里。其目的很明显，是要测试一下英国的反应。如果局势恶化，那么，平民装扮可以让阿根廷政府否认此次行动。

伦敦方面对登陆提出抗议，但他们在当地缺乏力量来驱逐阿根廷人。加尔铁里政府得到鼓舞，准备好了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舰、飞机、直升机和部队。

美国情报部门得到了备战的风声。里根改变了吉米·卡特因为阿根廷政府违反人权而有意避开它的政策。相反，里根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培养成为反对拉丁美洲左翼分子战斗中的盟友。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开

始的时候，阿根廷政府资助了一小股叛军对抗尼加拉瓜政府。尽管如此，美方人员和外交官还是密切留意着阿根廷，向华盛顿方面汇报阿根廷军舰和部队的动向。

玛格丽特·撒切尔从自己的渠道得到了类似的消息。这位英国首相决心要保住马尔维纳斯群岛，准备通过斗争来保卫这些岛屿。然而她希望最好不要开战，英国一定会在南大西洋战争的第一轮中失利，因为一支配备完整的特遣舰队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这些岛屿。到那时，英国海军不得不通过血腥的武力来根除阿根廷人。“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取决于美国人。”撒切尔回忆道。美国人是英国人的朋友，又是加尔铁里及其同事的后援，阿根廷人当然会接受里根总统的劝告。撒切尔打电话给里根，要求里根跟他们讲讲道理。

里根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打起来。在此类冲突中，他必须顶住压力选边站。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一定会得罪自己放弃的一方，但如果他拒绝选边，那他就有可能把双方都得罪了。

4月2日，里根打电话给加尔铁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谈了大约40分钟，试图说服他不要入侵，但没有进展。”加尔铁里坚持认为，阿根廷不能放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也不能妥协。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使得这一历史纠纷变得复杂起来。里根写道：“目前我们得知，当地可能有石油。”

甚至在里根试图说服加尔铁里的时候，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占领就已经开始了。阿根廷海军在这个殖民地的首都斯坦利港登陆，占领了该市的机场和码头。英国海军的一小股卫戍部队进行了无效的抵抗，而岛上的2000居民则作壁上观。

登陆的消息需要数小时才能传递到伦敦和华盛顿，因为南半球不稳定的大气条件干扰了无线电通信。等撒切尔得到消息的时候，她已经在集结海军力量，发誓要夺回这些岛屿。英国媒体因为对战争的期待而极度兴奋。当读者们得知，安德鲁王子在将参加战役的军舰之一“无敌”号航母服役时，这个民族坚定沉着的一面就表现了出来。撒切尔轻描淡写地说道：“皇室成员不会得到与其他军人不一样的待遇。”

特遣舰队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需要一段时间，这让里根得以派遣亚历山大·黑格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斡旋。黑格发现，撒切尔没有调停的想法。她特意让他留下来参加一次采访。撒切尔4月7日的内阁会议备忘录转述了首相的话：“当天，美国国务卿黑格先生希望访问伦敦。我们应当向他解释清楚，部长们对于议会辩论的关注使得斡旋根本不可能实现，但非常欢迎他第二天前来，前提是他不是作为潜在的调停者前来，而是作为大英帝国的朋友和盟友前来。”

等到撒切尔真的接见黑格的时候，她让他明白，对于阿根廷的侵略行为，英国不接受和解。黑格后来写道：“她不停地敲击桌面，提醒大家，这张桌子就是内维尔·张伯伦1938年坐过的，当时他说，捷克是一个遥远的民族，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也很少有共同之处。但随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导致了4500多万人死亡。”她的政府不会重复张伯伦的错误，撒切尔说道。她拒绝了里根批准的黑格的提议——动用一支国际维和部队来管理这些岛屿，并监督向自治政府的过渡。撒切尔说，英国不会在胁迫之下讨价还价。

黑格希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运气能好一些。经过长途飞行之后，一大群人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欢迎他的到来。他认为这种接待方式是为他精心准备的，但这没有意义。加尔铁里同撒切尔一样坚决。他说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在这点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不能牺牲我们的荣誉。”同撒切尔一样，加尔铁里把当前的事件置于更大的框架下考虑。他说：“我们今天的危机可以轻易导致南美地区动荡不安，因而

削弱西方世界的防御力量。”他又故意补充强调说：“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已经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收到了提供战斗机、飞行员和武器装备的提议。”

黑格不知道如何解读这种说法。苏联人很可能会在南大西洋浑水摸鱼，但阿根廷政府将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接受来自共产主义总部的援助。然而，阿根廷也可以寄希望于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即使加尔铁里所暗示的与苏联的关系纯属空穴来风。

里根还是拒绝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选边站。他指出：“双方都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他们缓和下来。”总统在争论双方之间采取了公开的中立立场。他对记者们说：“我们与这场冲突中的两个国家都是朋友，因而我们随时准备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我们所希望的以及我们愿意帮助实现的是要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没有武力行为或流血冲突。”

然而，媒体的报道对总统所谓的中立提出了质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华盛顿邮报》都提到，政府允许英国海军利用美国通信卫星的频道，并且美国情报机构与伦敦分享有关阿根廷军事行动的情报。

在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里根非常震怒，主要是因为报道中提到这些信息经过了《华盛顿邮报》所谓的“高级政府官员”的证实。总统并不知道这些泄密者是谁，但他指责媒体散布这些消息，私下里他把这种行为称作“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更不用说这是对事实危险的歪曲。“我们确实在向英国提供卫星频道，但是，这是在争端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常规做法的一部分。如果取消这种做法，那就会被看作支持阿根廷人。”在公开场合，里根保持沉默。在被直接问及有关向英国提供情报援助的报道时，他说自己无法在不破坏外交解决方案努力的情况下做出回答。“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不予评论。”

然而最终，里根还是摊牌了。撒切尔的决心让黑格认为，避免战争

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阿根廷妥协。当加尔铁里毫不让步的时候，黑格对记者们说，一旦开战，美国将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里根真希望这位国务卿没有说这么多，但他还是选择了解释，而不是否认这种说法。里根说道："这样做只是在遵守条约，遵守我们和英格兰签署的北大西洋同盟中的双边条约。当前，英国方面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请求，但是，我认为国务卿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针对那一小块极寒之地主权的争端中，阿根廷是侵略的一方，他们最终诉诸武力入侵，造成了流血冲突。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原则是，一定不能让此类武装侵略得逞。"

里根想再次说服阿根廷从战争的边缘撤回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与总统加尔铁里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他听起来有些焦虑，几次提到他们想和平解决。"但加尔铁里不想从这些岛屿撤军，也不想撤回自己关于阿根廷主权的声明。

撒切尔一如既往地固执。她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破坏和平的是阿根廷，不是英国。任何关于可以让侵略者占领岛屿，同时还可以避免冲突的提议都是严重的误导。对于其他潜在的紧张地区和小国家来说，其意义都极其重大，因为自由世界所倡导的根本原则将会受到破坏。"

尽管里根拒绝像撒切尔那样说得很强硬，但他同意撒切尔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截至中午，事情看起来没有希望了。"里根在4月17日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指责阿根廷。他在4月23日写道："惨剧可能就要开始了，这场战争主要是因为阿根廷的这位将军总统（政变上台）需要提升其正在下行的政治命运。"

一周后，战争真的开始了。英国特遣舰队在4月底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5月1日，英国战机轰炸了斯坦利港机场，让阿根廷人无法使用。5月2日，一艘英军潜艇击沉了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轻型巡洋舰，造成300多名士兵和船员死亡。

此次沉船事件使得外交解决冲突的希望破灭了。英国嗅到了胜利的气息，而阿根廷人则试图报复，或至少要为荣誉而战。两天后，他们成功了，一枚从空中发射的阿根廷导弹击中并损毁了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杀死了20名英国水兵，引发大火并最终导致该舰沉没。

里根被迫对战争的爆发做出回应。他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却卷入了一场与记者们的对话。当时他正要离开白宫到华盛顿以外做简短旅行，记者们大声向他提问。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进攻是预料之中的吗？”另外一名记者质问道：“我们将对马尔维纳斯战斗采取什么行动？”第三名记者大声叫嚷道：“总统先生，对于英方今天上午的进攻，您是提前得到预警了呢，还是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呢？”

里根的助手们非常不满这种车辆驶过时媒体的拍摄，认为这让总统脱离了保护。有时候的确如此，但这也给了里根机会，去选择他想要回答的问题。其他问题都被直升机的旋翼吹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里根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这完全是一场意外。”他说道。这并不完全属实，但当时却近乎如此。无论是里根还是黑格都没有要求通报英方计划的细节，总统也没有被告知英国的攻击将于何时开始。然而，考虑到撒切尔那么坚决，里根应该相当清楚，攻击即将展开。

记者们很快就证实了总统所说内容的真伪。他们得知，参与第一轮空袭的英军飞机是从大西洋阿森松岛起飞的，美国在那儿运营着一个“二战”时期从英国租借过来的空军基地。政府曾就是否允许英军的进攻从那里开始展开辩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反对这样做，认为这将得罪阿根廷，危及这个半球的团结。中情局副局长博比·雷·英曼代替威廉·凯西出席辩论，他的反应十分激烈。英曼后来回忆道：“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与总统一起开会时发火。”英曼称半球团结只是一个“谎言”，他提

醒在座的人，“自1812年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站在美国一边。里根接受了英曼的观点，英军得以利用阿森松机场。

但这让里根必须进行一些解释工作。一位记者在第二次遇见总统的时候问道：“总统先生，如果英国人从我们控制的阿森松岛起飞的话，那您怎么还能对这次进攻感到意外呢？”

里根回答说：“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报告。”

“他们是在利用阿森松岛上我们的跑道来轰炸马尔维纳斯群岛吗？”

“那是一个共用基地。”

“既然是共用基地，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感到意外呢？”

“是这样的，当我们的飞机从那儿起飞的时候，我也从没有通知英国人。”

很明显，轰炸和海战是在为英军登陆马尔维纳斯群岛做准备。里根担心战事或许会蔓延到阿根廷本土。巴西总统访问了华盛顿，他告诉里根，他的外交人员已经获悉，英国人正在准备进攻阿根廷大陆上的军事基地。里根回忆说：“我们的情报系统证实，英国正在进行攻击前的准备。”他给撒切尔打电话，警告她不要扩大战争范围。尽管撒切尔不打算采取超过她所承诺的行动，但在这一点上，她拒绝将其排除在外。撒切尔后来写道：“无论这些攻击是否具有军事意义，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它们会对我们的立场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完全达不到预期目标。”

里根试图推迟或阻止地面部队的冲突，他再次给撒切尔打电话。“我与玛格丽特交谈，但觉得没有说服她放弃进一步的行动。”里根在5月13日写道。阿根廷人也不愿意让步。加尔铁里对里根派来做最后停战努力的弗农·沃尔特斯说：“数百人阵亡了。我能够告诉我的人民，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什么呢？”

5月21日，英军展开登陆，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夺战。里根再次给撒切尔打去电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英国将在没有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停战，而阿根廷政府也不会失败。撒切尔没有妥协的打算。里根写道：“这位首相十分固执，她认为，只有获胜才能对得起到目前为止的牺牲。”

撒切尔也感觉到里根站在自己这边，尽管他在进行外交努力。五角大楼悄悄地增加了对英国的援助，除了其他项目之外，它们向英国提供响尾蛇导弹和修建临时战机跑道的材料。6月初，总统在与撒切尔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支持英国的立场。两人分别前往巴黎出席由主要经济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会议。他们在美国大使馆就南大西洋问题讨论了一个小时。英方的会议记录中记载道：“在谈论一开始，首相向里根总统诚恳地表示感谢，感谢美国向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她很遗憾，自己不能公开美方提供的非常有价值的援助，但对此也表示理解。”撒切尔重申了自己要彻底解决这一冲突的决心，然而，她希望英国方面的胜利不会对南美洲的稳定产生影响。“首相明确表明，她无意羞辱阿根廷，也不会对阿根廷本土开战。没有人会比她更希望停战。”

里根接下了这个话题。“里根总统表示，十分希望尽量减少伤亡人数。”英方备忘录这样记录道，“他想知道，与正面进攻相比，持续的轰炸是否无助于达到目的。”撒切尔解释说，轰炸会延长冲突的时间，带来的实际伤亡人数可能会增加。里根回答说，长时间的冲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他担心的是阿根廷国内的局势。他不确定加尔铁里是否会垮台，但假如他知道的话，那看起来空军总司令可能会取而代之。”里根继续说，加尔铁里是咎由自取。“里根总统主动提出他的看法：加尔铁里之所以下令入侵，是因为如若不然，几天之内他就要下台。对于庇隆派的同情而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已经近在眼前。”

几天后，里根在伦敦与撒切尔再次会面。他们进行了秘密交谈，彼

此重申了之前的立场。随后，总统对议会发表演讲。他明确提出，在对抗侵略的战斗中需要团结一致，尤其是针对苏联及其共产党同盟和属国的斗争。但他把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冲突归为维护法律秩序所需要的必要的努力的一部分。里根对他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听众说道："年轻人正在遥远的南大西洋岛屿上为不列颠而战。有人反对他们在如此遥远的荒岛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那些年轻人不是仅仅在为疆土而战，他们是在为事业而战，是在为信仰而战——一定不能让武装侵略得逞。"他借助撒切尔的话又补充说道："假如在大约45年前，这一原则能够得到更坚定的支持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或许就不会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

战斗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当时，阿根廷守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守军突然失去信心，停止了抵抗。"战斗结束得如此之快，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撒切尔回忆道。但她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却是持久的。她对自己的同胞们说道："不列颠重新点燃了前辈们昔日燃起的精神，今天，这种精神又像往日一样耀眼。不列颠再次在南大西洋证明了自己，从此以后，也将绝不会停留在过去的胜利上踟蹰不前。"

57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让撒切尔成了英雄，尤其是在里根的眼中。“她完全相信，自己的行为在道义上是公正的。”总统说道。里根愿意把自己想象成同样勇敢无畏，维护正义。撒切尔的胜利提醒人们，确实可以通过武力来赢取道德上的胜利。

然而，这也带来了间接损失。加尔铁里政权在马尔维纳斯战役失败后几天就垮台了。这让里根政府不得不负责阿根廷政府一直在支持的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两千叛军。里根发现，自己在中美洲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比预期的时间更早。

在世人看来，更明显的损失是，里根失去了自己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一直不能很好地融入他的政府。詹姆斯·贝克认为他装腔作势，说他“好大喜功”。英曼认为他缺乏缜密的思维，说他“霸道无理”。马丁·安德森认为，黑格从没有理解或欣赏过总统的领导风格。“他有些轻视那些非科班出身的、非一流的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安德森说道。安德森并非一流专家，但他是为总统出访做准备的成员之一，这让黑格大为恼火。安德森说道：“对于里根坚持把这些非专业的外交政策人士纳入到核心筹备组当中的做法，他感到十分不解。其中最让黑格恼火的是，里根习惯于让自己信任的顾问参与到他们并不擅长的外交问题讨论中。”当安德森出现在里根出访前的最后一次通气会上的时候，黑格暴跳如雷。“他像小一号的夏尔·戴高乐那样，挺直腰板，憋足力气咆哮道：‘安德森，你到我的会上来干吗？’”

安德森具有讽刺性的回答体现了效忠里根的人对黑格的态度。他说道：“国务卿先生，每当我有机会让您心情愉快的时候，我都不会错

过。”里根的手下几乎从来不会放过惹恼黑格的机会。他自视甚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认为他嚣张傲慢，而且认为他有损他们执意要维护的里根的尊严。他们不让黑格想见就能见到总统，让他去揣测这是谁的决定。黑格后来写道：“在我看来，白宫就像是一艘神秘的幽灵船，你可以听到缆绳和船体吱吱嘎嘎作响，有时甚至可以瞥见甲板上的水手。但到底是哪个水手在掌舵呢？是米斯、贝克，还是其他什么人？这一点根本无从知晓。”当黑格跟理查德·艾伦抱怨的时候，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说道：“亚历山大，你为什么不能只负责管好国务院呢？”米斯和贝克常常代表政府就外交政策以及其他事务发言。当黑格表示反对，指出他们的措辞缺乏外交辞令的准确，并建议他们把这一工作留给他来做的时候，他们置之不理。黑格说：“有时候，在挂断电话之后，我就感觉他们把我当成了孩子，根本不明白宣传是政治的发动机。”

黑格发现自己还要在日常事务中捍卫自己的领地，卡斯帕·温伯格越界的做法最为让人恼火。黑格说：“其他政府或公众难以相信，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防部部长，竟然可以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雌黄。”然而，这就是温伯格的方式，他懂得预算，但不谙外交。“他以政策为幌子，口无遮拦地公开内部消息。我为此曾祈祷他能够改正这种习惯。如果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那万能的主并没有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

然而，真正让他抓狂的是泄露秘密这件事。黑格说：“在我当面跟白宫人员谈话时，如果我无法正确理解他们的意见，那他们就会马上透露给媒体。”他从《华盛顿邮报》得知，威廉·克拉克在国务院的工作与其说是担任他的副手，倒不如说是替白宫方面监视着他当总统的野心。《纽约时报》告诉他，他在里根手下那些人当中的绰号是CINCWORLD——世界最高统帅——这缘于他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神态。他曾看到过自己提交给总统的秘密报告被直接引用，也看到过自己在国家安全委

员会本应是秘密会议上的讲话被直接引用。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其目的是什么？是谁泄露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得不到确定的答复。”黑格反思道。他向贝克、米斯以及其他人员抗议，结果石沉大海。米斯跟他说：“这些只是媒体传闻而已，不要在意。”结果，秘密还是继续被泄露出去。

里根的做法是忽略政府内部的争执。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坐下来好好谈谈。”然而，里根也纳闷儿，在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中，为什么黑格看起来如此四面楚歌。黑格在间接得知乔治·布什被提名担任政府危机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大为不满。正常来说，这一职位应当是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担任。里根在日记中写道：“黑格觉得自己的地盘遭到侵犯。我们选择乔治是因为黑格对艾伦心存芥蒂。他提出辞职。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是在无中生有。他是国务卿，没人来侵犯他的地盘。他负责外交政策，却得罪了一半内阁成员。”

黑格不断地威胁要辞职，而里根不断地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但是，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很显然，在总统遇刺那天，里根没有见到黑格过分激动的表现，但之后他有所耳闻，后来又不断地听别人说起过。1981年11月，他接到黑格的电话。黑格刚刚发现，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打算报道国务卿即将被解雇的消息。安德森是从一位匿名的白宫官员那里得到的消息。里根向黑格保证，这一报道并不属实，并打电话给安德森说，黑格是这些年来这个国家最好的国务卿。安德森撤下了这份报道，刊登了里根的支持声明。里根在日记中写道：“他当然不会说出向他透露消息的白宫官员的名字。”

里根也不想费心去找出这位官员，但他逐渐认识到，关于黑格的一些事情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期间，他与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进行了一次吹毛求疵的较量。柯克帕特里克同情阿根廷，这惹恼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英国人，撒切尔曾向里根抱怨，柯克帕特里克甚至在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时，还出席了由阿根廷

大使举办的晚宴。黑格认为，柯克帕特里克的行为和声明让人对他维护总统化解危机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里根试图让黑格和柯克帕特里克精诚合作。他分别与二人会面，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强的团队精神。里根认为，这两次见面很成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们可以化解分歧，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但是，里根想错了。黑格越发相信，白宫人员正在密谋给他下套。就在里根即将动身参加与友好的加勒比地区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黑格开始了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穿梭外交。黑格回忆说："我很惊讶地听到来自白宫的报告，说我所从事的马尔维纳斯使命抢了总统的风头，使罗纳德·里根对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访问黯然失色。有人跟我说，白宫方面把我的和平使命说成是'哗众取宠'。"黑格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报道，说他拒绝搭乘那些分配给政府使用的飞机，坚持乘坐高档飞机。事实确实如此，但并不是为了讲排场或者舒服。"问题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工作空间和通信设备。"他想要的那架飞机设备更先进。黑格没有对这次消息泄露进行谴责，但他的一位助手跟记者说，《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定是詹姆斯·贝克散布的。

这一指责完全是火上浇油，白宫方面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亨德里克·史密斯，黑格的饭碗取决于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平使命的成败。"你们可以说，黑格需要一次胜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道。当黑格没有完成使命的时候，这位国务卿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他回忆说："我回来之后不久，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每次告诉我的都是真相，他所处的位置也让他能够知道真相——打电话说，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我的前途。'黑格一定要离职，并且马上离职。'我的朋友引用詹姆斯·贝克的话说道，'我们要做成这件事。'"

贝克确实想让他离职，但主要是因为他已经成了总统的烦恼和负

担。贝克在提到黑格时回忆说：“他怀疑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贝克后来承认，黑格确实有不满的理由。他提到有一天，迈克尔·迪弗穿了一身猩猩装，在内阁会议的会场外炫耀，嘲弄黑格关于白宫人员想要出来逮住他的想法。在一次出访伦敦的行程中，迪弗故意分配给黑格一架噪声轰鸣、透气漏风的军用直升机，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白宫工作人员乘坐的是一架噪声不大的民用飞机。“黑格恼火我并不怪他。”但是，贝克又补充说，“我与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无论谁应对此事负责，黑格在国务院的日子都屈指可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刚一结束，黑格就向总统提交了一份他所遭受的来自白宫人员和其他内阁部长怠慢的清单。黑格说：“总统先生，我希望您明白在您周围发生的事情。我真是无法再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了，这太危险了，无法实现您的目标，也无法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再次提出辞职，但说明自己的辞职要等到11月的选举结束之后生效，为的是避免让总统尴尬。

里根写道：“亚历山大·黑格的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我必须结束我们这种地盘之争，结束他这种猜忌的态度。”总统认为，事情发展到如此难以驾驭的地步是一种耻辱。在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黎巴嫩危机的一次会议时，里根写道：“黑格在整件事中表现突出，他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中的英明之举令人赞叹。然而，他在处理同事关系时的那种偏执狂暴的表现令人惊讶。”

显然，黑格期望里根能拒绝他的辞职，就像之前那样，但总统已经受够了黑格问题带来的困扰。黑格出于错误的原因得到了太多的关注，里根与黑格并没有特别发生政策上的争执，但他不喜欢被抢去风头。他告诉黑格，他会阅读他的明细清单，然后答复他。

第二天，里根把黑格叫到椭圆形办公室，递给他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黑格看了里面的信，上面写道：“亲爱的阿尔[注]，非常遗憾，我接

受你的辞呈。”

黑格一怔。“总统接受了一封我从没提交的辞职信。”他回忆说。黑格意识到，在外交政策危机期间，直接提出不加解释的辞职会让他的简历看起来不很光彩。于是，他要求花些时间写封辞职信，并解释说，他会把自己的离开归因于政见分歧。

里根点头同意。但当这位国务卿还在斟词酌句构思自己的辞职信时，总统就已经给乔治·舒尔茨打去电话。舒尔茨在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曾担任过劳工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里根在萨克拉门托曾和他见过面，当时还是州长的里根向他请教过政府财政问题。那次会面持续了3个小时。舒尔茨后来回忆说：“他就联邦政府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我所经历过的最为认真的询问。”当时，舒尔茨就猜测里根打算竞选总统，但里根的询问表现出了更多具有实质内容的特点。“他想做好工作。”舒尔茨说道。之后，舒尔茨邀请里根参加了一次学术性和政策性聚会，聚会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舒尔茨的家里举行。“他让人印象深刻。”舒尔茨回忆道。里根观点鲜明，这对政客来说司空见惯，但里根的观点内涵十分丰富，“他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持那种观点。”

黑格离任的时候，舒尔茨是一家全球建筑工程公司柏克德公司的总裁。里根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在伦敦开会。里根说道：“阿尔·黑格辞职了，我希望你来担任我的国务卿。”

舒尔茨怀疑自己没有听清楚总统的话，于是就问里根：“黑格已经辞职了？既成事实了？”

里根回答说：“他已经辞职了，只是还没有公布，但确实是这样。我接受了他的辞职，希望你来接替他。”

舒尔茨突然意识到，里根希望立即得到答复。“总统先生，您是在要求我现在接受这份工作，就在电话里？”

“是这样的，乔治。”里根说道，“这非常重要，因为像这样一个岗位长时间空缺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在公布黑格国务卿辞职的时候，希望能同时公布我提名你来接任。”

舒尔茨考虑了几秒钟，然后说道：“总统先生，我加入。”

里根挂上电话，前往白宫的新闻发布厅。就在黑格还在写自己的辞职信的时候，里根公布了他的继任者。随后，他就飞往了戴维营。

当天晚些时候，黑格跟自己方面的人讲了国务院发生的事情。里根得到消息，说黑格要举行新闻发布会，于是里根和南希打开电视。黑格把自己辞职的原因说成是因为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里根摇了摇头，并不赞同。当晚，里根写道：“唯一的分歧是，到底是我制定政策还是国务卿制定政策。”

---

1. 亚历山大的昵称。——编者注

58

里根极少回顾过去。从孩童时期他就一直向前看——超越父亲的酗酒狂欢，超越不断搬家带来的情感错位，超越迪克森的狭小天地，超越伊利诺伊州来到好莱坞，超越好莱坞来到萨克拉门托，之后又来到华盛顿。壮志雄心推动着他向前看，不断取得更高的成就和声望，同时带来的还有气质的改变。与内省相比，他更倾向于行动，与思虑过去相比，他更倾向于向前走。他几乎从不承认错误，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没有犯很多错误，也因为承认错误需要进行他不喜欢的那种回顾与反省。假如他的事业没有那么成功，那么他可能会发现，自己采取的那种遗忘过去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他可能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事实上他的事业非常成功，因此为何还要思虑过去呢？

里根从没有承认选择阿尔·黑格担任国务卿是个错误，也没有承认他的那种超脱的领导艺术导致了官场中的游击战，让黑格无法专心工作，最终被迫离职。里根只是批评了黑格任期内出现的问题，然后就继续前行。

乔治·舒尔茨很快就意识到，真相远比看起来复杂。舒尔茨搭乘超音速协和飞机飞越大西洋，然后转乘直升机前往戴维营。他回忆说："我和里根总统在阿斯彭小屋外的树荫下共进午餐。威廉·克拉克、詹姆斯·贝克和埃德温·米斯同我们一起。贝鲁特炮火连天，媒体咆哮怒吼，而美国也面对着来自联合国不断增加的压力，要求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总统表现得镇定自若，但我可以看得出，他和他的助手们也感到紧迫、失望，充满危机感。"

自从以色列越过边境进入黎巴嫩，里根就感到了压力。“我们在走钢丝。”他在日记中写道。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好像愿意让以色列人压制住黎巴嫩南部地区数千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士兵，但他无法公开表态，这让里根左右为难。他说：“世人在等着我们动用我们的力量命令以色列撤出。如果我们希望帮助萨尔基斯，那就不能这样做，但我们也不能解释这种情况。形势每况愈下。”

里根的日子也没有任何好转。总统明白以色列出兵黎巴嫩的原因，尽管他不相信他们的公开声明，说他们只是想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以色列边境驱逐出去。里根猜测，贝京和沙龙打算干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至少要迫使该组织离开黎巴嫩。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要把叙利亚部队赶出这个国家。里根意识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以色列看作美国的马前卒，因而对于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造成的伤亡，纷纷指责美国。

里根拒绝公开训诫贝京，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只会使这位总理更加固执。但在白宫内部，当贝京再次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总统让他明白，他并没有从美国这里得到全权委托自由行事。“我当时相当坦率。”里根在会见之后写道。贝京回答说，以色列不得不进行自卫。里根说以色列军队造成了太多伤亡，贝京予以否认，而里根再次提起。然而，里根在日记中也承认：“这个问题很复杂。尽管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杀戮过重，但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来调停黎巴嫩交战各方，在7年之后重获和平。”

和平是里根希望的，既是为了黎巴嫩，也是为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然而，他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他还要接受停火。里根派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前去在交战方之间斡旋。哈比卜达成一项协议，结果却是各方违反了停战协议，并指责对方。哈比卜的关键问题是，以色列不会停止他们的进攻，除非他们达到了入侵的目的。但美国长期拒绝直接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做法也让他的任务更加艰

巨。美国斡旋代表哈比卜不得不雇用他自己的斡旋人员——黎巴嫩的中间人——来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交换信息。有时，为了提高效率，哈比卜亲自与巴勒斯坦人接触，结果遭到以色列人的指责，不得已他又缩了回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的信息传递了过去，部分原因在于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风格。乔治·舒尔茨回忆说："哈比卜在对任何人表达不满时都会大声咆哮，不停地挥舞着胳膊。他这种勃然大怒的表现既具舞台效果，又具说服力。在这一外表下，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公平善意的人……哈比卜传递令人不快的严峻事实的方式最终常常赢得双方的认可，并且不会产生怨恨。"

虽说如此，但哈比卜的影响力没有超出里根赋予他的权力。里根尽管对贝京很不耐烦，但他拒绝冒险跟以色列翻脸，因为，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伙伴。

当以色列军队逼近贝鲁特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紧张。以色列对黎巴嫩郊区的占领已经激怒了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但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一定会造成情感上和政治上更大的冲击。但在以色列看来，贝鲁特是个合理的目标，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进了贝鲁特。

里根试图先发制人，阻止进攻。总统断定私下警告已经失去了作用，因此开始公开训诫以色列。在与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会面之前，一位记者问里根，是否会因为以色列政府违反停火协议而对它采用强硬手段。里根回答说："我想说我会很坚决。这件事必须解决，不能再发生流血冲突。"这名记者问他是否已经对以色列失去了耐心。里根说："我早就失去耐心了。"

8月4日，里根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来评估局势，制订计划。会议一开始，他就询问了来自前方的最新消息。他说自己一大早就被助手叫醒，汇报说贝鲁特开始遭到“全面进攻”。情况是否属实？

乔治·舒尔茨说，以色列的行动还算不上全面进攻，但以色列的炮火让哈比卜不可能再继续进行停火谈判。舒尔茨转述了哈比卜的话，要求“严词声明，假如以色列不能提供他达成谈判所需要的时间和和平，那么，就要威胁进行制裁。”舒尔茨支持这一要求，并补充说，制裁可能包括再度中止军售，并由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进攻。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不赞同舒尔茨反对以色列的言辞，她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目的也是美国的目的。“美国不应当采取针对以色列的措施，放弃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可能。因为这将有可能阻止——如果不是彻底消除的话——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很明显，一旦我们从黎巴嫩清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和平进程中快速发展。”

里根同意柯克帕特里克的观点，问道：“我们如何把形势告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告诉他们必须退出呢？”

卡斯帕·温伯格没有回答总统的问题。相反，他又回到如何应对以色列的问题上。这位国防部部长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离开黎巴嫩，但他认为，以色列的行动过于极端。“美国必须让以色列知道其夜间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温伯格说，他指的是以色列对贝鲁特城市西部的轰炸，该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藏身之处。

里根倾向于向巴勒斯坦人施压，他说：“我们必须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明白，他们的游戏必须停止。”总统自言自语地说，他建议通过沙特阿拉伯做工作，“或许最好的做法是按照下面的思路与法赫德国王进行一些沟通：我们一直在抑制以色列，而我又在与贝京总理进行沟通。

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丝毫不妥协，这就带来了问题，让以色列重新开始他们的行动，是时候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黎巴嫩了。”

里根的顾问们没有反对里根，但他的提议无人回应，因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讨论又回到了里根应当对贝京讲些什么这方面。威廉·克拉克起草了一封信，呈送给里根。里根仔细研究了几遍。在他读到信的最后一部分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开始现场修改这一部分。总统写道：“昨晚我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会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贝鲁特。但这一进展由于你方部队的行动又再次受阻。必须终止无谓的流血，尤其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流血。我要求重建并维持停火区，直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离开贝鲁特。目前，我们两国的关系危若累卵。”

里根提议在信中称呼贝京为“梅纳赫姆”，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员一致认为，这将会削弱这封信原本严厉的语气。里根不大情愿地同意这封信的开头写着“亲爱的总理”。

事实证明，严厉的语言还是必需的。以色列对贝鲁特不断加强的轰炸促使里根给贝京打去了电话。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中东问题专家杰弗里·肯普默默地监听着此次通话，但当里根对贝京扔出重磅炸弹的时候，肯普几乎惊得叫出声来。里根说道：“梅纳赫姆，你是在进行大屠杀。”

肯普回忆道：“贝京被惊得寒毛倒立，你甚至可以在电话里感觉到。”总理缓慢而痛苦地说道：“总统先生，我明白大屠杀的后果。”

里根的电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贝鲁特的袭击减少了，但它深深地震动了贝京，因为他的父母和哥哥就死在纳粹之手。

哈比卜达成了一份协议，其要点是重新停火，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清除出去，随后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军。包括美军在内的一支多国维和部队将监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里根在白宫玫瑰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目的是帮助黎巴嫩武装履行其使命，确保在贝鲁特的巴解领导人、官员和参战人员安全有序地离开黎巴嫩领土。美军参加此次行动也是要帮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对于贝鲁特地区的主权和权力。我们的部队绝不会滞留超过30天。”

在此次声明之前，里根告诉记者，他将不回答问题，并解释说，国务卿舒尔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尽管如此，记者们还是冲着他喊了起来。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您如何能保证美军的安全？”

“会谈到这个问题的。”里根回答道。他指的是舒尔茨的新闻发布会。

这位记者追问道：“先生，如果他们遭到射击，他们会立即撤出吗？”

“你说什么？”

“如果他们遭到射击，他们会立即撤出吗？”

“当然，当然。”里根说道。

拉里·斯皮克斯打断了提问，提醒记者道：“我们说了不回答问题。”随后护卫着里根匆匆离去。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撤离进展顺利，没有节外生枝，这让里根可以在9月1日这样对美国公众讲：“今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天，它标志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功从贝鲁特撤离的结束。”总统向菲利普·哈比卜不

知疲倦的忘我工作表示祝贺，也认可了帮助监督此次行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工作。“我们的年轻人在两周内就将离开黎巴嫩。他们也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和平使命，我们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总统表示希望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可以带来更好的方案，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他为这一方案提出了一个框架，发出了三声呼吁。“我呼吁，以色列要清楚，它所渴望的安全只能通过真正的和平实现，这种和平需要宽宏大量、远见卓识和非凡的勇气；我呼吁，巴勒斯坦人民要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是与承认以色列未来的安全权利密不可分的；我呼吁，阿拉伯国家要接受以色列的现实，以及和平和正义只能通过艰苦、公平和直接的谈判才能获得。”

在阐释他的和平愿景时，里根明确拒绝承认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他也拒绝以色列对这些地区的长期占有。里根提出与约旦联合成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他明确表明，美国反对以色列在占领区建设以色列定居点。里根接受给巴勒斯坦人土地以换取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想法。他说：“我们的方针完全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之上，即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包括土地换和平。”

当贝京拒绝他的提议时，里根并没有感到意外。这位以色列总理一直声称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领土，应当永远归属以色列。贝京在给里根的信中写道：“总统先生，有些人称约旦河西岸是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地区。一千年以前，当地有个朱迪亚–撒马利亚王国，王国内我们的国王信奉上帝，我们的先知宣布永久和平相处，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18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族人在漫长的全球艰苦跋涉中薪火相传这种文明，并将其带回我们的故土。”尽管约旦在1948年以后统治过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地区，但以色列人民从没有忘记过它们。“在遭到侯赛因国王攻击之后，我们进行了最为合法的自卫还击，在上帝的帮助下解放了我们祖国的这一地区。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将永远不会再成为约旦

河西岸。”

里根对于贝京的强硬路线很失望，他担心这种强硬态度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冲突。总统的担心比他预期的得到了提前证实。9月14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在一次炸弹爆炸中丧生。这次暗杀活动让以色列人非常警觉，促使他们占领了贝鲁特西部。4天之后，黎巴嫩武装分子冲进两处当时由以色列军队控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了数百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而以色列军队袖手旁观。

里根非常震惊，也公开表达了这种震惊。总统说："今天早晨，当我得知发生在贝鲁特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恐怖。所有文明人对这些包括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谋杀都会感到愤怒和厌恶。"里根没有因为这场杀戮直接指责以色列，但指责他们沆瀣一气。"在促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贝鲁特撤离的谈判过程中，我们确信以色列军队将不会进入贝鲁特西部，同时我们还清楚，在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会控制好该城市，但这些都被以色列星期三开始的占领行为挫败了。我们强烈反对杰马耶勒总统遇刺后，以色列进入贝鲁特西部，这既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也因为我们担心这样做会引发进一步的战争。以色列昨天通过武力控制了贝鲁特，声称他们的行为将阻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现在悲剧却发生了。"

里根认为，唯一让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办法就是美国要更坚定地介入其中。他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对他来说，讨论进展得不够迅速。"最后，我告诉我的人，我们需要全力以赴。"里根当晚写道。他提出派遣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部队重返黎巴嫩，阻止进一步的暴力冲突。政府将迫使以色列离开黎巴嫩，并依靠众多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服叙利亚撤军。同时，黎巴嫩政府应当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达到可以保卫国家的能力。里根写道："不要再半途而废，要利用手边的多国维和部队来恢复秩序，肃清整个局势。"

乔治·舒尔茨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积极支持总统的提议，会上其他

人也没有表示反对。里根非常满意，写道：“战车开始启动了。”

59

里根整个外交政策方针的优势体现在他在中东政策中的劣势。里根一直关注事情的重点，即与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在这一领域中，他最终的成就超过了其他任何总统，但他这种关注重点的倾向削弱了他处理次要问题的能力，比如黎巴嫩战争。里根缺乏专业知识，不了解导致这一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动荡地区的特点和成见。要想在中东地区取得成功，需要关注细节，而里根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取得持久性成功的总统是在性格和方针上与里根截然相反的吉米·卡特，这一点绝非偶然。卡特经常因为他的微管理政策而遭到包括里根在内的许多人的嘲笑，但假如没有关注细节，卡特永远也不会取得突破，使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

尽管如此，里根还是希望可以取得类似的成就，希望美军重返黎巴嫩可以做到这一点。部队登陆和部署进展顺利，这鼓励里根把几位阿拉伯领导人召集到华盛顿。“了不起的一天！”他在10月22日写道。摩洛哥国王哈桑率队前来，哈桑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在说自己不会直接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哈桑认为，他可以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发表那样的声明。“他提出了阿拉法特声明的一个样本。”里根写道，“我认为很不错。然后他暗示说，自己可以在3周或1个月内完成此举。”

以色列方面不大支持，贝京拒绝从贝鲁特撤离以色列军队，他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定会返回。里根与菲利普·哈比卜见面，后者对于贝京当天的表现更加感到挫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占领——现在遭到了阿明·杰马耶勒政府的反对，他是被暗杀的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兄弟——证实了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企图的怀疑，也授人以柄，为巴勒斯坦极

端分子提供了便利。里根派遣哈比卜前往中东给以色列政府捎信：如果以色列不离开黎巴嫩，那它可能会失去美国的支持。

阿拉伯国家给里根的印象越来越比以色列好。约旦国王侯赛因在12月底抵达华盛顿，里根这样记录道：“我很喜欢他，他是我们的希望，可以率领阿拉伯方面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进行谈判。”里根对侯赛因大加赞赏。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侯赛因之后来到美国。“我们的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巩固了我们稳定的关系。”里根写道。穆巴拉克警告说，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可能无法达成任何和平协议，而以色列和叙利亚尽管是敌对关系，但看起来他们都有分割黎巴嫩的共同目标。里根说道：“我同意他的担忧。”

在1983年的第一季度，里根对以色列的失望继续加大。一个调查委员会发现，对于发生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阿里埃勒·沙龙负有过失，随后沙龙辞去国防部部长一职。这让里根有理由认为，事情可能出现转机。然而3月，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来访。尽管访问期间里根表达的愤怒之情没有他对贝京所表达的那样强烈，但此次访问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里根抱怨说：“以色列依旧在磨磨蹭蹭，消极怠工。”

4月发生的事情带来了新的震惊，也更让人失望。4月18日，汽车炸弹在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外爆炸，造成6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7名美国人。死亡的美国人中有几个是国务院和中情局的官员，以及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美国使馆还从没有遭受过这么严重的故意破坏，与伊朗有关的一个组织声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

“该死的！”里根在日记中写道。第二天，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得知了更多的细节。他又补充写道：“请主原谅我对那些人的憎恨，他们的行为如此残忍，但非常懦弱。”

4天之后，总统前往迎接运送遇害美国人尸体回家的飞机。他对遇难者亲属和公众说道："对于像我这样的执政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向为国捐躯者致敬更让人悲哀的了。这些英勇的美国人明知他们面临危险，然而他们依然愿意前往贝鲁特。卑鄙得无以复加的懦夫行为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这是在攻击我们所有人，攻击我们的生活方式，攻击我们珍视的价值观。"为此，里根说，在黎巴嫩进行的行动比以往更加重要。"倘若我们让这一行为阻止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和平友好使命，那么我们就真的会让他们失望的……让我们在此当着他们的面，正式通知世界上那些懦弱残暴的宵小之徒——他们将永远不会得逞。"

曾经有位记者在调停活动伊始问里根："总统先生，假如当地爆发战争，您是否打算让美国撤出黎巴嫩？或者海军陆战队进入当地会导致像在越南的那样一场漫长的纠缠乱战呢？"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南战争的幽灵一直笼罩在每一次美国的介入活动中。总统们通常会否认这种类比，里根这次也予以否认。他说："我根本没发现此类事情在那里发生。"然而，正是这种否认的必要证明了它对美国人心理的影响。美国选民从外交政策中得到的教训总是来得缓慢，但他们认识得非常深刻。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必须避免绥靖妥协，必须抵制侵略行为——成了40年来美国对苏联及其盟友政策的基础；越南战争的教训——其他国家的战争可能变成美国的泥潭——让吉米·卡特及以后的总统否认他们的介入与当年介入越南的行动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有时候会导致革命，让革命来解决问题，比如卡特在尼加拉瓜的行动；有时候会导致隐秘战斗，比如里根在中美洲发动的叛军行动。这种做法在记者或其他怀疑者提出越南问题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里根详细解释说："海军陆战队员进入当地时，他们对于我们的具体行动十分清楚。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其他外部势力离开黎巴嫩。等

到那时，等黎巴嫩方面说他们已经掌控了局势之后，我们就会撤离。”

记者们不大相信，另外一名记者问道：“先生，如果战争再次爆发，您还会撤出陆战队吗？”

里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个假设，而我发现，只要我不回答这种问题，我就永远不会陷入麻烦。”

然而，使馆被炸不是个假设，它凸显了美国卷入黎巴嫩问题的危险，也迫使里根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派遣乔治·舒尔茨前往中东地区替换筋疲力尽的哈比卜，并为舒尔茨办事处的谈判工作助威。国务卿处理以色列问题的最初报告还不错，舒尔茨给里根发电报说，以色列人仿佛即将达成撤军协议。

然而，突然之间，叙利亚成了解决问题的一道障碍。奇怪的是，这却给里根带来些许欣慰。里根关注重点问题的做法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部分，使它同黎巴嫩政坛中地区性党派主义、教派主义和人格主义展开较量。但是，叙利亚与苏联有联系，这就使它成了重点问题的一部分，也给了里根一次训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机会。里根认为，这样做比训诫梅纳赫姆·贝京更合适。勃列日涅夫曾指责以色列武力入侵黎巴嫩。他在给里根的信中写道：“以色列正在对黎巴嫩发动正规战，它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轻率鲁莽，蔑视国际社会准则。”——即冲破联合国武装设立的界线——“以色列正在对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国继续发动大规模侵略。鲜血横流，数千人境遇悲惨，这个国家中的和平居民——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正经历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勃列日涅夫认为，里根难辞其咎。“原因是，众所周知，美国控制并影响着以色列的重大行动。”并且，勃列日涅夫警告美国总统说，克里姆林宫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极度关注该地区局势的发展，因为这一地区毗邻我国的南部边界，那儿有我们的朋友。”苏联将

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除非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战争立即停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里根像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很愤慨，但勃列日涅夫的指责给了他一个机会。总统没有太在乎勃列日涅夫信中暗含的威胁。黎巴嫩与苏联几乎不接壤，而事实上，莫斯科在该地区苦于没有朋友，尤其是在戴维营协议让埃及开始指望美国而不是苏联的援助之后。里根没有理睬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这一部分。相反，他质疑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心和指责。“你对黎巴嫩人民的苦难表示关心，但这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苏联向当地武装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这些人积极活动，破坏黎巴嫩的政局稳定，进攻以色列北部领土，结果招致以色列报复。”里根告诉勃列日涅夫不要哗众取宠，而要务实地拿出解决方案。“我将继续利用我个人的影响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也希望你能采取类似做法，向那些苏联乐得其成的武装力量施压。”

与勃列日涅夫的书信交往让里根感到很满意，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黎巴嫩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主要是区域性的，并且根深蒂固，比近期才出现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要深远得多。有时候，里根感觉到，问题根源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在与叙利亚关系极度恶化的时候，里根在日记中写道：“随着大马士革的大门受到攻击，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决战开始了。”

里根并没有真的认为世界末日决战就要来临，但他也不希望冒任何风险。他命令舒尔茨和罗伯特·麦克法兰——后者顶替哈比卜担任里根的中东特使——加紧他们的调停工作。他们曾一度报告说，斡旋有所进展。

但之后，黎巴嫩的摩擦战再度升温，原有派系又分裂成新的派系，而黎巴嫩政府只是许多派系中的一个。美国依然承认黎巴嫩政府，希望

支持它。里根与杰马耶勒会面，保证不会抛弃他，并许诺向杰马耶勒提供武器，帮助政府抵挡反对势力。

里根认为，自己是黎巴嫩冲突中一位可靠的中间人，但是，他对杰马耶勒的援助——更别提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更为长久和多样的支持——让美国士兵看起来好像是打击那些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人的战士。1983年8月，里根收到一份电报，告诉他在贝鲁特机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遭到火炮攻击，这一消息提醒了他，中东问题是多么棘手。他不无渴望地说道：“在炮舰外交时代，世界一定没有这么复杂。”

或许这一渴望成就了随后的现实，因为里根不久之后就下令动用美国海军力量参与黎巴嫩战争。总统的军事顾问坚持认为，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得到保护。他们提议，派遣“新泽西”号战舰前往黎巴嫩海域，用炮火攻击对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的区域。里根不得不仔细考虑整件事情。“这将被视作我们参与了战争。”他承认道，然而他说服了自己，“这可以解释成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他说道，“如果这还不行，那我们将考虑撤离该地区或前往国会要求进一步参与其中。”

这一决定的确被视作美国参与了战争。“新泽西”号战舰用40厘米长、超过1吨重的炮弹炮轰了贝鲁特机场附近的高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打哑了针对机场海军陆战队的炮击。但这次炮轰是无差别攻击，造成了平民伤亡，毁坏了他们的家园，让更多的人认为美国是他们的敌人。

这些人当中包括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在10月底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撞击用作海军陆战队营地的机场大楼。爆炸把钢筋混凝土建筑夷为平地，杀死了241名美军士兵。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几英里外的法国军营也遭到了攻击，58名法国士兵丧生。

罗伯特·麦克法兰回忆说："当我告诉总统这个消息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像是一个72岁的老人胸部刚刚受到打击，体内的空气好像全部跑了出来一样。'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他满腹狐疑地问道。"

里根恢复镇定之后向媒体发表了一则声明，他说："语言无法完全表达我们的愤怒。"他又向死亡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并重申了自己对于他们为之阵亡的事业的决心。"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些行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野蛮本质。一旦他们得逞，把我们赶出那一地区，那他们就会掌权。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

60

在得知来自贝鲁特的可怕消息的几个小时之后，里根发动了一场似乎与黎巴嫩冲突无关的军事行动。在里根成为总统之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没有听说过格林纳达。甚至连美国新闻广播员也需要时间来校对发音。对加勒比东部这个小岛国的入侵让美国公众十分惊讶，乃至在此次行动结束前，里根的批评者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里根希望的就是这种效果。自入主白宫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展示自己和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决断力，尤其是要驱除越南战争的邪魔和清除美国无力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印象。拉丁美洲看起来是个非常适合里根意在展示这种力量的舞台。里根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在该地区的左翼盟友必须得到惩罚，而在拉丁美洲，美国的军事优势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敌人。

苏里南很快进入里根的视线。1982年12月，军事独裁者德西·鲍特瑟的士兵在这个荷兰前殖民地杀死了15名持不同政见者。随后，鲍特瑟发表声明，暗示说自己在讨好卡斯特罗，这让里根听起来很不顺耳。“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阻止他。”总统原本打算派遣海军陆战队，但之后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将会失去我们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那里取得的进展。”

因此，他谋划了秘密军事行动。1983年春，里根的国家安全团队制订了计划，为的是使鲍特瑟保持中立或推翻他。工作人员阿方索·萨皮亚–博施和奥利弗·诺思这样写道：“根据总统昨天在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的指示，我们提出了如下可能的行动方案：本周内派遣总统密使前往委内瑞拉和巴西，分别会见他们的总统，向他们详细通报苏里南发

生的一切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比方说，出现一个古巴化的苏里南社会。并且，这将会在南美洲的顶端建立起一个古巴和苏联的基地，该基地将会更有利于他们进出南加勒比地区，并以该基地为中心，增加他们对南美洲的影响。如此一来，巴西的东北部地区就会门户大开，至少会直接面对他们的宣传渗透，而委内瑞拉在其边境附近就会再多一个敌对国家。”萨皮亚–博施和诺思建议，不仅要向委内瑞拉总统刘易斯·埃雷拉·坎平斯通报情况，还要告诉他可能的继任者海梅·卢辛奇。“由于自身无能、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原因，埃雷拉·坎平斯极易受到攻击。把卢辛奇拉进圈内将会减轻埃雷拉·坎平斯的压力。”在巴西，行动必须开门见山。“必须让菲格雷多总统明白，当古巴人和苏联人出现在他的北部边境时，他们会给巴西带来威胁。他是一位将军总统，应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萨皮亚–博施和诺思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行动方案，但当他们的备忘录在25年后被解密时，这些方案被认为过于敏感，不宜公开。然而，乔治·舒尔茨在回忆录中指出了他们的想法，舒尔茨写道：“中情局派情报官跟我汇报了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一支由50~175名韩国特种兵组成的突击队会从委内瑞拉出发，对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发动攻击，推翻鲍特瑟。”国务卿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成功的可能，也没有分析在国内和国际上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他又补充道，“整个计划取决于几乎不可能的复杂的时机选择，还要假设韩国人会被认为是当地人。这简直是疯了。我非常震惊，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竟然由中情局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

尽管如此，里根还是采纳以侵略威胁作为外交手段。他任命威廉·克拉克作为他的密使前往委内瑞拉和巴西。行程是秘密的，但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克拉克后来回忆说：“我们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请注意，你们要么关注当前局势，应对苏联的据点，应对古巴的据点……要么就让它盘踞下来，而我们则别无选择，只能顾自己。”克拉克在加拉加斯向埃雷拉·坎平斯展示了美国的入侵计划。“他的面色变得苍白，在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他说：‘跟巴西谈吧，他们距离更近。我目前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我的政治麻烦已经够多了。”克拉克继续前往巴西利亚，他在那儿没有见到巴西总统，但与主管巴西军队的将军见了一面。“我们在车道尽头停下车，当时天已经黑了。”克拉克回忆道。他再次讲述了美国支持的入侵苏里南的计划。“这位将军跑到男厕所呕吐起来，他吓坏了。”克拉克说。

或许克拉克误解了这位将军身体不适的原因，或许这位将军没有向自己的平民老板们传递这种不适。不管是哪种情况，克拉克代表团没有实现里根的目的。克拉克向里根汇报完情况之后，里根指出：“委内瑞拉无法合作，而巴西总统也有自己的打算。”至于这种打算是什么，里根没有说，但他神秘地补充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Guiminish’行动，到这个月底之前，我们就会知道是否会成功。”

无论“Guiminish”行动的性质如何——这是里根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牧场饲养的一匹马起的名字——它没有推翻鲍特瑟，他继续执政了数年。然而，苏里南也没有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没有成为古巴在拉美大陆行动的基地。因此，里根必须寻找其他地方来阐明他反对拉美左翼分子的立场。

里根不必去太远的地方寻找。与苏里南相比，大多数美国人更难以知道格林纳达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小安的列斯群岛末端的一个小岛。但与苏里南不同，这个岛屿确实与加勒比地区毗邻，因而尽管面积不大，但战略意义重大。岛上有个政府，由莫里斯·毕晓普领导。与鲍特瑟那个只是一味残暴的政权相比，这个政府是由更为明显的左翼分子所领导的。里根自上台以后就一直在观察格林纳达，并一直在警告美国人发生在那里的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格林纳达这个小岛上，在加勒比岛链的南端，古巴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正在建设一个带有3000米跑道的机场。”总统在1983年3月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说道：“格林纳达甚

至没有空军，那这是为谁准备的呢？”当电视摄像机通过摇镜头展示空中拍摄的这条值得怀疑的跑道照片时，里根详细解释了格林纳达的战略意义，并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商业和军事交通线来说，加勒比地区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半数以上的美国石油进口现在都需要经过加勒比海地区。格林纳达的军事潜力在快速发展，这与这个不足11万人口的岛国所面临的可能的威胁没有关系，也完全与加勒比东部其他国家的模式不一致，因为这些国家多数是没有武装的。简单来说，苏联–古巴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化改造只能被视作对该地区的武力投射。”

然而，在1983年10月之前——也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的营地被炸之前，对美国政府来说，格林纳达问题还一直只是说说而已。莫里斯·毕晓普不仅招致美国总统的反感，而且惹恼了他的一些同事，他们废黜了他，将其逮捕并处决了。这一政变震动了整个东加勒比海地区，那儿的几个小岛国的领导人担心格林纳达的暴力活动会蔓延，于是他们紧急联合起来，请求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里根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接到了这一请求，当时他正与乔治·舒尔茨和唐纳德·里甘一起利用周末打高尔夫球。里根并不擅长打高尔夫球，但他喜欢能摆脱华盛顿政务缠身的感觉和与戴维营不同的景致变化。里根与南希在周五下午抵达，周六凌晨4点，他被罗伯特·麦克法兰的电话吵醒。麦克法兰刚刚接替威廉·克拉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原因是克拉克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得过于抢眼，疏远了与南希之间的关系。南希后来在提到克拉克时说：“我从没有与他真正交好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权力享受者——尤其当他在全国游山玩水时声称自己代表罗尼时，而通常这并不是实情。我对罗尼说起过，但罗尼喜欢他，因此，他待的时间比我希望的要长。”麦克法兰打电话说，总统需要听一下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最新消息。里根披上睡袍，在当时他跟南希下榻的奥古斯塔俱乐部中艾森豪威尔小屋的客厅与麦克法兰和舒尔茨见面。乔治·布什在华盛顿通过电话也参与其中。

麦克法兰传递了来自加勒比地区领导人要求美国介入的请求。他和里根的其他顾问指出，除了该岛屿的战略作用之外，在格林纳达还有一件事与美国利益攸关。数百名美国学生正在首都圣乔治的一所医学院上学。舒尔茨曾与美国驻巴西大使、军界前辈托尼·莫特利讨论过此事。“我们都对1979年的德黑兰记忆犹新。当年11月4日，66名美国人从我们的使馆被掳走，并被扣为人质长达一年多。”舒尔茨回忆说。舒尔茨没有证据表明，格林纳达新统治者打算抓走哪个学生，但随着他们的加勒比邻国请求美国介入，格林纳达人有可能会认为扣押人质或许是先发制人，阻止美国介入的一种方法。

里根对伊朗人质事件的记忆甚至超过了舒尔茨，因为赢得大选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人质。他不打算冒险，给自己带来类似的人质事件。“我问麦克法兰，五角大楼认为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做好营救行动的准备。”总统回忆道。他指的是抢先救出这些学生。麦克法兰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说48个小时以内可以开始行动。

“那就行动吧。”里根命令道。

总统后来承认，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美国学生或格林纳达，他担心的是美国会因为越南记忆而变得失去勇气。里根在卸任总统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深知越南战争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但我认为，美国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里根意识到，格林纳达并不是插入美国心脏的利刃，然而他却可以利用它来阐明自己的立场，从而防范其他的利刃。

仅仅数小时之后，贝鲁特爆炸的消息更加促使他表明立场。中东地区的复杂局势阻止他在黎巴嫩随心所欲地采取强硬行动，但这些掣肘使得美国更有必要在其他地区展示美国的力量。

对格林纳达进行打击的准备工作正在秘密进行。里根不希望让格林纳达政权有所警觉，因为他们可能会抓住学生进行自卫。他也不希望让国会听到风声，防止某些议员出于政治目的而走漏风声。里根后来说道："我怀疑，假如我们把这次行动告诉国会领导人，即使是在要求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向媒体泄漏消息，并会预测说，格林纳达将成为'另一个越南'。"

里根也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保密。格林纳达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而首相已然告诉里根，她认为美国无权干涉那里的事务。里根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不想与其争辩。"我想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唯一一位可以威胁罗纳德·里根的人。"霍华德·贝克后来说道。贝克是根据自己对两位领导人的了解讲这番话的，因为在格林纳达事件的危急关头，他无意中听到了里根和撒切尔的对话。入侵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于是总统下令发动进攻。此刻，里根慢慢地揭开了面纱，他把贝克、他的民主党同僚罗伯特·伯德以及众议院领导人蒂普·奥尼尔和吉姆·赖特召集到总统住处，进行秘密通报。通气会刚刚开始，白宫管家就走进来，说道："总统先生，首相的电话。"里根起身去接电话。贝克回忆说："他离开椭圆形客厅，来到隔壁房间，关上了门。但是，就像许多听力不好的人一样，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听得一清二楚。他说：'玛格丽特'——长时间的停顿。'可是，玛格丽特'——他大概说了三次，回来的时候有些局促不安，说道：'撒切尔夫人对此次行动表示强烈抗议。'"

然而里根拒绝改变主意。入侵行动继续进行，几个小时之后，总统解释说："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来自加勒比地区六个民主国家和美国的部队一起，开始在加勒比东部的格林纳达岛登陆。"加勒比的武装力量只是象征性的，正如美国政府暗示的那样。里根继续说道："我们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采取这一决定性的行动。首先，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护无辜的生命，包括上千名美国人，他们的个人安危理所当然是我最为关注的；其次，是为了先发制人，阻止进一步的混乱；再次，是为了帮助格林纳达这个岛国恢复法律与秩序，恢复政府机构。因为当地一伙残忍的

左翼暴徒通过暴力攫取了权力。”

里根的第三个理由明确表明，他不仅仅满足于把学生撤离出来，他还要推翻格林纳达政府，让一个他喜欢的政府取而代之。这符合那些请求美国介入的加勒比国家的要求。尤金妮亚·查尔斯是多米尼加的总理，同时担任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主席。她同里根一起参加了白宫的发布会，说道："我们都对近期发生在格林纳达的事件感到非常震惊。作为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意识到我们属于同一地区——我们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我们这几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人住在格林纳达——我们非常担心这类事情会再次发生。"查尔斯说，格林纳达的政变倒行逆施，阻碍了这个国家迈向民主的缓慢进程。"这就意味着格林纳达人从来没有得到机会自己选择他们想要的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确保他们有机会这样做。"

一位记者问里根，在格林纳达的美国人是否安全。里根回答说，据他所知，他们是安全的。另外一名记者问美国军队将在格林纳达待多长时间。里根回答说："我们不清楚会待多久，我们希望尽快撤出，因为我们在那儿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掌管他们自己的事务。"

有人问到主权问题。"总统先生，您认为美国有权入侵别的国家、改变它的政府吗？"

尤金妮亚·查尔斯插话道："但我认为这不是入侵行为。"

"那是什么？"这名记者追问道。

"这是我们请求支持的结果。"查尔斯说道，"我们属于同一地区，格林纳达是我们的一部分—"

"但是，你们都是主权国家，不是吗？"这名记者打断了她的话。

"——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确保格林纳达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自

由，来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

里根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这些国家曾是英国殖民地，自由之后，它们自己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要彼此支持，而格林纳达是这些国家中的一员，也签署了这份协议。”格林纳达在签署这份协议的时候，其政府是宪政民主体制，因而比当前的非宪政政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目前采取的这次行动是在现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

行动进展得迅速而顺利。里根在两天后对美国人说道：“我对我们的军队赞不绝口——陆军游骑兵和伞兵、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他们计划周密，行动果敢。”这支部队占领了格林纳达的两个机场，确保了学生居住学校的安全。里根说他们没有耽搁片刻，及时赶到了当地。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在那个重要机场工作的古巴人是军队预备役人员。“事实证明，其人员数量要大得多。我们抓获了他们中的600人，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基地，缴获了武器和通信装备。这充分表明，古巴占领这个岛国是经过精心密谋的。”里根描述了美军占领的一处仓库：“仓库里堆满了武器弹药，几乎堆到了房顶，足以装备上千名恐怖分子。曾有人跟我们说，格林纳达是一个友好的岛国，是旅游的天堂。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它正在被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军事堡垒，用以输出恐怖活动，破坏民主政治。我们赶到的正是时候。”

此次入侵行为招致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谴责，谴责它践踏格林纳达主权，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投票谴责美国政府。战后报告显示，美国学生从没有遇到过危险，美国政府夸大了古巴的影响。

里根毫不退让。记者海伦·托马斯询问里根，联合国大会的压倒性投票是否烦扰过他。里根回答说：“这根本没有打搅我吃早饭的心情。”另外一名记者请他解释一下，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与苏联入侵阿富汗有何区别。里根回答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这是一次营救行动，是一次成功的营救行动。被营救出来的人们以及被解放的格林纳达人民欢欣鼓舞，对我们到达那里的部队充满感激之情。”另外一名记者

想知道，格林纳达行动的成功是否会使总统在其他地区也倾向于动用武力。里根避开了这一问题，说任何其他局势都是不一样的。第三名记者说，尼加拉瓜政府声称，里根正准备下令入侵它们的国家。这是真的吗？

里根笑了起来，好像正在考虑这一问题。他当然希望桑地诺解放阵线能够注意到美国的强大力量。如果它们感到担心，那再好不过了。里根没有太过否认他们的说法，说道："自从那些人上台以后，我从没有相信过他们的话。你也不应当相信。"

61

里根上台的第二年，他的岳父洛亚尔·戴维斯病重。“南希对于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忧，这在情理之中。”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戴维斯和南希的母亲退休后回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戴维斯生病后，南希不得不频繁地从华盛顿出发，飞来飞去。里根喜欢他的岳父，也很尊敬他，自然也就很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但他更担心的是他的精神健康状况。里根写道：“他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现在我想，他或许平生第一次知道害怕了。”里根无法像南希那样腾出时间去看望他，但他希望自己能那样做。他说：“我非常想跟他谈论一下信仰的问题。此时此刻，我认为他应当皈依上帝，我非常希望能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然而，里根一直没有时间。几个月后，戴维斯去世了，里根没有来得及跟他谈论信仰问题。

宗教信仰方面的谨慎表现是里根的一贯原则。普通人，甚至与他关系很近的人有时也会怀疑他到底是否有宗教信仰。埃德温·米斯后来说：“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但是，南希和他的孩子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里根的宗教信仰，因而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对此都是一笔带过。罗恩·里根回忆说，他父亲认同某种现代的天定命运论。他这样写道：“‘我禁不住认为，上帝把美国置于两个大洋之间是出于某种目的。’他过去常常带着一种坚定的率真这样说。”罗恩还记得小时候家人一起到贝莱尔区的长老会教堂参加主日礼拜的情景。但除此之外，他父亲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秘而不宣。罗恩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圣经狂热者。”

作为总统，里根会援引宗教内容来点缀自己的演讲，使得“上帝保佑美利坚”成了在他之后每一位总统演讲的标志性结尾。在其日记和私

人信件中，里根偶尔会写上一两句带有宗教色彩的句子。然而，他的信仰远没有像，比方说，吉米·卡特的信仰那样显而易见。每到周日，他更愿意去往戴维营，而不是教堂。里根解释说，他的到场可能会干扰礼拜活动——这一点的确如此——但他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他表示，在自然当中同在任何建筑之内一样，都可以感知圣灵。在第一年任期内，他在戴维营过周日的时候写道："不在教堂内过周日很让我烦闷，但大家不知道我无法解决安全问题。我前往那里对其他人来说是种危险。我希望上帝明白，就像今天早晨这样，每当我身处美丽的森林和乡村的时候，我的心总是在教堂。"

然而，里根偶尔也会公开谈论宗教信仰。他曾在1980年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简短地谈论过，也在1983年3月更为详细地讨论过，当时他前往佛罗里达州，在全美福音派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大约就在南方民主党人成为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的时候，保守的基督教徒成了共和党政坛的顶梁柱。一位共和党募捐者以总统作为号召人物，同时囊括了观众中的许多人。这位共和党人在他演讲之后被安排同总统住在同一家宾馆。因此，里根对于自己受到的礼遇并不感到惊讶。他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欢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对观众表示感谢，不但为了他们当天下午的掌声，还因为他们在其他场合提供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总统说道："谢谢大家的祈祷。我和南希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了这些祷告的存在。相信我，对我们来说，这些祈祷意义重大。有一天，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有人问我是否知道那儿所有的人都在为总统祈祷。我的回答是：'是的，我知道，我感觉到了。我相信祈祷的力量。'"他说，自己以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信仰。"我还要提一下那个提问者。他又问我，有时候当他在祈祷时遇到了忙音是怎么回事。我说那只是因为我在那儿先于他祈祷了。"里根的听众发出会心的笑声。

里根又讲了另外一个笑话。"有一天，一位福音派牧师和一位政客

一起来到天堂门口。圣彼得在办完一切必要的手续之后，带他们参观了一下他们的住处。他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小单人间，里面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告诉他们这是牧师的房间。那位政客有点儿担心为自己准备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彼得在一座漂亮的豪宅前停下来，这座豪宅环境优美，仆从成群。当彼得告诉他这是他的住所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禁不住问道：‘请等一下，一定是搞错了。我怎么能住在豪宅里，而那个虔诚的圣徒却只得到一个单间呢？’圣彼得说：‘你必须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但你是第一个来到天堂的政客。’”里根的听众哄堂大笑，表示赞同。

然而，里根并不希望福音派信徒感觉到他们和他们的宗教在政坛没有地位。相反，他肯定了基督教在美国政坛和公众生活中的历史根源。里根引用威廉·佩恩的话说：“如果我们没有被上帝主宰，那么，我们肯定会被暴君主宰。”他又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上帝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他还引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说：“在所有能够带来政治繁荣的特质和习惯之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最后，他引用的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话。这位法国保守分子在更为深远的层面探究了美国民主的秘密。“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聆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和激情的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伟大和美国精神。美国是虔诚的。假如美国不再虔诚，那么，美国也将不再伟大。”听众更热烈地鼓掌，这次的掌声非常严肃，许多人点头赞许。

里根感谢他的听众，正是他们让美国保持虔诚，美国才得以保持伟大。他解释说，他的政府支持他们努力在美国生活中维持宗教和信仰的作用，这并不容易。“我无须告诉大家，这样做会使我们与许多人的主流态度相悖，或者至少是不合拍。这些人已经投向了当代世俗主义的怀抱，抛弃了久经时间考验的、一直是我们文明基石的价值观。”里根没有怀疑世俗主义者的良苦用心，但他认为他们的行动带来的结果是致命的。他们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把原本属于个人的东西归为政府所有，

用他们无神论的价值观取代经过考验的宗教信仰。

里根举了一个例子。“有这样一家民间组织，它非常关心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孩们不断增加的非法生育和堕胎。前段时间，该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诊所网络，向这些女孩提供帮助，希望缓和这种形势。”里根重申，他并无意指责这些人的初衷，但他们的行动败坏了道德。“这些诊所决定，在这些女孩们的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她们提供建议、避孕药和避孕工具。”里根说，他曾命令接受联邦资助的诊所要通知女孩们的父母，但世俗主义者强烈抗议。“我国一家主要报纸在社论中创造了‘告密规定’这个词语来反对我们这样做。他们批评我们侵犯了年轻人的隐私。最近，一名法官批准了一项禁令，反对我们执行这一规定。”里根大声质疑这个国家意欲何往。“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专家讨论这一问题。专栏作家们自以为是，武断地批评我们的错误，仿佛没有人提及道德在性行为中的作用。难道所有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都错了？难道我们都应当相信，如此神圣的事情只能被看作完全是身体上的事情，不会带来潜在的感情和心理上的伤害？难道父母不应当有权给他们的孩子以建议和忠告，让他们避免犯下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的错误？”福音派信徒们跳起来大声喝彩。

里根发誓要为维护父母的权利而对抗世俗的攻击，同时他还要在其他阵线展开战斗。他已经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宪法修正案，要求把祈祷重新引进课堂。里根很高兴地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两党人士支持这一修正案。我呼吁国会加紧行动，通过这一修正案，让我们的孩子学会祈祷。”里根政府支持立法来保证学生宗教团体同非宗教团体享受同样的权利，在放学后都可以使用学校的设施。

里根又转向了大部分听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10多年以前，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基本上清除了50个州关于保护未出生婴儿权利的规定。”他说道。里根指的是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现在，每年要求进行的流产能夺走超过150万未出生婴儿的性命。结束这一悲剧的人类生命

立法终有一天会在国会通过，你我必须永不放弃，直至成功。除非能够证明未出生婴儿不是生命体，否则它的生命权、它的自由、它追求幸福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听众发出热烈的掌声。

里根知道自己的听众感到四面楚歌，许多人喜欢这种感觉。然而，里根提醒他们，有迹象表明，他们关心的事情有所进展。“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了不起的精神觉醒，这是传统价值观的复苏，也曾是美国虔诚和伟大的基石。”里根说道。他引用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远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虔诚。每20个人当中有19个人信仰上帝，绝大多数人对圣经十诫相当认真。“另外一项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反对通奸、少年性行为、色情作品、堕胎以及烈性毒品。这项研究还表明，美国人十分看重家庭关系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当然，美国远非完美。里根说道：“世上还存在着罪与恶，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存在着必须与之斗争的罪恶。”但是，美国曾对付过罪恶，也将继续斗争下去。“我们这片土地的荣耀就在于，它有能力超越我们过去的道德陋弊。比方说，少数族裔长期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曾经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现在却成了所有美国人的骄傲。我们一定不能重蹈覆辙。这个国家不再会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种族仇恨的空间。”里根告诫听众一定要公开反对那些想要把国家带回过去的人。“我知道，就像我一样，大家对那些宣扬盲从和偏见的某些充满仇恨的团体的死灰复燃感到恐怖。利用你们布道讲坛强大的声音和你们教会强大的立场，在我们当中声讨和孤立这些充满仇恨思想的团体。我们得到的戒律简洁明了：‘人应当爱人如己。’”

里根说，美国一直是人类最大的希望，是人类自由的火炬手。至此，他开始结束自己的演讲，谈到了这个国家为世界正义进行的斗争。“在我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回答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当时我指出，作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领导人曾公开

宣称，他们所认可的唯一道德就是能发展他们的事业，就是世界革命。我想我应当指出，我当时只是引用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列宁的话。他在1920年说，他们反对所有产生于超自然思想的道德——那是他们给宗教起的名字——或者来自阶级观念之外的思想。道德完全屈从于阶级斗争的利益。一切有助于消灭昔日剥削社会制度、团结无产阶级的事物都是道德的。”

苏联人让道德屈从于国家需要的做法使得他们与美国人以及其他将道德置于首要位置的人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使得与他们的谈判变得复杂。里根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隔离起来，拒绝寻求他们的理解。我打算尽我所能，用我们的和平意图说服他们，提醒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拒绝使用核垄断来获取疆土利益的是西方世界。”

但这的确也意味着美国人必须了解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和政权。“的确，让我们为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能得到救赎而祈祷——祈祷他们可以发现认识上帝带来的快乐。但在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只要他们宣扬他们的国家霸权主义，宣扬其对于个人的无限权力，预言说它将最终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那么他们就是现代世界中的罪恶之本。”

里根说，人们普遍拒绝承认这一事实，这妨碍了他对付苏联和削减军备竞赛的工作。这种拒绝不久前又以呼吁“冻结核武器”的形式出现——停止新武器系统研发。里根解释说，冻结核武器的做法对于苏联过去的核武器建设是种奖励，却阻止了美国修正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因而实际上阻碍了军备管制，尽管这种管制是提倡冻结做法的人所赞同的。总统认为，有关核武器政策的谈判会变得艰涩难解，导致非专业人士甩手不干。他提醒自己的听众要警惕此类错误。“我恳请大家提防被自满所诱惑——傻傻地宣称自己超然于外，说双方的错误是一样的，从而忽略了史实和邪恶帝国的侵略欲望，只是一味地把军备竞赛称作大国间的

误解，从而将自己置身于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之外。”

没人能够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很重要，但在此我想补充一点，即我一直认为，世界目前发生的斗争永远不会靠炸弹或火箭来解决，也不会靠军队或军事实力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危机是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次对道德意志和信仰的考验。”

62

当里根的听众在演讲最后跳起来鼓掌的时候，记者们翻看着他们的笔记，寻找可以在当晚和第二天用作头条报道的内容。“邪恶帝国”是个合适的短语，而“现代世界中的罪恶之本”可以在版面允许的情况下详细展开。里根大部分的保守派支持者们同福音派信徒一道为总统坦率的发言而鼓掌，然而，他的自由派批评者们则对他的道德说教颇有微词，认为这种说法没有益处。

双方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把握里根演讲中的要点。总统认为，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免除美国人必须与之周旋的义务。在这一点上，里根与缓和紧张局势政策的设计师理查德·尼克松并没有太大区别。尼克松从没有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可知论者，他只是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与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以防双方最终毁掉世界。里根的结论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提醒福音派信徒要警惕，不要认为他们超越于大国关系政治之外。

里根在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政策的同时——中美洲、加勒比地区、波兰以及中东地区——他从没有忽略苏联。苏联的核武库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种威胁是其他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所无法企及的。从担任总统伊始，里根就在思考和算计，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如何减少苏联的军事威胁。里根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恰恰体现了他的想法，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基本思想。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寻求对付苏联的实用主义政策和不带偏见的政策。就像在政策的其他领域一样，里根展现了自己十分擅长说一套做一套的一面。

但首先，里根必须给苏联一种动力来商讨裁军问题。这就需要国会资助他进行关键领域的国防建设。国会中的民主党整体上从没有喜欢过里根的国防计划，在每一轮的预算谈判中，他们都会一点点儿地除掉那些他们认为过度浪费或过于昂贵的项目。在其批评者的心中，洲际导弹符合这两个标准。提出洲际导弹计划是为了解决美国现有陆基洲际导弹武库所面临的两大问题：美国导弹的老化和苏联导弹精准度的提高。要想提高导弹小型化和制导能力，美国军队建设者就有必要在单枚火箭上安装独立制导的多弹头，让一枚发射器具备现有导弹多倍的打击能力。这样就会抵消苏联导弹的精准度，因为假设即使只有小部分洲际导弹躲过了苏联的攻击，它们依然可以摧毁苏联境内的大部分目标。苏联领导人在进行世界末日大战的考虑时，就很可能会打消攻击的念头。

另一方面，鉴于核战略本身固有的悖论，苏联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既然洲际导弹配备了这么大的打击能力，那哪怕是干掉其中的几个也是非常诱人的。一枚苏联导弹就可以拯救多达10个苏联城市。如果这样测算的话，那洲际导弹计划很可能会无助于他们打消攻击的念头。

它们也可能让他们打消念头，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减少洲际导弹的弱点。导弹可以部署在加固的导弹发射井里，为的是抵挡住除了被苏联导弹直接击中之外的所有攻击。或者可以让导弹秘密移动。隐蔽性和机动性是美国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其中一支力量的根本。这种依靠潜艇发射的导弹可以藏在波涛之下，不断地移动。（三合一中的第三支力量是通过飞机发射炸弹和巡航导弹。这也具有机动性，但在当时隐蔽性较差。）这两种减少导弹弱点的方法——加固和增加机动性——是五角大楼的武器设计人员在研制洲际导弹时所寻求的目标。

但这两种方法费用都很高，因而招致民主党人和那些一直抱怨里根养肥了国防部、饿死了社会项目的人的抵制。一些批评者质问，为什么美国需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难道二合一或者哪怕是一支核力量还不够吗？另外一些批评者认为，洲际导弹会破坏世界稳定。许多人引用艾森

豪威尔的话，强烈要求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必要从国家安全中分离出去。

然而里根认为，洲际导弹是不可或缺的。他在上台第一年间曾去往新奥尔良。在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回到华盛顿之后，我听到了可能是任何总统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要为了我们未来的国防需要，我们必须批准战略导弹计划和轰炸机建设计划。"里根批准资助100枚洲际导弹，开始启动这一计划。

把新式武器列入预算是一回事，而通过预算又是另外一回事。在1982年政府内部的预算战争期间，洲际导弹计划一直是让戴维·斯托克曼和其他赤字鹰派心动的攻击目标。他们不想让这一计划流产，只是想推迟它。里根和他的洲际导弹盟友们——尤其是卡斯帕·温伯格——不得不奋起力争，保证这一计划一直是关注的焦点。1982年5月，总统批准了一项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强调推进洲际导弹计划对于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这项指令中写道："我们绝对有必要保持洲际导弹项目的发展势头，我们绝对有必要在1986年达到初步作战能力。"为了表达得更具体，这份指令补充道："届时，洲际导弹的研发将会完成，可以有足够的部队使用100枚战备导弹。"

国会中的民主党依然反对，他们开展反对洲际导弹计划的活动以及他们认为五角大楼无节制行为的活动。尽管他们在1982年国会选举的胜利——民主党在众议院得到了26个席位，而在参议院也保住了原有席位——主要是由于经济衰退的原因，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成功理解成是选民授权他们阻止洲际导弹计划。里根预测说："我们要有麻烦了，民主党人会企图取消整个计划。我们需要全场紧逼来实现它。如若不然，我不敢想象它将对我们在日内瓦的裁减军备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里根的担心凸显了洲际导弹计划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双重目的。他认同洲际导弹计划支持者的观点，即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危及到了美国现有的陆基导弹装备。他认为，洲际导弹就其自身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也看到了这一计划在他同苏联人谈判中的作用。如果国会批

准洲际导弹计划，那就表明，美国有决心以导弹来对抗苏联的导弹。而莫斯科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花费方面超过美国人的时候，也会回到谈判桌前，认真讨论裁减军备问题。或许裁减军备行动会包括裁减一些提案中的洲际导弹。倘若如此，那么，这些导弹不用装备就达到了目的。

谈判人员通常会紧紧攥住手中的底牌，里根在作为演员工会代表与电影公司谈判时也曾这样做过。然而，对于为了裁军目的而大力发展自己核战略的方针，他却是相当公开的。“美国希望大幅削减世界上的武器库，但除非我们表现出坚强的意志，重建我们的军事力量，恢复军事平衡，否则遥遥领先的苏联是不会有意与我们谈判的。”里根在一次电视演讲中对美国人说道：“请让我再重复一下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除非我们表现出坚强的意志，重建我们的军事力量，否则，苏联是不会有意与我们谈判的。倘若我们没有开始现代化建设，那么，苏联谈判人员就会明白，我们除了空谈之外是没有谈判资本的。”

民主党人并不买账，他们继续反对里根的战略导弹升级计划。里根私下里抱怨说：“蒂普·奥尼尔发动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运动来抵制洲际导弹计划。”这件事让里根再次对这位众议院议长抱有成见。这可能是最可恶的一件事，因为它超出了政治范围，涉及了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

63

即使是在为洲际导弹计划努力的时候，里根就已经开辟了惊险的军备竞赛新战线。1983年3月，他在佛罗里达对福音派信徒发表完演讲之后，总统就国家安全问题对全国发表演讲。他的语气明显不同，他唯一的主题就是道德制高点。“美国不会发动战争，我们永远不做侵略者。”里根说，美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但其防御力量必须强大。里根重申，美国的军事力量没有跟上苏联的步伐，因此，目前需要加紧军备建设。冻结核武器的倡议很危险，会对苏联非常有利。洲际导弹计划对于美国政策中势力对等的目标非常关键。国会议员必须坚持到底，而美国选民必须要求他们这样做。“我们必须坚持恢复我们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就会向盟友和敌人发出同样的信号，表明我们正在衰退，缺乏意志。”

至此，这篇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陈词滥调。新颖的部分出现在演讲结尾。里根提醒电视观众，美国的核防御政策是建立在通过报复性的威胁达到威慑目的的基础上。苏联不会攻击美国，因为它清楚自己也会被毁灭，或许会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一起被毁灭。威慑一直在发挥作用，或者至少说它没有失败过。然而，里根发现，威慑还远远不够。“我越来越深信不疑，人类精神必须能够超越并摆脱其他国家和人类，威胁他们的生存。”这必定需要另外一种办法。军备控制是一个明显的选择，也是政府一直承诺的。但在现有威慑框架内的军备控制会让世界上数十亿人成为被瞄准的目标。里根说：“这是对人类现实的悲观评论。难道拯救生命不比替他们报仇更好吗？难道我们就无法展示我们的和平意图，运用我们的一切力量和才智取得真正永久性的稳定吗？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并且我们必须做到。”

里根所提议的是保护美国免于核攻击的防御技术。他说，这种技术将会给人类的希望和期望带来变革。“假如自由世界的人们能够安全地生活，知道他们的安全不用依赖美国需要报复性的威胁来打消苏联的进攻念头，因为我们可以在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们的国土，或者我们盟友的国土之前，就破解并击毁它们，那该有多好啊！”

里根承认，构建他设想的防御体系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是一件艰难的技术性任务，在20世纪末可能不会实现。”然而，当前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开始尝试。“难道没有必要进行投资来让世界免受核战争的威胁吗？”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明白，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于是，里根开始采取关键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下令开展一项全面和深入的工作，制订一项长期研发计划，开始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消除战略核导弹带来的威胁。这可以为消除这些武器的军备控制措施铺平道路。”没有核武器，没有核恐惧是我们的目标。建设这一新世界的征程马上开始。“今天晚上，我们将启动一项计划，有望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在他自己革命的某些方面，里根起步较晚。与“里根革命”相关的关键概念——更小的政府，更低的赋税——在他上台之前就已经为保守派所认可。但通过表达自己关于没有核武器世界的构想，里根开始引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比他之前所尝试的所有事物都更加具有冒险精神。

他和他的政府对战略防御计划（SDI）的叫法标志着这场革命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想法在里根的头脑中浸淫了数年。卡斯帕·温伯格回忆说：“在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了这种并不令人惊讶的观点，即我们最好能够把我们的国防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这种军事力量不但要具备攻击性，比如导弹自身，而且要具备防御对方导

弹攻击的特点。”

里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许多非专业人士都认为，防御核导弹攻击是个极好的主意。但没有人指出，如何能实现这种防御。弹道导弹——这是一种向上发射进入太空，然后向下猛冲进入大气层的导弹——以每小时数千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这一速度比现有和计划中的任何拦截武器都要快很多。并且，因为敌方导弹攻击的潜在目标分散在美国广阔的国土上，所以不可能知道应当在哪里部署拦截武器。最后一点，已经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某些来袭火力——无论是弩箭、火枪子弹还是从飞机上投下的炸弹——总能设法突破防御。在核武之前的年代，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在核武时代，即使只有几枚导弹突破了防御之盾，也会造成数百万人的伤亡。

鉴于这些原因，核战略家们把他们威慑的希望寄托在“同归于尽”的概念上，简称MAD。MAD这一概念从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十分高兴。这需要那些手指放在核起爆器上的人的理性，而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理性曾无数次丧失。这还需要苏联领导人能够在看待危机时同美国领导人观点大致一致。MAD的方针引发了利用核武器进行欺诈的行为——术语上称作“战争边缘政策”——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暗示或公开威胁发动核战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的东亚危机时曾扬言要动用核武器；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曾针对古巴的苏联导弹推出过核战边缘政策。在这些情况下，苏联方面拒绝考验美国的决心。但是有人怀疑，这些只是因为运气好，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情况还会重复上演。

关于MAD，我们可以说的最好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可行的选项中危害性最小的一个。它最大的危害是道义上的破产，挟持数百万无辜民众来迫使世界领导人找寻解决方案。它摧残了所有生活在核武器阴影下的人的生活。它也终将失败，因为人类是一种不够完美、居心叵测的生物。同时，它迫使冷战双方接受荒诞的悖论，即各方所能做的最危险的

事情是发展防御体系。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苏联领导人得知美国要部署防御盾牌，用来抵挡苏联导弹，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在这一防御体系投入使用之前发动攻击。即使他们感到没有战争威胁，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因为无懈可击而感到欢欣鼓舞，并根据自己的臆想而行动。

里根没有研究过核战略，也从没有专注于这一战略之中灵魂扭曲的秘密。但他的本能告诉他，MAD是错误的，他讨厌MAD让他所处的立场。里根的儿子罗恩回忆了与父亲讨论这一严肃话题时的情景。罗恩说："几年前，在我父亲公布战略防御计划之前，我曾跟他谈起过针对核攻击的某种保护伞防御的可能性。身为总统，父亲最大的担忧——人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一个人——是这种想法，即由于误解、预见不到的形势或者某种匪夷所思的技术故障，他要被迫启动我们的预警核导弹。'我必须承认，苏联人民和我们的人民是一样的。'他跟我说，'该死，他们是他们自己政府的牺牲品。为什么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必须死掉，同我们的数百万人民一起死掉，因为双方领导人无法解决问题？'"里根希望，有朝一日，双方领导人可以解决问题，消除核武器。在这之前，战略防御应当是避免灾难的最大希望。

里根的军事顾问们愿意帮助他摆脱"同归于尽"的战略考量，尽管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卡斯帕·温伯格同意里根的思想，对现有的战略方针也不满意。他尤其痛斥了那些将这一方针当作他们职业生涯试金石的那些专家。温伯格说道："对那些懒散的、一味地从两国报纸上读取安全和战略方针的人来说，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另一个国家导弹攻击的想法不但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该遭天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在确保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战略防御会弥补而不是替代战略进攻之后，同意寻求"同归于尽"之外的方针。冷战期间，美国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几乎从没有反对过用于军事上的新花费，而今里根的官员们也没有反对。

政府内部的一致意见形成了一份国家安全决议指令，总统在1982年5月签署了该指令。指令命令继续研发洲际导弹，并补充说：“对于弹道导弹防御的研发将继续用以防护苏联反弹道导弹的突破，协助我们评估苏联的弹道导弹防御活动，并提供提高洲际导弹不易被摧毁的能力的替代方案。”

从动员公众意见的角度来说，这份决议指令浮夸的语言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海军作战行动总司令詹姆斯·沃特金斯上将向总统提交了他正在谋求的行为准则。他非常讲究地问总统：“假如我们可以开发一种体系，用以保护我们的人民，而不是为我们的人民报仇，这样是否会更好一些？”里根用力点了点头，说道：“完全正确。”

与几乎其他所有的演讲相比，里根花费了更多的精力来斟酌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演讲。他在完成了草稿之后对自己说道：“其中的大部分工作是要把官腔改成人们愿意倾听的语言。”他邀请了由外交官、科学家、军队军官和国家安全专家组成的特殊群体前来白宫听他演讲。演讲之后，里根与大家面谈。他在当晚晚些时候写道：“我猜想这篇演讲还不错。他们都把它捧上了天，好像认为它会成为将来争论的根源。”

在预测自己的战略防御提案可能会带来争议这一点上，总统是正确的。批评者们马上借用乔治·卢卡斯导演的电影，称其为“星球大战”，并认为这根本不现实，完全是宇宙幻想。五角大楼那些胆小鬼们在政府试图削减其他一切开销的时候，虚构了一个理由，以期获取新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核战略方面严肃的研究人员预测说，苏联的反制措施——主要以攻击型导弹为主——比美国的防御措施花费要少，其结果就是，美国将花费大量金钱，却得不到持久效果。专家还引用防御部署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来说明问题，这种不稳定至少会出现在MAD和SDI之间的过渡期。玛格丽特·撒切尔也附和这种担忧。她对里根说：“罗尼，这将会使你看起来要首先发动攻击。”

里根几乎从没有让批评使自己偏离自己坚信的目标，现在他也拒绝让批评影响到自己。相反，他倾听了白宫工作人员提供的赞美之声。里根在公布SDI之后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关于昨晚演讲的报道如雪片般飞来。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演讲所得到的最大回馈——电话、电报，等等，大量的报道对我有利。”

64

里根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十分认真，就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但他也十分清楚，苏联领导人也在关注这一问题，尽管当时，他们的领导人还没有确定下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4个月前，也就是1982年11月去世了。这位长期主政的苏联领导人病了几个月，使得军备控制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里根希望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可以推进谈判进展。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谈论他是否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与其继任者会面，无论这位继任者可能是谁。他们最后决定总统不去，因为不确定此行会有什么收获。里根派乔治·布什和乔治·舒尔茨替他前往。葬礼之后，副总统和国务卿同尤里·安德罗波夫会面。安德罗波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之前担任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主席。布什开玩笑说，他们两人有共同之处，彼此都曾是他们国家的高级间谍，但安德罗波夫没有笑。舒尔茨断定，安德罗波夫是个难缠的对手。他回忆说："与刚下葬的勃列日涅夫相比，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具僵尸，但他的精神力量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让我想起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死敌莫里亚蒂教授，不起眼的身体里全是计谋。"安德罗波夫的出身表明了他的强悍。舒尔茨说："我清楚，安德罗波夫领导克格勃这么长时间，一定非常残忍，也精通宣传。我估计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里根不久，就认同了舒尔茨的观点。总统试图与安德罗波夫建立私人联系，他邀请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来到白宫，说自己希望与安德罗波夫取得直接联系："不要官僚的繁文缛节。"多勃雷宁受到震动，说道："这必将是历史性的一刻。"

里根随即向安德罗波夫提交了一份手写的外交照会，上面写道："我们对维护世界稳定都肩负着重大责任。我相信，我们可以完成

这一使命，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积极地交流信息。”总统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可以绕开正常渠道。“我们的前辈在私下坦诚沟通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安德罗波夫感谢里根发来的照会。他说：“我十分认真地考虑了里面的内容。”但是，如果美国政府真心希望达成军备方面的协议，就需要展示它的诚意，出发点将是美国取消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只要美国没有开始在欧洲部署其导弹，就依然有可能达成协议。”安德罗波夫说道。一旦开始部署，则绝无可能达成交易。里根还曾提议探讨中美洲和东欧问题，安德罗波夫回应道：“那儿有什么好谈的？”苏联方面的政策一贯是遵循国家主权的原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无论它们身处何方，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里根意识到，如果安德罗波夫坚持这样的说法，那他不会有所收获。波兰有主权吗？然而，里根继续努力，他在回信中维护了自己关于中程导弹的政策。他说：“它们的唯一作用是要平衡苏联装备对欧洲的潜在威胁，并确保未来没有人会怀疑西欧和北美的安全问题完全是一回事。请注意看清我们的观点，假如我们针对苏联的盟友部署新型的、具有高度威慑力的武器，然后坚持说，苏联不能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平衡，那苏联的反应又会如何呢？”里根没有期望立即签署协议，但他再次表达了希望可以直接沟通的愿望：“我想，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要么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或者至少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更加慎重地考虑对方的态度。”

1983年9月，里根对安德罗波夫所抱有的这种渺茫的、向前发展的希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架从纽约出发，途经安克雷奇前往首尔的韩国航空KAL007客机在航行过程中偏离了航线。这架飞机误入苏联堪察加半岛上空，然后又进入库页岛领空。很明显，飞行员、机组人员以及乘客从没有意识到他们偏离了航线，或者他们正在飞临苏联导弹基地。

他们也不知道，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曾进入过这一区域，迫使苏联防空高度紧张。此次由于错误、无知以及猜忌引发的偶然事件导致KAL007客机被一架苏联战斗机击落，造成机上全部269人死亡，其中包括62名美国人，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国会议员拉里·麦克唐纳也在其中。

里根极为震怒。他宣称："我代表所有美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珍视文明价值观的人，抗议苏联对没有武装的民用客机发动攻击。语言已几乎无法表达我们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的憎恨。"

在随后的几天内，里根详细阐述了此次袭击所暴露出来的苏联制度当中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愤怒、难以置信和深深的悲哀。"阿富汗战争已经表明，克里姆林宫方面接受暴力行为。"但是，此次事件令世界上所有人感到震惊。"苏联这种卑鄙行为使美国几乎不可能与莫斯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对于一个如此鼓吹其和平愿望以及全球裁军，但又如此冷酷迅速地采取恐怖行动，牺牲无辜的人的生命的政权，我们又能做何感想呢？"

里根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反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情局和军方情报人员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击落事件很可能是由于身份误判：苏联方面把这架韩国客机当成了美国的间谍飞机。然而，总统继续将其视为故意行为。他召集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制定美国的对策。国务院和国防部自然到场，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参加进来，但同时参与进来的还有财政部、交通部、美国新闻署以及联邦航空管理局。讨论结果出台了一份由总统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决定要最大化地破坏苏联的声誉，提升美国相应的利益。"苏联的这次攻击行为再次凸显了苏联方面拒绝遵守文明行为常规准则的本性，也因此确定了我们现有的现实主义政策和力量的基础。"这份指令中写道。指令列出了三个重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寻求正义"。"我们必须与国际社会协商，并帮助国际社会讨要正义。"这份指令解释道："文明社会要求惩罚凶手、赔偿损失，制止未来再次发生这种耸人听闻的行为，并提高这种行为的

代价。”美国将说服它的盟友和“小弟”们坚持要求全面解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官方道歉，并惩罚那些责任人。

第二个目标是要“展示对于恐吓的抵制”。在此，其目的是“增加我们的亚洲朋友以及其他人的信心，表明苏联的威胁不会达到其计划中的目的，不会阻碍我们的朋友与我们合作，尤其是在共同关注的安全方面”。

第三个目标是要“提高对于苏联言行不一的认识”。这份指令解释道：“苏联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残忍提供了一次机会，完全改变了他们政权所一直提倡的虚假的道德和政治‘维和者’的观念。这一虚假形象曾让自由世界难以阐明苏联的真正目的。”

这份包含16项内容的清单规定了如何努力实现这三大目标，有些项目结合了外交和公共关系手段。“在联合国安理会力争最大限度地谴责苏联，并广泛宣传会议上制定的声明。”另外一些项目涉及经济和商业措施。“力争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立即达成协议，禁止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家，取消联程客票，采取其他可能的措施来禁止苏联民航总局的运营。”另外，还有一些项目支持美国一直在采取的行动。“再次确认现有的、在苏联击落KAL客机之前就已经实施的美国对苏联民航的制裁措施。”

里根率先垂范，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猛烈抨击了苏联捏造的蹩脚借口。他说：“尽管他们罪行滔天，招致全世界的反对，也证明了他们的犯罪是经过预谋的，但是苏联人依然拒绝说出真相。他们非常固执，拒绝承认他们的飞行员向韩国客机开火。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本国人民，他们击落了一架飞机。他们编造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故事，说在雷达上发现了这架飞机，而后这架飞机又神秘地从他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但没人开火。然而随后他们又指责说，这是我们派出的一架间谍飞机，他们的飞机向这架飞机发射曳光弹，警告这是苏联领空。”里根展示了克里姆林宫方面表里不一的证据，包括发射致命导弹

的苏联飞行员的无线电通信记录。总统解释说，这架韩国波音747客机的外形不可能被错误地当作先前出现在这一领空的美国RC–135飞机——“这是例行飞行”，总统说道。里根再次重申了苏联行动的十恶不赦。“请大家不要搞错，此次攻击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或韩国，这是苏联反对全世界的行为，反对全世界人类关系道德准则的行为。这是一次野蛮行为，来自一个肆意践踏个人权利和生命价值的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在扩张，试图主宰其他国家。”

倘若里根真的是一位更加老道的政治家——像梅特涅甚至是基辛格那样——那他可能就不会那样猛烈抨击制造韩航惨案的体制中固有的邪恶。毕竟，他一直试图劝诱那种体制的领导人回到谈判桌前。而对他们的侮辱——一定是针对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只能让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艰巨。并且，假如总统真的成功与苏联达成军备协议，那他也必须要说服国会来批准，说服美国人民来接受，因为美国人从不喜欢与邪恶之徒谈判。因此，里根对苏联的妖魔化做法让谈判变得比以往更加令人厌恶。

里根不够老谋深算，但他也是很精明的。里根自身很坦诚，但他明白语言和行动的差异。其他一些政府把不同的角色分配给不同的演员，让他们扮演坏警察和好警察。阴郁恐怖的约翰·福斯特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中扮演严肃角色；笑容可掬的艾克[注]是人们喜欢的角色；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努力要让吉米·卡特变得坚强；赛勒斯·万斯力图让他变得灵活。但里根自己一人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通过语言，另一个是通过行动。他在电视镜头前猛烈抨击苏联背信弃义——他表达的真实想法——但他对苏联采取的实质性措施是相当适中的。他中止了美国赋予苏联民航的着陆特权，推迟了一些美苏双边谈判，但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做法。

效果是相当好的。里根令人信服地重申了美国相对于苏联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诉求，为自己赢得了政治利益，也为美国在他所看重的世人的

眼中赢得了利益。但对于那些更关注行动而不是语言的苏联领导人来说——里根一直这样认为的——他让未来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着。

---

1.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编者注

65

里根经常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这表明他对于自己这位民主党前辈感到很亲切。但这种亲切程度超过里根所表达的，或许也超过他所意识到的。两位总统都是在经济动荡和国民士气低落的时候上台主政的，他们都试图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国有和私营企业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罗斯福这位来自东部的民主党人从左翼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私营企业崩溃的问题，他积极创建国有企业。里根这位来自西部的共和党人从右翼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伟大社会”的低迷问题，他积极推进私营企业。罗斯福和里根都认识到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差异，认识到鼓舞与成就之间的差异。罗斯福的巡回演讲和炉边谈话振奋了自由派的士气，但他的政策反映的是对民主党以及全国政治的承受力的精明评估。里根在其现场谈话和电视演讲中，从没有偏离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保守派的宠儿。但是作为总统，当对推进他的事业有利的时候，他会同民主党和自由派达成协议。罗斯福和里根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实用主义者，他们都懂得，一位成功的总统既能提供长远的、令人叹服的远见卓识，又能在短期内取得具体的进展。他们都懂得，总统不是沙皇独裁者，总统必须想人民之所想，即使有时候他们试图让人们想得不同、想得更美好。

里根没有考虑与罗斯福的相似之处，他是个凭直觉，而不是凭分析获取历史和政治知识的学生。（假如罗斯福能够活下来看到里根的表现的话，他也不会考虑两人的相似之处，因为跟里根一样，他也是个直觉主义者。）然而，里根一定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第一任期内的难题之一就是稳定和发展罗斯福第一任期内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使每一次试图抑制它发展的努力都落空了。

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间，社会保障制度历经了数次改革，但每次改革只是增加了其覆盖面和支出，其原因是社会保障深得民心，并且表面上看起来成本不高。只要上班族在数量上远超退休金领取者，那这一制度就不会遭遇严重的资金断流问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支出开始超过收入。分析家认为，在1983年年底之前，这一制度的养老金支票可能会开始遭到拒付而退回。

在其政治生涯早期，里根原则上反对社会保障制度，认为人们应当自己规划退休生活，政府对此没有义务。但随着其政治经验的增加，他发现这一项目深得民心，于是他就从思想到行动改变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提出要缩减社会保障，而不是消除它。里根在1981年的第一次改革中出乎意料地失败了，这就表明需要新的办法。他采取了总统们面对争议问题时惯用的方法：他任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国家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5名由总统选定，5名由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选定，5名由众议院议长选定。这种组成方式——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及每5人小组中来自同一党派的不能超过3人——确保了这个委员会两党联立的特点。该委员会受命制定建议，保证社会保障在长期内有着稳健的财政状况，即使是在向参与者提供适当好处的时候。该委员会应当在1982年12月31日提交其报告，这样可以安全避过中期选举。

里根任命艾伦·格林斯潘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格林斯潘是位经济学家，担任过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总统的其他任命人选包括保德信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全美制造商协会会长以及两位商业顾问；霍华德·贝克任命的是4位参议员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莱恩·柯克兰；蒂普·奥尼尔任命了3名众议员，一名前社会保障理事和一名刚刚上任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助理。委员会成员中有8位共和党人和7位民主党人。

该委员会在1982年间召开了9次会议，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以防

成为说客的竞技场。但它采访了无数专家，查阅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数十份报告，追溯了过去10年间产生的相关问题。

在委员会商讨期间，里根一直没有插手它的工作，当委员会超过预定的最后期限两个星期的时候，他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如果说感到惊讶的话，那就是他对于委员会能这么快结束工作感到很满意。更让他感到满意的是，委员会的报告得到了共和党人贝克和民主党人奥尼尔的一致同意。里根在提到这份报告时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份折中方案。就其本身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表示支持里面的内容，假如这些内容不是两党妥协的结果的话。然而，为了尽快、公正、并在两党联立的基础上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我们必须支持它，并为这一两党提出的方案而努力工作。"

这一方案让一些跟之前的里根一样的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取消社会保障，或者将其私有化。"国家委员会考虑了那些将社会保障项目列为志愿项目的建议，但拒绝了这些建议。"这份报告中写道。该报告还拒绝了根据需要按条件支付的建议，也拒绝了按照所涉及个人的贡献来限制支付的建议。这份社会保障报告的基本框架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设计的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该委员会还是提出了实质性的改革方案。通过把之前被排除在外的联邦雇员和非营利组织雇员吸纳进来的做法，该项目的分摊基数将会扩大；通过有计划地提高社会保障税率，提高服从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收入税率，增加个体经营者的税赋，以及通过对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的收益征税，该项目收到的款项将会增加；通过延迟增加生活费用，或者重新计算这些增加数额，该项目的支出将会减少。

里根开始在10天后的国情咨文中宣传社会保障项目的一揽子计划。他对国会和美国人民说道："历经数月的讨论和僵持之后，负责社会保障项目的两党委员会取得了貌似不可能取得的成就。"玩世不恭者曾预测说该委员会将陷入僵局，就像过去许多华盛顿方面进行的项目那样。

里根说：“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即使是在华盛顿，这些好挖苦别人的人也错了。通过妥协与合作，该委员会的成员克服了他们的分歧，达成了一份公正可行的计划。他们的表现证明，在涉及国计民生问题时，美国人依然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里根引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说道：“在全世界，变革是重中之重。在任何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问题会导致群众多方面的强烈要求。对此，那些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抱残守缺的人是没有准备的。”他再次引用罗斯福的话，说道：“未来取决于那些智慧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意识到大众更感兴趣的是政府，而不是政治。”里根说，罗斯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制订了社会保障计划，当代美国人必须至少要让这一计划再健康发展半个世纪。

里根在国会的听众留意着他的演讲，而他又单独或分组向那些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重复了这些讲话。委员会的提案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白宫和国会的支持，顺利通过国会审议，只不过增加了一条：逐渐提高退休年龄。这种快速高效体现了两党联立的力量。

1983年4月，里根签署了最终的法令。他再次向自己心中的英雄致敬，说道：“今天，我们再次肯定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承诺，即社会保障必须一直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这样美国的老人就可以有尊严地活着。”